

# 目 次

## 第三部 拉薩尔的鼓动

第一章 拉薩尔和萊比錫中央委员会 .....	3
一 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	3
二 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	9
三 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 .....	15
四 萊比錫中央委员会 .....	21
五 拉薩尔的《公开的答复》 .....	30
六 拉薩尔的会战计划 .....	39
七 最初的成败 .....	54
八 法兰克福大会 .....	64
九 全德工人联合会 .....	74
第二章 拉薩尔的策略转变 .....	87
一 萊茵的閱兵和对柏林的冲击 .....	94
二 拉薩尔和俾斯麦 .....	106
三 拉薩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 .....	119
四 《巴师夏-舒尔采》 .....	126
五 拉薩尔和工人 .....	134
第三章 拉薩尔死前 .....	146

## 第四部 党派的爭論

第一章 国际工人协会 .....	159
------------------	-----

---

第二章 拉薩尔的继承人 .....	171
一 存在的矛盾 .....	176
二 意見之爭 .....	181
三 工人的决断 .....	196
四 策略和組織 .....	204
第三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 .....	220
一 哈布斯堡同霍亨索伦的冲突 .....	220
二 普奥战争前的工人阶级 .....	227
三 普奥战争后的工人阶级 .....	241
四 普选权的最初尝试 .....	255
五 社会民主党議會活动的开端 .....	270
第四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 .....	279
第五章 德国的工会 .....	295
一 《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	296
二 汉堡代表大会和紐伦堡代表大会 .....	301
三 工会运动的分裂 .....	316
第六章 社会民主工党 .....	326
一 南德和薩克森的鼓动 .....	328
二 爱森納赫代表大会 .....	334
三 头几次党派之爭 .....	352
注释 .....	372
人名索引 .....	381

## 第三部

# 拉薩尔的鼓动



## 第一章

# 拉薩尔和萊比錫中央委员会

### 一 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

可是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工业无产阶级。普鲁士农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三百五十万人，而大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只有七十五万人。而且在工业人口中，手工业者多于工厂工人；在普鲁士，手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一百万人以上。在德国的普鲁士、萨克森、黑森选帝侯国、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这几个邦中，手工业工人共有二百万人以上，而工厂工人还不足一百五十万人。同时我们不可忽略，一般说来这些数字只是一个约数，具体说来，在所谓的手工业者中包括许多在经济现实中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内劳动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绝大部分地方，手工业者超过工厂工人，而农业劳动者则超过它们两者的总和。只有一个德意志邦，即萨克森王国的情况与此相反。这个王国以飞快的步伐发展成为一个建筑面积广阔的大城市，只在边境上有较少的农田。普鲁士的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同它不相上下。此外，六十

年代初期的統計虽然很不完全，也能給认为旧时代美好而留恋的人以安慰；德国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国还要經過一段相当长的時間。

可是，假如有一位博学之士在耶拿会战之后硬說，弗里德里希 8 二世統治下的普魯士根基稳固，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法国兵踏上易北河右岸，同这种說法相比，上面所說的安慰的意义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大局已定，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大工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开辟了大工业的胜利道路。从前有几十万手工紡紗工人，1849 年剩下八万四千二百八十六人，到了 1861 年减为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七人。大工业在哪里站稳脚跟，資本的积累和集中就在那里提高劳动强度，立刻發揮破坏作用。仅在普魯士棉織业中，由于采用动力織机，从 1846 年到 1861 年，手織机由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台减为四千七百七十七台，工人由八万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减为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一人。这只是大工业战报中的几个数字。

在大工业走过的地方，引起死亡和毁灭，在它未到之处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怖。手工业吓得渾身战抖。即使在还没有直接受到大工业威胁的地方，手工业也怀着忧郁的心情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經到了，感到大工业通过改变一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摧毁了它的基础。1858 年至 1866 年，在普魯士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表的許多地方的报告中，充滿了对于手工业不可遏止的衰亡的悲叹，甚至在像波森省这样暂时离开火綫很远的地方也是如此。

破产是小资产阶级的常客。这个阶级不能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而这个社会的突发的抽搖使它一刻也不能安静，小资产阶级執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地位一样充滿矛盾。道道地地的小市民仍然迷恋于中世紀的幻想。1862 年，他們在魏瑪建立了一个有行会綱領的手工业者同盟，就在这个时候，经济发展正以不可阻擋之

勢摧毀了巴登、維爾騰堡、薩克森的行會制度的最後殘余，由於對普魯士營業法規向壞的方面修改，普魯士手工業受到的嚴重損害是十分明顯的。德國小資產階級的這一派的領導者是鞋匠師傅潘塞，它的庇護者是易北河東的反動派。容克兄弟無限溫情地擁抱手工業兄弟，教士兄弟莊嚴地宣稱，手工業者是一個受到神的恩寵的等級，它同上帝的關係特別親切。胡貝爾聳聳肩膀用聖經上的 9 一句話刻劃了這種鬼怪活動：難道瞎子能給瞎子帶路嗎？

胡貝爾本人也熱烈贊成舉辦合作社，不附帶任何政治企圖，但也沒有在舒爾采-德里奇的合作事業鼓動中存在的巨大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合作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尤其是在小商業中，和在大工業一發展就在它的庇護下迅速成長而又迅速衰落的小資產者集團中很快發展起來。在個別例外情況下，舒爾采-德里奇建立的信貸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使得小生產者能夠把他們的企业擴大成為工廠；這些合作社給這個階級本身的幫助，只能是延長它垂死掙扎的時間。在這些合作社里，人們找不到一條改革性的社會原則。它們是純資本主義的緩和劑，不顧舒爾采的一切警告，只要發展成熟，它們就落進資本主義投機的魔掌。它們的崩潰不止一次埋葬了整個小城的幸福。可是小資產階級中有很多人仍然相信這張藥方，對着在顯著地位上寫着這個藥方的進步黨的旗幟宣誓。

手工業幫工同手工業行東一樣，也站在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可是幫工們對經濟自主所抱的希望越渺茫，他們就越靠近無產階級。反動派給了他們許多宗教的安慰，以彌補他們失去的世俗的幸福。在具有偽善傾向的福音派的男女青年會（儘管它們比較起來為數甚多）中，牧師們只召集了象流砂一樣變動無常的很少一部分人，可是從前的鞋匠幫工，傳教師科爾平 1849 年創立的天主教幫工協會，已經較早地出現在社會上了。天主教幫工協會主

要遍布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天主教会很聪明，它不对这些协会进行宗教宣传，年轻的副堂神父宁可同帮工们一起很好地娱乐、交谈，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因而也有许多耶稣教的手工业帮工加入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为的是在这死一般沉寂的时代满足他们对于精神交往的迫切需要。

- 10 对于社会上已经觉醒的人来说，这些协会当然只能是一只解渴的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使德国手工业工人得到荣誉的东西，在六十年代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阶级已经处于绝望状态，在堕入无产阶级之先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强迫流动日益成为帮工们可以充分利用的高级学校，他们把比“工厂主权杖”现实得多的财富装在自己脑子里带回来，根据他们的进步党的有权力的恩主的好心保证，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旅行包里带着这个“权杖”。

这种善意的许诺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所起的作用还要小得多，工业无产阶级非常集中，他们终于理解到该干什么。他们的苦难越来越不能忍受。英国工人在大工业的狂飙突进时代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一点不在六十年代的莱茵工业中找到它的写照。工厂主的正式代表机构，亚琛商会干脆说亚琛行政区工人的状况是悲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证明，在爱北斐特的纱厂中，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工人在狭小、不通风、响声很大的屋子里每天劳动十五小时，连吃饭的一点点休息时间也没有，而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洋铁罐，利用出现断纱的那几秒钟用匙子从洋铁罐里拨一点食物吞下去。女工和童工大量增加。莱茵商会的报告恬不知耻地公然对义务教育提出它们的“有理由的”申诉，因为义务教育妨碍它们剥削正在成长的一代。

1853年的工厂法规定给在工厂劳动的儿童每天上三小时课，

事实上这条規定也只是—紙具文，甚至这张紙也被最高法院的判決戳了好些窟窿。比如，普魯士最高法院就曾費尽心机找出一条理由說，佐林根的蒸气研磨业是所謂的手工业，不受工厂法的約束。为了节省安全装置的费用，这些工厂里的姑娘不得不脫下她們的飄动的长衣，穿上男孩的服装劳动，这就造成令人最不愉快的状态。当工厂視察員提出輕微的抗議时，地方长官和全部资产者对这种落后的情感表示十分憤慨，經過好几年的斗争以后，这种弊端才得清除。此外，俾斯麦內閣还给资产階級剝削扫除一切障碍。它的社会改革活动和救国活动是以消除在它的前任执政时期还存在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的輕微痕迹开始的。

尽管所受的苦难相同，可是六十年代的德国无产階級有一点还不如四十年代的英国无产階級，那就是它几乎沒有任何自由活动的可能性。不仅政治方面的强制法令束縛着它，在經濟方面，封建行会組織的殘余也处处阻碍它。德国的經濟立法比德国地图上的色采还要杂乱。一大片土地上充滿瓦礫堆，几乎到处都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块，阻擋着工人階級走向独立斗争，只有很少地方鑿成平地，无产階級可以在那上面同资产階級进行大規模战斗。虽然工业无产階級开始成立自己的队伍，可是在这个队伍內部，階級觉悟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甚至全德无产階級的先鋒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虽然这个先鋒队的先进分子已經在决戰場上展开，可是他們的群众才以不同的速度十分費力地从封建行会的窄路中走出来。

甚至在萊茵无产階級內部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別。在亚琛行政区，工人們恭恭敬敬地站在用飢餓制伏他們的工厂主先生面前，和用地獄制伏他們的神父先生面前。这些无产者是逐漸地、緩慢地、沒有急剧的变化，在迷信的压力下形成的；他們对现时代沒有任何

了解；他們受到驕橫的企业主的折磨，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砸烂他們的压迫者的窗子或者砸坏厂主的机器，然后又陷入旧日的昏睡之中。1857年的商业危机和1859年的严重的蚕病使克雷費尔特的織工从宗法的行东迷梦中惊醒；他們被信貸机构这条沉重的“金鍊子”<sup>12</sup>捆住，接受了老板的一切要求，用政府自己的話來說，他們处在与前几个世紀的农奴制相同的从属状态。可是他們依然不能理解，他們是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沒有組織的群众，不能进行任何頑强的反抗。貝尔格-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階級的階級觉悟最高，三月革命的传统在那里也最有力量。这里1849年五月起义的許多領袖在工人中活动，比如爱北斐特的胡果·希尔曼，他流亡国外十一年，回来后开了一家酒館，再如伊塞隆的卡尔·威廉·特耳克，他在三月革命以前是法院的一个小职员，参加过伊塞隆的街垒战，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可是一个博学的法庭却判处他罰金并剝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借口是在审前羈押期間发现他經營的一笔款子有所謂的“亏空”。現在他作为一个令人害怕的“小訟师”（还不如說是群众的真正辯护人），同恶毒的官厅进行既有趣又有效的小战。

在东德，白色恐怖統治扼杀了一切革命传统。最多在个别大工商业地区燃着几股小火。在汉堡，工人組織的輕微迹象在无害的教育組織或合作社的掩护下繼續存在着；雅科布·奥多尔夫在这里忠心耿耿地紧握着旧日的旗帜，进行爭取生存的最艰苦的斗争，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他的几个儿子。正如奥多尔夫从前是通过魏特林皈依共产主义的那样，萊比錫的工人和手工业帮工也从魏特林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烟草工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茨舍、鞋匠尤利烏斯·瓦尔特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不过人数还是不多。汉堡和萊比錫的工人群众的思想同其他地方的工人同

样模糊。

加之，对三月革命的回忆不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更不能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成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口号。为了把工人推入政治运动，需要其他的动力，而资产阶级提供了这种动力。

## 二 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资产阶级经常训练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最终必然被工人挫败。没有群众的帮助，资产阶级不能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至于它在多长的时间里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并立的同盟者，或者经过多么短暂的时间，它又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对立的敌人，这要看它聪明还是不聪明。

六十年代初期，情况对德国资产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在德国有这么多的陈年垃圾需要清除，因而它本可以长期保持同工人的可靠的同盟。普鲁士宪法纠纷的坚决勇敢的斗争，对普选权、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真诚拥护，总之毫不顾忌地建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可以使德国资产阶级不会这样快就被恶梦中的某个“未来国家”的阴影所吓倒。推动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策略的，纯粹是封建专制反动派，因为在普鲁士宪法纠纷的最初阶段，它就已经开始向工人献媚了。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工人会被这种温柔的媚眼迷住的危险，而且恰恰相反，因为工人丝毫也不想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抛弃资产阶级，所以进步党应该下定决心，在较大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同时为了取得对反动派的胜利，而且暂时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可是进步党不愿付出这个代价，它向工人提出的要求，不是推迟而是加快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分离过程。民族联盟怀着猜疑

之心，注意保持一个清一色的資產階級組織。它不允許分期繳納每年的盟費，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把工人排擠出去；卡尼格先和他的同伙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外交活動受到无数多数派的干扰，如果采用按月繳納盟費的办法，在代表大会中就可能形成許多多数派。相反地，民族聯盟以工人的好心的施恩者自居，正因为它是好心的施恩者，必然很快就使正直的无产者受到侮辱。

- 14 在經濟方面，資產階級根据舒尔采的观点，頌揚合作社是医治无产階級一切苦难的万灵良药。它宣揚私人意义上的自助，說每个工人都應該通过節約，自己克服困難，可是它又皺起眉头反对政治意义上的自助，即工人階級必須自力更生，它誣蔑这是一条不幸的迷途。对于这种理論的經受考驗性的任何实际試驗，必然使工人深信这种理論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資產階級为它的万灵良药大肆宣揚，舒尔采的合作社並沒有得到工人的特殊贊賞。空空如也的口袋自动禁止工人参加信貸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主要为工人組織的消費合作社始終远远落后于其他那些合作社。1863年，舒尔采本人知道有五百个信貸合作社，二百个原料合作社，而消費合作社还不到一百个。到了1864年，只有九十六个消費合作社，其中有三十八个給舒尔采写过报告。这三十八个合作社共有七千七百零九个社員，即平均每社有二百零二个社員。因为并不是消費合作社的所有社員都是工人，可見舒尔采的合作社比較起来在当时的无产階級中很不普及。工人們对于工厂主办的消費合作社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而合作事业的“有教养的”領袖对于工人組織的消費合作社則又不屑一顾。

1860年前后民族聯盟組織的工人教育协会在无产階級中扎的根子比消費合作社要深得多。从数字上看，1863年工人教育协会才有一百零四个，而反动派所掌握的福音派青年会还有三百六十

八个，天主教帮工协会还有一百八十八个。可是工人教育协会相当迅速地 在 德 国 扩 展 开 来， 尽 管 資 产 阶 級 在 这 些 协 会 中 胡 鬧， 它 們 还 是 得 到 比 較 活 跃 的 工 人 阶 层 的 喜 爱。 为 了 确 实 证 明 它 們 是 資 本 主 义 的 嫡 子， 給 它 們 安 上 了 “ 为 获 得 和 增 加 会 員 的 精 神 資 本 的 团 体 ” 这 个 名 称。 有 一 种 由 专 家 为 了 这 些 协 会 的 統 計 工 作 而 拟 定 的 一 种 表 格， 提 出 了 一 切 可 能 提 出 的 問 題： 这 些 协 会 教 不 教 課， 它 們 有 沒 有 图 书 館， 它 們 举 行 不 举 行 家 庭 会 議、 远 足、 音 乐 会、 戏 剧 演 出、 圣 誕 节 贈 礼， 但 是 沒 有 一 个 問 題 接 触 到 同 工 人 阶 級 的 政 治 利 益 和 社 会 利 益 有 关 的 事 情。 这 些 协 会 的 資 产 阶 級 恩 主 所 賜 与 的 “ 教 育 ” 往 往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正 因 为 二 十 年 代 和 三 十 年 代 达 到 一 定 水 平 的 德 国 国 民 学 校， 在 四 十 年 代 和 五 十 年 代 受 到 反 动 派 的 破 坏， 所 以 說 用 关 于 烏 兰 德 和 德 国 浪 漫 主 义， 关 于 莎 士 比 亚 和 萊 辛， 甚 至 “ 关 于 塞 繆 尔 · 約 翰 逊 和 他 的 传 記 作 者 馬 考 萊 ” 的 肤 浅 的 废 話 “ 教 育 ” 工 人 正 确 运 用 普 选 权， 这 对 工 人 完 全 是 一 种 諷 刺。 最 后 甚 至 有 一 个 工 厂 主 在 民 族 联 盟 的 周 刊 上 反 对 这 种 做 法。 他 說， 工 人 們 就 是 因 为 博 学 連 亲 爹 都 不 认 識 了， 甚 至 連 自 己 也 不 认 識 了； 他 們 的 記 忆 力 已 經 完 全 丧 失 了， 因 而 他 們 越 来 越 笨， 对 于 最 普 通 的 事 情 一 句 話 也 不 会 說 或 者 淨 說 些 荒 唐 的 話。

这个激烈的論断在两方面作了夸大。資产阶級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虽然想使工人对于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愚昧无知，可是它并不、或者毕竟不完全使工人什么也不懂，如果它想这样做，工人也决不会使自己成为傻瓜。

資产阶級需要——与想喝孩子血的工厂主无关，他們当然憎恨一切学校教育——許多有文化的工人骨干，在正統教会的統治下的国民学校不能給它提供这种骨干。因此它想把对工人有好处而且确实有过好处的专业学校和补习学校尽可能同工人教育协

会结合起来。如果资产阶级能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精神灌輸到工人中的优秀人物中去，而这些资产阶级的部下又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人群众中去，那么这对资产阶级就有双倍好处，这个目的肯定也起作用。萊比錫的市长在一次公开演說中曾經說过老实话，他說工人教育协会的目的在于培养工人贵族，这个著名的海港城市的市政当局每年以大量津貼支持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直到它以感激心情放弃一切“贵族的”性质为止。可是也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

16 不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或者誤认为通过教育工人可以消除阶级对立，因此他們努力工作，使工人教育协会保持一定的水平，不使它蜕化成单纯的玩物或者更坏的东西。

尤其是有才干的自然科学家为这些协会建立了值得贊揚的功績，这些人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泰奥多尔·繆勒，达姆斯塔特的路德維希·毕希納，萊比錫的罗斯梅斯勒。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可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自然科学的見解妨碍他們对社会状况有清楚的認識。罗斯梅斯勒常常对工人說：教育协会使你們能对自然有深刻的認識，因此你們全都可以成为发明家，然后就可以过富裕的生活。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把基本的自然科学教育同基本的社会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朗格出生于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以坚韧頑强的精神由一个农奴和馬車夫熬成东正教的神父和神学教授。他在苏黎世大学教过一个时期书。阿尔伯特·朗格在瑞士得到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印象。当他在萊茵区城市——科伦、波恩、杜伊斯堡，有时在文科中学，有时在大学执教时，他用自由的、公正的眼光观察德国的生活。他是一个耿直的年轻人，表露出誠实和坦白，他有那种真正的好意，并不是把一切給所有的人，而是把每个人所应

得的給每个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家,有充沛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一个博学的研究工作者,但决不是一个不喜外出的书呆子,在科学理論和实际活动方面,他是全面的。他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的形象,能够解决生活給他提出的一切任务。

他勇敢地解决了这一切任务。当他由于不服从米勒大臣的不体面的选举令,科布伦茨教育厅的官僚分子要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斥責”时,他把杜伊斯堡中学教师的职位扔到这些官僚分子脚下。当他看到资产阶级把促进自己的物质利益高高放在爭取人民权利的政治斗争之上的时候,他也毫无顾忌地同资产阶级决裂。他毫不畏惧地拥护工人的事业,当时这种坦率的表白給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还会带来重大的牺牲。但是阿尔伯特·朗格沒有完全摆脱刻在羅馬的最后一个德国教皇的纪念碑上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話的厄运;任何时代都有优秀人物倒下,这件事多么严重!

他那和諧的性格缺乏在必須作出倒向一边的决断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单面性。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尖銳地批判了五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只承认它是“自然研究的可用的原則”,而斥責它是“假哲学”。但是他沒有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却回到康德,一切認識在他那里都化为一种“最高的、最后的怀疑”。虽然他做过許多思想丰富的研究,但是他的主要著作并沒有达到最終目标。哲学家朗格保留着最后的怀疑,社会政治活动家朗格也是这样。他对拉薩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用比德国学术界的任何其他代表了解得都早;他多次非常仔細认真地評論了他們的著作,結果又令人难以理解地誤解了他們的著作。朗格完全沒有资产阶级的自私偏見,可是福音派牧师家的唯心主义教育,始終使他的思想受到一些束縛。他决不是一个一般类型的懶惰的調停人,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这些調停人的很快被人忘却的命运,因为当

历史的伟大轉折要求直截了当地表示贊成或反对的时候，他还为怀疑而花費精力。

罗斯梅斯勒、朗格和与他們类似的一些人所以在工人教育协会工作，是因为他們受了资产階級精神信念的推动，对于进步党來說，这种信念本身就帶有嫌疑的嫌疑。这两部分人之間决不存在友好的关系。进步党給工人提供的領導人也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尽管它对工人教育协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关怀的，可是它不能进一步克服资产者的自負，以致它认为它的优秀分子有足够的力量教育工人。除了全盘接受了社会問題的舒尔采-德里奇，还有对大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教育事业有貢獻的弗兰茨·敦克尔以外，  
18 进步党的領袖都把同工人交往看做是有失体面的事。它把这部分政策交給第三流或第四流的鼓动者去执行，而这伙人是非常复杂的。

宗納曼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国民教育工作，他是一个銀行家和一家報紙的老板，这家報紙尤其在南德有很大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影响。麦克斯·威尔特也在那里用內容貧乏的自由貿易論欺騙工人，他是巴师夏的一个应声虫，他贊揚冒险家的血腥侵略是特別艰苦的，因此也是特別有利的工作，这样，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为德国资产階級的波拿巴化做了准备。自由教区传教师烏利希在馬格德堡教育工人，他的品格值得尊敬，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糊塗虫，輔助他的是出身于一个大粮食店的年輕人麦克斯·希尔施，一个好人和坏音乐家，对于无产階級并非沒有一种微弱的关怀，因此經常給资产階級指出一些輕微的缺点，可是他太好虛荣，不肯加入工人階級的队伍，远远不够自觉，进步党一皺眉头他就害怕得要死。甚至拉薩尔在那里做过《工人綱領》这一报告的柏林郊区手工业者协会的主席弗里德里希·施特方尼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物。他在学术界失意后，向工人献了几年媚，后来又为资本家的报刊服务，罵工人运动罵了几十年。

不管进步党对工人教育协会居心多么好或者多么坏，这些协会毕竟給工人提供了了解自己的利益的第一批活动场所。德意志邦联的反动立法也同几乎所有各邦的反动立法一样，特別阻碍工人成立政治組織，使他們的工会組織等于不能存在。因此工人們就在进步党給他們开辟的操练場上练习。工人教育协会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对他們同样有启发作用。专业课程引起了現代无产者身上潜在的求知欲，而他們由于認識不断提高，很快就对在工人教育协会里常常听到的一些空話感到厌恶。他們的階級意識緩慢地，但不可遏止地觉醒了，它在模糊的冲动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工人們从进步党的贈品中接受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不适合他們的 19 东西使他們对好心的施舍者更加猜疑。进步党在把无产階級組織成一支政治上有力量而沒有意志的增援部队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上栽了斤斗。虽然孵出鴨子的母鸡只願領着鴨子在岸边散步，可是鴨子总是要下水。

### 三 无产階級的独立活动

1862年，几个主要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促使德国工人开展一个独立的运动。

民族联盟曾經派十二名工人去参观伦敦世界博覽会，它只拿出一笔很少的經費——一千二百塔勒，但是却为此大做广告，还要这些工人回国后向自己的同事报告他們的見聞。后来在魏瑪举行的行会會員代表大会引起觉悟較高的工人的反抗，因为这个大会在反动的經濟要求中翻斤斗，尤其是要求恢复行会規章，在德国絕

大部分地区至少这种行会规章的最露骨的形式已經被取消了。在行会规章还以中世紀的光輝形式存在的巴伐利亚，11月1日在紐伦堡召开工人大会，对行会會員大会表示抗議。

8月25日，柏林工人第一次集会，听取被派往伦敦世界博覽会的工人們的报告。在这次集会中已經有人提出召开全德工人大会的要求。在柏林各个市区举行的一系列的工人集会都贊成这个主张，在10月7日的結束會議上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五人組成的委员会，为工人大会做准备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油漆匠艾希勒，他在由自由主义者翁魯所领导的铁路器材股份公司做工，他的专门任务是在铁路車輛的門上写号碼。10月7日，艾希勒以委员会的名义請求薩克森內閣准許他們11月在萊比錫召开代表大会，10月28日接到批准的通知，不过附带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就是按照薩克森結社法的規定，代表大会应由薩克森国民召开。

在这个批示公布以前，柏林的委员会已于10月22日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宣言，定于11月18日在萊比錫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准备共开六天。列在大会議程上的問題有：全德国的經營自由和迁徙自由，全体工人的合作社和殘废者互助会，在柏林举行一次世界博覽会，最后还有参加伦敦世界博覽会的工人关于工业方面的报道。在这个宣言里，这些报道和魏瑪的行会會員大会被說成是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动机；此外只是說，国民的各个階級在新生活的溫暖阳光照耀下觉醒过来，采取新的行动，新生活的太阳必然也喚醒意識模糊的工人，工人的事情已經有了妥善的安排，就是工人們要想干預同他們最有利害关系的問題，也不起什么作用。宣言沒有任何反对資產階級的話；相反地，它規定参加代表大会的单位向柏林自由派报纸的編輯部报名。在报名期間，人們宣布代表大会在萊比錫召开，只有合法的代表可以到那里去，但是对于这种

合法性,对于代表的选举并没有作任何规定。

虽然这个宣言根本不会触怒资产阶级反对派,但是《人民报》只把它登在广告栏内,而在同一期报纸的编辑栏里发表了施特雷克富斯写的反对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文。施特雷克富斯说,在争取普鲁士宪法的思想斗争中,工人运动完全失败了;它虽然不是自觉地,但却是不自觉地为反动派服务,因为它给反动派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反动派能够用红色共和国这个鬼怪吓唬忠于宪法的党中的动摇分子,使他们走进它——反动派的圈套。利用这种完全不合时宜的运动,究竟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载在筹备中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纲领上的这些问题,受到国民经济代表大会和德国各邦众议院中的科学和实践的最重要人士的拥护;这些人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工人代表大会”<sup>21</sup>对此不能有所帮助。可以理解,这篇论文在柏林和莱比锡的工人中是不受欢迎的。

这时在莱比锡也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工人运动。1861年2月,这里建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它以“产业教育协会”的名称从属于由独立的工业经营者组成的工业技术协会。这个协会的资产阶级创始人拿1854年反对工人社团的反动的邦联法令为采取这种形式的理由或借口,可是他们立刻引起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的有力抗议。虽然这种抗议起初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对与会的工人发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给年轻的車工倍倍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民众大会。

倍倍尔是一个普鲁士士兵的儿子。他的父亲随军由奥斯特罗沃来到邦联的要塞美因兹,在这里当了下士,娶了一个生在韦次拉尔的姑娘。后来他调到科伦,奥古斯特·倍倍尔就生在那里,两年以后,他的父亲就死了。后来母亲改嫁给她丈夫的当监狱看守的

兄弟，第二个丈夫也死得很早，她就回到故乡韦次拉尔。倍倍尔在这个小城的贫民学校里读书，在他还不满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死了，以后他就领孤儿基金的助学金。十四岁那年他到一个车工师傅那里去当学徒。他天资聪明，稟性活泼，力图继续求学，可是，即使他平均每周二十格罗申的工资，扣除了在师傅家的伙食费和宿费以外还允许他有什么特殊进展的话，在那个可悲的庸人窝里，他也沒有任何继续深造的可能。

1858年2月到1860年3月，倍倍尔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地方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他在布萊斯部的弗賴堡、累根斯堡和薩尔斯堡工作的时间较长，在这些地方，天主教的帮工协会在精神和社交上都给他以鼓舞。他的爱国心还没有减弱。当他逗留在薩尔斯堡时爆发了1859年的战争，他就报名参加蒂罗尔猎兵志愿军，可是因为他不是蒂罗尔生人，而遭到拒绝。普魯士一开始动员，倍倍尔就急忙回到祖国，志愿报名参军，由于很快締結和約，他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第二年他该服兵役了，可是由于“体格全面虚弱”而被延期征集，他当兵的打算永远落了空。这时他就到萊比錫去找工作，结果找到了。

他的才能在产业教育协会很快得到发展。他从小得到的精神印象以及他那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协会的教育工作特别热心，却不参与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温和人物不断进行的鼓动工作。1862年春天，瓦尔特希在成立紀念大会上的演说使现有的对立公开爆发，在新选的理事会（这时倍倍尔已被选为理事）中，实力相等的两派对峙着。可是在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被多数派所击败，于是就建立前进协会，这个协会放弃了教育的目的，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尤其也举行一般的工人集会，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后

来同柏林的情况相仿，由这些集会中也产生了一个委员会，它的特殊任务是召开一次全体工人大会。

10月23日，即柏林委员会发表了请派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后一天，艾希勒同这个委员会取得联系。他本人来到莱比锡，以便对那里的工人说明他奇异地发现的“原则”，他认为，刚刚执政的俾斯麦内阁是关心工人的，只要工人背离进步党，俾斯麦内阁就会立即为工人的事业尽力；俾斯麦准备先给机器制造工人一笔巨款，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资产阶级的民族联盟的封建对称物普鲁士国民联盟同一时期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对这些奇特的言论作了说明。俾斯麦的两个亲密的朋友在这里讲了话，布兰肯堡说，工人运动将通过要求普选权使进步党经受一次严重的考验，瓦盖纳说，不可把钱袋看得比血税还重；为了建立一个按等级组成的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必须实行普选权。

23

可是莱比锡的工人对艾希勒的“原则”决不满意，在他们通过10月30日的一个全体大会，加强了他们召开工人大会的意图以后，他们就派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到柏林去，阻止艾希勒的阴谋活动，认真地同资产阶级反对派协商。

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已经从施特雷克富斯的粗野攻击对工人产生的影响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它想拔掉工人运动的每一根刺（这是它一贯的目的），它就必須更慎重地对待工人运动。莱比锡工人通过揭露艾希勒实际证明，他们决不想在进步党同俾斯麦斗争的时候，从背后攻击进步党，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这一方面一定更加得到加强。的确，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发现进步党的领袖在翁鲁家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上还是沉默寡言，但是仍然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的方式是由11月2日举行的工人大会产生的。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宣称，他们将在反对封建专制反动派的斗争中

支持資產階級反对派。他們在这次集会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显得比柏林工人高出一头，柏林工人只要发言，不是对政治毫无所知，就是干脆想跟着进步党跑。相反地，舒尔采-德里奇认为任何民主都是空論，它不能提高工人生活的物质基础，使許許多多的工人能够以代表者的身分参加政治运动。当然他也提醒人們行动要慎重，同时他也像施特雷克富斯那样提到資產階級内部的那些怯懦人物，这些人实际上对工人运动抱有一种虽然完全没有根据但暂时却不能克服的反感。不过舒尔采还提出反对任何鹵莽的另一理由，这个理由工人一定也了解。显然柏林委员会对召开代表大会采取不关心的态度。舒尔采认为，如果几百个工人来开会，毫无准备地研究这样重大的問題，这就会成为以一片混乱而結束的奇事；工人代表大会需要充分的准备，工人們不必因为从有能力的人們那里接受教导而感到慚愧；他自己提出要給工人做关于資本和劳动的报告。11月2日的會議仍然决定举行代表大会，不过会期要推迟一个时期，代表大会根据柏林綱領进行，只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从这个綱領里勾去了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覽会这一条，准备工作由萊比錫委员会进行，薩克森內閣的批示已經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而这样做又可以阻止柏林反动派制造新的障碍。

《人民报》用如下的叹息来結束关于这次會議的报道：編輯部网罗工人的努力徒劳无功。反动派好像也有相同的看法，同它的失望可能有关的是，两天以后，即11月4日，在拉薩尔的《工人綱領》沒收后四个月，对它正式提起控訴。俾斯麦和他那一伙人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們不願再理睬他們的帮手了。虽然艾希勒还担任了11月2日的工人大会的主席，但是11月7日他就不得不发表一个閃爍其詞的声明，反对对他的怀疑，責备“萊比錫的代表先生”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摘。甚至艾希勒引证了粗野的翁魯把

他赶出大門这一不必要的凶恶行为，也没有能够在工人中恢复自己的名誉。

#### 四 萊比錫中央委员会

这时萊比錫中央委员会抓紧时间进行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委员会由十人（一說十二人）組成，委員的名字現在已經不能完全确定了。除去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以外，有奥托·达姆尔，他是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年輕的自然科学家，在产业教育协会里做过关于化学方面的报告，还有鋼琴厂主多尔格，他是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由于参加德累斯頓五月起义被判死刑，后来他坚决不肯請求任何恩典，被判长期徒刑，在瓦尔德海姆度过了可怕的六年。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帝国議會議員的鑄造厂主圭茨也是委员会的成員。此外还有几个“受托人”，委员会根据柏林協議的精神通过这些

这些人使自己得到补充，他們是：高級教师阿尔布莱希特，律师文特尔，尤其是年迈的罗斯梅斯勒，1848年，他是法兰克福議會的議員，在反动年月里站在被迫害的工人一边。他是一个忠貞不二的人，他对国民教育的理解比所謂有教养的資产階級要真实而深刻得多，他在政治上也比平庸的进步党人激进，虽然如此，仍然受資产階級观点的限制。

25

11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德国工人书。它根据萊比錫工人10月30日的決議，柏林工人11月2日的決議以及紐伦堡工人大会11月1日的決議，要求派代表参加执行柏林綱領的工人大会，为了这个目的，它主张成立地方委员会，举行有教育意义的报告会，最后还有建立互助会，以便“按照英国的榜样，不使受委托者个人受到损失，充分”完成广泛的准备工作。地方委员会必須同中

央委员会保持联系，2月中旬以前要把筹备工作的结果报告莱比錫；然后尽快地召开工人大会。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在11月22日请求薩克森內閣許可把11月沒有召开的代表大会延期到3月召开，并取消1855年发布的命令，这个命令禁止退职的地方法官舒尔采（当时在德里奇，现在在波茨坦）公开讲演。

同时，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罗斯梅斯勒11月18日在音乐堂一次工人集会上讲的、后来印成小册子的演说。这篇演说开始“明确地”确定，薩克森王国政府通过10月28日的批示，“原则上”允许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虽然这本来是不必要的，但是却有极大的意义。然后他建议工人求得正統教会领导下的国民学校不让他们得到的教育和知识，但是他同样有力地强调，工人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畏惧与此相連的牺牲。“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必须永远掌握在你们手里，只有在你们之中绝对缺少合适人选的个别情况下才有例外。自己的事自己办！如果整个工人运动对你们有些价值，那么就不要害怕与此結合在一起的牺牲。否则宁可完全不搞工人运动。”同这种自由的见解相适应的是，罗斯梅斯勒想把运动的重点放在工人集会上而不是放在工人結社上，由于反动的結社法，这两者已经不能互相勾通了。

可是罗斯梅斯勒也警告工人不要采取“越軌的政治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回到施特雷克富斯的老調上去，他还特意引用了施特雷克富斯的“著名的、但被人严重誤解的”論文。他尤其不想理会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差别，他认为从法律上看，这种差别已被帝国宪法和1849年的帝国选举法消除了；有了争取恢复这个宪法和这个选举法的斗争，就做了工人在政治方面要做的一切，除非他们在各邦也想实行普选权。否则行东和帮工之間，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劳动之間就没有什么区别；工人的经济独立性甚至比許多行东大

得多，生活狀況也自由得多。但是最大的行東（為了他們的榮譽，這是值得希望的）也不會放棄工人這個光榮名稱，儘管他們不是根據現在開展工人運動的意義這樣做的。

儘管作者的願望很好，這個著作最後還是陷入極大的混亂之中。同時萊比錫中央委員會還傳播了另一個內容完全不同的著作，即在柏林被沒收後，在蘇黎世重新出版的拉薩尔的《工人綱領》。達姆爾由於他熟識的、後來當了進步黨議員的路德維希·洛厄佛的介紹，注意到拉薩尔的著作，但是拉薩尔個人還沒有和中央委員會發生關係；弗里茨舍和瓦爾特希到柏林去的時候，拉薩尔恰巧不在柏林。現在，當一個工人組織推銷拉薩尔的著作的時候，工人對這一著作也有很不相同的反應。在漢堡，人們懷着很大的興趣讀它，認為比由於價錢便宜而銷售較多的羅斯梅斯勒的著作“有效果得多”。可是1863年2月25日，當時最活躍的無產者之一，漢堡的木器工人泰奧多爾·約克給萊比錫寫信說：“至於小冊子，我必須承認，羅斯梅斯勒的很受歡迎，給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比另一本著作可靠得多的效果，許多人對另一本著作完全不了解，實際上現在還不能把它介紹給廣大群眾。”可是，參加倫敦世界博覽會的工人代表之一的約克，已經在倫敦參加了共產主義工人教育協會。不過，如果人們考慮到，拉薩尔的著作和羅斯梅斯勒的著作在前提和結論上雖有天壤之別，可是甚至萊比錫中央委員會也同時散布這兩種著作，那麼我們就不能由於約克的動搖而責怪他了。

實踐很快就打破了模糊的理論。由於考慮到反動的結社法，羅斯梅斯勒根據中央委員會的先例建議，不把運動的重點放在工人結社上，而放在工人集會上，換句話說，放在工人群眾上。可是由此馬上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誰是工人，對於這個問題，羅斯梅斯勒只會用空話作答，在這種空話的迷霧的掩蓋下，行會手工業者，

甚至资本家都可以算做现代无产者。

尤其是在汉堡，由此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前从那里的在自由教区传教师巴尔策的领导下完全跟着民族联盟跑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已经分出一个激进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最有名的成员是：奥古斯特·佩尔，他是汉堡两个消费合作社中的一个当时德国最大的消费合作社里的会计，还有机械师雅科布·奥多尔夫，他的和他同名的父亲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参加过活动。这个集团热烈欢迎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并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立即召集自由的工人集会，选举地方委员会。相反地，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汉堡消费合作社，同一个工人救济会，一家人民银行，还有阿尔托那工人协会联合起来，准备派代表参加工人大会。佩尔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团结，企图同这个委员会取得谅解，可是他们的条件——只派靠别人给的工资和面包生活的代表到莱比锡去——遭到断然拒绝，本想谋求团结，结果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佩尔集团援引了达姆尔代表中央委员会同意他们的见解的信，所以巴尔策就向罗斯梅斯勒发牢骚，罗斯梅斯勒也就立即向达姆尔宣战。罗斯梅斯勒要求宣布达姆尔的看法纯粹是他个人的事情；中央委员会同意罗斯梅斯勒的著作，因此它对谁是工人这个问题已经作出不同的决定。于是中央委员会面临着可能使它分裂的重大问题。一个协议很费劲地把结构的裂缝暂时粘上。瓦尔特希根据罗斯梅斯勒打的草稿，给巴尔策写了回信，信中说，达姆尔没有提出原则性的问题，他只想作实际努力，使不独立的工人作为人民中最受压迫的阶级在工人大会上有其足够的代表，这同罗斯梅斯勒的看法并不矛盾。至于派谁参加代表大会，必须由各城市的工人决定，中央委员会不作决定。可是，达姆尔同意佩尔及其同志的策略行动，那是完全正确的；巴尔策应当尽快地同佩尔团

結一致，召开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一个得到各方面承认的地方委员会。

当然，无产阶级的乐队在其他地方都不像在汉堡这样由当时工人运动的潜在的混乱中发出尖锐声音，而这种混乱本身削弱了萊比錫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力。它的宣言在许多地方得到反应，可是这种反应或多或少停留在精神上同情的阶段。施韦临的老民主主义者德姆勒尔差不多最诚挚地做了答复，可是他怎么能够召集梅克伦堡的工人呢？甚至同柏林和萊比錫一样是运动发源地的紐伦堡也宣称无能为力，一方面因为警察从中阻挠，另一方面因为紐伦堡的工人为了开工人大会花了一百二十塔勒而经济拮据了。也许资产阶级影响在这里已经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布勒斯劳的手工业者协会就根据舒尔采-德里奇的意見办事，他在12月5日給萊比錫写了一封带讽刺口吻的信說，人們觉得那里总是十分忙，地方委员会到底应该干什么呢？是收集统计呢，还是做别的事情呢？资产阶级很快就看清了形势，并且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一开始，它就收起苦脸，强作欢颜；它参与工人代表大会只是为了使这个大 29  
会失败得更加彻底。它有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个优点，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个优点。

12月初，黄鼠狼就幼稚而自负地推荐自己照看鸡雛；舒尔采-德里奇給“最善良的瓦尔特希先生”写信說：“按照您确定代表大会会期的情形，也许我有可能在这无限重要和艰巨的事业中給您做一个报告，也可以說是当您的报告員。”舒尔采在柏林已經做那些由于拉薩尔后来的反駁文章而博得悲惨名声的报告；这些报告企图利用空洞的謬論使工人看不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接着，在民族联盟的大本营科堡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人教育协会，这年年末或第二年年初，周刊《全德工人报》的試刊也在那里出版，这个报纸是由

民族联盟的业务领导人，施特賴特律师編輯和发行的。施特賴特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大概是司徒卢威一派，因此比柏林的进步党人激进；他在自己的新报上发出的反对容克和教士的声調比其他资产阶级反对派通常的声調都激烈，他对莱比錫中央委员会也抱友好态度，甚至“友好而恭順地”同拉薩尔通信，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政治上工人仍然由资产阶级牵着走，并且满足于舒尔采-德里奇給他們开的社会处方。新报創刊不到一星期，科堡工人教育协会在1863年1月8日向莱比錫写报告說，对工人代表大会的种种顾虑，在許多通訊，尤其是南德的通訊中发生了影响，这些顾虑无论如何是值得考虑的，而且也必須十分慎重地交换意見。可是后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博肯海姆、弗勒尔斯海姆、博恩海姆的在美因部組成一个联合会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同时还以美因兹和曼海姆协会的名义，于1月30日报告說，在奥芬巴赫举行的一次會議决定：一、莱比錫中央委员会应延期举行工人代表大会；二、它應該同工人教育协会举行一个预备會議，预备會議可于1863年8月前后在一个中心地点，如爱森納赫或哥达或魏瑪举行，以便筹备召开全德工人大会。科堡的协会和报纸立即对这个提示表示异常关心。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手里的牌已經完全亮出来了。它想夺取莱比錫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把它交到还完全依賴它的工人教育协会手里。如果工人代表大会由于奥芬巴赫決議已被推迟，那么资产阶级对于在爱森納赫或哥达或魏瑪举行計劃中的预备會議，也沒有什么可怕的。恰恰相反！如果工人教育协会互相联合起来，那么面对着德国的結社法，它們的处境还要困难得多，它們的整个存在还要更多地依靠各邦政府的恩典，资产阶级就更容易在痛心抱怨該死的反动派的情况下，防止工人“政治上的越軌行为”。

正当汉堡的爭論揭露了中央委员会本身的刚刚冒头的分裂的时候，关于奥芬巴赫決議的消息传到了萊比錫。在这个严重的情况下，瓦尔特希起草了一个宣言，企图消除委员会的第一个宣言引起的“种种混乱和怀疑”。这个宣言开始就明确宣称，工人教育协会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接合点；“工人运动的唯一机构只能是由自由的工人集会选举的委员会”。宣言在回答誰是工人这个问题时很不坚决，用的是迴避要点的語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絕大部分是不独立的工人，也就是不是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广大公众而交给个别雇主的一些人，一小部分是在許多方面同前者接近的人。”因此中央委员会首先依靠它的同志。

然后宣言談到，一个工人大会的綱領提出也得到资产階級拥护的、在許多国家早已实现的要求，这个工人大会还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瓦尔特希回答說，工人们要想在这些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发表自己的意見。当人们至今根本没有征求他們的意見的时候，他們就更想这样做；大家越不相信他們已經成熟，他們就想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他們不受任何琐屑的顾虑所支配。代表大会决不是对魏瑪行会会员大会的示威；工人根本不同这个半死不活的敌人打交道，他們要求对内对外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們想在已經得到的迁徙自由和經營自由是否真正够了这个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見；他們要想知道，对于合作事业，工人成熟到什么程度，以及加快这种成熟性到什么程度。“我們了解我們的同志們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貧困，我們关心他們；朋友們，我們希望你們終于說明，压在你們身上的这种貧困多么沉重，代表大会将成为你們的喉舌。它要证明，德国工人階級已經成熟，它感到自己有責任解决十分重要的社会問題，即使做不到这点，也应该鼓励和推动人們解决这些問題，因为它把清楚的理智、丰富的

感情、慎重而坚决的行动集于自身，因为它既沒有英国人的发财致富的唯物主义，也不懂法国人的自成系统的唯心主义，因为它能够而且也想在现有条件下沉着地继续经营，辛劳地争取自己的精神解放和物质解放。”这一段话是这个宣言的重点，此外宣言再一次鼓舞人们大力筹备代表大会，选举地方委员会，尤其是进行筹款。宣言也提出了一个在当前情况下对双方都很不利的建议，即延攬“受托人”；提建议的人在这个建议上能够找到真正的关键，这至少是一件幸事。

这个宣言沒有发表，肯定地说，即使发表也不能使中央委员会摆脱它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政策而陷入的窘境。宣言已经流露出使资产阶级有理由害怕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阶级意识，可是还没有流露出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切阴谋诡计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明确的阶级意识。有斧头还没有斧柄。工人们痛心但也正确地感觉到，他们所要求的宣告自己成熟的声明被资产阶级否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一个政治-社会纲领中说明自己的要求。

32 工人为了能够参加民族联盟，正式请求联盟把一年的盟费改成按月缴纳，这件事是这时发生的，还是前一个时期发生的，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确定了。联盟不同意这样做的答复是人所共知的，它的理由是，工人们可以把自己看做是“精神上的名誉盟员”，最好工人协会给它们的主席缴一年的盟费，这样工人协会通过它们的主席可以在民族联盟中有自己的代表。

资产阶级用类似的方式回避普选权的要求。民族联盟以它要求包含普选权的1849年的帝国宪法来证明它拥护普选权；正如罗斯梅斯勒在他的文章中所说，此外还特别要求普选权，是没有意义的。普鲁士进步党确实已经原则上把普选权从自己的纲领中勾掉，不过它在工人面前还支吾其词；比如舒尔采-德里奇说，“当

然”，作为权利平等的要求，普选权肯定是可以给与的，只是为了正确地使用它，工人群众必须先受教育。指出第二帝国时期关于普选权的經驗，給进步党人帮了大忙，恰恰也在最觉悟的工人中間为他們帮了大忙。1863年2月，倍倍尔表示反对普选权，約克也在同一时期給萊比錫中央委员会写信說：“在现实条件下想为普选权尽力，是异常危险的，首先是因为这样做目前得不到效果，其次，我认为普选权是損人不利己的，只要像現在这样，只有少数人受教育，它就很容易被用来反对自由。”因此，这样直率地树立普选权的旗帜，不是給中央委员会的处境减少困难，而是增加困难。瓦尔特希在新宣言的草稿中甚至都沒有提到普选权。

中央委员会沒有发表这个宣言，而是去找一个真正的“受托人”，在全德国只有这个人能够帮助它。現在拉薩尔的《工人綱領》已經逐渐发生作用了。1863年2月初，中央委员会的两位主席瓦尔特瓦和达姆尔动身到柏林去同拉薩尔商談。商談在拉薩尔的住宅进行，路德維希·洛厄佛也在座。他們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見，这个成果表现在中央委员会2月10日所做的決議里。中央委员会在科堡工人报上发表了一个宣言，坚持要召开代表大会，但反对操之过急；只有在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同意甚至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召开代表大会。“我們希望召开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代表大会，并希望有对一切問題都完全清楚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这个大会。”宣言沒有談到任何原則性的問題，可是中央委员会大概同时正式請求拉薩尔，用任何一种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关于工人运动及其可以利用的手段，尤其是关于合作社对完全沒有财产的阶级的价值发表自己的意見。

拉薩尔用《公开的答复》一文作答，这篇文章上写的是3月1日的日期，大約在3月中旬公之于世。

## 五 拉薩尔的《公开的答复》

《公开的答复》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认为工人根本不必关心政治和工人应该给进步党充当无私的合唱队和共鸣板，这两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工人只能从政治自由中期待自己的正当利益的实现，但是进步党通过它在普鲁士宪法纠纷中的态度表明，它完全没有能力哪怕只促成自由利益的最小的实际发展。工人等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使平等、直接的普选权成为这个党的原则性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机构只能在政治方面满足自己的正当利益。为此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一个和平的、合法的宣传活动，乃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这个党对进步党的策略是不言而喻的；它必须到处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党，虽然它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支持进步党，但是只要进步党离开了共同利益，就坚决背离它，反对它，正是利用这种手段迫使进步党要末向前发展，提高进步的水平，要末越来越深地陷入它现在已经陷得很深的不起作用、没有权力的泥沼里。

然后拉薩尔来回答莱比錫中央委员会给他提出的社会问题。他说，关于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的讨论，不应列入工人代表大会的议程。这种讨论至少有迟来五十多年这个缺点。人们一声不响地在一个立法机构中宣告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可是人们不再加以讨论。储蓄会、残废者互助会、急难互助会、疾病互助会可以减轻工人个人的贫困，可是对于改善工人等级本身的正常状况来说，它们却是毫无力量的手段。拉薩尔引用胡貝尔的相同见解，以便通过这个在政治上站在同他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在经济上站在同他完全不同的立场上的人的证言，最简捷地消除这种怀疑：似乎他不重

視这些互助会只是早已存在的政治傾向的結果。

現在來談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拉薩尔沒有批判政治活動家和國民經濟學理論家的舒尔采，以便熱情地同“德國合作事業的父親和創始人”握手。可是對於舒尔采的合作社能否改善工人等級的狀況這個問題，拉薩尔十分堅決地給予否定的答复。信貸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最多能使沒有資產的手工業行東同本身已經不能經受大資本和工廠大批生產的競爭的有資產的手工業行東處於同等地位。它們可以延長小手工業者垂死掙扎的時間，從而增加這種垂死掙扎的痛苦，可惡地阻止我們的文化發展；它們根本不接觸在大工業中勞動的、日益壯大的真正的工人等級。

相反地，舒尔采的消費合作社當然可以包括整個工人等級。不過它也完全不能改善工人等級的狀況。要想幫助作為消費者的工人，而不在他真正受壓迫的一面（作為生產者）幫助他，這已經是完全錯誤的。工人作為消費者也處在不利的境地，他必須零星購<sup>35</sup>入自己的必需品，因而遭受零售商店的剝削，消費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期限內可以消除這個弊害。但是這個次要的損害同壓在工人身上的主要嚴重的損害毫無關係。

拉薩尔闡明了“鐵的經濟規律”，這個規律在今天的條件下，在勞動供求的支配下，決定工資，它使平均工資停留在一個國家中根據習慣為了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限度上。“工資不能經常超過這個平均數，否則由於工人的狀況有所改善，就會增加結婚和出生率，增加工人人口，從而增加了又把工資降低到從前的水平，甚至降低到那個水平以下的人手的供給。工資也不能長期落在必要的生活費用下面，因為那樣一來就會產生移民、不結婚、節育，最後由於貧困而產生工人人數的減少，因而又減少人手的供給，又使工資恢復到從前的水平。因此真正的平均工資

处于变动之中，經常在它必須不断地落回的重心周围旋轉，有时比它高些（所有或个别劳动部門的繁荣时期），有时比它低些（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困难和危机时期）。”

拉薩尔說，自由經濟学派本身发现和证明了这个規律，他能够为此举出同国民經济学中的伟大而著名的人物一样多的证人。他建議工人去問每个要想改善他們的处境的人，是否承认这个規律，如果他不承认它或者不知道怎样消除它，就把他当作一个空談家而背离他。他把这个規律的作用总括如下：“从劳动收入（生产）中首先扣除了工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一部分（工資）并在工人中分配。生产——劳动收入——的整个剩余落到企业主的手里。”工人是无产者階級，因为他們甚至不得被由于文明进步而增长的生产力，也就是被增长的劳动收入，被他們自己的劳动的增长了的收益能力排除出去。給予他們的，經常是生活必需品，給予企业主的，經常是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由劳动創造的一切。

拉薩尔承认，如果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許多工业产品价格大大下降，同时进入了一个人手需要增加的較长时期，在一个国家中根据习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的范围扩大了，如果人們把不同的时代互相比較，工人等級将来的状况可能比过去好一些。他稍稍离开正題来讲这个問題，是因为这种偶尔发生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在几个世紀的过程中始終是那些要想欺騙工人的人仿照巴师夏的先例用廉价而空洞的言詞反复談論的問題。在各个世紀中，工人等級的整个状况是否真正不断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很复杂的問題，需要进行学术性的研究，而那些不断地用“前一世紀的棉布多么貴，現在他們能用多少棉布做衣裳”这番話来安慰工人的人即使概略地进行这种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进行这种研究，因为他不仅要給工人絕對确实的东西，而且也要給他們很容

易論证的东西，可是假定这种改善已經发生，无論如何这就是顛倒了有关的問題。人們愚弄工人，欺騙工人。

如果工人談到他們的状况改善，那么同一时期的生活习惯就是它的尺度。而人們都把他們的状况同前几个世紀的工人状况作所謂的比較，以此来安慰他們！当然，今天工人的处境比波多苦多人<sup>①</sup>和吃人者要好一些，这是确定的事实。可是，人的任何滿足永远只取决于滿足手段同在一个时期已經习惯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比例，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最少增长也造成前所未有的苦难和匱乏。“如果波多苦多人不买肥皂，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吃人者不穿讲究的上衣，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在发现美洲以前工人不抽 37 烟，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工人在发明印刷术以前，他不能买一本有用的书，他缺少什么呢？”即使必需的生活条件的水平在各个不同时期确实已經提高了，工人的人的处境在这些不同时期还是始終不变，即永远在各个时代习惯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最低水平周围变动，有时比它高一点，有时比它低一点。

于是拉薩尔把他对于消費合作社的評價做了如下的总结：只要工人中仅仅有个別集团参加消費合作社，只要消費合作社不接触一般的工資，它們就只能使入社的工人以消費者的身分，通过比較便宜的消費，稍稍改善貧困状况。可是一旦消費合作社开始包括整个工人等級，工資铁律就使得工資由于生活費用通过消費合作社变得更便宜而必然同样下降，这样一来，到那时为止消費合作社給个别工人集团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又化为烏有了。

因此，舒尔采的所有組織对工人等級本身没有什么帮助。“怎么回事？难道工人个人的自由联合的原則不能改善工人等級的状

<sup>①</sup> 巴西东部的印第安人，十六世紀起，尤其是 1790—1820 年間，被葡萄牙殖民者用种种卑鄙手段屠杀，至二十世紀初只存一万多人。——譯者

况嗎？”对此拉薩尔回答說：“当然能够——可是只有把这个原則应用和扩展到工厂的大規模生产上才行。使工人等級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通过这种手段，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消除那条規定工資的殘酷的铁律！如果工人等級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那么工資和企业主利潤之間的區別就消失了，从而單純的工資也沒有了，劳动收入作为劳动的報酬代替工資的位置！”用最和平、最合法、最簡單的方式，即工人等級通过自願的联合以自己企业的主人的身分組織起来，取消企业主利潤，这是工人等級状况的唯一真正的、唯一合乎它的正当要求的、唯一不是幻想的改善。

38 可是怎么做呢？拉薩尔又接着說，看一看铁路、机器厂、造船厂、棉紡厂、織布厂等等，看一看工人的空空如也的口袋就可以知道，如果工人仍然仅仅作为个人孤軍奋战，他們就决不可能自己經營大工业。“正因为如此，国家的事业和任务就是使你們能够做到这一点，即把工人等級个人的自由联合的伟大事业抓到自己手里，促进它，发展它，使它成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向你們提供自己組織和联合的手段和可能性。”

拉薩尔这时指出，有人說国家的任何这种干預取消了社会的自助，这是把人引入迷途的叫喊。如果国家給青年聘請教师，設立学校和图书馆，那么它并不妨碍青年自修。可能有个別人沒有利用教师、学校和图书馆而受到教育，可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工人的个别集团尤其在英国通过仅仅由于他們自己的努力而成立的合作社，在大生产的某些較小的部門，在某一个小范围内使他們的状况得到一些改善，那么这些例外只是证实这条規則，即对于整个工人等級說来，只有通过国家帮助才能真正改善它的状况。

同样，工人也不願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廉价的空論欺騙。“离开所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远的莫过于这个要求，即

劳动階級完全同今天一样，保持它們的个人自由，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劳动报酬，同国家的关系无非是通过国家得到它們办合作社所必需的資本或必需的貸款。可是，促进和介紹人类文化的巨大进步，正是国家的任务和职责。这是它的使命，它为此而存在，永远为此服务而且必須为此服务。”拉薩尔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举可以举的关于运河、公路、邮局、邮船航綫、电报、地租銀行、农业改革、新生产部門的設立等等成百个例子，而深入地談了談国家对于铁路工程的利息保证。他說，这种利息保证是国家的极为强 39 烈的干与，是有利于富裕的有产階級的，这些階級本来就掌握一切資本和信貸，可以比工人容易得多地抛弃国家的干与，可是它們还是要求这种干与。这是完全可以允許的，可是，如果問題在于国家为了受苦的階級，为了絕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参与其事，那么这种干与就是“純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管铁路引起的文化进步多么大，它同劳动階級的联合达到的最巨大的文化进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拉薩尔在一个注解里对此作了說明：关于一个随着時間的推移逐漸扩及整个工人等級的合作社所需要的資本（說得更确切一些是所需的貸款）很容易得到的問題，在对貨幣和信貸的社会职能作过金融理論方面的討論以后再談。此外，所有这种有关执行方法的討論完全是多余的、不起作用的；如果实现要求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討論才有实际的价值。拉薩尔暂时停留于下面的指示：“这些合作社当然是随着時間的推移逐漸遍及整个工人等級。它們将从由于雇佣的工人最多而最适合联合的工业部門开始。它們将从那些地区开始，那些地区由于它們的經營活动的方式、由于它們的人口密度以及由于居民自願联合的意向——这是三个通常同时出現的因素——比其他地区适合联合。一旦成立了一批这样的合作

社，一切其他企业部門和地区就越来越容易地建立合作社，因为一切由国家帮助建立的合作社必須而且也将参加一个信貸联合会。除去信貸联合会以外，一个保险联合会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合作社，这个联合会通过分配补偿可能发生的营业損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国家决不会終于在这些团体中起独裁者的作用，它的职权只是确定或批准章程和为了保证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对营业的监  
40 督。每周先发給工人适合該地該企业水平的工資，年終把合作社的赢利作为紅利分給工人。”为了证明成立这些合作社的实际可能性以及证明它們的存在会带来很大利益，拉薩尔提到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虽然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沒有任何帮助和支持成立的，完全依靠孤立的工人的努力，但是却得到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合作社确实是未来的先鋒，它們用坚强的手开辟道路，不顾与它們对抗的不可能性，取得了可信的实际結果，这說明，如果国家帮助克服这种不可能性，就会得到大不相同的結果。

可是到底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1851年，普魯士王国国家統計局根据官方稅册公布了居民如何根据收入分担賦稅的計算法。拉薩尔把这个計算的結果用原話和原来的数字再說了一遍，然后把它总括了一下：“百分之七十二又四分之三的居民的收入不足一百塔勒，即处于最貧困的状态！其他百分之十六又四分之三的居民的收入在一百塔勒至二百塔勒之間，即处于几乎沒有改善，仍然貧困的状态，其他百分之七又四分之一的居民收入在二百塔勒至四百塔勒之間，即仍然处在困难状态，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一的居民收入四百塔勒至一千塔勒，一部分处在勉强得过的状态，一部分处在富裕的状态，最后有百分之零点五的居民是大大小小的富豪。仅仅两个最低的、最受压迫的階級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如

果人們（人們也必須这样）再把仍然沒有資产的、受压迫的第三个階級的百分之七又四分之一加上去，那么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六又四分之一的人处在受压迫的貧困状态。国家属于你們，受苦的階級，而不属于我們，較高的等級，因为国家是由你們組成的。国家是什么？我提出这个問題，現在你們从很少几个数字中比从几本厚书中看得更明显：你們貧穷階級的大联合——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工人的这个大联合不應該对他們的較小的联合发生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呢？

拉薩尔还特別提出一个例证，說明不依靠国家的資助、利用自 41  
由联合改善工人等級的状况而想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是不可能的，这时他談了談英国工人合作社中最有名的一个，罗奇德耳<sup>①</sup>的開路人。他強調指出，在那个合作社中产生过一个旨在使那些不同时是股东的工人得不到营业利潤的运动；有工人資产和雇主义思的工人，罗奇德耳的開路人就变成了这幅令人討厭的諷刺画。此外，合作社的工厂有一千六百个工人股东，而在那里劳动的工人只有五百人；如果人們不干脆想像工人就是富人（如果是这样，一切問題都在幻想中解决了），那么在本工厂中劳动的工人就永远也不能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工厂所需要的投資。为此需要多得多的不在工厂劳动的别的工人股东。两者在罗奇德耳的開路人那里的比例是一比三，这甚至是很順利的，只能用十分特殊的例外情况来作解释，此外这个比例必然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增长，因为文明的进步恰恰在于，每天有更多的死的自然力，即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因而投資額对人的劳动的数量的比数每天增长。如果合作社扩及整个工人等級，哪里找到三倍或者更多倍数的、現在还必然支持在工

<sup>①</sup> 英国中部工业城市，1844年在这里成立了第一个消費合作社（罗奇德耳的誠实的開路人）。——譯者

厂劳动的工人的工人股东，来給这些工厂投資呢？

因此，用这种办法，通过工人等級的成員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努力，解放工人等級，从数学上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工人等級脱离苦海的唯一道路就是自由的个人联合，通过国家的推动和援助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怎样使国家能够参与共事呢？答案立即十分清楚地摆在大家面前：只有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权才能办到。如果德国的立法机关是由这种选举权产生的（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能規定由国家履行这个义务。“然后在立法机关中提出这个要求，然后这种参与的范围、形式和手段可以借助理智和科学来討論，然后——你們可以放心！——了解你們的情况，献身于你們的事业的人，就能够用科学的鋒利武器武装起来，站在你們一边，保护你們的利益！如果而且只要你們的事业的代表仍然只占少数，那么你們，社会上的沒有資產的階級無論如何只能归罪于你們自己和你們的选举不当。”普选权不仅是工人等級的基本政治原則，也是它的基本社会原則，是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样使普选权得以实现呢？拉薩尔指出反对英国谷物稅的五年多的鼓动工作，谷物稅終于被托利党内閣废除了。“你們自己組成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在德国各邦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是不倦、不断的宣传活动。从这个联合会哪怕只包括十万德国工人的时刻起，它就会是一个力量，任何人都不得不加以重視。”工人應該把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作坊、每个村庄、每間茅屋中去。城市工人應該把他們的較高的見識和修养灌輸給农村工人，應該随时随地、不断不停地討論普选权的必要性。工人們應該建立互助会，这些互助会虽然資金很少，但却是进行宣传活动的巨大財力，利用这些互助会可以創办公开的报纸，散发传单，派出代表。你們應該每天不倦地重复这一点，再重复这一

点，永远重复这一点。“取得实际成果的一切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点，集中于最重要的一点，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你们不要向右看也不要向左看，对于一切不叫作普遍、直接的选举权或者与它没有联系、不能导致它的东西都不要听。”如果在不多几年内能够实现的这个号召，确实被传播到构成社会上的贫穷的、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人们中去，那么人们就不能长期反对它。

各邦政府可能同资产阶级为政治权利斗气、争吵。它们甚至可能用对政治权利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拒绝工人的政治权利，从而拒绝普选权。<sup>43</sup>“可是普选权已被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人理解为一个生存问题，因此它也被热情地传播到整个民族中去——先生们，你们可以完全放心，没有任何力量会长期反对普选权。这就是你们必须树立的标志。这就是你们胜利的标志！对你们说来，别的东西是没有的！”《公开的答复》就是这样结束的。

## 六 拉薩尔的会战计划

拉薩尔的《公开的答复》对《工人纲领》的关系，就同战术对战略，会战计划对战役计划的关系那样。它是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次会战所做的战斗部署。拉薩尔作为工人鼓动家在《公开的答复》中提出的不是结论而是导言。他知道，他要想投入战争的群众是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组成的，他们的看法和理解力极为偏狭，必须在炮火中受到锻炼。拉薩尔也必须仔细注意他行军所经的地形，注意他所冲击的堡垒的构造和形势，注意发射的敌炮的口径。现在他必须实际上克服一切革命行动的辩证矛盾，他曾经使这个矛盾成为他所创作的悲剧的可悲思想。问题在于，

把原則的全部坚决性同政策的必要的片面性結合起来。

拉薩尔不能（至少不能像馬克思所要求他的那样）保持“同过去的工人运动的天然联系”。几乎没有哪两个时代的差异比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同发表《公开的答复》的时代的差异更大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精銳小部队說話，这支小部队几年乃至几十年以来住在欧洲交通的中心樞紐，熟悉了德国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的最困难的問題，它团結在一个秘密的宣传协会之中，在革命的前夜做准备工作，在欧洲的扰攘不安的群众中为共产主义进行宣传。相反地，拉薩尔对一个經濟和政治上还很落后的国家的工人阶级說話，这个阶级还远沒有摆脱凶恶的反动妖魔，通常革命的炮火洗礼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但是在最近时期内这种迅速提高是沒有希望的；这个阶级应该作为群众性政党，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战斗，可是連它最进步的成員对于这个社会的本质也几乎毫无所知。假如对当时的德国工人只能被他們最切身的利益吸引住这一点有所怀疑，那么对拉薩尔來說，他的《工人綱領》所受的待遇必然消除了这种怀疑。《工人綱領》虽然也已經使《共产党宣言》的思想适应德国的状况，但是它在工人阶级中沒有引起反应。

拉薩尔不願根据一个純理論的处方，預先規定德国工人运动的进程，而是完全按照馬克思的見解，只要德国存在真正的阶级运动，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宣传活动的现实基础。他从普选权和合作运动，这两个开始推动德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他向德国工人說明，对他們來說，普选权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不掌握政权，他們决不能滿足自己的阶级利益，这样他就立即使普选权的要求具有原則的全部坚决性。四十年的德国历史給拉薩尔证实了，他在这一方面对德国状况判断得多么正确。当他使普选权成为工人运

动的口号的时候，普选权沒有享有最高的声誉，因此应该对他的功績作出更高的评价。资产階級群众出于多疑的階級本能反对普选权，而另外一些人（不仅有朗格和洛貝尔图斯，也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第二帝国时期实行普选权的經驗对普选权表示怀疑。

誠然，拉薩尔对普选权作了过高的评价。虽然一开始他就說，普选权不是魔法杖，虽然他认为普选权不是立即而是长期下去才能发生重大作用，但是他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測定这个期限。在这一方面拉薩尔产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也是这样）大胆而眼光远大的思想家的那种錯觉。可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拉薩尔正确地認識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普选权是一个武器，德国无产階級必須而且也将用这个武器进行斗争，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虽然这个見解遭到这样激烈的而且是来自这样有影响的人士的反对，事实的力量却不断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向拉薩尔預先給它規定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以普选权作为它最适合、最有效的武器而成长壮大的，关于这一点任何人也沒有恩格斯在他的最后著作中說得更有說服力了。<sup>①</sup>

① 恩格斯的最后著作是为馬克思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个导言写于1895年3月。同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这个导言的摘要，却删去了一切革命的言詞，以致把恩格斯（如他于1895年4月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所說）弄得“无论如何总是站在温和的合法性崇拜者的地位”，使他感到十分憤慨。可是在《新时代》上以及作为小册子发表的导言也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文。因为政府正在重新制定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法令（所謂“顛复法案”），所以柏林党执行局請恩格斯删去导言中的一些激烈的詞句。恩格斯不得已同意了。他在3月25日写信給考茨基說：“由于我在目前情況下必須考虑的、我們的柏林朋友对于顛复法案的一些顾虑，我的文章蒙受了一些損失。”因此这次发表的导言虽然暂时——在一定的情况下——得到恩格斯的同意，但是对議會活动却給与了比他真正的看法要肯定得多的评价。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在恩格斯死后竟厚顏无耻地在为自己的議會迷病症作辯解时，引证恩格斯为《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当作对单纯議會主义的贊揚和恩格斯的政治“遺言”。梅林当然沒有看过

然后拉萨尔谈到合作社问题。他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资规律粉碎了关于工人阶级的这个所谓万应灵丹的一切幻想。他用无产阶级压迫者自己的武器打击这些压迫者。拉萨尔在后来的演说和文章中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切著名的代表人物都承认他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规律。可是正是他十分强调的这个规律的“铁的”性质被社会主义经济学证明为站不住脚的，因此重要的是，要研究拉萨尔是否相信这个规律存在并根据什么历史权利相信这个规律存在。

首先，马克思后来在一个极不愉快的时刻所写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sup>②</sup>可是拉萨尔并没有陷入这个矛盾之中。他不是象朗格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待马尔萨斯的理论，他比他们两个几乎更明确地指出了马尔萨斯理论的特征。他指责这种理论的真正核心，即认为人口繁殖的速度有超过生活资料增加速度的倾向，是一个“早就遭到反

恩格斯导言的原文，以为可以援引恩格斯的“最后著作”来说明拉萨尔的观点正确。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的原文第一次在苏联发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6—229页。——原编者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駁的錯誤”，他嘲笑由这个錯誤所引出的关于“明智地节制”生育的理論是幼稚的、不道德的、不合人情的、不自然的，“完全是胡說八道”。同馬尔薩斯相反，拉薩尔說：劳动的人手越多，財富就越多；如果今天的情况还不是这样，那么缺点在于資本主义社会的“經濟对抗作用”。因此，拉薩尔在《公开的答复》中強調指出，“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劳动供求的支配下”，資產階級經濟学的工資規律是有效的。他不是像馬尔薩斯主义者那样把它看做是一个自然規律，而是看做一个社会規律，因此他可以毫不矛盾地說，社会的另一种組織可以取消这个規律。

显然这种看法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包括《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著作中所发表的关于工資規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就說过，人口并不在自然界中威胁生活資料，而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威胁就业手段；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力的生产受竞争規律調节。恩格斯在他論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中說明工資規律所用的話与拉薩尔在《公开的答复》中所用的差不多相同，事实上恩格斯也承认拉薩尔像他自己和馬克思在四十年代所理解的那样引用了工資規律，即作为資產階級社会的經濟規律，不是作为馬尔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然規律。大概朗格也沒有說，拉薩尔用馬尔薩斯理論证明工資規律，相反地他責备拉薩尔忽視了这个理論，像馬克思那样，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引出他的規律。

可是，即使在这种限制下，工資規律的“铁的”性质仍然遭到馬克思的駁斥，說得更确切一些是用科学上不可爭辯的方式证明，它对已經发展的資本主义社会是站不住脚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現代工业及其有規律的周期变动不是通过人口的絕對运动，而是通过相对的过剩人口，通过資本根据自己的伸展或收縮而吸收或推回的产业后备軍来調节它对劳动力的需要。“但在由 47

于工資上漲，实际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能够积极增加之前，恐怕已經再三經過了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必然有产业战进行着，厮杀着，并且要打出勝負来。”<sup>①</sup>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起支配作用的工資铁律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鼎盛时期变成一个有伸縮性的工資規律。它的上限是資本的利用需要，它的下限是工人所能忍受的目前不致餓死的貧困的程度。在这些界限內，工資額不是由人口的自然运动决定的，而是由工人对資本尽可能从劳动力中榨出无偿劳动的經常傾向进行的反抗来决定的。如果这种傾向碰不到任何反抗，那么它就发展成为不是铁律的作用能再提高的低微工資。如果这种傾向遭到反抗，那么它就按照这种反抗的力量和程度而被消除，因此，工厂法、工会以及其他能够增强工人的反抗力的东西决不是螳臂当車，而按照工資铁律的理論，却應該是这样。可是資本的不断积累，产业后备軍的不断増加，从而无产阶级階級状况的不断恶化，这是工人的一切反抗都不能制止的。“使……产业后备軍常常与积累的范围和能力保持均衡的規律，又把劳动者牢牢鎖在資本上面，比火神黑伏士多斯把普罗米修斯鎖在岩石上，还要鎖得坚牢。这就引起一个与資本的积累相适应的貧困的积累。在一极有財富的积累，同时对极，那个把自己的产品当作資本来生产的階級，就有穷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暴及精神頹廢等等的积累。”<sup>②</sup>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即在拉薩尔死后三年）所闡明的那样，这是大資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工資規律。

如果說拉薩尔在他提出工資铁律的时候有理由說，它是  
48 一个在科学上不容爭辯的規律，毫無疑問，他相信这个規律是正确的，那么当然还要补充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就已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參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1頁。

② 同上书第710頁。

經指出产业后备軍和它对工資所施加的压力，他們預言了无产階級不可遏止地下降到赤貧的境地，他們在《共产党宣言》中正是由此得出結論說，資產階級再不能統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維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拉薩尔在后来的著作，尤其是在他的主要經濟著作《巴师夏-舒尔采》中，确实毫无顧忌地論述了使現代无产階級的状况比从前一切被压迫階級的状况更坏的这种生存的不稳定性。他之所以不在《公开的答复》中就強調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他在这里只想提出“絕對确定的和容易論证的东西”。因此他完全不談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中工人的状况是經常改善还是經常恶化的問題，而只談即使人們作出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較有利的假定，工人的状况还是不能忍受的这一事实。

当然这一事实也不因馬克思所闡明的工資規律而有任何改变。恰恰相反！現在举一个数字为例來說明問題，拉薩尔的工資铁律这样說：資本主义社会欠无产階級一百，而馬克思的有伸缩性的工資規律說：不，資本主义社会欠无产階級一千。資產階級抱怨說，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工資铁律，而不对它在这样长的时期內依靠拉薩尔的“引入迷途”的权威，对資本主义社会施加的“不公正行为”表示懺悔，这种抱怨是沒有理由的。比較严肃的指責是，拉薩尔被工資铁律的結論所牽制，低估了工人保护法和工人階級的工会組織（只要它不是沒有实际目的的）的意义。工会运动在德国暫時还不能开展，并非由于拉薩尔的理论錯誤，而是因为德国差不多所有邦政府和人民代議机关都死抱住禁止工人联合的法令不放。不通过威胁性的群众运动从这些高級官厅手中夺取工厂法，却为此向它們苦苦哀求，这是拉薩尔即使确实沒有低估工人保护 49 法的意义，也不能做的一种儿戏。

对当时的实践來說，拉薩尔从工資铁律中为消費合作社引出

的結論可能是重要的。他认为要想帮助作为消費者的工人就是本末倒置，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管这种帮助多么微小，它也不像拉薩尔根据工資铁律所认为的那样渺茫。可是他也不是劝告工人不要参加舒尔采的合作社；他反而对他們說，只要这些手段能給个别工人或工人集团以某些帮助，他們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拉薩尔不是反对合作，不是反对自从圣西門以来作为社会主义中心問題的合作生产和合作消費，他只反对在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资产階級对合作思想的摧殘。在估計这种思想仍能有所作为方面，拉薩尔不是走得不够远，而是走得太远，他对英法两国的工人合作社的評價以及热情地同“德国合作事业的父亲和創始人”握手就說明了这一点。

那种摧殘在于，使合作思想脫离了政治方向，出于好心或恶意，劝告工人說，为了自己的解放，他們不需要政权，而可以作为个人自己帮助自己。拉薩尔用“国家帮助”来反对这种“自助”。他教誨工人說，他們只有組成政党才能走上脫离苦海的道路。这肯定不是标新立异，而只是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复兴，正如这个斗争在四十年代不自觉地发展起来，后来《共产党宣言》根据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各个方面做了說明那样。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也不是从毕舍或路易·勃朗或其他一个“所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代表那里剽窃来的，这个代表要想根据某个人为的建筑計劃建設一个新社会，而不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必須掌握它那个时候的运动規律，才能支配它。由此可以看出，拉薩尔是怎样看待“所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諸如此类的烏托邦的。

50 在合作問題上，拉薩尔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同一个立場上。1864年拉薩尔死后，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写道：“1848至1864年的經驗毫無疑問地确定，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則上

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但只要它沒有越出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那就始終既不能阻止垄断按着几何級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減輕他們的貧苦負担……为了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国家财力。”<sup>①</sup> 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同样的精神根据大概是由馬克思起草的提案,作出決議:“个体的雇佣劳动者通过他們的联系所能給与合作运动的发展形式是不健全的,这种合作运动不能通过自身改造資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自由和合作的劳动的一个巨大而和諧的体系,就需要普遍的社会变革,一般的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沒有社会的有組織的力量,这种变革就决不能实现:必須从資本家和地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由工人自己行使。”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經提到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也談到有組織的无产階級在夺取政权后采取种种措施,把信貸集中到国家手里和建立国营工厂。

可是在这个問題的一点上,拉薩尔从現代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退回到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去了。不过并不是鼓动家打乱了理論家(按照洛貝尔图斯的說法是,“公开的”拉薩尔打乱了“隱秘的”拉薩尔)的計劃,而恰恰相反。假如拉薩尔仅从鼓动工作考虑,在无产階級专政在历史上所担負的各种各样的任务中,恰恰把生产合作社提到首要地位,那么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无可非难的。因为舒尔采-德里奇本人宣布生产合作社是一切工人合作社的“頂点”,所以簡單指出,他虽然經過十年努力还沒有能够建立生产

<sup>①</sup> 梅林在这里引的不是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并且成为許多新版本的根据(如《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所載)的馬克思翻譯的成立宣言的譯文,而是利用了威廉·艾希霍夫經馬克思认可后在他1868年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中发表的譯文。——原編者

合作社，或者沒有能够建立一个值得一提的生产合作社，对他就是最确切的反駁。舒尔采虽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在德国却被认为是“社会王国的国王”，如果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开展起来，他就必然要退位。可以說明当时情况的特色的是，舒尔采是在莱茵省的首府被宣布为那种国王的，而且是由馬克思的两个老同志宣布的：一个是格奥尔格·荣克，他曾在《莱茵报》工作过，另一个是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本人还当过《新莱茵报》的編輯，在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判了好几年要塞监禁。

可是拉薩尔并没有，或者并不单单出于鼓动的原因而把工人的注意力首先引到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上去。他想給工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具体的东西，不能把他的最終目标——消灭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写在他的旗帜上，而不使他的进步党和自由貿易派的“烏合之众”的敌人得到他們所渴望的、在还完全沒有觉醒的群众面前巧妙地把他当作一个沒有头脑的空想家而击败的可能性。因为拉薩尔还不能公开自己的目的，所以他选择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作为一个完全渗透了目的的本性的手段。他已經在《公开的答复》中間接地，在《巴师夏-舒尔采》中直接地談到，有必要用社会的共同信貸經營其共同的事业，把生产的收益按照参加生产者的劳动成績进行分配。“这一方面的过渡手段，最方便、最温和的过渡手段就是国家資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这还不是‘解决社会問題’，解决社会問題需要好几代時間，然而它是有機的、不可遏止地趋向一切进一步发展的、使这种发展由自身展开的芥菜子。”拉薩尔在为这几句話写的一个注里說，正因为他的过渡阶段是这样温和和实际可行，而自身又包含着一切进一步发展的有机萌芽，所以它激起资产阶级的这种无名怒火，假如他提出某个进一步的抽象要求的話，资产阶级会平心靜气地把他当作沒有危险的异教

徒置之不理。理論上的成就和他通过他的《公开的答复》而开始的 52  
实际鼓动在一点上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規律。理論上的成就越是完全地引出在它本身发展的原則的一切結論（哪怕是最后的和最沒有关系的結論），这种成就就越好。相反地，实际的鼓动越是先集中于一点，然后推論出其他一切，这种鼓动就越有力量。不过这一点必須是本身已經包含其他一切結論的一点，这些結論必須由这一点以有机的必然性发展。

拉薩尔在致洛貝尔图斯的信中也正是这样說的。他在这里明确地說，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在他只是达到目的，即生产社会化的手段，如果洛貝尔图斯对于同样的目的有更好的办法的話，他将欣然受教。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深信国家給工人合作社的貸款不是主要的，但它一定根据自身发展的活动的結果，逐漸地（当然要經過一二百年）导致土地和資本私有制的消灭。

因此关于拉薩尔提出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要求时的純正动机，无需再作說明。他认为这个要求很有实现的希望，起初只为其辯护，这也是有道理的。可是这时候他犯了一个理論錯誤，犯了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的錯誤，认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取消商品生产的規律。如果人們把无產階級夺取政权当作前提，那么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說，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属于“这样一些措施，它們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沒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們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sup>①</sup>这就是說，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不能自发地由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們听命于自身发展的活动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0頁。

的結果，它們生产商品，必須服从商品生产的規律。布赫尔曾經說过，它們只制造新私有者，洛貝尔图斯說，对于生产的社会化來說，这种新团体所有制甚至是比資本家的私人所有制更难克服得多的一个障碍。当然拉薩尔答辯說，他根本不要求土地、資本和劳动产品应归工人所有，他要求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即个人的“劳动成果”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这个份額决定于个人的劳动量同全社会劳动量之比。虽然这是他的最終目的，可是他沒有看到他的手段对于这个最終目的是不适用的。工人在依靠自身发展的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中变成“他們自己企业的主人”，他們的“劳动成果”，如洛貝尔图斯所說，将是地租+資本利潤+工資，因此，如布赫尔所說，对占有的化学特性沒有任何变动。

人們可能认为，拉薩尔的这个理論錯誤終于成为一場无聊的爭論。假設工人像《共产党宣言》和《公开的答复》以同样程度假定的那样，先夺得了政权，那么他們早就学到这么多的邏輯，或者事实的邏輯很快就給他們說明，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不是在《公开的答复》的意义上，只有在《共产党宣言》的意义上才是解放本階級的一种手段。可是拉薩尔的錯誤也有实际的后果。如果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有机萌芽”，那么哪一个国家来培植这个幼芽就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就給一切可能的反动活动开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拉薩尔的資產階級敌人对于資本主义社会的阴谋詭計知道得十分詳細，馬上就能认出拉薩尔的装备上的弱點。假如他們的进步的长腿不靠着一根棍子，他們在这一点上甚至会比他們实际所做的更凶恶得多地逼迫他。为了彻底揭露拉薩尔的錯誤（他們，恰恰是他們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們必須坦率得超过對他們似乎有利的范围，显露“各界优秀人物”的美点，于是他們滿足于根本沒有或者十分表面地接触問題核心的指責，以致

拉薩尔要击退这些指責是相当容易的，当然这又加强了他的錯誤观点。

此外拉薩尔是一个头脑清楚、目光敏銳的思想家，不会这样由于外来影响而突然想到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念头，也不能够这么直截了当地摆脱这个念头。相反地，它同他的全部經濟思想糾纏在一起。拉薩尔把地租和資本利潤正确理解为劳动产品的扣除，可是他只把这看做是对工人階級的“詐騙”；他把剩余价值的形成理解为一个法哲学的問題，不像馬克思那样理解为一个提供了解整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能使整个經濟学发生革命的經濟事实。不管拉薩尔怎样站在《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他也沒有完全割断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对他的束縛。在《工人綱領》中以及在拉薩尔后来的鼓动著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法国社会主义有一定程度的依靠。

这种一定程度的依靠之所以不可忽略，是因为它往往被夸大到最可怕的程度。拉薩尔有一切理由推測，他的和路易·勃朗的“国民經濟学观点可以很明显地各奔东西”；他的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同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場是这样的不同，以致只有曾經被判定为見树不見林的德国教授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談，而阿尔伯特·朗格在 1865 年就已經提醒人們不要这样做。拉薩尔贊同四十年代法国社会民主派的意見，可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說，并不放弃对它的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他也批判地克服了它的幻想，只剩下一点残余，这个残余还给經濟問題披上法学的、哲学的和一般思想的伪装。剩余价值作为經濟杠杆变革資本主义社会，可是作为“对工人的詐騙”，它不会被想像得如此美好的国家所废除。拉薩尔在他的法学和哲学观念方面，也从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并得出同他們完全不同的結論；他淵源于費

希特和黑格尔，而毕舍則淵源于圣西門，勃朗淵源于傅立叶。可是拉薩尔在为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辯护时，卷入了有时像毕舍有时像勃朗的一系列矛盾之中，并不是因为他剽窃了他們的著作，而是因为解决同一不可解决的矛盾的一切尝试必然有某种相似的地方。

拉薩尔从普魯士的收入統計中引出的錯誤結論同对社会和国家的唯心的、形式的了解也有关系。他已經证明了他本来要想利用这个統計证明的东西，尽管有无数有道理的和沒有道理的責难，有的是针对他的主观的解释，有的是针对他所报道的数字的客观正确性。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算术都不能推翻这个事实，即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統治的国家里，大多数人过着不同程度的貧困生活，相当少的少数人过着大体可以糊口的生活，占全人口絕對或相对极小比例的人过着不同程度的富裕生活。正如拉薩尔在他的一次辯护发言中所說，一切統計資料反映了絕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有产者只像几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絕大多数人的阴暗潮水中，仿佛是为了表示，那股潮水多么阴暗，多么深邃”。可是，拉薩尔从他的数字中得出結論說，几年之內，就可以把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貧穷的、沒有資產的人民聚集到无产階級解放斗争的旗帜周围，这个錯誤甚至使他感到最难受的失望。

四十年代的法国社会主义提出来和資產階級对立的“人民”，同《共产党宣言》提出来和資產階級对立的現代工人階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拉薩尔忽略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結構。他忽略了，現代工业的雇佣工人只是沒有資產的階級中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而在这个相当小的部分中又只有一个相当小的部分有了无产階級階級觉悟，构成全人口的貧穷群众的各階級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村无产階級、婢僕、小农、小官吏、小手工业者乃至一部分

帮工都对工业雇佣工人的解放斗争抱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不同阶级的见解和思想决定于它们的特殊的阶级地位，为了使它们领会经济的辩证法（起初最有说服力的雄辩术也不能使它们体会这种辩证法），需要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不同的变革。拉薩尔想用思想的推动力完成只有经济的推动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因此，《公开的答复》有不少缺点和片面的地方，但恰恰是这些缺点和片面的地方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它的直接影响。工资铁律、对剩余价值的道义和法律上的判决、收入统计及其动人的数字使几十万颗高贵的心燃烧，使几十万支坚强的臂膀受到锻炼。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辩护的意思，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假如拉薩尔把理由不充分的论点传播到群众中去，并非因为他认为它们是正确的，而只是因为他认为它们能起作用，那么他就不应受到辩护，而因为他认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别人就无须为他辩护。可是，正如《公开的答复》中的片面性和弱点乃至一切都出于一个根源，即拉薩尔还没有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的全部活动一样，这些片面性和弱点的强烈影响也可以由当时德国根本还不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解释。没有可以据以衡量拉薩尔的论点中的错误的实际尺度，同资产阶级用来网罗无产阶级的迷人的蜘蛛网相比，他还是三倍正确，即使在按今天的科学认识的水平来看不正确的地方也是如此。他正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所需要的开路者，因此他在他的弱点方面也是强有力的。

而且，《公开的答复》的缺点比起它的优点来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拉薩尔在工人运动的第一个会战计划中就提出了一个正面广而纵深大的部署，一开始就堵塞了一切宗派的歧途。为了进行政治的阶级斗争，他把队伍组成这样密集的方阵，使得队伍永远只能

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平地上行軍和作战。他的理論的片面性阻碍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前進的時刻必然要到来，可是長期下去，這些障礙就被偉大的思想家和戰士所組織的軍隊的腳步踩碎了。

57 当拉薩尔用《公开的答复》同路德反对赦罪的論綱相比的時候，他对自己的鼓动不是估計过高，而是估計过低。論綱点火比較快，也比較直接，可是只像一个火星落到一个开口的火药桶里，通过一次激烈的爆炸把十六世紀的德国群众投入一个混乱的运动之中。同論綱相比，拉薩尔的答复是一个火把，它給十九世紀的德国群众运动指出了几十年的道路和目标。路德为他的行动的成果感到惊奇，拉薩尔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什么。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宣言使工人从內心里了解他們的經濟状况，使他們能够抵抗一切謊言、幻想和欺騙。拉薩尔在写給同他交好的杜塞尔多夫的商人勒維的信中說：“全文讀起来是这样容易，以致工人一定会馬上感觉到，仿佛他早就知道，任何人也不能从他那里把它夺去，或用謬論和詭辯把它除去”。可是他又补充写道：“一般說来，工人等級也許認識还不够明确，如果是这样，我当然是一个无用的人，进步党可以欢呼我摔倒了。”拉薩尔敢作敢为，可是他不敢輕举妄动，而是受伟大的历史义务的約束。

当布赫尔和齐格勒在最后关头还想拽住他的胳膊的时候，他答复他們說：“一个工人运动已經存在，即使要掉三十三次脑袋，也必須給它提出理論認識和实际口号。”拉薩尔用这一番話保证了他在同时代人中的权利和在后世的荣誉。

## 七 最初的成敗

3月17日，萊比錫中央委員會討論了拉薩尔的綱領性文章，

虽然罗斯梅斯勒、多尔格和以来宾身分出席的施特雷克富斯表示激烈反对，仍以六票对四票通过它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宣言。少数派之中，有两个人只願意有条件地表示贊同，另外两个人想向工人简单地介紹这个文件。这两个人（其中有多尔格）退出了中央委員會；  
罗斯梅斯勒和文特尔也辞去了“受托人”的职务。由于中央委員會的多数派贊成拉薩尔的宣言，他們就放弃了执行柏林綱領的工人代表大会，主张建立一个奉行拉薩尔所闡明的綱領的大規模的工人联合会。于是中央委員會就解散了。正好隔一天，即3月18日薩克森政府发布了一个命令說，由工人大会选出的委員會应被視为社团，必須遵守結社法的規定，不得同其他社团有事务上的联系。

3月24日，中央委員會把自己的权力交給在音乐堂举行的一个全体工人大会。多尔格和罗斯梅斯勒又提出警告，而进步党人席尔特巴赫讲的話比他們还激烈。大会还是以一千三百五十票对两票决定贊成拉薩尔，并成立了一个新委員會，筹备大規模的工人联合会。

此外，《公开的答复》像一个炸弹似的落下来了，不过贊成的远比反对的为少。人們对拉薩尔，也对萊比錫中央委員會傾泻了无数的責难。3月28日在一次全体工人大会上就同意萊比錫決議的勇敢的汉堡工人首先支持拉薩尔和萊比錫中央委員會。佩尔和奥多尔夫用这个大会的名义給科堡工人报寄去一个精采的声明，无情地揭发了資产階級对工人階級玩弄的阴謀詭計。他們在声明的最后說：“我們通过这个声明向你們，萊比錫的勇士，伸出結盟之手，你們也把普遍和直接的选举权写在你們的綱領上，你們也为（虽然也許是徒劳的）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請接受我們衷心的謝意。但願我們的这一贊揚能够补偿別的方面对你們的忘

恩負义行为。即使你們和我們的希望暫時不能实现，你們也获得了首先发动运动的荣誉，但願这个运动不再死去，而是（也許在将来）产生伟大的生命。”《科堡日报》至少給这篇有两栏长的声明打开了它的“談話室”，当然只是为了把它埋葬在編輯部的九栏的評論里，这些評語是表面善意和内心憤怒的混合物，最后来了一个明显的暗示，一字不易地搬出了 1854 年的邦联法。

接着，4月11日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工人大会表示贊同拉薩尔；他們寄到萊比錫的表示贊同的決議上有六十个参加者的亲笔签名。同一天，佐林根工人教育协会也做出了同样的決議。第二天，即4月12日，在科伦举行了一个省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會議，把萊比錫決議列入議程；这个會議有科伦、杜塞尔多夫、佐林根、爱北斐特和四个小地方的代表参加；佐林根的代表带来了信鴿，以便能够立即向故乡报道人們以紧张的心情等待的結果。在这个會議上几乎只有已經参加过革命年代的工人运动的人互相爭論，这些人是：毕尔格尔斯、里廷豪森、同拉薩尔交好已有十五年的杜塞尔多夫商人勒維，还有胡果·希尔曼。这时毕尔格尔斯已經后退为溫和的进步党人，向拉薩尔发动攻击，用傲慢的态度对待里廷豪森，把他当做一个用意很好，但把作废的药方又拿来重用的人，他还不了解，人民的直接立法是万应灵丹。只有勒維和希尔曼坚决拥护拉薩尔，并終於取得胜利，当然票数只是六十四对五十七。4月19日，由希尔曼任主席的爱北斐特的符佩尔塔耳工人联合会也表示贊成萊比錫決議。

可是这也就是一切，而表示反对的大会却多得多。3月20日，路德維希·洛厄佛向萊比錫工人报道說，舒尔采-德里奇通过施特雷克富斯知道了3月17日的決議，“舒尔采对你們非常生气，他很希望萊比錫中央委员会繼續存在下去，希望那里，甚至在委员会

中发生分裂，他将向奥芬巴赫、法尔次海姆和紐伦堡发令，反对拉薩尔的小册子。”紐伦堡工人协会也馬上积极活动，并于4月12日宣称，拉薩尔是“反动派收买的一个工具”，在資產階級的比較狡猾的人物看来，这种說法当然太笨拙了。相反地，他們贊成1863年4月从施泰廷到卡尔斯魯厄作出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十几个憤怒決議，說什么拉薩尔的小册子是一个“不合理的拙劣作品”，假如不是所謂的萊比錫中央委员会輕举妄动，在工人运动中，“有意或无意 60地为一切自由发展的敌人立下无比的功劳”的話，人們根本不用注意拉薩尔的小册子。

資產階級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馬上就知道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关系，它毫不迟疑地在全綫向拉薩尔发动攻击。在德国前所未有的迫害开始了。資產階級報紙卓有成效地证明，它的斗争方式比十年前封建報紙的告密者用来迫害它自己的英雄的不体面的斗争方式强。

比較起来，舒尔采-德里奇同拉薩尔最适当、最体面地进行了和解，虽然拉薩尔完全有理由談到舒尔采的“悲慘的回答”。舒尔茨用非騎士的方式回答拉薩尔的騎士式的挑战；他痛罵“走江湖的騙子”及其“吹牛术”和“仙丹”，自負地认为“拉薩尔先生的全部大胆妄为和一知半解”都属于这一方面，以便断言国民經济学的一切权威都承认工資铁律。可是舒尔采还很寬厚，容許拉薩尔有可能作为不自觉的工具为反动派服务，他至少在这一点上正确地复述了拉薩尔的見解，即工人階級必須先夺得政权，然后才能进行大規模的社会改革。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做出这种姿态，仿佛拉薩尔想急急忙忙地把工人扔进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用低下的国家奴隶身分消灭他們做人的尊严。可能事实上不能脫下小資產階級那层皮的舒尔采不是有意歪曲的；不管怎么說，由于一个粗暴的誤解，

他恰恰在他的論战能够最先伤害敌人的地方，折断了这一論战的鋒銳。他比拉薩尔更正确地估計到在德国工人階級当时的发展情況下，它的合作組織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果他想作出任何证明的話，他就應該專門致力于这一点。可是他的基本論断，即个体工人的小資產階級經營是工人階級的比它的政治行动更好的教育手段，却簡直是可笑的。这个論断也是不严肃的，因为舒尔采起了这样的作用，仿佛拉薩尔劝告工人什么也不要干，只是不时地出一点捐款做选举基金，或者把一张选票投到票箱里，这样烤好的鸽子自己就会飞到他們的嘴里。

舒尔采在攻击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时，以类似的方式使自己的武器变鈍了。作为实际了解資本主义社会情况的专家，他知道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这些合作社必然也受竞争規律支配，它們将冒无計劃的生产方式的危險，从而預先規定了它們的成員的特点，这些成員宁願做狡猾的交易所之狼，而不願做革命的无产者。可是，因为他不能承认，拉薩尔的錯誤在于沒有进一步抓住禍害的根源，所以他沉溺于这种光荣的思想，宣布資本主义的冒险是一切人类自由和一切人类幸福的总和。他认为，因为拉薩尔建議的生产合作社被国家夺去了冒险性，它們必然导致参加这些合作社的工人的道德敗坏和整个商品生产的全部下降。舒尔采背弃他較好的过去声称，科学不知道有“像企业主利潤这样一种东西”。人們所謂的这种东西，首先是企业主的工資，其次是风险的报酬。企业主是做事最多，最重的工人，所以也应该拿較多的工資，他把过去劳动的成果——資本冒損失的危險投入新的企业，所以他應該为此得到报酬。“社会王国的国王”就用这些高超的思想打击社会的“走江湖的騙子”拉薩尔。

舒尔采对拉薩尔的政治綱領的攻击也是同样高超的。他比任

何人都更了解，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用什么方式把工人压低为政治上的奴隶，現在他敢說，拉薩尔通过他对进步党的批評，侮辱了工人，工人“不是”这个党的“附庸，而是又大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他还指出，1848年无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有因或无因地把有产阶级和有教养阶级”推入反动阵营。这个微妙的論据，当时却是进步党反对拉薩尔的政治上的主要王牌，不管它是被作为或多或少婉轉的威胁或者作为使人流泪的悲歌提出来的。罗斯梅斯勒叹息<sup>62</sup>說：現在普魯士资产阶级终于起来反对王室和容克地主了，可是，当工人开始实行独立的政策时，它就又改变主意了。善良的人们以此证实拉薩尔在发表《公开的答复》时写给勒維信中的話：“請相信我，我在这里对进步党作了十分詳細的研究，它的首要原則是：宁可要来自上面的专制主义，也不要来自下面的革命。”在这个范围内，这两部分是一致的。問題只是，正如拉薩尔在一次辯护发言中所說，几十年来德国经历了巨大的动乱，是否只是为了翁魯先生和芬克先生能够同国王和大臣爭吵，能够自以为是重要人物。资产阶级坚决肯定这个問題，拉薩尔同样坚决地否定这个問題。

根据舒尔采的这些行为，要說他在拉薩尔的敌人之中还以有礼貌和态度好著称，听来就觉得奇怪了。可是事实就是这样。进步党报纸干脆說拉薩尔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无用人，不会讀統計数字，想在裁縫魏特林的翻过来的褲子里，恢复在1848年已經失敗的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場，他喋喋不休地談論李嘉图的陈腐的、早已遭到反駁的工資規律，而对国民經济学却毫无所知。或者它們更概括地揭发他是一个变节者，是一个想把工人阶级出卖給俾斯麦內閣的叛徒，是反动派所收买的工具。它們把拉薩尔的“国家帮助”歪曲为工人卖身給国王和容克所得的低微报酬，它們企图用这种

办法刺激它們自己也十分敬畏的、現代无产階級的民主神經，来反对拉薩尔，轉移对自己的注意。拉薩尔說，上百个排泄管每天向他傾泻聞所未聞的謊話、歪曲和調言，这是一种完全正当的憤慨的流露。

幸亏拉薩尔和萊比錫委员会都沒有显出被这种騷动吓呆了的样子。他們用一切力量反对这股逆流，可是当自由派报纸对工人还有影响的时候，他們的前进是困难的。他們向四面八方拉出去的綫，除去《公开的答复》立刻在那里的工人中发出威力的六个城市以外，几乎全都沒有接上。洛貝尔图斯写給萊比錫委员会的信是最初几周的唯一重要成果。洛貝尔图斯虽然承认他贊成拉薩尔为批評資产階級經濟学所說的一切，但是他不仅反对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而且尤其迫切地劝阻拉薩尔所认为的头等重要問題——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他对于普选权本身并沒有什么可反对的，可是如他所說，他不想承认它是“解决社会問題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洛貝尔图斯劝告工人不要走政治弯路，而是直截了当地組成社会党，明明白白地要求較好的社会地位，在他們的新联合会中討論，他們怎样能够得到这种較好的地位。如果只有国家政权的一般法令能够帮助工人，那么这个法令必須在所有其他階級的同意下以最和平的方式頒布。

毫無疑問，洛貝尔图斯确实认为他的主张是从他二十年来的信念产生的。他的公开信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一件勇敢的行为，它在进步党人面前，确切地指出自由貿易欺騙的本来面目。可是这个援助者用一只手給予拉薩尔的鼓动的，只是他用另一只手拿走的东西。这两个人在两三个月內书信往来頻繁，可是并沒有使他們接近一步，虽然他們互相都很同情。因为洛貝尔图斯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空想，所以拉薩尔从沒有完全了解，使

他們分离的对立多么深，烏托邦主义者洛貝尔图斯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的反感多么不可克服。他长期认为，用他热烈的辩才和亲切的友情完全可以争取这个“沉默的合作者”，而当他的一切爱的努力付诸流水的时候，他就相当气愤地割断了这种联系。可是，如果说洛貝尔图斯至少按照自己的看法做了真诚而明确的证言，那么萊比錫委员会的其他询问所得到的成果就更小：布赫尔暂时一言不发，烏特克用一个表示同情的一般声明作答，这个声明虽然没有洛貝尔图斯所做的保留，可是也没有洛貝尔图斯对自由貿易派和进步党政策的严厉批评。

拉薩尔本人根据委员会的愿望，起草新组织的联合会的章程，<sup>64</sup>亲自交给萊比錫工人。他在4月16日举行的一次大会上，駁斥了敌人对他的《公开的答复》提出的指责。他用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薩伊、罗雪尔的著作引来的不容置辩的引文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通过它的最杰出的代表承认工资铁律。他揭露了說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848年按照与工人为敌的精神建立的国家工場同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場或他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是同一性质的东西的谎言。他粉碎了国家不可干涉经济问题的谬论，根据英国的历史指出这种理论的空洞浅薄，德国的自由貿易派特别喜欢援引英国史中这个所谓的榜样。当时由美国内战引起的棉花危机给英国紡織工业区和德国紡織工业区带来巨大灾难，拉薩尔可以指出，正是英国的自由貿易派用震耳欲聋的叫声要求国家参与，以便阻止失业的工人移居国外。結合洛貝尔图斯的见解，他强调他的鼓动的高度文明的性质，这种鼓动旨在完全用和平方式取下工人的脚镣，他提醒人们不要仇恨和蔑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状态的无意志的产物，可是同洛貝尔图斯不同，他承认自己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只是因为进步党

表现出它无力取消反动派，所以他攻击它，只要进步党反对反动派，他就支持它，他想推动进步党，使它离开它犹豫不决的立场。这篇演说发生了效果，赞成拉薩尔的有一千三百票，反对他的只有两票。他的会章草案也印出来了，也同《公开的答复》一样得到广泛的传播，新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原定6月，后来确定为5月23日。

可是在萊比錫大会三天之后，即4月19日就发生了强烈的反击。柏林的一个工人大会决定反对拉薩尔。这个大会是由进步党领袖召开的，根据它的报告有一千二百名工人参加了大会，而别人却认为这个数字不确。排字工人迪特曼担任大会主席，博尔济希工厂的一个名叫哈塞的职员做了关于拉薩尔和舒尔采-德里奇之间的争论的报告。看来，进步党的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觉得亲自担任这样的角色有点难为情，而必须由这位平常并不出名的哈塞为他们来执行这个任务。哈塞认为“拉薩尔先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傻瓜，说国家帮助是对个人自由和一般伦理的暗杀行为，博尔济希工厂是通过国家最慷慨的帮助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工厂的一个职员说出这番话就特别中听。哈塞用愤怒的呼声反对工资铁律，想娶一个忠实的德国姑娘的忠实的德国男子一定会考虑，他每天的工资是比一个銀格罗申多还是少。然后进步党的这位愉快的先锋战士说，拉薩尔过去被控盗窃文件虽經萊茵陪审法庭宣判无罪，可是人们知道，甚至最聪明的法学家也不能奈何“拉薩尔先生”，再者，人们也还不能说明，拉薩尔同一个人的关系有多么深，最近在他家附近有人为二十五个塔勒对这个女人进行搶劫謀杀。热狂的群众对这一切发言都高声喝采。不言而喻，又一次想抓机会恢复自己的名誉的艾希勒，在台上大嚷大叫，可是民主主义者路德維希·洛厄佛甚至没有为拉薩尔的理论辩护，只想保护拉薩尔个人

的人格，不受报告人的中伤，随着激烈的爭論，有人喊：揍他！把他轰出去！于是洛厄佛变得哑口无言了。拉薩尔的真正拥护者，艾斯納医生提議，大会應該暫時拒絕評論社会問題，而至少表示拥护普选权，但是这个提案干脆就沒有被采納。所謂人民法庭反而判決人民的誘惑者拉薩尔有罪，柏林报纸用嘹亮的大喇叭声把这种高尚的文明行为宣揚出去。

丑恶的喜剧使布赫尔摆脱了胆怯的克制状态。第二天，他引用这个喜剧写信給萊比錫委员会說，柏林提供的这个威胁与会者、欺騙未与会者的例子使人加倍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場。他答应在萊比錫做一次报告，证明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論——国家只应保障个人的安全而不管所有別的事情，在科学、历史和实践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这封信刚刚发表，资产阶级就把套在布赫尔脖子上的绳子抽紧了。4月26日，布赫尔就給拉薩尔写信說，給萊比錫委员会的信給他招来“很大麻煩”。他不得不放弃同拉薩尔的友好交往，否則他就会陷入迫使他自行投入的糾紛之中。他答应必要时干脆承认，他是由于意識到自己的弱点而后退的。对萊比錫委员会，布赫尔表示不做报告，因为报告不能把問題談清，而只答应給它写一篇短文，据說这篇文章已經在写，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这样，布赫尔就完全退出了运动。后来他又恢复了同拉薩尔的私人交往，可是正如許多文件所证明的那样，他从沒有再对拉薩尔的政治决策有过什么影响。

純粹从人情的立場出发，拉薩尔似乎认为，布赫尔的过失一大部分應該由资产阶级的拷問本領負責。拉薩尔对他的朋友始終是最忠实的，他是一个大理想主义者而沒有知人之明，直到最后，他对那个軟弱的人还寄予个人的很大信任，可惜却沒有得到好报。

## 八 法兰克福大会

柏林大会后一天，拉薩尔給《人民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明，他的两个熟人本来受他的委托要声明，他准备向柏林工人說明他的建議，如果他們要求他这样做的话，換句話說，如果他們肯安安靜靜地听他发言的话，可是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同时拉薩尔重复了他的要求，如果工人願意听他讲话，他就在柏林发表演说，可是进步党領袖很怕这个危险的試驗，而不敢冒险从事。

67 可是他們在柏林办到的，同一个时候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却没有得逞。4月19日的柏林工人大会把拉薩尔在东德的鼓动弄得无声无息，同一天，勒德尔海姆的一个工人大会也要为西德完成这个任务。虽然美因部联合会的工人教育协会中的多数派已經表示反对拉薩尔，但是宗納曼和麦克斯·威尔特认为让联合会本身再一次对拉薩尔宣告破門是适当的。同时，根据他們的提議，美因部委员会應該使萊比錫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其办法是，美因部委员会执行从前在奥芬巴赫制定的決議，根据进步党和自由貿易派的精神集中工人教育协会。为了这个目的，在勒德尔海姆召开工人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哈瑙、奥芬巴赫、法兰克福、博肯海姆、呂塞尔斯海姆、达姆斯塔特和奥斯特霍芬派出約二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个狡猾的打算有一个漏洞，或者甚至有两个漏洞。首先，并不是所有在勒德尔海姆开会的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都随着主謀者的口哨跳舞。領導达姆斯塔特工人教育协会的路德維希·毕希納和領導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的泰奧多尔·繆勒就不願意盲目地



初民族联盟自以为可以利用这种热情。1861年，在海德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它决定成立培养“适当的专门人材”的国防协会，同时为建立一支德国舰队而募捐，为了不管普鲁士国王愿意不愿意，要使他同德国统一的事业结合起来，这次募捐所得预定交给普鲁士政府。不顾死活的资产阶级赞扬这个决议是“德国的网球场宣誓”<sup>①</sup>，当然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保留条件，那就是吕内布克荒地的米拉波——卡尼格先先生决不能够效法他的法国典范的顽强性。

可是这又是孵鸭子的母鸡的故事。民族联盟的决议促使德国西南部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建立了许多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这些协会对“炮弹亲王”十分了解，不会妄想用几个酒钱把普鲁士政府哺育成德国统一的先锋战士，可是它们一向是见好的就要，愿意听从民族联盟的建议，为了它们的训练和装备罗致“适当的专门人材”。它们认为吕斯托夫是这样的专家，吕斯托夫给它们一个实际的忠告，国防协会首先必须有武器。这个建议正合国防协会的心意；它们越来越活跃，在1862年法兰克福射击大会上，有几个国防协会起誓，明年要打起“孤独的兄弟民族”的模糊的旗帜，反抗丹麦压迫者。这种誓言是这样幼稚，吕斯托夫的意见是这样错误（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用推翻南意大利的波旁统治的同样手段推翻德国的邦联议会统治），可是整个运动表现出终于要从空谈的泥沼中走出来的良好愿望。拉萨尔也对这个运动表示了一时的关怀，1862年夏天他给施魏格尔特上尉写了一张见马克思的介绍名片；施魏格尔特上尉曾在加里波第和吕斯托夫部下服役，这时为了给国防协会买几千支步枪，在英国筹款。

<sup>①</sup> 1789年6月2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封闭会场阻止国民议会的召开。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临时改在宫廷的网球场集会，一致宣誓：“非待宪法制定完成，决不散会”，这就是著名的“网球场宣誓”事件。——译者

可是使得热心的人们对于国防协会感到兴趣的事情，却使民族联盟的领袖们感到十分惊慌。在他们控制下的所有报纸都接到指示，大力反对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中的“不成熟的青年”搞政治活动；可以允许他们做的，是体格锻炼和使高等学校的“有教养的青年”变成白痴的那种愚蠢的狂饮习惯。1862年秋天，在海德尔堡举行的国防协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吕斯托夫和民族联盟的几个首脑参加了这个大会。吕斯托夫要求把为建立德国舰队募集的钱用于购买武器；把这些钱交给普鲁士政府，是“对理性的背叛”。出席大会的民族联盟的国务活动家要求收回这种“侮辱性”的词句，当吕斯托夫拒绝这样做时，他们马上就离开了会场。随后，民族联盟在它的科堡全体大会上，对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的“爱国行动”还表示了一种空洞的关怀，却小心翼翼地拒绝“一切进一步的提案”，在它看来，这种谨慎小心任何时候都是更勇敢的表现。

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件在德国西南部的“未成熟的青年”中造成 70  
一种在勒德尔海姆工人大会上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的情绪。毕希纳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而当宗纳曼、麦克斯·威尔特和民族联盟的其他勇士向拉萨爾发动攻击时，工人们非常冷静地发表意见，决不给人以可乘之机。法兰克福的木器工人海曼说，先生们最好抑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因为不管他们认为自己多么聪明，也还可以向拉萨爾学习许多东西，美因兹的钟表工人谢普勒补充说，拉萨爾至少有把德国人从民族联盟的永远迷梦中唤醒的功劳。激烈的争辩告诫那些经过筹划的人民法庭的导演们，这一次他们拉幕拉得太早了。他们急忙装出一付笑脸来对付这尴尬的局面。宗纳曼收回他为了消灭拉萨爾而提出的议案，假装生气地问，能不能相信像他和他那一伙这些无可指责的正直人，会进行意外的袭击。工人大

会沒有解决这个难题，就决定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新的工人大会，并邀請拉薩尔和舒尔采-德里奇参加。

舒尔采借口有議会工作，拒絕了这个邀請，很难說是，因为他认为不值得費力同拉薩尔爭辯，很可能是因为他有理由害怕靠近拉薩尔的刀口。相反地拉薩尔立即答应参加，虽然他所有的朋友都劝告他不要在一开始气候就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应战。他正确地观察了形势。他給洛貝尔图斯写信說，他清楚地知道，这种舌战不能决定任何問題，可是从柏林工人喜剧用来反对他的方式来看，他需要树立声誉。他要抖动他旧日的革命长鬚，为爭取胜利而付出一切力量。地点的不利将提高他的胜利，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以減輕失敗的痛苦。

拉薩尔所以接受邀請，决不是因为勒德尔海姆形成了有利于他的半个轉变，这半个轉变与其說是有經濟动因，还不如說是有政治动因。关于他的反动打算的謠言是进步党人大多在工人面前对他进行的誹謗。現在当反动报纸开始对他的宣传活动表示很可疑的关切的时候，这种誹謗就更加危險了。美因部的民主工人使他分享胜利者的光荣的斗争，能够有力地推动停頓的运动。

可是，除此而外拉薩尔在各方面都需要树立声誉。他的宪法演說、《公开的答复》、萊比錫演說、《工人綱領》案的辯护发言都包含許多最有教益、最动人的鼓动材料；这些論著中的最小的一个对社会和本质的了解也比进步党的所有賢人所能了解的还要深刻。虽然拉薩尔善于出色地令人易于理解地論述最困难的問題，但是他用小册子和演說进行的战斗乃是一个携带重装备的士兵同无数每天发起新的攻击向他进迫的輕装潘都尔兵痞<sup>①</sup>的战斗。

<sup>①</sup> 潘都尔兵是十七、十八世紀在奧地利軍隊中服役的匈牙利步兵，以殘暴和不守軍紀著称。——譯者

斗。尽管他的工作力量无尽无竭，他的炮击只在測量过的中間地带轰响，消失在进步党报纸每天向他发射的嗒嗒的步枪声中。

拉薩尔没有为打这种非正规战而装备起来。有一两次他迫使敌人的报纸发表了他对它的攻击的反驳；在《福斯报》上，他明确指出年老的劳教授坚持异议，这位权威人士表面上反对工资铁律，可是事实上却给它做了证明。唯一有几分愿意接受拉薩尔的稿件的自由派报纸是萊比錫的《德意志总汇报》，它的出版人布罗克豪斯曾经出版过《既得权利体系》一书。拉薩尔特别利用这个并非由于政治上的同情，而是由于私人感情而对他开放的、因此也是很不宽敞的谈话室，来确定关于1848年法国国家工厂的文件真实性，由于严重无知或恶意歪曲，不断有人非难法国国家工厂，说它是他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前车之鉴。此外，拉薩尔还能利用几种地方性的、读者不多的小报，这些报纸要末像汉堡的《北极星报》、萊比錫的《时代精神》和紐伦堡的《法兰克尼亚人民报》已经气息奄奄，要末像法兰克福的《人民之友》、斯图加特的《士瓦本人民报》和埃斯林根的《格拉道斯》，企图同工人保持一半的友谊，苟延残喘下去。利用这些软弱无力的政论的辅助手段，是不能同自由派出版界的暴徒相抗衡的，如果拉薩尔使他們之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在道义上破产，他們也不以为意。资产阶级不乏新的雇佣文人，甘心为了重金牺牲自己轻微的名誉。拉薩尔必须更加重视有效的成果，在敌人阵营内部战斗时，一切谎言也不能把它消灭。

因此，正如毕希纳没有特别夸大地所说的，半个德国的眼睛都注视着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工人大会。美因部的委员会为了一开始就保证打败拉薩尔而采取了种种措施。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这个协会的主席泰奥多尔·缪勒不上圈套，刚从英国回来的一个1848年的逃亡者伯恩哈

特·貝克尔在會員中用写文章和談話的方式为拉薩尔进行宣传。为了对抗，人們又很快地組織了几个雇佣工人的新协会，在决定性的那一天，讓他們痛飲一陣，然后为了資本的神圣事业去进行斗争。工人教育协会的會員不得进入举行會議的大厅楼下，这些工人教育协会大部分已經表示反对拉薩尔，被任命为大会干事的宗納曼的一个編輯負責防止魚目混珠。沒有参加协会的工人只得在迴廊里徘徊，沒有投票权，却有每人出六个銅币以充大会开支的义务。正如毕希納所說，“事先已經”有十五个演說人登了記，以便等拉薩尔一說完，就用进步党的道地的激烈言論，把拉薩尔說得一錢不值。当然美因部的委員会有合法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組織由它召开的會議，可是拉薩尔說宗納曼和威尔特大概不可能更非法地使用他們的合法权利，这实际上是正确的。

当然他不会这么輕易上当，他在认为必要的范围內进行自卫，并要求毕希納答应，他想說多久就可以說多久，不得打断他。他可以信賴毕希納的諾言，为了相信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命运，他不需  
73 要更多的东西。他的长篇演說正好适合这个机会。这篇演說沒有什么新的內容，大部分只是拉薩尔在《公开的答复》和萊比錫演說中所談內容的进一步發揮和論证，然而它也有許多确当的用語，必然能够爭取被引入迷途的听众，并且解除阴險的敌人的武装。

一开始，拉薩尔就使會議大吃一惊，他指出麦克斯·威尔特曾經在一本可以說是“科学的”著作中宣布工資铁律是不容置辯的真理，可是这位正直人几个星期以来又罵它是毫无价值的幻惑物。“先生們，你們看到，我认为一个雇佣工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一个雇佣文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帶着辛辣的諷刺的口吻补充說，他沒有讀麦克斯·威尔特的那本著作，当他在它出版时翻了一翻，馬上認識了“沒有思想的剽窃者”的时候，就不高兴地把它扔到

一边了。可是一个朋友让他注意看了看麦克斯·威尔特承认工资铁律的地方。这个朋友就是洛貝尔图斯，拉薩尔用更使不幸的麦克斯·威尔特感到屈辱的形式对洛貝尔图斯表示感謝。委员会的幕后操纵者徒然地企图用結束演說的叫嚷为他們出席大会的伙伴报仇。大会对这些捣乱分子表示严重的抗議；他們都想繼續听这个有趣的演說人的讲话。

然后拉薩尔为《公开的答复》中的統計数字辯护，有人对这些数字表示“十分怀疑和憤怒”，因为这些人为了不让沒有资产的階級知道自己的力量，所以不願告訴他們有多少人。拉薩尔尤其抨击爱北斐特的小文人，瓦克納格尔，这个人以前和以后都沒有什么成就，而当时却被捧为統計学的权威，因为他对拉薩尔的数字，除了提出两三点主要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內容上确切的指責以外，企图利用大胆的修飾取消这些数字。拉薩尔接着利用其他的、更精确的官方統計证明，基本上仍然是他在《公开的答复》中确定的結果，同时利用无产階級的可怕的死亡数字回答了毕希納的非难，毕希納說，如果官方的統計是正确的，那么普魯士的一半人口沒有早就餓死，簡直是不可理解的。拉薩尔对此叹了一口气說：“你們德国工人真是一些怪人！在法国和英国工人面前，人們必須辯論，怎样能够改善他們的悲慘境况，可是对你們，人們还必须先证明，你們是处在悲慘境况之中。你們只要还有一段坏腊腸和一杯啤酒，就根本觉察不到，也不知道你們缺点什么东西。这是由你們的可恶的节欲引起的。”在大会的已經不受干扰的鼓掌声中，拉薩尔闡明，对于印度的苦修僧和基督教的修士來說，节欲是一种美德，可是对于把一个民族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看做是对它的发展和文化的刺激的历史学家和国民經济学家來說却不是这样。

拉薩尔像在萊比錫那样，詳細論述了国家帮助的原則，不过还

更深入而确切地证明了自由貿易派的陈詞烂調的精神上的貧乏。在回答国家从哪里拿資本或貸款給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他說,为此并不像舒尔采所說的那樣,需要“几十亿”,在初期,有一亿塔勒供四十万工人組織合作社之用已經綽綽有余了。他明确地举出这个数字,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但这并不妨碍敌人此后为了使这个思想本身成为可笑的而濫用这个例子。有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叫欧根·李希特尔,当时以資本主义的忠实奴才的身分开始写作,不久以后他又假装工人写道:“未来的大臣們为自己选拔的四十万工人,将来每人可以从一亿塔勒中借到二百塔勒(要付利息),难道为了这笔錢,他必須在生产合作社里,在警察監視下劳动嗎?就是这样嗎?謝謝吧!”这个所謂的工人說,如果他运气好,有好亲友,才能从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大臣那里借二百塔勒,算做国家的援助,而据他計算,他在舒尔采的消費合作社里,七年零四个月就可以节省二百塔勒,而这就成了他的自由财产。“因此,人們还應該牺牲自由,在警察監視下劳动嗎?这太愚蠢了!”李希特尔对拉薩尔的論战确实是太愚蠢了;假如这些喜欢爭論的著作家,虽然很不老实,但还有一点脑筋的話,他們就應該反对拉薩尔的信貸运用,在这一方面具有同他的生产合作社相似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想用公債建設一条新铁路,也想用公債建設一个新社会。可是这确实

75 是这些天才思想家的不幸,甚至当拉薩尔有一次不对的时候,他們仍然有三次不对,因此他能用下面的話胜利地打垮了他們关于国家不可能帮助工人階級的謔語:“你們十分粗糙、十分錯誤地想像这件事情,你們想像,国家必須把一亿塔勒拿到桌面上来交付。先生們,現在还没有进行过一个沒有花費两倍于这个数額的战争呢,为什么事情沒有引起过战争呢?在前一世紀还为了情妇的喜好,在本世紀还为了君主的征服欲或者为了資产階級的有限的銷售利

益而进行战争。四十年代,英国对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至少花费了上述款项的两倍,进行这个战争,只是为了让中国人抽鸦片,也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非常特殊的销售利益。为了世界上的一切,为了有产阶级的有限的销售利益以及为了君主的情绪都可以花两倍于一亿塔勒的款子;难道只是涉及到解救人类这个问题时,突然这些钱就拿不出来了嗎?”

拉薩尔谈到这一问题时,博得越来越多的掌声,这时敌人知道最大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大会对于拉薩尔的讲话越来越感兴趣,在他作了已达四小时的演说以后,其他演说人再发言的希望就不大了。虽然拉薩尔已经声明,为此他将出席一个新的大会,向他的反对者答辩,但是他们可能害怕(这种害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拉薩尔的演说能够顺利地发生作用,他们就彻底失败了。于是他们煽起一阵骚动,打断了拉薩尔的发言。在同拉薩尔作了简短的商谈以后,海曼在讲台上宣布,两天以后拉薩尔在工人教育协会大厅继续讲完。

第二天,法兰克福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硬说,“许多”工人一面喊舒尔采-德里奇万岁,一面离开了大厅。可是正直的泰奥多尔·繆勒没有参与其事。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揭发了“几个虚假的数字”。会后,美因部委员会把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千三百名会员写在记录上,而根据精确的计算只有五百二十七人出席了大会。到大会结束时,只剩下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其中最多只有六十人是喊 76  
着舒尔采万岁离开大厅的。拉薩尔有理由给洛贝尔图斯写信说,洛贝尔图斯大概不会为自由派报纸的不真实的报道所迷惑,那些报道中的数字没有一个是真的。相反地,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如果不是敌人极尽阴谋诡计之能事,这个胜利就接近它的顶点。

事实上,5月19日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以四百票对四十票表示

拥护拉薩尔。他在演說的剩余部分中，主要討論問題的政治方面，一个耳聞目睹的人报道說，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会员們不是受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是受青年的热情驅使，保证了这一胜利。这个报道是完全可信的。拉薩尔用火热的語言說，正是他的运动的政治方面必然促使工人向他的运动欢呼。“如果你們不是民主主义者——为什么我要向你們講話？我没有兴趣也没有义务向別人講話，而只向民主主义者講話！”进步党庸人的运动不会有結果，如果人們願意为此等几个世紀，乃至地质学的整个时期的話，也是如此。自从各邦政府变得十分狡猾，滿足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以来，这个阶级就不再为政治自由而赴湯蹈火了。有些阶级以最大热情支持反动派，为此投入了全副力量。除去少数几个思想家和热心人以外，没有一个阶级支持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最大利益就是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放在政治自由之后，而且这也正是在人数和力量方面占无限优势的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利益。誰指責他为反动派服务，誰就是有意識地、可耻地顛倒黑白！并非像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說的那樣，它害怕他变成反动派，相反地，它害怕在两三年的过程中，由这个运动中将产生反动派的劲敌。“你們給我五十万参加我的联合会的德国工人——我們的反动派就不再存在！”拉薩尔用这番凿凿有据的話在法兰克福大会上取得胜利。

随后，他以同样的論证在美因茲的一个大会上取得胜利，在那个大会上，七百名工人一致表示拥护他。

## 九 全德工人联合会

这时候，拉薩尔赶到莱比錫去，1863年5月23日，在那里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据說，拉薩尔曾經說过，假如他在法兰克福和美

因茲得不到胜利，他就要退出自己的事业，人們只要稍具普通的机智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按照拉薩尔的性格，他不会这样快地让他曾經升起的旗帜落下来，同渗透他的整个本性的革命頑强性相比，在消耗精力的斗争的压力下，他可能或早或晚激动地談到个别的推动的或反抗的感觉，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一生的决定性行动中，这些感觉并不支配他，而是伴随着他。即使沒有法兰克福的胜利，他也会在已經走上的道路上前进，不管这个胜利对他有多大鼓励，他也不致因此而忽略还有巨大的困难在等待他。

联合会在万神庙举行成立大会。有代表十一个城市的十二名代表参加：瓦尔特希、达姆尔和弗里茨舍代表萊比錫，奥多尔夫和佩尔代表汉堡，約克代表哈尔堡，勒維代表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希尔曼代表爱北斐特、巴門和佐林根，伯恩哈特·貝克尔和海曼代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钟表匠謝普勒代表美因茲，在會議进行期間，德累斯頓的鞋匠勒济希終於来到，起初德累斯頓只有很少人拥护这一事业。此外还有二三百名萊比錫工人参加，人数比参加冬天在音乐堂举行的工人大会少得多。关于这一点，資產階級報紙开了廉价的玩笑，它們把开会的地点叫做“群魔宮”，說地点选得不好。可是會議不是在晚上而是在下午举行的这一事实，充分說明萊比錫工人参加人数較少的原因。

会章的第一条說明了联合会的宗旨，即采取和平和合法的途徑，尤其是爭取社会輿論，为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而努力，这种普选权是能够充分代表德国工人等級的社会利益和真正消除社会中的階級对立的唯一手段。

規定会章的組織条例比說明原則碰到較大的困难。拉薩尔曾 78  
同齐格勒(他很尊重齐格勒的組織才能)商討过工人保險总公司的計劃，这个計劃失敗后，在組織政治—社会鼓动的联合会时，他仍

然坚持齐格勒草拟的章程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坚持不是一开始就把联合会束縛在太严格的条文之中，而是給它的领导尽量多的自由，至少保证主席有較长的任期和巩固的地位。不可否认，第一任主席具有尽可能独裁的全权（不管这种全权是否适合拉薩尔的个人喜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連对反动結社法的顾虑，在这里也不起主要作用。差不多在德国所有各邦都有反动的結社法，它們的共同之点在于，禁止各政治团体互相交往，因为不能組織分会，全体会員不管他們住在什么地方，都必須直属設在萊比錫的联合会，所以联合会就形成严格的集中。

撇开这一切不談，那么問題不在于建立像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协会，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党，这个党思想統一，行动統一，尽快地把工人群众作为团結一致的队伍投入政治斗争的战场。根据当时的情况，只有通过一个能够高瞻远瞩地認識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的独裁领导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运动所能指望的最好的新参加者还是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員，也就是多年以来习惯于最空洞的社团游戏、必須先学习行动和战斗的工人。拉薩尔不得不适应现状，这里主要問題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同时适应事物的永久核心，即那种像呼吸必須有肺一样，适应任何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須有的民主精神。当拉薩尔組織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时候，他給这个斗争以比較容易和迅速地粉碎暫时的形式的力量，起初他只能用这种形式进行組織。沒有誰比拉薩尔更雄辯地喚醒潛藏在現代无产阶级中的自我訓練的力量了。

79 他的遺產主要是，德国工人阶级深深体会到必須要有一个巩固的組織，以及这个組織在最严重的时刻，沒有外来的援助能够发挥作用。用过分盲目相信拉薩尔的会章的詞句而引起的、暫时的，总之是轉瞬即逝的混乱換取这样寶貴的遺產，肯定代价并不算太高。

这个会章作了如下的規定：每个工人只需简单地声明入会，就可以成为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會員，而且随时都可以退会。在发生怀疑时，由理事会决定某人是不是联合会所謂的工人；理事会也有权接受不是工人的人入会，或把恶劣的會員开除出会，除非这些會員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訴。在入会时，每个會員交两个銀格罗申的入会費，从那时起，每周交半个銀格罗申的会費。理事会由一个主席和二十四個理事組成，其中有一个會計和一个拿四百塔勒薪金的書記。他們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須获得絕對多数票，其任期为一年，但第一任主席任期为五年。理事会处理联合会事务，有过半数通过即可决定，主席可以立即发布紧急命令，不过在三个月內要得到理事会的追认。代表大会每年必須举行一次。時間和地点由主席决定，如果多数理事或六分之一的全体會員向主席提出书面建議，主席必須在六個星期內召集代表大会。同样，主席規定理事会會議的時間和地点，可是，如果多数理事提出要求，就必須在四个星期內召开理事会會議。主席对財務工作不进行任何監督，會計有責任按主席的指示支出一切費用。联合会的書記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各地方會員由理事会任命的全权代表領導。理事会有权在任何时候撤換全权代表，主席有权暫時停止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职权是，吸收會員，向金庫繳納入会費和会費，向書記报告工作，召开和領導当地會員的公共集会。联合会存在的期限規定为三十年，在联合会存在三年后才可以修改会章，并且必須由代表 80 大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决定。

很明显，这些規定賦与主席很大的全权。理事会其他二十四個成員对于他的权力可能有的限制不起多大作用。他們分散在全德各地，因此他們的行动力受到很大阻碍。所以不言而喻，一开始理事会就把任命全权代表这个重要职权交給了主席。可是值得一

提的是，在制定会章的會議上，就已經有一个民主反对派起来反对主席的过分沒有限制的权力。尤其是还不認識拉薩尔本人的汉堡和哈尔堡的代表，表示了这种意見。奥尔多夫提議第一任主席的任期不是五年而是三年，在这个議案遭到否决以后，約克投了未記名的一票，反对选举拉薩尔担任主席，并不是因为他本人不信任拉薩尔，而是因为伯恩哈特·貝克尔說，当然，拉薩尔應該当选为主席，这句不审慎的話引起約克的不滿。

拉薩尔在下列两个条件下担任主席：第一，选举他当主席这一点，要在有代表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經過投票批准；第二，他有权任命一个副主席以代替自己，副主席的任期和任命次数由他决定。勒維当选为司庫，瓦尔特希当选为書記。除了他們以外，理事会的成員有萊比錫的达姆尔和尼德尔来，德累斯頓的勒济希，汉堡的佩尔和奥多尔夫，哈尔堡的約克，美因河畔的雪茄烟商施特劳斯，美因茲的謝普勒，杜塞尔多夫的排字工人，拉薩尔的老朋友基希尼亚維，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最后还有佐林根的两个制劍工人克林格斯和維尔姆斯，他們两个是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和一个消費合作社的領導，曾推动这两个組織同拉薩尔的运动发生联系。下余的理事名額留給新参加的城市，理事会有权，只要有半数以上通过就可由这些城市补充理事名額至二十五人。这样，后来考克門的馬丁尼律师和柏林的鞋匠帮工梅茨內也参加了理事会。

81 联合会成立以后，拉薩尔在柏林，瓦尔特希在萊比錫为联合会的发展进行积极活动。起初从表面上看成績极小。瓦尔特希把《公开的答复》寄送到似乎提供了一綫希望的所有地方，可是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种子，几乎到处都落到龟裂的土地上。工人群众的不成熟性和企业主用来使他們疏远拉薩尔的鼓动的高压手段起了抑制无产階級的重大作用。6月19日，拉薩尔任命了十六名全权

代表，有十一名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的，其中德累斯頓几乎还没有半打会员，美因兹已经开始退会了，新参加的城市有五个，那就是：阿尔騰納、柏林、布勒斯劳、希尔德堡豪曾和紐伦堡。在阿尔騰納和紐伦堡只有一个全权代表，可是没有会员，布勒斯劳也是这样，由长期要塞监禁获释的諾特荣克担任了那里的全权代表的职务。希尔德堡豪曾大约有十来个会员，在柏林差不多只有鞋匠表示了一点同情。理事会的理事梅茨内和柏林的全权代表阿伦特都是鞋匠。

联合会的政論武器也是很充实的。在垂死挣扎，要求支援的小报之中，汉堡的《北极星报》被选为联合会的临时机关报，拉薩尔捐了一笔钱增强了它的力量。在这以前，这个小小的周刊处在海因岑、金克尔、布林德和其他与社会主义为敌的流亡者的精神影响之下；这个刊物編得很坏，編輯布龙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阴谋分子，曾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出盟。轉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名下以后，《北极星报》也没有好转，资产阶级报刊的吵鬧的乐队完全压倒了这管甚至没有按照正确的节拍吹奏的脆弱的短笛。

拉薩尔本人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尽量多的名人和有教养人士参加他的鼓动方面。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很小，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这些新参加者的作用。早在法兰克福大会以前，他就曾经企图用有点突发的方式为自己的目的给胡貝尔公开发表的論工人运动危机的信作解释；这样他就给了胡貝尔的判断以一种作用，当胡貝尔发表了一篇攻击拉薩尔比攻击舒尔采要尖锐得多的、論工人及其顧問的短文的时候，这种作用就反过来反对他本人。而且胡貝尔对拉薩尔的攻击也是很肤浅的，有一部分是很輕率的，这种輕率的程度同胡貝尔以拉薩尔和舒尔采的公断人自居的高傲程度相仿。事实上，他应该受到不过分亚

于可怜的瓦克納格尔的懲罰，当时拉薩尔正为了一件新的嘲諷，用鞭子把瓦克納格尔抽回家去。

可是拉薩尔写信給胡貝尔說，他本来应该“严厉地”回答，但是他决不能因为自己暂时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严厉对待胡貝尔这样一个人，多年以来他就由于許多文章而敬愛胡貝尔，胡貝尔对工人充滿热爱和真誠的好意，他是这样大公无私和富于牺牲精神。拉薩尔企图同胡貝尔取得諒解，給他指出社会王国的幻想是一种理論上很漂亮，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后来这些話被拉薩尔的一个老同学，俾斯麦的新聞署长哈恩所歪曲，他說拉薩尔是一个社会王国的空想家。可是胡貝尔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拉薩尔的辯才也說服不了他，如果說胡貝尔的这种偏見就其方式來說，至少是正直的，那么胡貝尔在拉薩尔死后又做了一件別的事情，即献給“喜欢玩弄阴謀的人物”和“拜金主义的幸运儿”一个不漂亮的悼詞。在私交上，拉薩尔始終同胡貝尔保持亲切而坦率的关系，这是完全有利的，可是在政治上要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黑人洗白，却是白費力气。

从邏輯上說，拉薩尔是可以爭取 1848 年的老民主主义者的。假如这些人的情况不是这样就好了：精华已去，糟粕犹存！加之，拉薩尔爭取到的少数人也沒有达到他的期望。他把馬丁尼参加联合会看做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他不仅把这位新皈依者选进理事会，还任命他为东普魯士省的总全权代表。可是馬丁尼始終是一个光杆司令。还有海尔維格也是这样，拉薩尔虽然沒有把他选进理事会，也任命他为瑞士的总全权代表。經過半年的催逼，拉薩尔才費劲地从海尔維格那里弄到一个联合会会歌，即有名的《祈  
83 禱吧，工作吧》，这支歌并不是沒有才华，可是过分模仿雪萊的一首著名的詩，因此有几节虽很动人，却从沒有在德国工人中广泛流

传。拉薩尔的一个朋友，未来的音乐家汉斯·馮·毕洛夫給海尔維格的詩作了曲，乐譜难唱可能也是不易普及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拉薩尔吸收資產階級有教养分子参加他的运动的努力仍然有其值得重視的一面。当莫泽斯·赫斯做了关于劳动权的报告，表示拥护新运动，并担任了科伦的全权代表的职务时，拉薩尔写道：“不是一切都由我一个人來說，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否則，在蠢貨們看来，运动就采取了单个人的形式。”虽然碰了很多壁，但是拉薩尔也找到了在他突然死后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人，也許比他本人繼續这项事业要有利一些。这个人是美因河畔的一个律师，叫約翰·巴普斯提特·馮·施韦泽，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輕人。

施韦泽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古老的望族。他是在叔本华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早在1861年就发表了关于时代精神和基督教的范围广泛的研究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背离了叔本华的非历史的寂靜主义，面向历史发展的重大問題，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精神，但却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思想革命的精神。这本书是一个年輕人的著作，本身有其重要意义，它的目标还不明确，因此內容不免略有空洞之处，可是对許多問題的观察却很精确，证明作者才学兼备。同时，施韦泽也傾向民族联盟的鼓动，在1862年法兰克福射击大会时期，編輯官方的会刊，此外他担任科堡公爵的副官也很出色，当时科堡公爵正以宣传的姿态扮演未来的德国皇帝的滑稽角色。

施韦泽在进行这次活动时，就有人暗中造謠，說他贪污了大会的款子。这件事从沒有得到证实，当資產階級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惜付出很大代价使施韦泽身败名裂的时候，甚至也沒有人企图证实这件事。因此人們可以設想，那个謠言只是施韦泽很快就认

84 識到民族聯盟的內容空洞的活動的一個證明。法蘭克福射擊大會以後不久，他由於引誘一個青年做了一件猥褻行為而激起公憤，在曼海姆被判兩個星期的監禁，這時他的名聲受到更沉重的打擊。大資產階級社會把他趕出去，同時這種估計又得到證明，即施韋澤主要是因為他的民主思想而不是因為性的過失而受到處罰的；恰恰是大資產階級社會只要犯罪人心地善良，通常就為這種過失準備了一個寬大的愛情的外衣。到這時為止施韋澤在民主主義的體育協會和國防協會中有很大的影響，可是現在這些組織也出於更為空洞的理由，不願理睬他了，因此，當施韋澤同拉薩爾發生聯繫並請求拉薩爾推薦他寫的一部社會小說的時候，法蘭克福的工人不歡迎他，是可以理解的。

拉薩爾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施韋澤，反對法蘭克福的工人。他坦率地對施韋澤談到後者的“令人遺憾的、為他的趣味所不理解的喜好”，他直截了當地向法蘭克福工人承認，施韋澤的性的愛好是一種“違反自然的錯誤”，可是他認為這種錯誤同一個人的公正和對信念的忠誠，同他的政治品質毫無關係。古希臘對於男色絲毫也不反對，偉大的希臘思想家也知道什麼叫做道德。拉薩爾認為法蘭克福工人反對同施韋澤在政治上合作，是確切而又令人氣憤地證明，德國人陷入偽善者的境地還很深，他們不懂得把政治同私人的事情分開。施韋澤把他的長篇小說《路金德或資本和勞動》獻給拉薩爾，拉薩爾毫不猶豫地接受了，當該書第一卷在1863年夏天出版時，他很高興。一個公正的批評家當然不會同意他的熱情的評論。從美學觀點來看，施韋澤的小說是一個不定形的怪物，是冒險的浪漫主義同工人問題的社会政治討論、拉薩爾鼓動著作的大量摘錄和法國革命鬥爭的历史敘述的奇異的混合物。其中最好的部分是對民族聯盟的生活和活動的諷刺描寫，這種描寫首先得

到拉薩尔的好評。根据活生生的手本描繪的一些图画十分成功，<sup>85</sup>比如宗納曼所接近的自由派銀行家伊津格尔，可是作为詩的乐章，这部小說是失敗的。

这时拉薩尔夏季旅行的日子快要到了。6月27日，他发出一个公告，任命达姆尔为副主席，在他离职期間担任联合会的領導工作。这个通告引起了敌人的嘲諷，在拉薩尔的拥护者之中也引起許多人摇头。不管怎么說，錯誤主要在于通告的形式（拉薩尔通知“工人們”，他“到瑞士的溫泉地区去旅行”），而不在旅行本身。几年以来，拉薩尔的身体就不太好，过去一年的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使他的健康状况更为恶化，为了来年的更为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他需要彻底休养一下。此外拉薩尔并没有想到，在空闲時間什么也不干；在旅行中他带着舒尔采給柏林工人所做的、現在已經作为德国工人問答的一章、公开出版的报告，以便在对它們进行駁斥时，为他的鼓动工作写一本理論著作。

拉薩尔先到瑞士，那里有一个并非不严重的失敗在等待着他。进步党执行了把始終忠实于它的工人教育协会更紧密地集中起来的計劃；1863年6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倍倍尔、罗斯梅斯勒、欧根·李希特尔和海尔曼·貝克尔，貝克尔同毕尔格尔斯一样，由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溫和的自助者。这个工人大会表明，絕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协会还跟着进步党跑；連倍倍尔和罗斯梅斯勒这样的人，也沒有被选进新联合会的委员会。宗納曼和麦克斯·希尔施在那里起領導作用，民族联盟从自己的金庫里，給联合会拿出一年的經費。7月19日和20日，瑞士的三十六个德国工人协会将在苏黎世举行一个中央大会，在这个会上也要討論德国工人运动的問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都接到邀請。被任命为瑞士的总全权<sup>86</sup>

代表的是海尔維格，因此他有責任代表联合会出席苏黎世中央大会，而且那时他又住在苏黎世。可是，無論是他自願承擔的義務，或是拉薩尔的恳切請求，都不能使这个懶散的人履行他的職責。他以某些偏狹的顧慮作借口，宁願使事業受到嚴重損失，也不肯让自己的貴體經受也許很硬的過堂風。“整个工人事業，歸結起來就是這些卑微的丑事，我們兩個人不適合做這種事情”，他的朋友呂斯托夫這樣高尚而爽朗地說。

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派到蘇黎世去的宗納曼却比較敏捷。他通過一個惡毒的報告，促使山已經完全變成木乃伊的格奧爾格·法因擔任主席順便舉行的瑞士工人大會，發表了反對拉薩爾的經濟理論的尖銳聲明，後來這個聲明又被德國資產階級報紙惡毒地用來反對所謂的反動分子拉薩爾。蘇黎世大會同法蘭克福大會情況相似，瑞士工人對大工業的情況還很不了解，因而他們不能贊同拉薩爾的社會目標，可是他們對於拉薩爾在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死氣沉沉極表同情。正直的目擊者拉登多夫描述宗納曼的舉動是“十分可笑的”，蘇黎世中央大會委員會在瑞士報紙上發表了一個聲明，在這個聲明中，海爾維格的譴責——不能期待瑞士工人協會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斷——和這些協會同宗納曼的所謂一致都遭到駁斥。聲明說，協會只表示反對拉薩爾的經濟觀點，沒有提出任何有利於進步黨的議案，更不用說通過它了。拉薩爾的敵人決不會在他們對拉薩爾所犯罪行方面得到寬恕；他們空前傲慢地大聲叫囂把一切反對意見壓下去，這只能消除那些對事業本身還有些猶豫的人們剩下的最後同情。可是這個聲明沒有在德國發表，因此在瑞士的德國工人不理拉薩爾的這個壞印象依然存在。他本人對這種不幸的肇禍人表示了他對朋友常有的那種寬容；他在

87 在一封誠懇的信中，還企圖使海爾維格脫離耽於幻想，無所事事的

状态，不过沒有任何效果。

也許拉薩尔比較容易地擺脫了这个糟糕的事件，因为一切只决定于一个問題，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否会在德国国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在离开德国以前就給瓦尔特希写信說：“我們只能通过广大群众前进。一个群众运动只有民族联盟那样多的成員是可笑的。我們必須有七倍于民族联盟盟員的會員。否則我們就会遭到可笑的失敗。”当瓦尔特希告訴他，从外表来看，事情进行得很順利的时候，他又从恩加丁写信給瓦尔特希說：“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限制，从内部来看——关系到會員人数——事情进行不很順利。这是最糟糕的事！……如果运动不能掌握群众，即工人等級，那么不管怎么样它总要失敗。如果我們至迟在一年之内不能吸收大量會員，那么不管我們能够取得多少精神上的胜利，也是完全沒有力量的。”因为敌人还过高估計运动的成績，說它有一万會員，所以瓦尔特希想命令各全权代表向外界肯定这个数字，对此，拉薩尔回答說：“如果工人像您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我們也会丢臉。这是肯定的。我們不能让我们的全权代表說假話。我們大概有一千會員，就不能說有一万會員。对这个問題可以保持沉默，而說謊對我們是不合适的。”可是在联合会成立以后三个月，即8月底，瓦尔特希十分气餒地給当时住在奥斯坦德的拉薩尔写了信；因为联合会只有約一千名會員，所以瓦尔特希建議解散联合会，或者把它放到別的基础上。

他說，如果就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协会而言，这么多的會員是非常可观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沒有这么多的盟員。可是对于一个政党來說，这个数字就太小了；不但沒有超过民族联盟盟員人数的七倍，而且只达到它的盟員人数的二十分之一。8月29日，拉薩尔十分沉痛地回答說：“在我們整个联合会里約有一千會員！就目

88 前來說，这是我們活动的成果！这是我写得手指发酸，說得声嘶力竭而取得的成果！亲爱的瓦尔特希，群众的这种冷淡造成了絕望，是吧！对这个完全是为了他們、完全是为了他們的利益而存在的运动这样冷淡，对在精神方面不可度量的鼓动手段表示这样冷淡，而这些手段过去已經用过，在法国已經取得过巨大的成果！这个愚昧的民族什么时候才能終于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呢！”可是拉薩尔并没有气馁。“像您所說的那样，解散联合会嗎？决不可能！它所經歷的时间还太短，連冬天都还没有过去。如果这样做，对于我們的民族和党來說，就太不光彩了。人們必然深以为耻！而且这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也是一个莫大的錯誤！如果情况像現在这样，我就不扔掉手中的劍。誠然，人們可以說，只有一千會員，这柄劍是木头做的，可是，只要这把劍在劍鞘里，由于它的柄，看起来就像一把劍，人們用少数人就可以吓倒敌人。在来年春天或夏天以前，不管情况如何，我决不解散联合会。”然后拉薩尔考虑到扶助联合会的手段，尤其是亲自在莱茵地区进行鼓动，并用下面的話，击退了投降思想：“那时我还要拿出三倍的力量来工作。有勇气就行！”

使他本人能够勇往直前的，除了对运动的新手段的信賴以外，还有 1863 年夏天德国政治的发展。

## 第二章

### 拉薩爾的策略轉變

1月至5月，俾斯麥和進步黨在普魯士眾議院中令人厭倦地繼續進行無聊的爭論。議會演說越是顯得不起作用，自由派的議院英雄就越企圖用大話招搖撞騙。像格奈斯特、西姆桑、濟貝耳這樣一些最馴順的哥達黨人說俾斯麥是唐·吉訶德，是一個玩弄權術的人，是真正的國務活動家的諷刺畫，這一切並不妨礙這個反動大臣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為所欲為。最後，他們陷入一場關於大臣是否應該服從議長的懲戒權這一議會禮節的爭論之中，爭論的結果是政府於5月27日提前解散了議院。

這時，反對派就組織盛大集會，以便再一次利用無限的辯才慶祝他們在無限的雄辯中受到考驗的英雄氣概。可是俾斯麥卻對他們的報刊進行了沉重的打擊，6月1日，他發布了一個出版令：國內報紙在兩次預先警告以後，仍然堅持危害社會治安的立場者，主管機關有權令其暫時或長期停刊。一道內閣命令解釋這種權能說，報紙不得發表把政府的措施說成是不合法的和違反憲法的文章。總之，不容許攻擊政府的內外政策，甚至，也不容許在討論國外情況時含沙射影地批評普魯士政策。在這種場合，主管機關毫不猶豫地、毫無顧忌地採取措施，事實上，認為出版令是違反憲法的措施而提出抗議的六家柏林報紙立即受到第一次警告。

90 这样，进步党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同封建专制反动派进行真正的斗争呢，还是停留于至今进行的不实在的佯战呢。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大有希望的。如果它迫使自己的敌人认真考虑出版令，那么它就可以使他陷入难堪的窘境。为了使国内群情激昂，使斗争涉及到同资产阶级报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物质利益，没有比这再好的手段了。今天遭到禁止的报纸，明天可以改变名称出版，用加倍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俾斯麦用这个命令可能使个别资本家受到损失，可是最后他必须向对侵犯神圣财产的人坚决进行报复的资本屈服。人们预见到，俾斯麦在邦议会复会以后，由于众议院的反抗，不能也不会维持这个违反宪法的命令；这种预见使人更快地把这个既损人又害己的武器指向它的铸造者的胸口；投入自由派报纸的资本在对出版令进行顽强反抗时，所冒的危险更小。这一切是很明显的，先决条件是，进步党要进行真正的斗争。

相反地，如果宪法纠纷至今和今后都不超出议会的和政论性的争吵的范围，那么进步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就躲避俾斯麦对反对派报纸进行的打击。那就不得不屈服，在邦议会复会和出版令被众议院废除以前，不发表反对政府的政论。进步党决定采取这条道路，坚持自己的方式，似乎不致遭到攻击，只是这种方式决不能导向胜利。同时每个公正的人必须承认，进步党在这种情况下比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更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报纸根本不能在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用锋利的武器进行政治斗争。没有一个报纸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竞争的基础上，进行一场发生伤亡的斗争，如果这个报纸受到损失，肯定会立刻被自己的战友吃掉。二三十年后，当《人民报》暂时被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91 禁止出版时，同它竞争的自由党报纸，首先是自由党党魁欧根·李

希特爾貪婪地從暫時失去知覺的同行的骨頭上剔肉，當然對這個同行所受的迫害，也貓哭耗子似地洒了一番眼淚。這就是每個在1863年夏天敢於毫無顧忌地反對出版令的進步黨報紙的命運。

這種有道理的憂慮也可以說明，當時進步黨的報紙比人們所熟悉的它的議會代表機構還要不體面。《萊茵報》憤怒地質問，人們怎麼可以要求一個報紙發行人拿自己的資本冒險，而《人民報》把它從新紀元初期以來發表的一切忠於國王的和深信不疑的論文出版了一個專冊，以備用白紙黑字證明自己政治上沒有問題。這個著作當然是“非賣品”，可是它並沒有因為不讓一般的讀者知道這種過分的忠誠意向而變得漂亮一些。它是特別為王太子<sup>①</sup>和太子妃準備的，他們屬於《人民報》的最熱心的讀者之列。王太子公開表示反對出版令，於是資產階級的忠實的君主主義者就再三頌揚“這樣多次受到上帝祝福的王朝”，現在可以期望這個王朝按照他們的心願行事了。除了已經使進步黨感到煩惱的一切事情以外，當時王太子的自由主義的 Krebsgang〔倒退〕已經開始，這種倒退繼續了整整二十五年，直到 Krebs〔癌症〕<sup>②</sup>真正出現，使愚人之舞（正因為它以為已經達到了目的地）變成了死之舞為止。

正當進步黨議員在自己的集會上吵吵嚷嚷，進步黨報紙在出版令的監督下啞口無言的時候，德國問題突然發生了。奧地利政府認為普魯士憲法糾紛是一個好機會，可以扭轉普魯士在德國事務的領導方面同它進行角逐的狀況。奧地利皇帝召集德國諸侯到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開會，討論在受到極力頌揚的聯邦原則基礎上的邦聯改革，事實上這個原則等於使王朝分立主義和哈布斯堡霸權永久化。由奧地利皇帝、普魯士國王和三個一開始就是奧地

① 指威廉一世之子，弗里德里希三世。——譯者

② 弗里德里希三世於1888年患咽喉癌去世。——譯者

利的囊中物的中小邦諸侯，組成一个过半数票决定問題的邦联执政內閣，由各邦的議會代表选举一个邦联議會。深入討論这个拙劣陰謀的細節是沒有必要的；它的目的是一方面利用多数战胜普魯士国家，另一方面是并吞德意志民族。

俾斯麦要防御这个不高明的打击并不困难。他不让国王参加法兰克福諸侯會議，直截了当地声称，奧地利的建議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民族利益，而是致力于各邦分立。只有一个由整个民族直接参加产生的、真正的国民代表机构才能給民族利益提供保证。只有这样一个代表机构才能保证普魯士不必为对全德国不利的事情作出牺牲。还没有一个如此巧妙地想出来的邦联官方机构能够排除王朝分立主义利益的措施和反措施，而国民代表机构必然是这两种措施的对抗物。奧地利政府对于普魯士內閣的这番話虽然发表恶毒的意見說，根据革命年代的經驗，在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議會中的特殊普魯士的立場同全德国的立場一致，是一个“危險的前提”，但是这支巴息人<sup>①</sup>之箭是在逃走中射出去的。俾斯麦以“大胆的”证明，彻底地将了奧地利外交一軍，把諸侯會議以及联邦的邦联改革送到它們應該去的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有德国各邦議会的三百多名議員参加的法兰克福議員會議，对付奧地利計劃的办法比俾斯麦少得多。它虽然沒有直接上鉤，而是声称，只有像在1849年帝国宪法上以法律形式表現的邦联的統一才能完全滿足民族的要求，可是它补充說，面临內部危机和外部問題，它不能对奧地利計劃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加之，議員會議做出把这个決議交給諸侯會議的愚蠢行为；德国的人民代表

93 扮演着向王朝的发育不全的专制主义提出迫切請求的角色，几个

<sup>①</sup> 古代伊朗的一个民族，曾于公元前三世紀中期，建立帕提亚王国(或称安息王国)，同羅馬进行过多年的边界战争。——譯者

世紀以來，這種專制主義就受到德國人民的詛咒，現在又被俾斯麥在公眾面前弄得狼狽不堪。肯定，他們對這種可恥的歸順沒有誠意，不久以後，他們慷慨激昂地拒絕了奧地利的邦聯改革計劃。可是，為了利用在中小邦君主面前奔走激怒俾斯麥，而放棄自己的原則的外交，目光更加短淺。俾斯麥決不是一個對於這種刺激十分關心的人。他反而第一次讓民族問題同立憲問題發生衝突而從中取利，並于9月3日解散了眾議院，以便讓選民對於法蘭克福諸侯會議對普魯士邦的權力地位、獨立和尊嚴的暗害行為作出判斷。

因此，德國事務在1863年夏天得到發展。普魯士的憲法糾紛完全停頓了，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到，進步黨沒有能力認真解決任何真正的問題。相反地，民族問題迅速展開，它的第一次出現就足以迫使反動的俾斯麥內閣採取可以說是民主的立場。事實上並不是拉薩爾似乎對俾斯麥的外交手段作了超出實際情況的估計！可是他相信事實的不可抗拒的邏輯性，相信自己有力量幫助這種邏輯性發生作用。

他在發表《公開的答復》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民族革命的問題。當時他寫信給勒維說：“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即通過國外形勢，比如通過戰爭而發生國家政治革命，我很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也相信它會出現；它或早或晚總是會出現的。可是，只有自覺的工人黨的核心支持和推動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才會是一個真正的、有力的、合理的革命。否則，它在政治方面也會變成軟弱和反動的……一個工人黨，一個自覺的、由於社會原因革命的黨的牢固核心向前推動、突進——只有這能夠保證通過戰爭等等發生的革命，在國家政治方面也得到有力、有利的发展。否則又是模糊不清和反動。”拉薩爾不顧一切建立了一個工人黨的核心。在俾斯麥不論

94 願意或不願意而接受了一个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議会的綱領以后,为了給无产阶级夺取能够滿足它的阶级利益的武器,而推动俾斯麦前进,从他手里夺取从进步党那里决不能得到的普选权,难道这是不值得的嗎?

1863年秋,拉薩尔开始轉变自己的策略。这一轉变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毫无疑問是有道理的。革命的工人党在它們的童年时代往往依靠利用統治阶级的内部分裂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宪章主义者曾經有多少次使托利党人反对輝格党人,輝格党人反对托利党人而从中得利啊!的确,进步党的政策使得拉薩尔的策略轉变成完全不可避免的。这个党曾一再拒絕同拉薩尔和工人結成同盟;它捏起拳头用力打击无产阶级最起碼的要求;它对工人的正当要求进行頑强抵抗,而对反动派的过分奢望却予以寬容。对进步党來說,任何时候利用一个有效的、周到的政策,即使从资产阶级立場出发,重新获得工人的同情也是有利的。可是如果它不这样做,而越来越深地陷入政治上不起作用的境地,那么它就沒有权利要求工人也让人把自己拉到这个泥沼里去。

当然,拉薩尔所采取的策略的正确性是同这一点有联系的,那就是一个革命的工人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占优势的統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換句話說,它嘲弄它的压迫者而不是受他們嘲弄。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按拉薩尔的意思写道:“在下述两件事情之間有一条真正的鴻沟:隱蔽地或公开地为敌人工作,或者像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那样,抓住机会,从敌人的錯誤中取得利益,让一个敌人消灭另一个敌人,迫使他們走下坡路,利用对目的有利的形势,不管这种形势是由誰引起的。”拉薩尔在世的最后一个时期,同拉薩尔过从甚密的、在原則問題上不容易受人欺騙的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写过类似的話:“拉薩尔在他的策略上是一个大胆的、勇敢

的杂技演員，他坚决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技巧，可以安全地跳到一个最接近深淵的邊緣，因为他經常一跃又站在他的坚固的陣營之中。他善于出奇制胜和令人敬畏，他时常扔給反动派一根老骨头，以便正当它啃这根骨头的时候，更狠狠地痛打它一頓。”拉薩爾始終注意，把革命的工人階級作为第三个独立的和卓越的力量放在容克階級和資產階級旁边和它們之上；为了工人階級的原則，他想逼迫国王和主教作证；他在后来的叛国案审判中打算說明，如果俾斯麥許可实行普选权，他就是聰明的創始人，这时他拒絕了布赫爾的慎重的建議，为了不使俾斯麥胆怯，不設“聰明的創始人”而設一个“传道者”或“先知”。

不是对于拉薩爾的策略轉變，也不是对于他实行这种轉變的精神，而是对于他个人实际执行这种策略的能力，有許多异議。当拉薩爾大胆地蒙上自己的旗帜的色彩的时候，他就是最純潔、最美丽的。那时，他的优点显露出来，缺点暗淡下去。他在去世的前夕写的一段話，表明了他最內在的本质：“沒有最高的权力，什么也干不成，我的年紀已經够大了，不能再做儿童游戏了……我担心，事态会慢慢、慢慢地发展，我那火热的心灵对这种幼稚病和长期过程不感兴趣。”从1863年秋天起，拉薩爾估計到历史发展的緩慢性、幼稚病和长期过程，他不能經常制伏他的火热的心灵、深刻的煩惱，使之成为他的策略最需要的冷靜的考虑。加之，在不断的、經常增长的斗争中，他的神經受到过度刺激，身体也十分疲劳。

因此他的缺点就比較突出，优点却黯然失色了。他的鼓动的末期已經不具备它的初期原有的朝气和力量。虽然他的精神之火有时还在燃烧，几乎比他过去的最好时期还显得輝煌，但是也有这样的時候，那时与其說是发出光和热，还不如說是在冒烟。

## 一 萊茵的閱兵和对柏林的冲击

拉薩尔9月20日在巴門,27日在佐林根,28日在杜塞尔多夫有计划地检閱了萊茵区工人的队伍。他孤独地在海濱散步时,打好了对工人演說的草稿。这篇演說把集会、报刊和法兰克福議員會議当作社会思想的三种征候加以討論。

在这一方面,拉薩尔联系到他的鼓动的政治根源,联系到反对在那三种征候中又得到新的证实的资产阶级的昏庸。至于进步党的集会和它的报刊,如果资产阶级想給熊洗澡而不弄湿它的毛皮,那么它举行集会的方式,它的报刊在出版令面前屈服的样子,同它的整个政策完全一致,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拉薩尔指責这种政策是怯懦的和孤立无援的,那么他对进步党的集会和报刊进行尖锐的諷刺,在邏輯上也是正确的。

政治反对派的集会的正当与否,完全决定于举行集会的反对派的本质。如果这些集会是一种善于行动、善于战斗的政策の伴随現象——按照歌德的話“白天的工作,傍晚的客人,辛苦的周日,愉快的假日”的精神——,那么它們就是有效的鼓动手段,毫无疑问是正当的。可是,如果它們代替了政治工作,如果它們用大声喧嚷的祝酒致詞掩盖了完全缺乏行动力的缺点,那么它們就是破坏手段,是怎样严厉反对也不为过的。1865年科伦的議員集会应该证实,拉薩尔对1863年科伦議員集会一句話也沒有多說。

拉薩尔对进步党的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报刊的攻击,在某些方面更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人們十分看重拉薩尔在他的閱兵演說中对待这种报刊的可以說具体的不公正,比如重視他对像《人民报》的伯恩斯坦这样在許多方面有功的人的过分严厉的評論,那

么这就叫撿起芝麻，丟掉西瓜。即使把所有这种不公正綜合起来，它也达不到資產階級报刊，尤其是伯恩斯坦对拉薩爾的不公正行为的十分之一。他决不要求把自己归入基督教的善于忍耐的人之列，有人打他們的右臉，連左臉也轉过来由他打。假如拉薩爾在抵擋难以置信的咒罵时，經常遵守客观上正确的界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而且，他可以有根据地說，他对資產階級报刊的否定的評論，不是由他受到的侮辱引起的，早在反对朱里安·施米特的文章中，他就鞭笞过資產階級报刊的弊害了。 97

可是，他对这种弊害理解得太片面了，因为他譴責报刊是同資本主义社会不可分离的精神墮落的專門的代表。誠然，資產階級报刊是一种“工业的投資和投机”，可是作为破坏国民精神的工具，它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資產階級不仅有报刊撰稿人，而且，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說，也使“医生、律师、牧师、詩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sup>①</sup>。拉薩爾在閱兵演說中，以及在平时鼓动学者反对报刊，这些学者作为一个階級同新聞界的“精神无产階級”同样地，或者比它更坏地生活在永隨地獄之中。这样的时代总要到来，那时頑固的教授們在国内兜售俾斯麦进行大量掠夺的計劃，要想利用拉薩爾罵自由派报刊的話，来镇压工业資本主义报纸的相当正当的反抗。

还有，拉薩爾认为資產階級报刊腐朽的根源在于广告业务，这种判断也太片面。一个植根于資本主义社会土地上的报刊，不管它刊登不刊登广告，必然带有資本主义性质。可是这主要是一个理論上的片面性的問題。对于首先要談到的德国报刊來說，广告业务当然是走向深淵的道路。拉薩爾死后不久，开始創辦完全沒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頁。

有立場的商业报刊的是广告代办所,这种报刊像油斑似的扩大,它的地位还远在受到拉薩尔鞭笞的六十年代的报刊之下。此外,拉薩尔建議由国家办理广告业务,把报刊的真正使命交给报刊,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想法,当然不是对今天的国家来說的,而是对93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来說的(拉薩尔所談的只是这种国家),是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来說的。

閱兵演說的重点在第三节,即对法兰克福議員會議的批判上。拉薩尔明确指出,1849年的帝国宪法是一个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旗帜的反动空想。可是他补充說,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既然选择了这面旗帜,就不应由于“不完全否定”奧地利的邦联改革計划这种矛盾性而使自己成为可笑人物。“进步党人为了使俾斯麦先生害怕,而向諸侯送秋波。他們希望用向德国諸侯献媚的办法,把俾斯麦吓倒。这就是这些最可怜的人的手段!如果我們同俾斯麦先生作战,那么正义要求我們还在齐射的时候就承认,他是一个男子汉,而那些人却是——老婆子!老婆子还从来沒有一次向別的方面献媚而吓倒一个男子汉。”因此,俾斯麦已經用解散众議院回答了进步党人。

拉薩尔对工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态度作了精确的說明,他說,工人对选举的結果并不大感到兴趣。普选权还不存在,或者不再存在,普魯士宪法还沒有一天合法地存在过。这个宪法以一系列的违法行为为基础,王室就利用这种手段废除了1848年的四月法令。对这个宪法所作的誓言是无效的,正如某种法律上的理由取消了起过誓的婚姻时,在祭坛旁边所作的誓言是无效的那樣。自从1849年的修改宪法的議院以来,在普魯士还沒有一个合法的代議机构;普魯士議院是一群非法的篡夺者。当然,自由派的議院

英雄們為了把人民實際仍然保有的權利，用作重獲其他國民權利的武器，也可以在非法的議院集會。可是，這樣他們在議院每次開會時就應該確定它本身的非法性，并把國民權利的還沒有贖回的影子召來。

因此，工人既對鬥爭的對象——普魯士憲法，也對進行鬥爭的人——反動分子和進步黨人（工人同這兩種人都沒有關係），都不大感到興趣。可是，進步黨同反動派之間的鬥爭繼續下去，對他們倒有很大的策略上的利害關係。因此，他們在進步黨的勝利還不絕對可靠的一切地方，就投這個力量較弱的黨的票。反動派同進步黨之間的鬥爭的繼續，對工人有利，並不是使得一個人戕害和毆打另一個人，而是正如路德起來反對教皇時，胡登所說，讓他們互相戕害和毆打。

拉薩爾對於卡尼格先和舒爾采-德里奇在法蘭克福議員會議上的演說還說，資產階級鄭重其事地宣稱，它不要革命，它不斷威脅說，如果工人敢於執行獨立的階級政策，它就退出戰場，它從來也不同意改善工人階級的社会狀況，它寧願放棄自己的政治自由，也不願意欣然把普選權交給工人。他告誡工人，一旦發生激變（“不管它是怎樣產生的”），不要忘記進步黨人和民族聯盟分子，一直到最後關頭都宣稱，他們不要革命。

除了這些話以外，拉薩爾對工人說，資產階級同反動派一樣，也是同工人敵對的，工人所關心的是這兩個黨派的互相磨擦，是利用從統治階級之間的爭執中獲得的一切利益。一旦發生激變（“不管它是怎樣產生的”），工人就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普選權，或者俾斯麥通過政變頒布普選權，在任何情況下，工人都不應該考慮從來也不關心普選權的資產階級的私利。

拉薩爾並沒有用他論證策略轉變的言論，否定他過去的任何

原則性观点。早在論意大利战争的著作中,他就指出 1849 年的帝国宪法是一个反动的空想。他在論費希特的政治遗产的文章中就已经說过:“同联邦和国家統一这个大矛盾相比,甚至君主国和共和国之間的矛盾,也降为比較次要的矛盾,我們完全确信,甚至那些希望有一个完全废除了三十五个下級君主权的、世襲君主制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国(即使它带有大学生协会时代的一切裝飾紋、纓絡和伤感性)的人,也还站在比我們的联邦共和主义者高得多的、智力和政治真理的阶段上。”根据費希特的見解,拉薩尔把联邦制度理解为空洞的原則;他在閱兵演說中用美国内战这个事实来反对联邦制度,同时忽略了,国家政治形式最終是由产生它們的經濟状况决定的,由于經濟状况的不同,联邦制度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国家形式。可是这又是純理論上的片面性;正如馬克思早在《新萊茵报》上指出的那样,恰恰在德国,經濟发展的需要同联邦制度是不相容的。拉薩尔把民族联盟分子向奥地利分立主义的邦联改革献媚,看做是向在一般民族問題上最反动、最陈腐的立場献媚,而加以譴責,他这样做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

事实上,俾斯麦比进步党老练而有条理地击退了法兰克福諸侯會議的“联邦制度的阴谋”,拉薩尔所做的男子汉和老婆子的鮮明比喻实质上是完全确当的。假如进步党同俾斯麦进行一場真正的斗争,他这样做在策略上就不合适了。可是进步党恰恰不这样做。就拉薩尔关于普魯士宪法的价值所說的一些話而論,他完全停留在他从前的宪法演說的立場上。現在他也毫不諱言,普魯士王室的违法行为,如果进步党要想胜利进行爭取批准預算权的斗争,它就應該考虑拉薩尔对它說的話。

閱兵演說虽然遵守策略轉变的界限,但是它却导致使拉薩尔越过政治机智界限的一个偶然事件。萊茵区的工人沒有使他失望;

他們熱烈歡迎革命年代的老同志和反动年代的忠实朋友。拉薩爾在巴門對兩三千工人講話。自由派工廠主和他們的走狗企圖鬧事破壞大會，結果完全不能得逞。搗亂分子很快就被揭露出來，同時，正如瓦爾特希的報道所說，許多揮動的椅子和扔出的啤酒杯加速了他們的退却。 101

大會給阿爾伯特·朗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給法蘭克福的《南德報》寫了關於大會的報道。在匿名發表的，但無疑是朗格寫的文章中說，有人硬說拉薩爾是反动派的工具，甚至是盲目的工具，這種無聊的論斷根本不值一駁。反动派幫助他而不是他幫助反动派。他的擁護者的人數以及他們的热狂不斷增長。這種執弟子禮的方式同合作社社員對舒爾采-德里奇的沉默的、天真的皈依，本質上完全不同。在巴門，向撤退的進步黨人扔去的啤酒杯不是普通的粗野的武器，在工人從來就有憤激情緒的佐林根，人們估計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拉薩爾把他的行動稱為閱兵，這不是一種浮誇。將來是否有一支射擊協會和體育協會會員的隊伍為了憲法走上戰場，還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的話，拉薩爾的一支工人隊伍不會讓德國的現行憲法保留一點原來的樣子，至少不會保留王笏、王冠、星和其他玩具，這一點是肯定的。

朗格預言，巴門的事件將在佐林根重演，而且還要變本加厲，這個預言首先得到證實。為了聽拉薩爾的演說，成千上萬的萊茵區工人湧到佐林根。練習射擊的城堡的大廳擠得水泄不通，在大廳門前還有密集的人群擠來擠去。進步黨人在拉薩爾剛一開始講話就企圖打斷他，這種企圖剛一露頭就遭到失敗，可是有幾個工人怒不可遏，用刀子刺傷了幾個被派出的搗亂分子。拉薩爾講了半小時以後，佐林根市長帶了十二名武裝警察來到會場，解散了大會，理由是有幾個進步黨的騷擾分子受了傷。於是拉薩爾在武

装警察的簇拥下，在不断向他欢呼的成千的工人的包围下，赶到电报局，给俾斯麦发出一个急电，请求首相对“进步党市长”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解散了大会，“依法”予以“最严格、最迅速的损害赔偿”。

这个电报是拉薩尔的一个严重错误。人们不能在魔鬼的祖母那里控诉魔鬼。一个革命者更不可央求十几年来极可耻地压制过而且现在还在压制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封建反动派的代表，为一个进步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对这种权利的破坏进行赔偿。俾斯麦当然没有给予所请求的损害赔偿；封建官僚决不否定一个利用警察为所欲为的自由派官僚，反而经常把他当做悔过的罪人大加欢迎。如果说，拉薩尔被进步党激怒了，做了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作为人的拉薩尔，那么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拉薩尔就更不应该给自己的死敌办事。进步党终于有了一张纸，可以为拉薩尔同俾斯麦的同盟作表面上的证明。

不久，拉薩尔本人就充分体会到这个错误的严重后果。在佐林根大会以后，他还在杜塞尔多夫发表了演说，没有受到干扰，后来，由于声力完全枯竭，他不得不放弃同汉堡的拥护者会面的企图。10月7日，他又回到柏林，并且正确地认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这个城市。他散发了一万六千份告柏林工人书，他用这个讲话开始向柏林冲击。

进步党起初打算使拉薩尔在莱茵区取得的胜利没无闻；前共产主义者貝克尔根据这种精神努力劝说从前的制革工人，现在已经当上哈根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小报编辑的威廉·哈森克莱维尔。当封闭消息的企图不能得逞时，进步党的报纸（仿佛它们想证实，阅兵演说谈它们不是谈得太多）就散布谣言说，拉薩尔在佐林根在对他的煽动感到愤怒的工人面前，受到警察的保护。尤其

是在柏林工人中讀者最多的報紙，《人民報》和《柏林改革》揚揚得意地進行這種欺騙宣傳。拉薩爾就從這一點談起，以便給柏林工人指出，他們受到進步黨報紙的欺騙多麼大。他利用朗格致《南德報》的信證明，進步黨人對自家人是說真話的，而且強調了他的宣傳活動的革命性。他又一次說明，進步黨人所以恨他，並非因為他們預料他反動，而是因為他們預料他革命。他說擁護普魯士憲法是反動的，而擁護普選權是革命的。他嘲笑進步黨內那些搖擺不定的人，他們這時認識了在法蘭克福議員會議上所犯的錯誤，熱狂地反對奧地利分立主義的邦聯改革。拉薩爾問道，有些人8月間跟着奧地利跑，10月間跟着普魯士跑，在最重要的民族問題上，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能告訴工人，工人應該做什么，工人拿這些人該怎麼辦呢？

拉薩爾特別嚴厲地抗議他向國家要求國家援助的這一說法。他預先就對俾斯麥後來的“社會改革”下了判決，因為他堅決反對這種想法，即工人應該從國家手裡領養老金，應該為了一筆施舍而犧牲他們的獨立和自主。他不要求多，也不要求少，只要求未來的、由於實行普遍、直接的選舉權而復生的民主國家，通過它很容易辦到的信貸運用，把成立生產合作社所需要的資本預借給工人。這種國家援助同自助並不矛盾，相反地，乃是大規模的“社會自助”，只有它才給工人提供自助的可能性。拉薩爾提醒柏林工人，想到1848年3月的偉大的死者，並警告他們說，如果他們再猶豫不決，那麼對自己、對他們的兄弟、對整個歷史將負有重大責任。德國最重要的中心已經勝利了，普魯士萊茵區正在大踏步前進，再加上柏林，運動將成為不可抗拒的。

這篇講話寫得很好，可是等於沒有發生任何作用。當時，柏林無產階級正處在一種混亂狀態，這種狀態在前一年就對它不利而

使它同萊比錫无产階級有所不同。普魯士的首都以飞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大工商业城市，主要是因为以它为中心的铁路网日益密集。它从普魯士偏僻地区的居民中吸来大量的劳动力；从1860年到1867年，柏林人口由近五十万人增加到七十万人以上。工人人数到处急剧增长，他們受到新分子的强烈影响，这些新分子到那时为止对政治就像对月亮上的人那样不了解，現在以为在大城市里首先可以找到出产金子的地方，他們经历了最初的失望，結果却更加死抱住最后的希望不放。同时，几乎沒有任何組織把混乱的群众組織起来。

除了专门或者主要以教育为目的的大手工业协会和舒尔采的政治堡垒，柏林工人协会以外，只有三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协会：由一个鞋匠领导的老帮工协会，印刷工人协会和自称郊区手工业者协会的奥兰宁堡郊区的机器制造工人协会。最初，这些协会参加拉薩尔的运动的情况是令人十分惊异的，在告柏林工人书末尾表示願意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册上登記的五个（連瓦尔特希是六个）工人中，有四个或五个鞋匠，一个排字工人，机器制造工人却一个也沒有。如果人們考虑到，制鞋业是正在沒落的手工业，印刷业是工場手工业，机器制造是现代大工业，那么看来柏林工人所处的工业发展水平越高，他們就越持拒絕态度。

然而要說明这种奇怪現象的內在联系是很简单的。制鞋业从来就因为資金少容易进行而是一門过剩的手工业，从四十年代起，大部分就已經变成受資本剝削的家庭手工业；从那时起，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的貧民救济活动里，带着一大群孩子的吃不飽飯的鞋匠就居于显著地位。六十年代，机器操作突然襲击了这种手工业。1867年巴黎工业展覽会报告得意揚揚地宣称：自从法老的时代以来，三千多年，人們都同样用手做鞋，現在已經能够完全用机

器制作了。在普魯士軍鞋厂里，就用柏林一家工厂以每台二百塔勒的代价交付的机器做鞋。在这个手工业中，人們說：能逃命的就逃命吧！行会运动的領袖是一个鞋匠師傅；舒尔采的二百个原料合作社中，由鞋匠師傅組成的不下八十个；拉薩爾的首要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也是像瓦尔特希、梅茨內、阿伦特、霍伊茨、福格特这些有才智的鞋匠帮工。

印刷工人的境遇又不一样。新聞事业迅速繁荣而且受到地方的限制，反动派对学校的破坏限制了这个需要較高文化水平的行业的劳动力竞争，在这个行业中暂时不会采用机器以及其他許多情况，使得印刷工人特別倾向于工会組織，根据他們的正确估計，这个組織会对提高他們的工資有一定影响。有六百名會員，包括柏林所有印刷和排字工人的一半的柏林印刷工人协会已經要求柏林各印刷所的老板，修改在反动时期强迫工人接受的工資額，現在这个工資額同生活資料的不断上涨的价格已經不成比例了。协会当然遭到断然拒絕，因此現在就轉而拥护拉薩爾的适合于自己的原則。它要求国家帮助，它向内閣递交了一个要求废除禁止工人联合的法令的請願书。在拟定这份請願书时，它引用了工資铁律，可是还有所保留，即利用工人联合可以达到“大致抵銷企业主对沒有資產的工人的优越地位”的目的。拉薩爾在印刷工人协会中得到的只是半心半意的皈依。

机器制造工人对他的鼓动采取完全拒絕的态度。当时机器制造业蓬勃发展，机器制造工人工資很高，是一个强大、活跃、真正現代的工人阶层，他們在內心深处憎恨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反动。他們从工厂的最近的近旁看到普魯士官僚和行会制度拥护者，由于前一年工人运动的領袖人，而且还是他們之中的一个人，暴露出充当政府的工具的真正面目，因此他們变得非常多疑。所以从五十

106 年代起就同他們有密切关系的《人民报》能够比較容易地使他們討厭“国家援助”。加之，进步党的机器厂厂主又請求政府废除禁止联合的法令，虽然进步党的态度很快就表明，这只是籠絡柏林无产阶级的最重要部分的一个花招，但是暂时并不是沒有影响的。除此而外，还有拉薩尔的那份打給俾斯麦的倒霉的电报。机器制造工人始終忠于进步党，他們的态度对柏林无产阶级群众起着决定作用。

拉薩尔在柏林资产阶级人士中爭取到几个拥护者，医生艾斯納和諾伊曼，书商萊因霍德·施林格曼，家庭教师阿列克西。还有一年前从英国回来的李卜克内西也在这时参加了拉薩尔的組織。李卜克内西在《北德总汇报》工作了一个短时期，这个报纸是由1848年以来就是一个道地的共和主义者的奥古斯特·布拉斯創办的，本来是大德意志民主派的机关报，可是很快就投靠了俾斯麦。李卜克内西一看破这点，就立即辞职，又开始在柏林街头进行爭取生存的艰苦斗争，这种斗争，他在伦敦街头已經进行过十二年了。据他自己說，推动他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是为了实现光荣义务，是在进步党报纸的攻击面前表示同情联合会。此外，他对拉薩尔的鼓动的看法同馬克思一样，根据他刚从布拉斯那里得到的痛苦經驗，拉薩尔的策略转变是不合他的意的，甚至引起他的怀疑，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他不了解德国的情况，他錯誤地认为，拉薩尔作为老共产主义者，却被誘入进步党民主派的方向和1859年的大普魯士的拿破侖热狂之中。因此正如李卜克内西正确地估計的那樣嫌恶是双方面的。

拉薩尔用来向柏林进攻的微弱力量遭到了优势力量的抵抗。进步党宣称，社会主义在柏林抬头了，它也一定在柏林遭到迎头痛击。为了获得这样尊贵的荣誉，进步党并不拒絕警察的帮助；在拉

薩爾由于給俾斯麥打了電報而做了一次錯事以後，進步黨就不惜做三次錯事。<sup>3)</sup> 它的第一種手段是驅逐，在這一方面警察可以幫很多忙，第二種手段是搗亂，在這一方面警察又可以幫很多忙。拉薩爾根據在萊茵區的經驗，先舉行不公開的會員座談會，以訓練他的擁護者的牢固核心。可是就在10月22日舉行的第一次座談會上，就有十個進步黨人被趕了出去，他們為了進行搗亂，以欺騙手段在聯合會名冊上登了記。在11月2日的第二次座談會上，一群搗亂分子闖進了大廳，隨後進行監視的警官急忙解散了會議。11月10日的第三次座談會進行得比較順利；只有兩個進步黨暴徒被趕出去，他們請求警察幫助，甚至遭到拒絕。於是拉薩爾就想毅然打開難局，在黃金國大廳召開公開的大會。可是他由於得了很厲害的咽喉炎，沒有能夠出席這個大會，進步黨人揚揚得意地說，他由於害怕而偷偷溜走了。可是，11月22日，當拉薩爾又在黃金國召開一個新的公開的大會，並親自出席的時候，卻有一群警察闖進來，用暴力驅散了參加大會的人，並且逮捕了拉薩爾，說他利用告柏林工人書，準備進行叛國活動。參加大會的進步黨人，遺憾的是也有被進步黨矇騙的工人，發瘋似地喊好。

三天以後，拉薩爾被保釋了，可是他看出，他對柏林的衝擊失敗了。工人由於他被捕而叫好，證明他還不能發動足夠的力量，粉碎進步黨和警察的聯合反抗。為了面子，他還舉行了一兩次會議，沒有受到干擾，也許進步黨剩下的一點羞恥心復活了，也許是它以為現在工人保險不會出問題了。隨後，拉薩爾就放棄了在柏林的鼓動。在這些劇烈的鬥爭中，柏林的聯合會會員曾增加到二百人，後來又很快地降到三、四十人，拉薩爾生前，這個數字就沒有上升過。

## 二 拉薩尔和俾斯麦

108 在此期間，尽管俾斯麦尽了最大努力施加压力、采取措施，众議院的改选仍然給进步党带来新的胜利。虽然保守党議員也由十二人增加到三十六人，但是受到損失的不是进步党，而是老自由派的和其他中間派小集团。新的众議院立即废除了出版令，俾斯麦放弃了它。他对民族神經的投机暂时沒有成功，可是碰巧，他又能够立刻怀着更大的成功希望，重复了这一投机。

11月15日，丹麦国王去世，沒有男性子嗣，11月18日，頒布了丹麦总宪法，违反伦敦議定书把什列斯維希公国并于丹麦王国。这样就把十几年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的耻辱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上来。国内发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几百个民众大会上，人們表示願意牺牲生命财产，从丹麦的桎梏下解放这两个公国，并决定为这个目的而募捐和召募志願軍。德意志的大邦，奥地利和普魯士粗暴地反对这个运动，同时，它們严格遵守偏袒丹麦王位继承人的、用暴力废除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继承法的伦敦議定书。它們宣称，所以要干涉丹麦，只是因为它沒有履行伦敦議定书上規定的、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义务，可是这样恰恰是承认了民族运动热烈要求撕毀的这个文件在法律上是有效的。馬克思在1848年，拉薩尔在1859年要求的解放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革命的民族战争的前提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很快就同中小邦的外交手腕配合，把民族运动引进一条死胡同，即承认奥古斯滕堡家族的继承权，这是一种君主的特权，它的合法性写在中世紀的一张羊皮紙上，它的道义上

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权利却写在一张完全不同的紙上。奥古斯滕堡王位继承要求者属于充斥德国的、品格和才智同样低劣的平庸王子之列；他以致路易·波拿巴的一封乞求的信，开始他爭取所謂<sup>109</sup>的权利的斗争。在德国，他的最热情的先锋战士，一个是科堡-哥达公爵，那是在欧洲成为笑柄的好出风头的人，还有一个是薩克森大臣博伊斯特，他对德累斯頓五月战士进行的可耻行为成为欧洲的丑聞。

尽管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美妙，德国资产阶级却急忙利用它对德国人民的一切影响，为奥古斯滕堡的宣传服务。大小德意志派为这个崇高的任务联合起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一个新議員大会成立了一个三十六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企图用一个振振有词而内容空洞的声明，使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军队与外界隔绝。不久，事情就发展到，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对于讨厌的喧嚷感到憤慨的地步。当“純德国的”大臣博伊斯特由于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事件的功劳，据说要得到一项国家贈礼时，民族联盟的周刊就在几篇文章中揭露了瓦尔特海姆监狱的可怕的秘密，来扭转这种过分毁坏名誉的行为。当普魯士进步党为奥古斯滕堡家族效劳的时候，它的左翼并不同意。瓦尔德克反而声明，普魯士众議院沒有任何理由，叫这样一个僭位者迷住了；与其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边界地区設立一个軟弱无力的小邦，还不如把这个地区合并于普魯士更为合理。这正是俾斯麦所追求的暂时保守秘密的最后目标，他用的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內閣政策的錯綜复杂的办法，可是进行得也很巧妙，胜过了中小各邦的外交手腕以及大小德意志派资产阶级共同的政治才能。

拉薩爾对于“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梦想”也同馬克思当时对于受海洋冲洗的廉价热情那样，采取否定态度。民族运动只要

有真正的内容,它就能够掌握工人;尤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距离这两个成为爭論对象的公国很近的汉堡的会员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为了“德国的正当权利”募捐和募兵,同时这样做并不是追随进步党的尾巴政策,而是謀求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很显然在当  
110 时情况下,这样一种行动只能給統治阶级提供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来扼杀年轻的工人运动,于是拉薩尔及时制止了这个迫切的危险。他起草了一个決議,指出伦敦議定书是一种暴行,正統的君主特权是一种錯觉。德国各邦政府的义务是,把两个公国从丹麦王室的暴力下解放出来,可是在派出志願軍和体育协会会员到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去以前,必須先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人民将因此失去最有牺牲精神的先鋒战士,这些人的团结一致比过去任何时候所要求的都更迫切。同在德国国内必須解决的巨大的中心任务相比,只要在德国有三十几个君主进行統治,是否其中有一个是外国君主这个问题,就是很不重要的了。被正統的君主特权迷住了的进步党人,似乎想利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这个机会,轉移人們对国内状况的注意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不去解决他們无法解决的矛盾。可是人民不应忘記,德国有了統一和自由,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即可自行解决,而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任何胜利都不能保证德国的統一和自由。

各地联合会都接到这个決議。汉堡的会员(拉薩尔承认他們放的第一把火是很光彩的)也逐漸平靜下来。住在汉堡的两个理事中,奥多尔夫一开始就是冷靜沉着的,而佩尔还接到拉薩尔特別写給他的一封信,迫切警告他不要为成立志願軍做任何事情。毫无疑问,在当时情况下,拉薩尔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的見解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拉薩尔差不多同时在波兰問題上做出的決議也是这样。

这个決議承認 1863 年的波蘭起義對歐洲是有貢獻的，它摧毀了泛斯拉夫主義的幻想，同時使得從前許多德國愛國者對拿破侖和沙皇在民族原則的幌子下結成聯盟的恐懼成為不可能。這樣就為歐洲民主的團結政策作了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如果德國為自己 111 的改革利用波蘭起義，波蘭起義就為德國立下特殊的功績，即為建立德國統一掃除了一個最大的外部障礙。重建一個在德國保護下的獨立的波蘭，是德國的最光榮、最正當的外交任務，為這個目的而進行戰爭，是德國的最直接的利益，是彌補參加瓜分波蘭而犯的錯誤的唯一辦法，同時也是真正把自己從東方和西方加在它身上的壓力下解放出來。拉薩爾所做的唯一保留涉及用和平手段把波蘭國土德意志化的問題，他對這個問題的估價比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對它的估價高些，差不多同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對它的估價相同。拉薩爾把這看做是一個需要進行專門研究的實際問題。他的波蘭決議和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決議的原則性內容，從共產主義的革命立場來看是無可非難的，這兩個決議也確實得到倫敦共產主義工人教育協會的認可。

1863 年和 1864 年之交的冬天的政治發展大體上就是這樣。普魯士眾議院否決了俾斯麥為了對付丹麥而要求的一千二百万塔勒的公債，又在 1864 年的預算中勾去整編軍隊的經費。因為俾斯麥一開始就聲明，他不理會這些決議，所以雅科比建議，否決政府的整個預算；根本不應該委託一個故意地、原則性地違反憲法的內閣，來處理國帑。他是堅決要求這樣做的。可是進步黨的多數派認為，否決整個預算純粹是幻想，由於完全得不到預期的效果，會使反對派的狀況惡化，除非納稅人拒絕納稅，而這是不可想像的，進步黨的多數派在這一方面也是堅決的。因此，人們就從約一億三千五百万塔勒的預算中，削減了還不到六百万塔勒，就是這樣，俾

斯麦也已經胜利在握。1864年1月25日，他对众議院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訓斥，把邦議會送回老家，同时正如他自己所約定的，哪里  
112 有錢，他就在哪里挪用。目前他有足够的財源可以弥补成为問題的較少的亏額。2月12日，他公布了一个內閣決議，規定财政管理要有一定的严格限制的标准，以此来安撫国家債权人。这些事实又一次证实了拉薩尔的看法，即完全解散立宪机构，是反对派使政府失去活动力的唯一手段。如果众議院繼續談来談去，它就会墮落到根本不能算做政治力量的地步。

可是不仅如此：众議院簡直成为它的敌人的一个仗恃。由于法兰克福諸侯會議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危机，俾斯麦陷入封建派和宮廷的“磨擦”的交叉炮火之中，他清楚地知道，它的德国政策越暴露，这些磨擦就会越来越复杂。奥古斯塔王后是歌德的学生，是一个有教养的妇女，从不喜欢易北河东的容克；王太子夫妇有自由主义思想，而且更多地傾向奥古斯滕堡家族；去世的国王的很有势力的王后害怕同奥地利有任何爭执，容克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害怕这一点。所有这些影响襲击着国王的怯懦的心灵。当时有一句据說是俾斯麦說的話流传很广：把老白馬往沟边赶，它就吓得猛烈地往回跳。虽然如此，还使俾斯麦得到国王的寵爱的，是他賴以战胜抗命的众議院的胆大妄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国王面前驅除3月18日的阴影，他按照自己的說法，把国王比做英国的查理一世，把自己比做斯特拉福，把只想用剪利息单的剪子把“非生产的”軍事开支削减一点的溫和的自由貿易派比做只想喝血的克伦威尔派。

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上，他同奥地利一起，都根据倫敦議定书行事，这时奥地利由于担心民族运动，而且，根据奥地利大臣几点慎重的暗示，也由于对俾斯麦本人的暗中猜疑，而願意同

他打交道。俾斯麥不再為邦聯議會的多數派和三十六人委員會的破壞性的決議操心了。他說，政治問題就是權力問題；德意志的大邦是保護德意志邦聯不受歐洲風寒的溫室；普魯士不能被代表兩三百万人的一个多數派所打敗。他最多在外強面前利用三十六人委員會的漂亮的決議，就像他在國王面前利用普魯士議員的漂亮的演說那樣；他這樣做，仿佛德意志大邦要不至少根據倫敦議定書干涉丹麥，那些聲明就能挑起德國革命似的。當然三十六人委員會又戰勝了這種騙人的奇談，它發表了一個新的聲明，在這個聲明里，它對自己以前的失敗感到自慰的是，它“竟然把奧地利和普魯士這兩個敵視民族的光榮事業、以它們同民族潮流的原則對立而自負的大邦趕到什列斯維希去”。

1864年1月，奧地利和普魯士要求丹麥廢除新的總憲法，否則它們就要干涉；如果丹麥用武力反抗它們的干涉，那麼戰爭就取消一切條約，就要一般地討論倫敦議定書。丹麥不肯屈服，于是就發生了戰爭。4月18日，普魯士軍隊進攻迪佩爾堡壘<sup>①</sup>。然後在英國的策動下，在倫敦舉行了一個國際會議，企圖進行新的調解，這時俾斯麥舍棄了倫敦議定書，同時在普魯士國內以及在兩個公國本身，涌現出許多奏章，這些暫時羞羞怯怯、含含糊糊地要求合併于普魯士的奏章呈給了國王，而且被國王很高興地接受了。關於這件事，俾斯麥給他的一個心腹寫信說，在他看來，“把所有想叫的狗都放出去”，是有好處的；“獵犬的所有吠聲”共同發揮作用，使外國感到由丹麥來統治這兩個公國是不可能的。奧古斯滕堡人和“所有直到柯尼騷河<sup>②</sup>的永遠合而不分的人”必然慣於考慮普魯士政府不能給他們提出的綱領。奏章應該糾正兩個公國把自己看做

① 丹麥為保衛阿爾斯島在日德蘭半島南部的迪佩爾村建立的堡壘。——譯者

② 什列斯維希和日德蘭半島的界河。——譯者

是德意志家庭中的过生日的孩子，普魯士必須以自己的生存，保证它們的特殊利益的“妄想”。为了“說明局勢”，俾斯麦“最后”补充說，对他來說，两个公国合并于普魯士虽不是最高的、必然的目的，也是最合适的結果。

114 在这种政治发展时期，拉薩尔和俾斯麦进行了私人会談。关于会談的情况，人們是从以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一方，以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8年所做的报道中得知的。<sup>①</sup>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說法是不一致的。究竟誰是会談的发起人，就是一个爭論的問題，根据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說，是俾斯麦，据俾斯麦本人說，是拉薩尔。对于这一点还不能肯定，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問題。因为俾斯麦承认，他願意接見拉薩尔，而拉薩尔如果认为有必要或有好处，就同俾斯麦会談，他不会像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对一个形式的礼节問題这样看重。会談是像俾斯麦所說的只进行了三四次，或者像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所說的进行的次数要多得多，也同样不能确定，而且也是无关紧要的。在第三点上，俾斯麦的說法比較可靠。据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說，因为俾斯麦拒絕立即授与普选权，所以拉薩尔断絕了他們的关系，而据俾斯麦說，他們的关系並沒有断，因为拉薩尔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把他的宣言送給俾斯麦，所以俾斯麦的說法是可信的。可是在一个重要得多的問題，即在這些会談的內容上，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回答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談的是政治問題。俾斯麦断言，他同拉薩尔、就像同一个聰明的領地邻居那样愉快地聊天，这只能是一种可笑的遁辞。

最可笑的莫过于俾斯麦企图給自己的断言找根据。关于这一

<sup>①</sup> 古斯达夫·迈耶尔在他所著《拉薩尔和俾斯麦。他們的通信和談話》(1928年柏林版)一书中发表了有关拉薩尔和俾斯麦之間的关系的全部材料。——原編者

点，他在 1878 年說：“我們的关系完全不可能具备一种政治会談的性质。拉薩爾能够要求我什么，又能給我什么呢！他沒有任何后盾。在政治会談中，尽管人們有时为了面子不說，骨子里就是 *do ut des* [欲取姑予] 这么一个問題。可是人們心里一定說：你这个穷鬼能給人什么东西？他沒有任何东西能給作为大臣的我，他所有的，是很能吸引作为个人的我的东西；他是會同我交往的最聰穎、最亲切的人們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决不是共和主义者；他有很明显的民族的和君主主义的意向，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德意志帝国，我們的接触点就在于此。拉薩爾是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是以霍亨索伦王朝結束，还是以拉薩爾王朝結束，也許在他还是一个疑問，可是他的思想彻头彻尾是君主主义的。”这几句話表明，从个人对个人來說，在这几次会談中，俾斯麦是一个可怜虫，正如拉薩爾所預言的那樣，他想利用社会主义吃櫻桃的企图，以得到櫻桃核而告終。

正如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所說以及俾斯麦所承认的那樣，他們的会談圍繞着普选权和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两个問題。可以补充說一句，对拉薩爾來說，普选权是个主要問題，对俾斯麦來說，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是个主要問題。最近一位热心的教授把迪斯累里、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奉为皇家社会主义的三位古典代表，同时迪斯累里，甚至波拿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人們要想談論什么俾斯麦的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須把它叫做慈善社会主义或奴仆社会主义。俾斯麦不仅頑固地反抗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解放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反对一切能够提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社会改革，他的这种不可糾正的頑固性是人所共知的。在前一世紀沒有一个资本主义剝削者比俾斯麦更露骨地把工人的星期日休息叫做危险的礼物，或者譴責合

法地調整工厂里的儿童劳动是对家庭内部重要事务的可恶干涉。俾斯麦的所謂社会主义全部包括在他对一个心腹人所說的作为官方扼杀工人問題的主要指示的一番話中：“誰对老人和殘废者的养老金抱有希望(即使这种希望很小),他就感到比較舒服,对自己的命运比較滿意,对待这种人比对待瞻望不确定的未来的人要順利和容易得多。比方您考察一下一个私人的用人和官厅的听差或宫廷的侍从之間的差別,后两种人所做的事要多得多,因为他們比前一种人对自己的职务的依賴性大得多,因为他們可以期待养老金。”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如果人們要想濫用这个名詞的話),永远在于,用周济迷惑工人,使他們像宫廷侍从一样容易对付,并且做更多的工作。

116 俾斯麦也从这个天才的观点来理解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他的波拿巴主义的伎俩在內閣中遭到一定程度的反抗;頑固的旧官僚还不熟悉这种新方式。俾斯麦就更多地在別的方面寻找好办法。他自己的經济学識是封建的中世紀殘余和庸俗經济学开端的阴暗的混合物,适合一个开始懂得謀取资本主义利潤的容克地主的地位。当然拉薩尔任何时候也不会像俾斯麦錯认为他有君主主义傾向那样,錯认为俾斯麦有社会主义傾向。拉薩尔看破这种慈善的和奴僕的社会主义时的惊异心情充分反映在他从这时起屢次对用他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議做試驗的强烈抗議中。他最多只是利用俾斯麦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干的蠢事,比如1864年春天,当三个西里西亚織工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了柏林,請求国王帮助他們反对资本主义剝削者的时候就是这样。

当时,西里西亚織工的慢性困苦由于棉花危机轉变为一种急性的灾难。早在1862年8月,賴辛巴赫区的工厂主就提醒地方长官奧拉茹斯注意“危險的情况”,請他采取措施使得織工在这年冬

天不致陷入困境。奧拉茹斯回答他們說，全体工厂主肯定将尽一切力量，用自己的資財对付面临的困苦状况；一般說来，他們的状况改善了，而工人的状况仍然停留在悲慘的境地。当工厂主提議为失业的織工建立一个劳动院时，奧拉茹斯以譏諷的口吻拒絕說，这个建議将会“不是沒有理由地”給它的倡議者带来工人的憎恨。劳动院能使許多无辜陷入貧困的居民不致挨餓嗎？这些居民几乎从来也剩不下一个分尼以备急需，他們用自己的劳动使別人发财致富。这位地方长官是一个最小的波拿巴，因此他是适合不久以后即 1862 年 9 月成为普魯士首相的小波拿巴的心意的人。这件事引起人們相当密切的注意，也使議會为此进行了辯論。郎根比劳和彼得斯瓦尔道这两个織工的大村庄所在的賴辛巴赫区是一个蘊藏着火焰的地方，那里的工厂主中有一个进步党領袖列翁諾尔·賴辛海姆，他在維斯特-吉尔多夫有一家大紡織厂，是四十年代海外 117 貿易公司建立的、汉泽曼在 1848 年用极便宜的价錢卖出去的那些工厂中的一个。賴辛海姆是个普普通通的資本主义工厂主；他不用茨万齐格尔兄弟的方式嘲笑被他剝削的工人，却用舒尔采的節約处方来安慰他們，不知报恩的織工也把这种事情理解为辛辣的諷刺。他們回答得很真实：我們从哪儿节省錢呢，难道我們該把嘴吊起来嗎？

1864 年春天，織工弗洛里安·鮑尔和两个同志，受了大多被賴辛海姆雇佣的三百个織工的委托，从維斯特-吉尔多夫来到柏林，向国王伸訴。織工們很可能是受了封建派的唆使而采取这一步驟的。否則就不能理解，他們怎么会对王室发生信任，二十年前王室曾用枪弹、用皮鞭、用苦役和鎖鏈来惩罚他們对于史无前例的剝削的反抗。地方长官奧拉茹斯正式声明，他不能促进也不能阻止織工的意图。这位正直人士沒有主意了，因为他的頂头上司內政大

臣以及执行工商业政策的商业大臣不願使用波拿巴主义的伎俩。經過四个星期的时间，俾斯麦才实现了他的願望，使織工代表能够朝見国王。

在这段时间里，織工們仔細看了看柏林的工人区，会見了既参加了拉薩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参加了舒尔采的柏林工人协会的当时很有名的工人卡尔·普罗伊塞。进步党人硬說，普罗伊塞是瓦盖納的密探，并企图由此搓一根绳子来捆拉薩尔，因为織工們是在拉薩尔家里会見普罗伊塞的。从今天对这种說法进行审查的情况来看，它是一种沒有根据的怀疑。当时的报刊关于柏林工人运动的报道中引用的普罗伊塞的許多讲话，使我們看到他是一个喜欢饒舌的，但也是一个好心的联合会管事，这种人到处管閑事，但也到处得到善意的諒解。当进步党人为进一步证明他們的断言，想叫人把普罗伊塞开除出柏林工人协会的时候，大多数会员阻止这个秘密判决，他們宣称，普罗伊塞是一个怪人，可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普罗伊塞对請求他帮助和出主意的西里西亚織工說，他本人不是学者，他們可以去找拉薩尔、舒尔采-德里奇和瓦盖納，他們真正是工人問題的学者，当織工們說，他們对舒尔采的处方暂时不感兴趣的时候，他就沒有給他們介紹这位节约使徒而介紹了柏林工人协会主席，排字工人迪特曼。

織工們对拉薩尔比对迪特曼和瓦盖納抱有更大的好感。弗洛里安·鮑尔成了維斯特-吉尔多夫的全权代表，賴因巴赫区不久就成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最有力的支柱之一。相反地，当俾斯麦介紹織工代表去見国王的时候，他完全扮演着可怜虫的角色。国王答应織工“立即依法处理問題，从而帮助他們解除困苦”，这是一个永不兌現的諾言，这样“社会王权”就彻底丢了臉。为了調查織工提出的困苦而成立的一个官僚主义的委员会认为一切都很正常，

列翁諾爾·賴辛海姆从这个事件中獲得殉難者的榮譽。在這期間，他對當地的織工進行了嚴厲的審查，俾斯麥從王國的金庫里拿出一些錢塞給被解雇的工人，建立生產合作社。可是這件事進行得也不順利，因為這個由地方長官奧拉茹斯領導，以便發揮他的政治家才能的示範機構一年之內就光榮地破產了。關於俾斯麥為了使西里西亞織工變成宮廷侍從而花的救濟款額，有不同的記載，最少是六千塔勒，最多是一萬二千塔勒。

俾斯麥以蠱惑者的身份關心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而拉薩爾則以民主主義者的身份關心普選權。他敢於用這個武器同進步黨和反動派作戰，他同俾斯麥會談就是談這個問題。他正確地預見到俾斯麥或早或晚要實行普選權，但是他的錯誤在於，他希望利用他個人的辯才，使這個時刻提前。俾斯麥以一個狹隘、狡猾的商人的方式，對拉薩爾感到失望，拉薩爾以一個偉大的、目光遠大的理想主義者的方式，對俾斯麥感到失望，這個理想主義者想象他的 119 對手有某些觀點，其實這些觀點與他的對手風馬牛不相及，正如黑格爾哲學與南太平洋的島民那樣。

拉薩爾為了促使俾斯麥實行普選權所說的一些話，可以從他後來的演說中相當可靠地推斷出來。拉薩爾從普魯士憲法一天也沒有合法地存在過這一見解出發，把實行普選權不看做是違反法律，而是恢復法律，如果人們在無數次的違法行為（這個奉天承運的“法的國家”就以這些違法行為為基礎。）以後，以這樣一片好心談論普魯士的法律的話，這也是完全可以容許的。可是這個論證是白費氣力，對俾斯麥和他的國王沒有發生作用。這兩個人參加的違法行為是這樣多，以致對他們來說多一件少一件違法行為是無關緊要的，正如不久以後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也確實是無關緊要的。同樣，他們對於拉薩爾對“最有教養和最有才能的人”和王

室的呼吁也是沒有好感的，那些“最有教养和最有才能的人”在他們同資產階級的爭論中，认为召喚人民是“摆脱最高历史裁決的办法”，那个“由原来的面团”捏成的王室，仍然倚靠它的宝劍存在。对俾斯麦和他的国王來說，这又是道道地地的梵語。現在他們認識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他初期還沒有認識的人民，这个 *puer vobustus sed malitiosus* [强壮而不怀好意的男孩] 在 1848 年 3 月 18 日用有力的双手搓揉正統王室的“原来的面团”，并折断了普魯士亲王的劍。他們极其慎重，决不过早地喊这男孩上台。事实上，拉薩尔在这个論证中忘記了他自己的两个論点，即个人受人欺騙，階級决不受人欺騙这个論点，以及进步党宁要来自上面的专制主义，而不要来自下面的革命这个論点。俾斯麦不仅是一个人，而且也是一个階級，他清楚地知道，在紧急关头，他可以比較容易地掌握資產階級，而要掌握无产階級却要作很大的让步。

在最近几年，三級选举制除了它的反民主性而外，它的反封建性也清楚地显露出来，俾斯麦决不喜欢三級选举制，不久他就把三級选举制称为“最可怜的、最不合理的”选举制度。他也沒有忽略  
120 普选权对容克階級有利的一面，只要农村无产階級在容克階級的統治之下。可是俾斯麦的階級意識很强烈，不会过早地試驗双刃斧头。进步党在宪法糾紛中所采取的溫和、怠惰的方式对他暂时是完全适合的。他不仅沒有任何迫切的理由，而且不久的将来也沒有任何理由，在普魯士实行普选权。沒有人比拉薩尔更明确地证明进步党反对派的沒有希望了。

只是在德国問題上，俾斯麦才打出普选权这张王牌。这个問題在俾斯麦反动的內閣政策的十分混乱的初期还深深潜伏着，拉薩尔无法使它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問題。俾斯麦完全是一个旧派的外交家，他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在桌面上玩拉薩尔要求他

玩的激烈的牌戏。有时他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的狡猾而表现出来的坦率同那种“无须隐瞒它的打算(因为这些打算都是以铁的必然性为根据的)的最有力的外交手腕”相似的程度,就同骆驼和馬,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相似的程度一样。俾斯麦所追求的大普魯士最不迫切需要的,就是拉薩爾断言普选权可以給与的、民族的“崇高的精神生活”和“无限的扩张力”。

拉薩爾在同俾斯麦的会談中,走上了一条錯誤的道路,引誘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是过分的自信和唯心主义地过低估計了現代階級斗争本身的重量。拉薩爾肯定懂得在反动派面前完全自由活动,他永远可以說,他掌握反动派而不是反动派掌握他。可是用計謀攻入用暴力还不能占領的要塞的企图,使他說了許多容易被人誤会的話。

### 三 拉薩爾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

普魯士官厅对拉薩爾本人和他的宣传活动表示愤怒,拉薩爾本可以从这一事实推出,旧普魯士国家是很难用計取胜的。俾斯麦并不庇护他;即使俾斯麦想这样做,他也很难办到。警察国家有自己的头脑;它本能地感觉到,想使群众脱离它的統治的一切尝试。粗野的警察想使无产阶级离开拉薩爾,走向舒尔采-德里奇,他們仍然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121

可是拉薩爾同司法和警察斗争的方式,使他得到极高的荣誉。为一根稻草而极力活动,拿荣誉作賭注,这是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口号,他时常发表德国自由主义从沒有理解的意見;只有每个人尽一切力量,打消一切顾虑把他所遭遇到的任何违法的暴力都充分公之于世,每次又重新訴諸国内公共的法律意識,那么警察国家才能

变成一个法律国家。不管这个思想說得多么玄虛，它比那些因为不能对抗而适应任何警察专橫的讲求实际的人的行动要实际得多。假如資产階級反对派从来就贊成拉薩尔的原則，那么普魯士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早就会比宪法上的一紙具文要强一些。自由主义不这样做，却对警察企图用来鎮压年輕的工人运动的一切阴谋詭計公开或不公开地报以掌声。更值得尊敬的是，拉薩尔心力交瘁地企图保护自由，哪怕因此引起别人对他的憎恨(作为个人长期下去他必然遭到失敗)也在所不惜。

拉薩尔反对无法无天的专橫行为的斗争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典范。虽然如此，詳細研究这个斗争的細节是不可能的，或者正因为如此是不值得的。拉薩尔和他的拥护者所受到的警察迫害，今天还很普遍，无须詳細叙述。誰在无产階級階級斗争中战斗过，誰就亲身体驗过这种迫害。搜查住宅、逮捕、沒收和撤銷营业許可，解散和禁止，一切都根据已經給警察的胡作非为开辟了广闊的活动天地的法令执行，可是在这些法令給警察規定了一定界限的地方也被它毫不犹豫地越过了。这些就是警察所使用的崇高手段，其目的是反对为了劳动階級的利益实行普选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活动，执行它的維護社会和国家的任务。

122 警察的集中体现是司法。撇开只是警察国家的沒有意志的工具的檢察官不談，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这个国家。他們从統治階級中得到补充，受严厉的紀律法的統治，甚至他們之中較好的人也被普魯士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所迫，把他們的階級偏見作为审判的基础。階級司法无须用拉薩尔是个反动分子的鬼話来欺騙自己或别人。它乐意为他证实，他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小人不同。在反革命通过一系列杀害无辜的可耻行为而得到巩固以后，它适应資产階級階級斗争的緩慢速度，沒有操纵被它收买的司法，越过一

定的界限。在五十年代，根据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提出公訴的情况較少，进行的懲罰也較少。由于侮辱，由于挑起仇恨和蔑視，由于誹謗国家机关等等而被判監禁，在当时就是一件大事，如果判处監禁，刑期也只以天数計，最多以几个星期計。当工人鼓动家拉薩爾出现在社会舞台的时候，这种情况一下子就改变了。檢察官急忙对他起訴，这种控訴使人很难說出到底是起訴理由之幼稚，还是量刑之重，更使人惊奇。九个月監禁，两年監禁，三年懲役，一年之内刑期迅速增加，法官們并不十分緩慢地使司法成为受到威胁的階級特权的复仇之劍。

拉薩爾受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是由《工人綱領》引起的，据说这个著作挑撥沒有产业的階級对有产階級的仇恨和蔑視。拉薩爾先在市法院后在高等法院为自己进行辯护的发言，不仅是辯护发言中的杰作，而且也是他的社会政治鼓动的武庫中的有价值、有效力的武器。同他 1849 年的辯护发言一样，他在发言之前就先付印。这些发言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絲毫勇于战斗的朝气，仔細的准备也沒有損害令人惊奇的机智，他在审判的一切变动中依靠这种机智都能找到正确道路。在市法院进行的初审很是激烈。拉薩爾作为杰出的辯論家不顾庭长的一再打断，仍然坚持发言，这种方式同他对檢察官謝林的懲罰同样是典型的，他引证了檢察官的父亲，哲学家謝林的著作使檢察官受到道义上的譴責。 123

当然，無論是檢察官或者是法官都不能攀登《工人綱領》的科学高峰。他們求助于胡言乱語，也就是拉薩爾在极为尖銳的辯护发言中談到的，一句話吞下另一句話。像蒼蠅粘在胶水上一樣，他們粘在革命这个字眼上，他們只懂得把这个詞用“干草叉<sup>①</sup>的

<sup>①</sup> 农民起义时，常用干草叉作武器。——譯者

意义”来解释，只懂得把它理解为杀害和击毙。他们根据普鲁士“法治国家”的精神毫不諱言，平常可以随便說的話，在工人面前不能說。他们据以进行可以說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攻击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对間接稅不成比例地压在劳动阶级身上这一事实的爭論。当然拉薩尔后来在高等法院可以說：“恰恰为了这一点而受到懲罰是严酷的、令人憤慨的。三百年来，这个問題在科学上已經載在許多书中，甚至每本入門书中，所以受到懲罰，只是因为檢察官和法官从沒有看过国家經济学綱要。”由于这种无知，拉薩尔在檢察官建議判九个月監禁以后，被判四个月監禁。拉薩尔請求法官为了历史將記下他們的姓名，而宣判他无罪，法官不答应，他们宁可把自己的名字——皮尔辛、科尔克和馮·符尔芬——写在不公正的法官的黑榜上。檢察官謝林的道义上的破产由于官运亨通而得到安慰。他一直当到普魯士的司法大臣和德国司法国务秘书。

拉薩尔給他的第一审的辯护发言冠上《科学和工人》这个标题。它的最精采的部分是这样一种主张：“对历史有比較深刻了解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的一切状况处于普遍衰亡之中，只有两样东西是伟大的，只有两样东西在渗透欧洲生活的一切血管的私欲的慢性痨病中保持朝气并且繼續生殖，这就是科学和人民，科学和工人！只有这两者的联合才能賦与欧洲状况的嫩芽以新的生命。科学和工人，社会的相对的两极，如果它們拥抱，就能用它們的铁臂粉碎一切文化障碍，它們的同盟就是我的目标，只要我活着，我就决定把我的生命献給这个目标。”在《公开的答复》发表前不久，拉薩尔为《工人綱領》辯护而发表的这一演說，是完全无愧于《工人綱領》的。这个发言中还有許多空洞的理論，其中恰恰有真正拉薩尔的东西，但是还没有令人忧郁的憤慨，它是一个战士的图象，在战

場的尘土还没有揚起以前，明朗的阳光再一次照射在他閃亮的武器上。

在拉薩爾在高等法院为抗議市法院的判決而做的伟大发言中，已經沾有一点这种尘土了。这个发言談到間接稅和劳动階級的状况，它证明，間接稅是把捐稅負擔由有产階級身上轉到无产階級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在过去和以后都没有像这次证明得这样彻底和不可反駁。这个发言在这一方面具有永恒的价值，仅仅是这个发言就足以駁斥，拉薩爾在經濟学方面是外行的謬論。拉薩爾同样确切地反对錯誤对待“革命”一詞。他再一次給革命下了定义，說它是代替現狀的一种新的原則，不管它用不用暴力，同时他給这个有名的名詞补充說：“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說，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相信将来要发生革命。如果人們有头脑，决心适时地、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革命就会完全合法地，帶着和平的一切恩泽到来，不然革命就会在某个时期內，在暴力的一切振动下，穿着铁履，披头散发地闖进来。無論如何，它将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到来，如果我远离日常的喧囂，深入历史之中，我就听到它的脚步声。”拉薩爾用辛辣的諷刺，鞭笞階級的司法，这种司法不判断所說的内容，只判断說这些話的人和地方。他可以引证，普魯士統計局局长，樞密顧問恩格尔与他发表《工人綱領》同时在合唱协会的资产 125 階級公众面前做过一个内容完全相似的报告，沒有受到控告。他可以宣讀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恩格尔勇敢地向他证实了这种一致性，并用容易理解的暗示补充說，在由专门学科引起的一切訴訟中，也像在由工商业引起的訴訟中那样，重点應該放在专家的鉴定上。因此，在拉薩爾的这个发言中，重要的和伟大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个别地方，人們感到这个发言是他在 1863 年春天，对进步党对他进行的誹謗保持着最初的新鮮印象的时候写的。

尤其是他突出了这个非常正确的思想，即間接稅的大量增加是資產階級历史时期的有特征的标志——这个时期既包括資產階級共和国也包括現代专制制度——，他把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同他在其法官面前进行辯护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他对法官們說，他們不属于自由貿易派，不属于那些現代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憎恨国家，不是憎恨这个或那个一定的国家，不是憎恨这种或那种国家形式，而是憎恨一般的国家，正如他們有时明确地承认的那樣，他們很想废除一切国家，想把司法和警察包給索价最低的承包人，并利用股份公司来进行战争，使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还有道德，从那里能对他們的用資本武装起来的剝削欲望进行反抗。“先生們，不管使你們和我分开的分歧有多么大，面对着这种瓦解一切道德的行为，我們手挽手地站着。我同你們一道保卫一切文明的古老的灶火——国家，反对那些現代的野蛮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論证，它很容易被反动的蠱惑所利用，而且也确实被利用了。那是在十五年后，那时高等法院所服务的那个国家把一种間接稅的可怕的新負担压到被它用暴力箝制着的工人階級肩上，只有“現代的野蛮人”（不管他們出于何种动机）反对这种压榨群众的行为。拉薩尔本人通过高等法院的判決馬上就知道，这个国家是多么不算一个

126 国家。高級法院虽然同低級法院一样害怕暴露自己，因此把懲罰減为一百塔勒的罰金，但是它沒有推翻第一次判決这个司法怪物，而且也給《工人綱領》判了死刑。

檢察官謝林进行报复，他根据拉薩尔第一审的辯护发言而控告拉薩尔犯了誹謗罪（这个案件以判处拉薩尔一个月監禁而結束），并且控告《告柏林工人书》为叛国。拉薩尔非常冷靜地应付这个控告。他給达姆尔写信說：“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件，它的根源只在于檢察官謝林个人的报复心”。这个案件于1864年4月12

日在國事法庭審理，拉薩爾被控為旨在用暴力改變普魯士國家制度的活動做了準備工作，事實上這個案件以拉薩爾被判無罪而結束。可是由於誹謗國家機關和侮辱內閣而對他進行的、另外兩個與此有關的控告，由特別法庭轉到正式法庭，同時又根據某些彈性條文對拉薩爾的辯護發言再提出一次新的控告。因此事情就停留在這個漂亮的原則上：由每個毀滅性的控告中，生出兩個或三個新的控告。拉薩爾在叛國案中所做的辯護發言的第一部分毫不費力地駁斥了檢察長阿德隆的司法謬論，第二部分則考察了控告的政治方面，同時發表了根據拉薩爾的見解，可以促使國王和俾斯麥通過實行普選權，強行改變普魯士國家制度的意見。

關於這一方面所要說的，和關於拉薩爾同俾斯麥的會談所要說的相同。拉薩爾在這個發言中對進步黨攻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厲害。他稱進步黨是一個想用王室用恩寵給它做成的項圈勒死王室的集團。無論如何不可忽視，這種看法本身是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性的，拉薩爾經常持這種見解，其所以經常遭到非議，是因為拉薩爾恰恰在這個時候以這種形式發表了這一見解。自由派政論家亨·伯·奧本海姆比較婉轉地說過同樣的話，他寫道：“普魯士憲法不是全副武裝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它的革命根源的標志早被磨滅了，這個憲法得到王室的雄厚力量承認的印記在反动年代已經在它身上打上了。”由於進步黨使自己的所謂爭取自由和人民127權利的鬥爭，限制在這個憲法的畸形兒身上，它同拉薩爾之間的分歧就產生了。拉薩爾在國事法庭的發言中也一再強調：我是推動者，政府里的那些人是被推動者；假如他們不做他所要求的事情，他就毫不客氣地談論他們的“無能”。布赫爾曾經請求他對表達方式要慎重一些，他拒絕了這個請求，現在他也冷冷地回答：布赫爾請求他，在法院討論期間離開，以便假如他仍被判處檢察長所建議

的三年懲役，就可以逃走，这是不适当的。

第三个重大案件是由拉薩尔的在杜塞尔多夫被沒收的閱兵演說所引起的。因为这次审判是在自由主义的莱茵区的一个法庭上进行的，而檢察官則用进步党报刊上的材料来充实自己的长篇发言，所以特別值得提一提。除此而外，無論在控告和判决的不公正方面，还是在建議和判处的刑罰之重方面，这个审判同拉薩尔在易北河东的法庭上所受的审判没有什么差別。这个案件比其他案件几乎給拉薩尔带来更大的麻煩。第一审的缺席判决以判处拉薩尔一年監禁而結束，由于他在上訴时自己进行辯护，使刑期减为半年，可是在这里也不缺乏加演节目：根据辯护发言提出新的控告。在对付拉薩尔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司法确实都是“反动的一帮”。

拉薩尔的死使一大堆可怜的案卷成为廢紙。可是在他的死的部分已經逃出階級司法之手以后，它还不倦地追究他的不朽的部分。因此1865年2月15日，柏林市法院根据挑撥仇恨和蔑視的条文判决消灭关于科学和工人的演說。司法和警察仍然用长枪和棍棒攻击拉薩尔的精神；而詩人的話在他和它們身上都已經實現了：

然后他将作为一个崇高的人  
从法警中間穿过。

#### 四 《巴师夏-舒尔采》

拉薩尔在这些恼人的事件之中，抽出時間和精力来写他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著作，这是一本理論著作，作为工人鼓动家，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最后的結論。

这本于1864年1月出版的书在同舒尔采論战方面，同反对朱

利安·施米特的著作的情況一樣：它對舒爾采這個人有時批評得過分，因為它使一切不好的東西都在這個人身上體現出來。當然舒爾采十分得意地接受了人們委託他的“社會王國的國王”這個任務，準備用自己的名字來掩蓋資本主義的一切腐朽，因此在這一時期拉薩爾在論戰上的任何過分之處都可以得到原諒，同論敵的罪過相比，這種過分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為了拉薩爾本人和他的事業，他應該做得更好一些，那就是把他對舒爾采的人身攻擊抹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可以由激烈的語調壓低為溫和而輕蔑的語調。假如他這樣做，這本著作中的一些占較大比重的章節（在這些章節中，他的辯證法的全部制勝力量又一次發揮出來，有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吸引力），還會得到勝利。這些章節就其性質來說，是積極批評的真正范例。在舒爾采的《德國工人問答》一書中，有幾章把巴師夏的含糊的話說得更含糊，要想從中獲得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確觀點，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可是拉薩爾能把這件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事變為可能。他在序言中所表達的希望就可以說是正確的：他的命運引他走上比較順利的道路，因為它迫使他用論戰的形式來敘述科學的國民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則，假如命運允許他，在一部系統的著作中有步驟地闡明科學的國民經濟學的綱要，那麼這種形式就遠不如上一種形式有效果而且生動。對於徹底解決這個任務來說，拉薩爾過于是一個法學家和哲學家，他的經濟學著作同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相比，就像是一隻木頭戰船靠著一艘遠洋裝甲艦，而《巴師夏-舒爾采》開到這艘遠洋裝甲艦面前，卻像是一隻敏捷的魚雷艇，它常常在敵人艦隊的被蟲蛀的老船中間進行嚴重破壞。

拉薩爾在《巴師夏-舒爾采》中扯碎了自由貿易派和歷史學派 129  
以不同的方式掩蓋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所有面紗；這就是仿佛這

种社会状态是人类永远的自然状态的狭隘观念，关于使各个自食其力的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自助的骗人鬼话，为了资产阶级的较高的荣誉有计划地歪曲经济学范畴，硬说资本只有通过节俭才能产生，企业主利润是脑力劳动或道德克制的报酬以及当时作为最纯粹的科学成果在街头巷尾兜售的十几种类似的故意捏造的鬼话。拉萨尔在分析批判这些鬼话中，阐明了事实真相；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他同样明晰地叙述了这个阶段的产生和消亡。他论述了资本同工人交换职务的历史过程，那就是资本把活的工人贬为死的劳动工具，而把自己——死的劳动工具发展为活的增殖手段。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在这一方面，而且只有整个社会的大生产又把资本贬为死的服务性的劳动工具，打开社会财富的新泉源，这些矛盾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恰恰是一种混乱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上分配财产的一种制度，是对社会关系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社会关系作为粗暴的自然力进行报复，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成一种球戏和赌博，劳动阶级的背脊成了投机家和企业主在上面决一胜负的赌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在经济范围内废除个人的责任，而社会主义恰恰要合理考虑人类社会中的公共事物和有连带责任的事物，以便建立人的自由和负责能力。

《巴师夏-舒尔采》在个别地方含有一些从今天的科学认识的观点来看，好像是有反駁余地的，或者是站不住脚的东西，总的说来，这本书在它出版的当时，在历史上和理论上是一部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得更好或同样好的著作。没有什么东西比罗雪尔企图用一堆十分怯懦、无聊的模糊概念和内容空洞的评论来蔑视“小品文作家”拉萨尔更站不住脚的了。《巴师夏-舒尔采》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此它受到

了應該受到的報復。三十年來，報復者企圖證明政治經濟學史上還沒有像拉薩爾這樣明顯的和多方面的剽竊者。

遺憾的是，首先說這種不懷好意的蠢話的，是拉薩爾的最親近的朋友。齊格勒硬說，拉薩爾的全部理論是從傅立葉主義者圖賽奈爾的著作中竊取來的，布赫爾表面上從拉薩爾的遺著中銷毀了，事實上是隱匿了一個鼓動計劃，因為根據洛貝爾圖斯鑑定，這個計劃是從蒲魯東的著作中剽竊來的。各種各樣的人大吵大嚷地說，拉薩爾模仿洛貝爾圖斯。另外一些人說，拉薩爾純粹是畢舍，還有人說他純粹是巴扎爾，還有另外許多人則說他純粹是路易·勃朗。至於拉薩爾除此而外還剽竊了馬克思的著作的說法，則是很有前途的私人講師們的平庸智慧的產物。他們之中的比較大胆的人物確實看出，現在終於到了給舊詞配新譜的時候了。因此他們就說，拉薩爾剽竊了馬克思在拉薩爾死後幾個月才發表的一篇論文。有人說，拉薩爾善於剽竊別的社会主義者的著作，不僅剽竊他們在拉薩爾生前出版的著作，也剽竊他們在他死後出版的，或者將要出版的著作，這種天才的說法，確實給資產階級研究的虛榮心开辟了天才發現的無限廣闊的天地。

這種研究的方法同它的結果同樣美妙。因為自從聖西門，甚至自從托馬斯·莫爾以來的社会主义都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害中產生的，並且要想消除這些弊害，所以這個根源和目標的共同性，給近代所有社会主义者以某種共同的思考方向。在這種共同性之內，各个社会主义者的態度、活動和願望決定於他的天賦，他所受的教育，決定於資本主義社會及其階級鬥爭的不同發展，決定於社会主义認識已經達到的高度，總之，決定於他在其中思想、<sup>131</sup>行動和說話的整個歷史環境。如果人們要確定，某一個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的歷史中，應該占什麼地位，就必須研究這一切。如

果仅仅根据现代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一般輪廓来判断这个人，那就会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硬說，獅子、綿羊、老鼠和鯨魚，因为它們都有哺乳动物的特性，所以是相同的动物那样昏聩。不过应该承认，历史批評的这种不合理的方法，有其合理的原因。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一个一定的社会攻击得越具体，越尖銳，这个社会的粉飾者就越是想方设法地把他說成是从所有角落里收集各种一般的口号的一个抽象的幻影。还没有一个德国教授或私人讲师否认拉薩尔的沒有传播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理論著作的独创性。相反地，馬克思的伟大理論著作越是成为群众的公共财产，就出現越多的大学著作聊以自慰地指出，馬克思同拉薩尔一样，也是一个可怜的抄襲家。

拉薩尔本人从沒有自称是先驅的社会主义理論家；他甚至沒有断言自己是把新思想介紹給群众的社会主义鼓动家。恰恰相反！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說，他只想給工人以絕對确定的和容易证明的东西，他对他們說的全部是在科学中早就确定了的东西以及科学家們早就知道的东西。如果說拉薩尔在这种时候喜欢引川資产階級权威的著作，并不是因为他想以此掩盖从社会主义先驅者那里盜窃来的东西，而是出于他本人完全公开說过的原因，他利用这些权威能够更加有力地打击資产階級敌人。他的鼓动的历史重点不在他的个别的要求和思想是否已由別人或多或少相似地說过，而在他是否正确地認識到，必須組織德国无产階級的政治階級斗争的历史时刻，以及他是否懂得正确地組織这个斗争。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可以談到拉薩尔在自己的鼓动著作中是否經常对

132 給他以教益的社会主义理論和实践的代表給与公正的評價。

事实上，拉薩尔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沒有得到什么好处，从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可是从現代科学共产主义那里得到的好处却很多。他在借用三月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民主派

的个别思想或用語时，是否每次都要注明出处，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情况而定。如果要真正决定这个问题，所花费的劳动和精力就会远远超过这个问题本身的价值。从事情的实质来看，拉薩尔所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派同路易·勃朗及其同志的法国社会民主派有根本的不同；拉薩尔必须随时随地注意不给阴险的敌人以新的歪曲的机会，他有充分的正确理由，不援引法国社会主义，假如他援引，只能很表面，很有保留，而他不援引，在最坏的情况下只是不客气，而不是不公正。

拉薩尔同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关系却完全不同。要是没有马克思的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他的鼓动，尤其是《巴师夏-舒尔采》是不可想像的。拉薩尔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中引用过一次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不仅引用了它，而且给它加上许多最生动的赞语，他一口气说它是极为重要的、杰出的、优秀的、划时代的、卓越的著作。同这种虽然不是夸大，但却是夸张的赞扬相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却说，拉薩尔在引用他在1859年的著作中关于价值量和价值实体所做的说明时，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这种行为显得多么冷酷无情。马克思«en passant»〔“附带”〕做的补充，更不客气：“斐·拉薩尔经济著作中全部的一般的理论命题，例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等等，几乎逐字剽窃自我的著作，甚至连我所创造的专门名词在内，而没有注明出处，他这样做，多半是由宣传考虑决定的。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他的详细叙述和实际应用，这些是与我没有关系的。”<sup>①</sup> 给拉薩尔写传记的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就这一点说，马克思个人远远离开拉薩尔，就像一个迟钝而顽固的人往往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Ⅹ页。

远离一个敏捷而有口才的人那样。这是对于馬克思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我們只要让事实本身說話，就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对他們两个人各自做出公正的評價，而不对一个人或两个人有不公平之处。

拉薩尔經常十分重視同馬克思合作，一直到1862年夏天，他还表明要同馬克思一起在德国开始对工人进行鼓动，这就表明拉薩尔决不会偷偷地用馬克思的文笔来裝飾自己。但是，如果馬克思不想同拉薩尔的“詳細叙述和实际应用”发生任何关系，如果他另外一些話責备拉薩尔认为應該賦与德国工人运动的特殊形式，那么拉薩尔显然处在迫不得已的状态。他既不能在他从馬克思学来的东西中否认自己的科学信念，也不能引用馬克思的著作而不在他們不一致的問題上引起公开爭論。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拉薩尔的行动的才肯定是“宣传考虑”，而且看来差不多是这样，仿佛他在认为同馬克思的看法完全一致，可以引用他的著作的时候，就想用許多贊語来弥补他在另一些地方必須十分不快地放弃的东西。但是馬克思不仅在拉薩尔生前，而且在他死后，也注意到这种“宣传考虑”。当拉薩尔在他引用馬克思著作的一个地方，大大伤害了馬克思的观点的时候，这就更加严重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中再一次总结了他从前关于商品和货币所做的論述，并且尽可能地通俗化，恰恰考虑到使拉薩尔陷入窘境的“严重的誤解”，这时馬克思才說明这种关系。

事实上，这种誤解归根于拉薩尔和馬克思之間的最深刻的分歧，也就是法哲学观点和經济学—唯物主义观点之間的分歧。拉薩尔在《巴师夏-舒尔采》中，严厉批評了巴师夏和資本利潤的其他詭辯家轉嫁給英国經济学的价值論的服务范疇。他又根据李嘉图的学說，完全恢复了价值論，李嘉图认为一切价值都分解为劳动量，而劳动量又分解为劳动時間。然后拉薩尔根据馬克思的見解

闡明，在個人不是創造使用價值而是創造交換價值，不是為自己的需要而是為其他所有人的需要勞動的社會里，不是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形成和衡量商品的價值，而是只有當它體現通過貨幣而獲得獨立存在的一般社會勞動時間的時候，才是這樣。可是拉薩爾以為，用這個關於作為衡量價值的單位的貨幣和社會勞動時間的敘述，已把馬克思關於價值量和價值實體的論述的“思想的神髓”提示出來，這個估計中的確包含着“嚴重的誤解”。他從馬克思所發展的价值論中只取出適合他的法哲學世界觀的東西：他指出構成價值的一般社會勞動時間使社會共同生產成為必要，以便保證工人得到他的勞動的全部收穫。可是對馬克思來說，他所發展的价值論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包含的一切謎，沿着這條線索可以追究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形成，這種形成是必然使資本主義社會變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世界歷史過程。拉薩爾忽略了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之間的差別，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再一次詳細說明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雙重性，他把它當做了解政治經濟學的鑰匙。拉薩爾在馬克思開辟的這條新道路上走了一段，然後又用他對價值論的道德-法律的敘述堵塞了這條道路，不言而喻，當馬克思企圖續成他的1859年的著作時，必須清除這個障礙。

今天有些多愁善感的人為馬克思對待拉薩爾的行為抱不平，這些人肯定不了解馬克思，更不了解拉薩爾。拉薩爾是一個非常誠實而嚴肅的科學信徒，他歡迎明白指出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即使這對他不利，也無不如此。也許他認為馬克思索回自己的精神財產，是使他从一種迫不得已狀況下解放出來。馬克思不想同他的 135  
“詳細敘述和實際應用”發生關係，他可能更加滿意。這種敘述和應用是拉薩爾用來裝備德國無產階級的武器，正如馬克思在另一

个地方所說，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以后，拉薩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績。<sup>①</sup>

## 五 拉薩尔和工人

在1863年和1864年之交的这个冬天，拉薩尔需要完成許多艰巨的工作，而他最大的負担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关怀。如果这个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就达到了主要目标，其他目标是否达到就是次要問題了。如果没有这样发展，按照拉薩尔的看法，他就丧失他投入几乎超人的精力的巨大押注。在他看来，他在开始进行鼓动时所抱的希望沒有实现。

事实上，联合会的发展規模是很可观的。1863年秋天仅有一千會員，差不多过了一年就增加了四倍。可是联合会仍未脱离拉薩尔所嫌恶的儿戏状态。加之这种发展又是这样艰难痛苦，以致拉薩尔在郁闷的时刻就变得“十分厌倦，很是厌倦”。事实上，事态的外貌同拉薩尔在紙上所描繪的完全两样。一夜之間从地底下涌出一支团结一致的工人队伍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拉薩尔的鼓动是由个人的功名欲引起的，是錯誤的，那么，說拉薩尔只从历史-科学上关怀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至少是夸大。現在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他对工人阶级具有深厚的同情，他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受和感情。可是他基本上生疏的，是工人阶级作为群众的内在生活，同贫困和灾难，同日常琐事的艰苦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工人阶级必然努力上升到它的现代阶级意識的可靠基础），以及同这种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徒然的襲

<sup>①</sup> 見馬克思于1868年10月13日致約·巴·施韦泽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頁。

击和痛苦的重蹈复轍。現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帕拉斯·雅典娜<sup>①</sup>那样从一个大胆的思想家的头脑里产生出来，拉薩爾对于“它的最初尝试的不彻底性、艰苦性和弱点”沒有正确的了解，至少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清楚的了解。 136

德国无产阶级开始觉醒，随若在它身上也就产生了必然鼓舞它的解放斗争的自觉的纪律和团结的精神。拉薩爾的火热的辩才善于在突击中夺取这种精神，可是在迅速地沸騰起泡沫之后，紧接着就是同样迅速地撇去浮泡。在屏息静气地谛听拉薩爾讲话的几千人之中，最多只有几百人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名簿上登记，而这几百人之中，几乎只有几十人履行他们入会后的义务。因此，拉薩爾感到十分失望，而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就其后果而言是有益的过程。現代工人阶级为了永远有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自己锻造自己的命运；現代工人阶级必然要经过，而不能跳过它最初的有力的奋起同组成能征善战的持久队伍之间的过渡阶段。

因此，拉薩爾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自己的鼓动的作用。他所散布的火星落在湿木头上，因为不能馬上成为熊熊烈火，他便认为这些火星已经熄灭，这是很不对的。他交给群众的东西，所起的作用决不止一小时、一天乃至一年。主要工作他已经完成了；他为一支强大的工人队伍创造了坚固的骨架。像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一支核心部队是不会被打倒的，在最凶恶的风暴中也没有被打倒。差不多同时，仅仅两三个月以后，当拉薩爾抱怨“深刻而痛苦的失望”和工人群众的冷淡和迟钝所引起的“内心的强烈愤怒”的时候，当他咒骂使他气得要死的 *métier de dupe*〔愚蠢的行业〕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不能发泄这种怒气，而必须在内心把它掐死，往往还必

① 希腊神话中司智慧、技艺、战争的女神，从最高的天神宙斯的头颅中诞生。——譯者

須坚持相反的主张的时候，阿尔伯特·朗格这样一个聪明而公正的观察家写道，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培养工人等級领导人物的非常有效的学校”，他补充說，真正同工人交往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个联合会的影  
137 响比它的會員名册大得多；在萊茵区的工人中，舒尔采的拥护者已經寥寥无几了。

当然在这里的工人中，联合会的會員也比其他地方都多。在1864年秋天的四千六百十名會員中，有一半以上在萊茵区，在这一半之中又有一半以上是在爱北斐特-巴門和以符佩尔塔耳为老家的、由于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場的繁荣而不断革新的紡織工业的农村前哨，尤其是在容斯多夫和韦默耳斯基尔兴。爱北斐特的全权代表胡果·希尔曼不倦地走遍整个地区，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在流亡伦敦期間，曾无缘无故地被人认为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其实决不是这样，可是个人在經濟情况不佳时，在选择补救手段方面决不是严格的，因此常常受人攻击。拉薩尔气愤地回答联合会司庫对希尔曼的怨言說，他同希尔曼就像拿破侖第一同达烏的关系一样，假如他有两个这样的人他就要枪毙他們之中的一个，可是，因为他只有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需要他。

除去爱北斐特-巴門以外，有五百會員的佐林根是萊茵区运动的中心。这里的卡尔·克林格斯和爱德华·維尔姆斯是拉薩尔的热心的拥护者。佐林根的工人教育协会完全合并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佐林根的消费合作社公开声称，成立一年半以来，它始終反对“簡直可笑的和夸大的观点”，即认为通过消费合作社可以改善工人階級的状况；它始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社員不受零售店的暴利和越来越普遍的粮食掺假的影响。佐林根的研磨工和剪刀工人，磨劍工和造劍工几十年来受到資本的沉重鞭笞，因而对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理解得容易而迅速。在雷姆夏特、哈根、伊塞隆，手

工業的觀念還給宣傳造成嚴重障礙，萊茵河左岸的克雷費爾特的情況也差不多。相反地，在工業人口很多的杜伊斯堡，運動的進展却很順利，杜塞爾多夫也是這樣，因為人們對拉薩爾在萊茵河畔的生活的回憶在那里起着作用；這兩個城市各有會員二百五十人左右。科倫的進展較慢，因為萊茵資產階級在那里的反抗最為強烈。1863年12月，莫澤斯·赫斯回巴黎去了，接替他擔任全權代表的人不能利用個人的才能彌補地區的不利。 138

萊茵區以下，聯合會的主要堡壘就是漢堡和它附近的哈爾堡。兩個城市共有會員約七百人。德國大商業的這個典型城市給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提供的有利條件同德國大工業的典型城市提供的差不多。漢堡工人教育協會還是1848年成立的，它在反動年代的灰燼中，保存了繼續發光的革命火星，此外，五十年代在漢堡成立了德國最大的兩個消費合作社。當民族聯盟這股潮流湧入教育協會時，在它之中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領袖是教育協會的總幹事于爾根·呂德爾斯，主要發言人是奧古斯特·佩爾，他原來的職業是律師的司書，後來有一個消費合作社任用他管帳。由於他是反對派，所以被開除出教育協會，于爾根·呂德爾斯被撤銷總幹事的職務，隨後他就開設了一個小旅館，佩爾和他的擁護者在这里見面。1862年11月，年輕的雅科布·奧多爾夫加入了他們這個集團，他是一個鉗工，在虎鉗旁邊和鐵工廠里度過了五年艱苦的學徒生活，後來又在德國、瑞士、巴黎、倫敦流浪了五年，有過很多經歷。他有着真正的無產階級的血液，他比佩爾接近群眾，雖然佩爾並不是一個沒有才能的人，後來甚至成了博士，當了律師，可是因此也就脫離了工人運動。聯合會駐哈爾堡的全權代表是泰奧多爾·約克，他是一個勇敢、頑強的無產者，當保證工人運動的獨立性成為必要時，他對於別人指責他倔強頑固是不

放在心上的。一个年輕的木器工人吉斯达夫·德克維茨把运动从汉堡帶到不来梅，可是市議會把他吓倒了，市議會把不来梅沒有結社法这个事实解释为在不来梅不允許成立政治社团。于是德克維茨就限于进行一种秘密的鼓动，只爭取了二三十个會員。

薩克森王国的會員人数同这个王国的工业地位不相称。它总共只有汉堡和哈尔堡那样多的會員。其中有一半是在萊比錫及其工业郊区孔納維茨、施忒特里茨和童貝克。在1863年秋天瓦尔特希移居柏林以前，他在格罗森哈因、格罗斯布克、諾伊格斯多夫、罗斯瓦因进行了鼓动，起初效果不小，可是很快就逐漸消失了。来自諾伊斯多夫的一份报告关于这件事是这样說的：“會員不敢公开拥护拉薩尔，因为害怕受到迫害。很久以来一个織工每天最多只掙到三个銀格罗申六分尼。瓦尔特希先生受到欢迎的原因就在于此。一般工人都认为，为了改善状况必須开始斗争。”沒有什么比一个工人的这几句朴实的話，对受資本主义剝削的家庭工业的可怕影响，描述得更为明确了。不足維持生活的低得可怕的工資使得被剝削的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在奴隶的恐怖和野蛮的报复心之間搖摆不定。

在薩克森王国不像在萊茵河畔那样破产的資本主义激进派，在比較发展的工人阶层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人們不能一下子就把密布在易北河左岸的薩克森地区的工人教育协会之网扯碎。在德累斯頓，联合会會員人数几乎不到一打，其中銅匠弗尔斯特林主要是由于热心而不是由于有才能而显得突出。在萊比錫，烏特克仍然忠于联合会，給會員做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报告。据报道，他沒有受到很大欢迎，原因是他的表达能力沒有达到他的学識所达到的高度。萊比錫的全权代表是达姆尔，他是一个有三百塔勒收入的青年学者，有一个人口迅速增多的家庭，受到个人爭取生存的斗

爭的严重压迫；因此鼓动工作主要落到弗里茨舍的强有力的手中，他是德累斯頓五月战士的老前卫之一。

在西里西亚織工区，事态的进展比薩克森織工区順利，不过在拉薩尔死后才是这样。拉薩尔在波希米亚的阿什<sup>①</sup>爭取到为数不多的會員，这件事使他感到許多沒有充分理由的愉快和吃了許多沒有真正成果的辛苦。拥护他的是大約一百个織袜工人和織布工人，他們是被机器抛到街头的勇敢而正直的人，他們把“餓死”看做是眼前的“这种世界喜剧的結局”。可是只是就他們的虔誠的意向來說，而不是就他們的革命意向來說，他們可能是（正如拉薩尔所說）“老胡斯教徒的后裔”。被拉薩尔任命为阿什的全权代表的織袜工人馬丁写道：“不論貴賤必須按照聖經行事，这正是拉薩尔主席先生和他的头脑清楚的拥护者的意图”。这种十分模糊的看法充分表明，阿什的會員不是运动的真正的树根，而是一个野生的幼苗，当然拉薩尔为了保护那里的會員不受官厅和工厂主压迫而做的种种努力，並沒有因此而每下愈况。

在南德，运动所占的地盘很小，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运动起源于普魯士，一方面南德的小資產階級还占很大优势。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海曼和泰奧多尔·繆勒虽然对联合会的事业表示同情，但是沒有接受联合会的任何职务。法兰克福的工人教育协会也繼續存在，因为繆勒要想首先开展对工人的教育工作，而拉薩尔由于考虑到繆勒对他有过不少貢獻，因此尊重他的这一願望。由于宗納曼在苏黎世工人大会上进行阴谋活动，拉薩尔想让人把他从协会中开除出去，可是由于两票之差，沒有成功。一开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法兰克福有六十七名會員，这个数字虽然增长很慢但

<sup>①</sup> 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位于赫布西北。——譯者

却不断增长。其中有一半是裁縫，此外是別的手工业工人，如制黃銅器工人弗里茨·埃爾納爾和紙夾工人韋爾凱爾，也有個別文人，如伯恩哈特·貝克爾和年輕的亨利希·奧貝文德爾。可是拉薩爾並沒有利用施韋澤來貫徹自己的意志，後來施韋澤經他介紹成了萊比錫的會員。在法蘭克福最初的全權代表，雪茄烟商人施特勞斯表現出不可靠以後，伯恩哈特·貝克爾接替了他的職位。美因茲的情況比法蘭克福壞得多，那裡的鐘表工人謝普勒很快又回到進步黨的懷抱中去了。美因茲的事態過程是現代工人運動初期常有的朝盛暮衰現象的一個特別確切的證明。拉薩爾的辯才似乎一下子就掌握了美因茲的工人，然後就發生了一個徹底的倒退，到拉薩爾逝世為止的一年半時間內才又有了十至十二個會員；可是當拉薩爾的遺體經過美因茲時，該城工人像對一個國王那樣，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

在小市民的典型地區萊茵普法爾茨、巴登、維爾騰堡，運動沒有能夠站穩腳跟。相反地，斯圖加特、埃斯林根、烏爾姆、海耳布朗、哥平根、羅伊特林根、格明德、康斯塔特等地的維爾騰堡工人教育協會，在1863年6月組成一個特殊的邦的聯合組織，一年之後在哥平根舉行了第一次全邦的大會。在這些協會的理事中，有工廠主、教授、教員、藥劑師以及其他知識分子，可是工人卻極少。巴伐利亞的情況有一點不同。巴伐利亞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邦，在工業立法方面非常落後，可是在奧格斯堡、慕尼黑和紐倫堡有幾個金屬工業和紡織工業的中心，有幾千個產業工人。尤其是奧格斯堡的大規模的紡紗廠、織布廠和棉布印花廠吸收了大批工人。奧格斯堡的工人受到的訓練並不壞，因為紡織巨頭在建廠初期為了培養本地工人，從亞爾薩斯和瑞士招來一批外國工人；而且在奧格斯堡也有許多工人參加過巴登—普法爾茨起義，還具有深刻的反

抗精神。可是巴伐利亞的資產階級為了把工人群眾投入政治生活，在這裡花的力氣也最多。巴伐利亞的資產階級開始感到自己的存在，並同教皇全權主義，即同用這種名義活動的容克階級和僧侶階級發生了關係。它尤其希望打破工商業立法和關稅立法的限制，因為這些限制給它參加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增加了困難。奧格斯堡的紡織業大王，今天是保護關稅論者，當時卻是積極的自由貿易主義者，他們答應被他們剝削的工人享受自由貿易的千年王國的一切天堂之樂。有時他們可以用這一點來欺騙無產階級，可是在最進步的工人中也不是沒有產生比較正確的見解。當一個在漢堡參加拉薩爾的運動的奧格斯堡工人，機器匠弗里德里希·迪爾回到他出生的城市的時候，爭取到幾十個會員。可是事情進展得不很順利，因為缺少演說人材，而且自由派報紙對拉薩爾的中傷在工人中還有很大影響。

總的說來，在拉薩爾逝世的時候，全德工人聯合會在德國散布 142  
到五十多個地方，其中有三分之一多一些，只是空有其名，在另一個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百多個會員。在國外，倫敦共產主義工人教育協會表示願意參加，可是拉薩爾對待它却很慎重，因為他認為倫敦的情況是最困難、最複雜的。很可能他想避免同馬克思發生可能的衝突。在瑞士，約翰·菲力浦·貝克爾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擁護拉薩爾，可是卻抱怨得不到成果，因為手工業工人還完全耽於舒爾采的幻想，每個人都把自己看做是一個賺錢的合作社的未來成員。

聯合會分布的地區範圍遠遠落後於拉薩爾的期望，而它的內部發展也是這樣，或者更為不妙。拉薩爾剛在這裡播完種，就想在這裡收穫。由於全權代表的報告不定期，會員繳納會費不按时，並且往往完全停交，由於年輕的聯合會的生活中頗不缺乏的“進步

党式的摩擦、瑣事、陰謀、爭論”，拉薩尔感到非常焦急。“联合会儿戏”逼得他咒罵了无数次。尽管他不知疲倦地用請求、提醒，在最严重的場合甚至用威胁推动全权代表，但是他沒有看到他所創立的組織發揮正常的功能。联合会的金庫一开始就有很大亏空，而且不断增加，由于拉薩尔的捐款、他的鼓动著作的稿費、几个富裕的會員的自願貸款、司庫的預支以及其他財政措施，亏空有所减少，但是沒有完全补足。甚至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汉堡的佩尔和萊比錫的达姆尔都不能按期結算帳目和提出报告，那么怎么能够期待那些只有很少會員的全权代表，作为普通的工人在每天的艰苦劳动以后，进行宣传活动，还要算帳或者写字呢？像他們这些人是不习惯同笔杆儿打交道的。

为了提高联合会的内在生活能力，拉薩尔采取了一些旨在扩大会員的独立性的措施。首先他指示在爱北斐特、巴門和容斯多夫各設一个由当地會員选举产生的特别的财务管理机构。它由两个司庫和两个检查員組成；此外还有两个監督員，他們的任务是到到期未交会費的會員那里去催交会費。可是只有全权代表有权处理当地的开支，其标准是，不經主席特別批准，开支不得超过每月收入的一半。过了一些时候，拉薩尔又为那三个地方以及杜塞尔多夫、佐林根和韦默耳斯基尔兴规定，当地的會員选举三个全权代表候选人，由主席最后决定由誰担任全权代表。一开始就規定这两項制度将在整个联合会中推行，这是对民主原則的让步。不过它們似乎沒有促成很大的改进，因为缺点主要在于，組織本身还很幼稚，而不在于它的弱点已經显露出来。

虽然有这許多幼稚病，但是联合会仍然表明，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會員对拉薩尔表示忠誠和贊同的許多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再緩和了他的焦躁心情，可以使他得到很大滿足，

自覺自願地承認他是自己的領袖的，是德國無產階級的精銳部隊。同時事實早就表明，聯合會並不是一個對大師唯命是從的宗派，而是一個很快就開始接受獨裁領導的發展迅速的黨。有人說，拉薩爾要求他在柏林的擁護者答應，在稟承天命的王室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支持王室，反對資產階級，結果遭到這些擁護者的強烈反對，這種說法是不足置信的。這個要求同拉薩爾的一切可信的言論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它（加之又是經過第三手流傳下來的）應該被流放到童話的國度里去。可是遺憾的是，在另一種情況下，拉薩爾卻醉心於對萊茵工人的革命意向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兩個叫莫爾的佐林根研磨工人和一個叫洛茨的愛北斐特的工人，在1864年春天被判四個月監禁，因為據說他們用刀子刺傷了兩三個拉薩爾在佐林根發表閱兵演說時搗亂的進步黨人。這時拉薩爾建議，被判刑者應該向國王呈遞一個有大批工人聲明支持的請願書，請求恩赦。可是這幾個勇敢頑強的人堅決拒絕了這個建議。他們認為，即使被判四年監禁，向國王乞求恩典，也是違背他們的意志的，他們的同志也贊成他們的意見。拉薩爾的建議遭到堅決反對，不過他至少老實承認，能夠領導這樣一些人，使他感到自豪。當然他還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意見，因而提出不遞請求赦免書而遞交一份伸訴書的第二個建議。 144

同佐林根工人的這一抗議相比，瓦爾特希反對拉薩爾就很沒有理由了。1864年2月1日，瓦爾特希辭去了聯合會書記的職務，因為他同拉薩爾合不來；同拉薩爾非常親密的佐林根的愛德華·維爾姆斯接替了他的職位。瓦爾特希移居德累斯頓，擔任那里的全權代表。這時他就致力於聯合會的地方分權，同資產階級的比較堅定的派別發生比較緊密的聯繫，同時竭力批評聯合會名存實亡，主席的非常危險的欺騙，以及發表其他包含明顯對拉薩爾進行

人身攻击的意见。无论如何，瓦尔特希的这些做法是錯誤的；他自己曾經体验过，工人投靠进步党会得到什么結果。如果說联合会的中央集权不能实现的原因是，工人们还不适应一个政党組織，那么地方分权就是干脆給整个运动判处死刑。拉薩尔有理由不把这看做是結束的开始，而是看做結束本身，如果联合会真正必須解散的話，这就是解散联合会的一个巧妙的借口。假如瓦尔特希不相信得到成果，那么根据他过去的情况，他就應該脱离联合会而不是破坏联合会，拉薩尔对于瓦尔特希的反对越来越感到难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45 尽管如此，这种敌对也含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很久以来就有人对于拉薩尔給工人运动确定的組織提出許多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严重夸大的责难；比如拉薩尔在他的命令中，开始把地方組織簡称为支部<sup>①</sup>，这种把一个冗长的名称按原意加以簡化，被說成是宗教的宗派精神，其实这种簡化不过是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对它的地方組織使用过的一个名称。不过在拉薩尔的組織中有形成宗派的危險，这是无须爭辯的，因此在联合会内部很早就发生的对拉薩尔的反抗，是内部力量的一个标志，不管它起初像佐林根工人那样采取了正当的形式，或是像瓦尔特希那样，采取了不正当的形式。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存在期間，这种对立从沒有完全消除，只有当它所反对的危險，即同一切个人独裁結合在一起的危險消失时它才会消失。

拉薩尔在无产階級階級斗争中把权力和自由統一起来，把这看做是未来社会形式的典范，这是有很大意义的。毫无疑问，只要关键在于喚醒无产階級的强烈的階級意識，消除由进步党帶到无

<sup>①</sup> 德文是 Gemeinde，原意是地方团体，也有教区、教会等意。——譯者

产階級队伍中来的群龙无首的散漫現象，个人独裁也是有益和有用的。然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个人独裁就由动力变成障碍，非被取消不可了。一个意識到自己的革命意志的、历史上上升的階級，把权力和自由在本身統一起来，无须把自己的意志像一把錘子似的交到一个人手里。拉薩爾所执行的个人独裁的真正权利，在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說，像約克、瓦尔特希和佐林根研磨工这些进步的工人很早就發揮自己的意志，反对拉薩爾的独裁領導，这就证明了运动的独立的推动力量。

在个人独裁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以前，还要經過好几年，它的瓦解过程不止一次地导致激烈的震动。可是这里只反映了无产階級革命的那个不显眼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敌人得到廉价胜利的值得欢迎的机会，直到事实表明，它是革命的不可遏止的胜利的一个条件为止。

### 第三章

## 拉薩尔死前

146 1864年5月8日，拉薩尔开始夏季旅行，这次出門以后，他就沒有能够回来。这次他不需要发表一个道歉声明，来抖落鞋上的柏林尘土了。冬天的空前劳累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在2月就給联合会的全权代表們写信說：“我疲乏得要死，虽然我的組織是强大的，可是它已經处在摇摇欲墜的状态，我非常激动，以致夜間不能入眠，在床上輾轉反側，一直到五点钟为止，起床时感到头疼，渾身无力，我工作过度，过分紧张，过分疲劳，其程度是惊人的”，在同一时期写給洛貝尔图斯的信中說了类似的話：“我由于工作过分紧张，神經受到过分刺激，以致我的神經就像繞在身上的绳索一样松垂下来。”拉薩尔的寿命屈指可数了；根据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診斷，前一年在他发表鼓动演說时使他受到很大痛苦的喉病，只允許他在世上活很短時間了。

可是只要地平綫上还閃耀着希望的火花，他就不願退却。他仍然指望，迫使政府实行普选权，这个想法日益成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內的思想和言論的推动力。因为他追逐鬼火，所以他离开正路越来越远，虽然从沒有远到不能随时回来的程度。这个时期发表的言論帶有极为严重的身心交瘁的痕迹，可是拉薩尔本人从沒有消失在这些痕迹之中，他絲毫也沒有不忠于自己的事业。

他的原則始終如一，尽管他的策略往往发生特殊的变化。

拉薩尔利用5月这个時間重新檢閱了他的队伍。这次閱兵从萊比錫开始，然后主要又扩展到萊茵地区，1864年5月22日在容<sup>147</sup>斯多夫举行的联合会成立紀念大会是这次閱兵的頂峰。拉薩尔在这个大会上发表的演說，通常就叫容斯多夫演說，他于5月9日在萊比錫，14日在佐林根，15日在巴門，18日在韦默耳斯基尔兴已經发表过这个演說（不过內容大多比較簡要），到处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呼，他陶醉在也許可以补偿他的无限痛苦的胜利之中。他那干渴的心贪婪地吸收充分的胜利阳光，而永远的黑夜很快就要降临。在萊茵区群众的难以形容的欢呼声中，他自以为是一个滿意地、安靜地站在他的人生旅程的終点的浮士德<sup>①</sup>。他始終有这样一個印象：在創立新的宗教时一定是这种情况。今天誰能同一个垂死的人的这几句話进行爭辯呢？

一般认为容斯多夫演說，是拉薩尔发表过的所有鼓动演說中最差的一个。它的弱点有一部分可能在于，它不是一气呵成的。本来它應該是“对內的評論”，正如前一年的閱兵演說是“对外的評論”那样。它應該鼓舞會員的正当的热情和精神，接着簡單扼要地叙述一下政治形势。由于在拉薩尔出发旅行前不久，国王接見了西里西亞織工代表，这个插曲似乎給拉薩尔的策略轉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击門，拉薩尔对演說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这个演說原来的題目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和普魯士国王的諾言，这就說明它已經成为“对外的評論”了。拉薩尔撇开工人，对“柏林的几个人”說話，去年他就曾經企图用他的閱兵演說来影响他們。

可是他的策略的王牌越大，它的根本錯誤也就暴露得越明显。

<sup>①</sup> 浮士德是中世紀德国的一个占星家、江湖医生，歌德詩剧《浮士德》的主人公，他追求真理，努力求知，认为“活动是生活的基础”。——譯者

一方面，拉薩尔想把国王牢牢釘在他用来欺騙織工的空洞諾言上；“我們想看一看，王室是否遵守这个諾言，它答应劳动階級的話是否兌現。”拉薩尔使国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則的宣誓証人，他說，答应依法处理工人問題，也就是答应实行普选权；由等級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議机构决不会同意撥款帮助工人脫离苦难。如果人們附帶考虑到，拉薩尔用一种很不礼貌的姿态，对待官方新聞机关交給織工代表的国王答复的印本，那么某些落后工人也許对拉薩尔对王室的嘲弄发生誤解，可是工人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他們應該采取什么态度。另一方面通常誰也沒有比被嘲弄的对象更快地了解这种嘲弄行为，拉薩尔怎么能希望，容斯多夫演說（他命令联合会書記把这个演說慎重地交給俾斯麦）会使一个放出所有的狗的权术家上当呢！

拉薩尔在这个演說中对于他的鼓动成果的敘述，主要以柏林的几个人为对象而不是以萊茵工人为对象。这些敘述犯了严重夸大的毛病。他的宣传活动的效果的确很大，可是起初还摸不着，看不見，因此拉薩尔在这种宣传活动的摸得着、看得見的成果根本不存在，或者以远非如他所說的那种程度存在的地方，寻找这种成果。他画了一幅諷刺画，严重地伤害了自己；这种有时几乎是荒誕无稽的奇譚同他实际給过的伟大的历史推动相比，是多么低下啊！他理应从那时起就受到責难的一件事，是他慫恿美因茲的主教来对付进步党的自由貿易派，这个“教会諸侯”，“在萊茵河畔几乎被視為圣人”，“多年以来，他就从事学术研究”，現在他“在內心里”感到有必要，在工人問題上发表意見。如果說克特勒尔主教在一本无关紧要的小册子中，为了激怒自由派資产階級而承认工资铁律，同时为了鎮压无产階級的解放斗争而硬說财产是神賜予的，那么他是在进行一种僧侶的煽惑，这种煽惑可以使舒尔采-德里奇这样

的人“几乎以圣人”的面貌出現。恰恰是在萊茵区的工人面前（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受着教皇全权主义的精神束縛），拉薩尔本来可以做得好一些，那就是剥下这只狼的羊皮，而不是把他奉为大有問題的权威来反对资本主义。

直到容斯多夫演說的末尾，拉薩尔才又把他的辯才提高到旧日的高度。他把自己所受到的迫害叫做胜利的最后标志。他用夸耀的口吻回顾他用利劍战胜了的审判，但是他以对无产阶级階級斗争有深刻了解的人士的身分补充說，单个的人不管如何有力量，在一定的憤恨面前就要失敗。当他說出他的复仇的願望的时候，死神的翅膀在他头上发出响声，他的听众通过热情的欢呼，向他表示这个强大的民族文化运动不会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死亡，只要他們之中有一个人还在呼吸，他燃起的烈火就会繼續不断地蔓延开去。

从5月底到6月底，拉薩尔住在埃姆斯治疗喉病。在这里，他写了一篇文章反駁瓦盖納为《十字报》写的一篇对《巴师夏-舒尔采》的評論。在坚定的封建党人中，瓦盖納最热心于用普选权誘人；他利用怯懦的资产阶级来夸耀自己，說资产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錢袋而把政治财富和自由扔进暗室。可是瓦盖納本人要想挽救的，是“基督教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政治财富和自由”，他想加在普选权身上的等級畸形不是什么別的东西，只不过是富豪的三級选举制的封建版，三級选举制的实行也被加以粉飾，据說它維持了“普选权”的寿命。

瓦盖納十分仇恨资本主义，对它有詳細的了解。他知道恢复封建-行会社会組織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同老浪漫主义者格尔拉赫发生了明显的对立，格尔拉赫曾經把封建社会主义的秘密告訴瓦盖納，現在由于事态急迫，他宁願用舒尔采-德里奇而不用拉薩尔

来装門面。瓦盖納也不像俾斯麦那样，认为拉薩尔有“君主主义意向”；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具体的普魯士国家同拉薩尔的抽象的国家理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面对着像《巴师夏-舒尔采》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条有理的闡述，瓦盖納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他对这部著作的評論充滿了关于基督教国家的基础，关于保持中等阶层是資本和劳动的唯一正确的結合，关于其他类似口号的陈詞烂調。瓦盖納甚至不顾羞耻地从最流行的自由貿易主义那里进行剽窃，他說，总收入的增加至少同总收入的其他方式的分配同样重要，他的王牌——工人也不尽是有道德的人，資本家也不尽是罪人——能在《十字报》上夸耀，也能在《人民报》上夸耀。

拉薩尔在柏林同瓦盖納有私人来往，据瓦盖納在他的回忆录里笑嘻嘻地說，拉薩尔曾經恭維瓦盖納，說普魯士的三个最聪明的人就是——按照这个順序——拉薩尔、俾斯麦和瓦盖納。如果拉薩尔真正說过这句笑話，那么他对瓦盖納的精神才能一定沒有作过高的估价，瓦盖納对他的《巴师夏-舒尔采》的評論，肯定不能使他对这个封建派的先鋒战士有較高的評价。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定詳細予以答复；反駁的内容表明，他想对实行普选权一事給予新的推动。他毫不費劲地駁斥了瓦盖納的不像样子的誤解；他說，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用革命方法实现，完全决定于現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代表者；他激烈反对生产合作社的一切小規模試驗，他給普选权找根据說，广大群众是最有組織能力的，他們的健全头脑是最聪明的。这肯定是很正确的，只是这番話必然使他想争取的那些人大吃一惊。因为不管俾斯麦和瓦盖納怎样“聪明”，他們作为統治階級的狡猾的代表就像害怕瘟疫那样害怕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組織。

为了在上訴法庭上，为前一年的閱兵演說而受的控告进行辯

护，拉薩尔于6月底到了杜塞尔多夫。他的辯护发言中所談的政治問題，乃是容斯多夫演說的余韵。后来拉薩尔在法兰克福和普法尔茨住了两三个星期，主要是为一个定期出版的联合会报纸做准备工作。时常有人提出这个問題，即拉薩尔为什么不早一些着手来弥补他的装备上的这个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因为《北极星报》越办越坏，这个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到那时为止，他为了完成更紧迫的任务，必須拿出三个人的力量。从冬天起，他就計劃創辦联合会机关报；1864年夏天作出最后决定，并进行准备工作。报纸的編輯将由施韦泽和約翰·巴普提斯特·馮·霍弗斯特騰担任，后者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前任少尉，有一些财产，为人溫和、亲切，但没有什么才能，而且有点喜欢幻想，他完全受着施韦泽的精神影响。新报纸的出版地点规定是柏林。

7月中旬，拉薩尔为了进行乳清疗法，到了里吉-卡尔特巴德<sup>①</sup>，起先他仍然忙于联合会的事务。由于他迫切希望对“事件施加压力”，当时他計劃秋天让汉堡工人做出一个決議，要求俾斯麦违背奥地利的意願，并吞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这时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战争已經結束。在伦敦會議垮台以后，普魯士军队于6月29日占領了阿耳斯島，7月10日整个日德兰半島已被奥普军队占領，7月20日，丹麦政府表示願意进行和平談判。拉薩尔表现出是一个很好的預言家，因为他預見到，奥地利和普魯士将会为了爭夺共同的鹵获物而厮杀起来，在这一方面，他看清了一场外交糾紛，在这一糾紛的过程中，俾斯麦必然会打出普选权这张王牌。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說明，他想建議汉堡工人做出的決議是正确的。相反地，如果这样做，那么这个決議将是拉薩尔由于轉变策略而采取的一切錯誤步驟中最錯誤的一个步驟；它决不是“对事件

<sup>①</sup> 瑞士中部的风景区。——譯者

施加压力”，而只是为了普魯士侵略政策的利益，暴露工人运动的弱点。不过，这个決議是否像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和其他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在拉薩尔是一件已經決定的事情，还是大有問題的。正如他在他的信中談到这个決議的情况表明，这一天他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的、很伟大的、也許事实上很重要的手段”，寄予过高的希望，第二天就又說他本人对这件事不抱很大希望，看来这个決議多半是在密信或密談中发泄出来的、神經受到过分刺激的情緒的流露，而不因此就架起了由思想到行动的桥梁。

152 拉薩尔在里吉-卡尔特巴德主要是忙于同瓦尔特希的爭論，而不是忙于这个还完全不着边际的計劃。他們之間的不和在准备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問題上爆发出来，根据会章，这个大会应在1864年年底以前召开。会章对代表大会的組成作了如下的規定，在举行大会的地方，所有出席大会的會員都投票，其他地方則选举代表投票，这些代表所投票数同他們所代表的地方的會員总数相等。会章中对于代表的旅費沒有作出規定。因此，拉薩尔同达姆尔（拉薩尔在离开德国期間又任命他为副主席）取得一致意見，企图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完全切合实际的，而且也不违反会章。他們建議，那些不能或不願为特派代表募集旅費的支部，可以让住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的或其附近的會員做它們的代表。当然普遍实行这个建議必然大大大降低代表大会的意义，可是在許多支部經濟困难，人数很少的情况下，沒有其他办法举行代表大会并滿足会章的相应規定。无论如何，这个建議并不限制會員的权利，因为每个支部只要能够和願意給代表募集旅費，它就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

这时，瓦尔特希以联合会理事的身份反对拉薩尔和达姆尔的建議。他断言，这样一来，各支部在选举代表方面受到了限制。只

有代表的旅費由联合会金庫或由向联合会會員征收的特別費来支付,瓦尔特希才承认代表大会是“照章召开”的。可是撇开联合会金庫已經有了很大亏空,以及會員在繳納正常的会費已經不按时的情況下,特別費将成为鏡花水月这一点不談,連会章也不能給瓦尔特希帮忙,会章上並沒有規定,代表大会代表的旅費由联合会支付。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瓦尔特希的提議都是不正确的,而拉薩尔和达姆尔的建議是正确的。而且,瓦尔特希声述他提出这个意見的理由时,帶有虽不是憎恨,但却含有敌意的語調,这种語調本身完全能够激怒拉薩尔,当事实表明,瓦尔特希的行动又是他的地方分权活动中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就更能激怒拉薩尔了。 153

虽然如此,只有拉薩尔的身体有病和精神受到刺激的状况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7月27日写給全体理事的长篇通知书中,提出了他同瓦尔特希之間的重大問題,他用几乎并不委婉的言詞威胁說,如果理事会不把瓦尔特希开除出联合会,他就辞去主席职务。下述几种伴随現象使得这种很不民主的行为变得更不漂亮:至今等于沒有发生过任何作用的理事会第一次就要以差役的面貌出現,同时拉薩尔还使伯恩哈特·貝克尔和施韦泽当上了理事(他知道他們会同意他的見解),最后他命令联合会書記,把通知书立即发給瓦尔特希以外的其他理事,而当維尔姆斯先到德累斯頓,好好教訓了弗尔斯特林,能在德累斯頓和薩克森所有支部防止瓦尔特希的“阴謀”的时候,再把通知书寄給瓦尔特希。不幸的是,拉薩尔为联合会进行的活动,却以这种刺耳的噪音結束。

前一天,海伦·馮·德尼格斯到了里吉-卡尔特巴德,引起拉薩尔在8月31日去世的一場戏迅速展开了。事件过程本身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沒有直接联系,而且也常常有人談到,因而沒有再叙述一遍的必要。只有在对那个女子的感伤的同情发生作用,而有

損拉薩尔的情况下，简单地說明一下事件的过程才是必要的。

德尼格斯小姐自动地来到里吉-卡尔斯巴德，伪善者可能指責說，拉薩尔有病，长期以来被山上的恶劣气候所束縛，为工作和忧虑而精疲力竭，却不避开这种远道的迎合。这个妇女喜怒无常地粉碎了拉薩尔經過思考的巧妙的追求計劃，她在日内瓦的一家旅館里使他面临抉择，要末像一个傻小子那样在夜間把她拐走，要末像154 一个可敬的庸人那样，把她帶到她的父母家里去。拉薩尔后来十分懊悔，他没有选择逃走，却选择了“高雅的和資產階級礼貌的喜劇”，可是这并没有否定，拉薩尔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首先符合他的人品和地位的事情。有人說他这样做，大大损伤了一个毫无顾忌地献身的妇女的心，只有德尼格斯小姐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让人看到哪怕一点点被伤害的妇女的心，那么这种說法才是可以討論的。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根据呂斯托夫和罕勒律师的一致证言，拉薩尔的所謂牺牲者在这个剧的最重要的一場中所采取的态度证明了拉薩尔的一句話的主观上的正确性，拉薩尔为了迫使这个妇女的父亲以及她的先已解除婚約、这时又恢复婚約的未婚夫进行决斗，而用这句話来证明这个妇女的资格。

肯定，拉薩尔为了实行他的意願，为了避免对可笑的失败詛咒，而严重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像憎恨死亡那样憎恨任何严重的失败，对他來說，失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他在巴伐利亚外交大臣那里并让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在美因茲主教那里采取的措施，拉薩尔甘願接受的决斗(虽然他原則上是反对决斗的)，他在这些动蕩的日子里发表的談話和文章，是不能为自己辯解的。尽管人們举出种种辯护理由，仍然給人留下一个不快的印象，这些理由是：拉薩尔有责任保护一个为他而受到虐待的妇女，只要他认为，她願意受到保护，德尼格斯一家的高傲态度有意識地伤害了他正

当的自尊心，他当时的每一封信都十分真实地談到的他的身心力量的毫无希望的瓦解。拉薩尔本可以死得更光彩一些，可是，如果由于死者生活内容丰富，可以推論他在去世时思想安静的話，那么他也可能把这种死亡当做解救者加以欢迎。

他不是为了生命而喜爱生命；他嫌恶迟鈍的老年，他在四十岁上就已经看到老之将至，他开始进入老境。他的最近的将来在他面前是不肯定的，不明确的。有些人說，他总有一天会像他的朋友布赫尔那样为俾斯麦效劳，这些人說这話，就像瞎子在談顏色。只要拉薩尔为将来制定了一定的計劃，就会在他在最后几个星期同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談話中表露出来。根据这个老自由战士的报道，拉薩尔說过，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必須停止活动。他认为一年之内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出現，但是他看到，这件工作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的精力不够，尤其是他不能熬过即将执行的徒刑。这些話带有真实的印記。由于貝克尔的建議，拉薩尔打算在日内瓦住两年，取得那里的公民权，假如他能活得长一些，这个計劃多半会得到实现。如果这样，他就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鳥儿，也許他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宁可快死而不长期受疾病折磨。

近来有人說，拉薩尔通过致命的决斗，进行“間接的自杀”，因为他害怕秋天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举行會議，这个會議使他面临抉择：要末停止和撤退，要末同老朋友进行殊死的斗争，这种傳說也是沒有根据的。我們在現有的一切文件中，找不到关于这次會議的任何迹象<sup>①</sup>；相反地，拉薩尔6月29日給維尔姆斯的一封信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当时完全不了解馬克思对他的鼓动有什么看法。把这种傳說的一切心理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不可能性列举出来，是沒有必要的。可是，如果人們要确定一个既侮辱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侮辱拉薩尔的前提——这样一个秘密法庭已經确定开庭——，

<sup>①</sup>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卡尔·馬克思》(1896年紐伦堡版)第112頁上，談到1864年秋天拉薩尔計劃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会晤。——原編者

那末拉薩尔沒有任何理由用“間接自杀”的办法逃避这次审判。他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直截了当地为他的鼓动辯护。他启发了德国工人的階級觉悟，給他們开辟了通往巨大的斗争和胜利的道路，这些德国工人可以为他作证。半年以后，当拉薩尔和他的老朋友之間的意見分歧公开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們，首先是萊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其中也有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也紛紛表示拥护他們已故領袖的主张。

我們把随意揉捏他們的拉薩尔的工作交給资产階級的奇譚制造家吧，他們一会儿把他說成是一个虔誠的德国奴仆，必恭必敬地跪在霍亨索伦王座前面，一会儿把他說成是一个凶暴的怪物，人們利用他把幼稚的爱国者吓得躲到床下；历史上的拉薩尔往往引起对历史真实性的粗暴歪曲，但是他的青銅立像并不因此而被吹倒。他是一个有病的垂死的人，虽然如此，他在瑞士死得还是过早。瓦拉几亚<sup>①</sup>的貴族地主的枪弹似乎毫无意义地夺去了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但是它只是杀害了思想家和战士拉薩尔身上的必死的东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从拉薩尔已有的成就来看，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熾热的灵魂已經停止呼吸，剩下的只是过分具有人性的激情。他的忠誠的拥护者认为，他是为工人的事业而牺牲的，即使在这个完全錯誤的看法中也包含着确切的意義。馬克思在写給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慰問信中也說：“他死得年輕——在胜利中——好像阿喀琉斯<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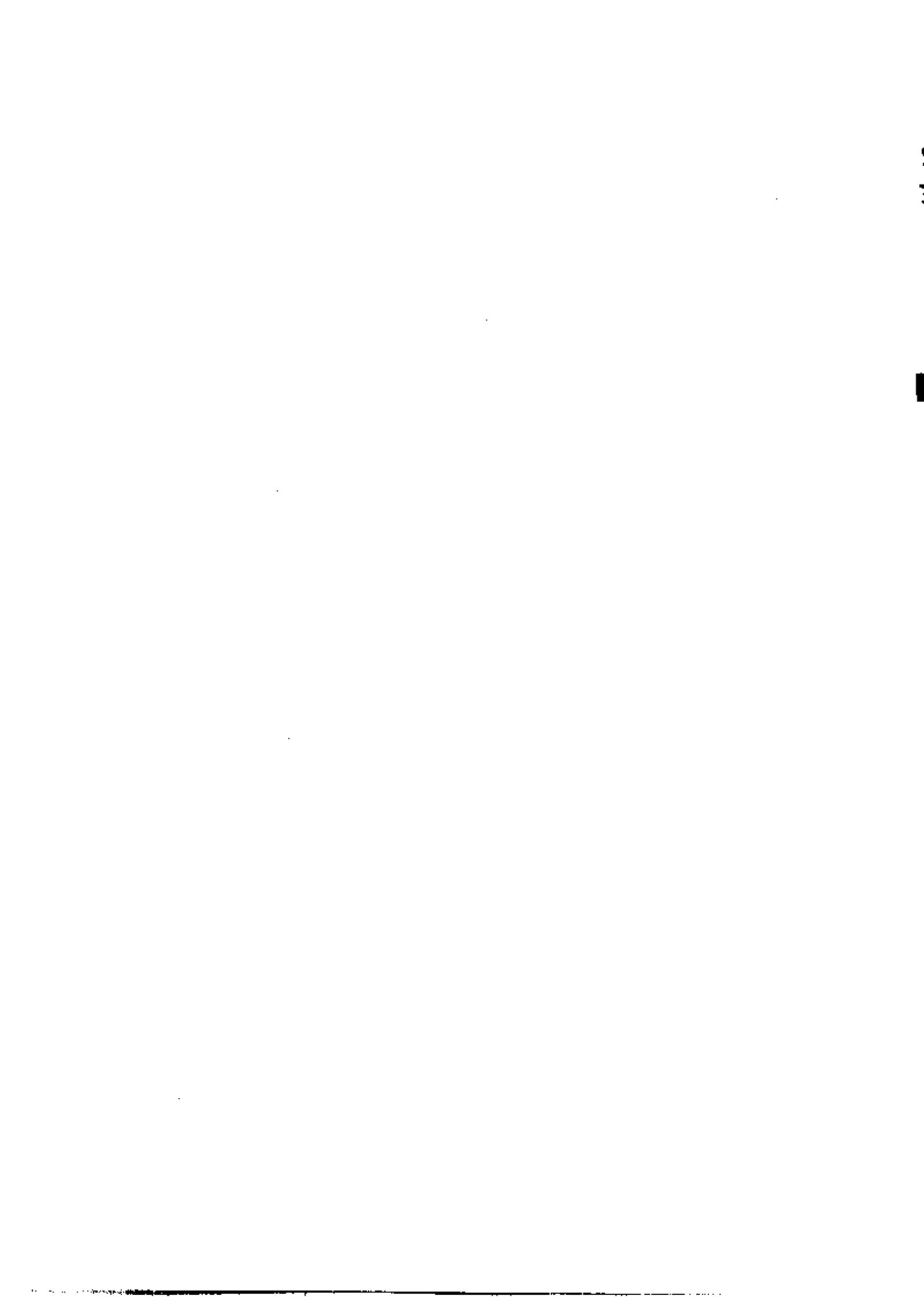
德国工人階級始終机警地拒絕在拉薩尔墓旁扮演判官的角色；它对他保持着深刻的、不可破坏的忠誠，这种忠誠是拉薩尔的光荣，也是德国工人階級的光荣。

① 羅馬尼亚南部地区名，同拉薩尔决斗的拉科維察(海伦·馮·德尼格斯的未婚夫)是該地的貴族地主。——譯者

② 希腊神話中的英雄，其母預言其寿命短促而光荣，否則冗长而无聊，他选择了前者，后来战死于特洛伊之役。——譯者

## 第四部

# 黨派的爭論



## 第一章

# 国际工人协会

159

在德国唤起新的工人运动的那些原因，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作用。哪里有欧洲无产阶级，那里的无产阶级就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组织起来，首先在本国的土地上为自己的解放进行斗争。在最先进的国家中，这个斗争的国际性质也已经显露出来。

1848年大陆革命的失败，导致英国宪章运动的完全瓦解。加之，法定的十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阶级在精神、道德和身体方面起到恢复作用，工人阶级必然感到这种恢复作用是一种新生，在五十年代的热狂的工业活动中，英国工会〔Trade Union〕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1857年的商业危机的到来，发生了许多事件，使英国工人了解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没有给他们准备一块可以长期居住的地方。尤其是美国内战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关于这个战争，马克思说，它给欧洲工人阶级敲了警钟，正如十八世纪的美利坚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过警钟那样。棉花危机把英国纺织工业的工人推入最可怕的贫困之中，虽然如此，英国无产阶级表现出比统治阶级胜过一筹，英国统治阶级对美国奴隶主的同情遭到英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抵抗而宣告破产。由于资本家在每次争论中，一再威胁说，要从大陆输入廉价劳动力以削弱工会的力量，因

此安于小成不求进取的任何尝试，很快就使工会嫌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贵族进行危险的自我欺骗，开始把自己局限在提高劳动  
160 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上，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走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领域。

在法国，意大利战争只给波拿巴政变创造了最后的喘息时机。十二月英雄<sup>①</sup>曾经推动的事件，现在又同他的意愿背道而驰。他必须充当意大利民主派的工具，法国民主派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反对他。波拿巴更加企图掌握工人运动。对他有利的机会是可能有的。法国无产阶级由于有许多宗派而处于分裂状态。除去秘密社团和空想主义派别的残余以外，主要有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前者把街垒战斗，后者把小资产阶级游戏看作自己的救世之道。六十个巴黎工人要想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遭到蒲鲁东的严厉谴责（因为工人在政治上同激进派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同时又受到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无礼的嘲笑（因为工人要想独立）。总的说来，法国工人受法国资产阶级愚弄的情况同德国工人受德国资产阶级愚弄的情况相同。这是往波拿巴的磨盘里注水，他让水磨的轮子欢乐地歌唱，他比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伶俐，可是同样遭到失败。他的头一着棋就没有得手。他允许法国工人选举代表，由官方资助派去参加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这一举动并没有使他的阴谋得逞，却促成了别的事情。

法国工人当然选举了自己的头脑最清楚的代表，他们在伦敦很快就同英国工人领袖建立了友谊。1862年8月5日，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国际团结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交换意见，使得海峡两边的无产者产生了经常保持联系的愿望。起先这种联系是这样不受

<sup>①</sup> 指路易·波拿巴，他在1851年12月1日夜間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译者

約束地建立起来的，那就是有几个法国代表留在伦敦，在那里找到工作。已經接上的綫，由于 1863 年的波兰起义而連接得更加紧密了。西欧文明民族对波兰的古老传统友誼在西欧无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波拿巴是否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样，为了推行他所 161 謂的深得民心的专制主义，又促成英法两国工人在波兰問題上的团结一致，这个問題可以攔在一边；不管怎么样，有几个法国工人在 1863 年 7 月 22 日出席了伦敦的波兰大会，不是由波拿巴花钱而是由法国工厂花钱到英国来的。他們要想同英国工人一起为波兰起义而工作，同时成立一个国际工人联盟的思想又自动地显露出来。鞋匠奥哲尔和其他英国工会領袖参加的一个委员会向巴黎工人发出一份呼吁书，首先对他們对波兰問題的支持表示感謝，然后就說，各族人民的团结对于劳动的事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每当英国工人要想通过縮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資来改善他們的社会地位的时候，资本家就用招入法国、比利时、德国或其他外国工人相威胁，这样一种骯髒竞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各国劳动阶级之間缺少一种有組織的联系。

这个由比斯利教授譯成法文的信件在巴黎的工厂中引起騷动。为这个信件中所包含的思想进行的热烈的鼓动工作开始了，由于在巴黎工人中重新进行募捐，使得巴黎工人对伦敦呼吁书的答复由一个代表团递交一事成为可能。为了欢迎这个代表团，英国委员会邀請各国工人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圣馬丁堂举行大会，并由比斯利教授担任主席。托伦宣讀了法国工人对英国工人呼吁书的复信，复信由波兰起义談起：“波兰又被浸沒在它的儿女們的血泊之中，我們仍然是无力的旁观者”，于是进而要求，必須傾听人民对一切重大社会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意見。资本的专制力量必須粉碎。由于分工，人成了机械的工具，沒有工人的团结，自由

貿易必然促成一种工业上的奴隶制度，它比大革命时代所摧毁的奴隶制度还要残酷和不幸。各国工人必须团结起来，给一种灾难性的制度树立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个制度把人区分为脑满肠肥的显贵集团和吃不饱饭的无知群众。

162 经过热烈讨论以后，大会选出了一个由各国工人组成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这个章程将于1865年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最后决定，在这以前暂时生效。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英国工人。不过在委员会10月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有各种国籍的工人参加了委员会。这时委员会约有五十名委员。其中英国工人仍占一半左右，并且担任了主席、司库和秘书等职务。其次，以德国的委员最多，共十名，他们大多（像马克思、埃卡留斯、斐迪南·沃尔弗、列斯纳、罗赫纳、普芬德等）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国有九名委员，意大利六名，波兰二名，瑞士也是二名。被任命为通讯书记的有：马克思（德国），勒·吕贝（法国），马志尼的私人秘书沃尔弗（意大利），霍尔托尔普（波兰），荣克（瑞士）。委员会在工联委员会办公处开会，它的经费一开始只有三英磅（六十马克），这是在第一次会议中募集的。

起先，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清准备建立的同盟的性质和目的。一开始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设想对各国现存的工人组织进行破坏性的干涉，也不能在这些组织之外，建立一个足以阻碍这些组织在本国发展的新组织。普选权问题、共和国问题以及类似问题，不管它们多么重要，都必须留给各国工人组织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德国工人、英国工人、法国工人和意大利工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重要的问题是树立一面旗帜，如果各国战斗的工人大军不愿误入歧途，如果他们想达到现代无产阶级的共同的胜利大道，他们就不可无视这面旗帜。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国际行动

的基础，創造德国的拉薩尔派、法国的蒲魯东主义者和英国的工会会员可以在其中一致合作的环境，以便清除国际范围内的工人解放所遭到的障碍。委员会弄清了些問題以后，就选出了一个附属委员会起草綱領和章程。

163

在11月1日的另一次會議上，附属委员会提出了它的建議。主要問題是在两个草案中进行抉择，一个是馬志尼本人制定由沃尔弗提出的，另一个是由馬克思提出的。当时馬志尼在英国工人中很有名望，可是他对現代工人运动沒有深刻了解。因为他不了解現代工人运动的真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他憎恨它。他的綱領最多只是采用了几个社会主义的詞藻，而六十年代初期的无产阶级早就把这些詞藻抛在身后了。他的章程也是由过去的精神中产生的，是根据政治密謀团体的严格集中的方式写成的，它特別违反工会的存在条件，一般地违反一个国际工人联盟的存在条件，这个联盟的任务不是創造新的运动，而只是把各国已經存在，但很分散的无产阶级运动联合起来。馬志尼所不理解的，馬克思了解得很清楚。他起草的成立宣言和章程被一致通过，它們永远是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本身为这个新联盟定的名字）的行动准则。

比斯利教授后来談到成立宣言时說，它很可能是关于工人反对中等阶级的事业的最有力、最确切的、被压缩成十来小頁的論述。成立宣言开始就肯定一个重大的事实，即工人阶级的贫困程度从1848年至1864年間沒有減輕，虽然这个时期按工业发展和貿易增长程度來說却是史无前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成立宣言拿两种材料作了对比，一个是蓝皮书对于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可怕統計，另一个是財政大臣格萊斯頓在他的預算报告中为了說明在这个时期中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地增长（不过完全局限于

有产階級),而提出的数字。宣言揭露英国状况中存在这个尖锐矛盾,是因为英国在工业和貿易方面占欧洲第一位,可是宣言补充  
164 說,大陆上所有大工业发达的国家都存在这个矛盾,不过地方条件有些不同和規模較小罢了。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实力和财富的令人陶醉的增长,都局限于有产階級,虽然像在英国那样,少数工人的工資有所提高可以算做例外,但是由于物价普遍上涨,增长的工資又被抵銷了。“工人階級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們头上的階級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論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場,自由貿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貧困;在現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現在对于每一个沒有偏見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別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經濟进步时代,在不列顛帝国的首都,餓死几乎已經成为一种常規。这个时代在世界編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頻繁地重复发生,規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帶有致命性。”<sup>①</sup>

宣言談了談五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失敗,认为这一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特征。宣言特別指出两件重大事实。其一是法定的十小时工作制及其对英国无产階級的非常良好的后果。爭取用法律限制劳动時間的斗争直接涉及一个大的爭論,即构成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实质的供求法則的盲目統治和构成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学实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0頁。

质的由社会福利支配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sup>①</sup>

在第二个重大事实中，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这个事实就是合作运动，是根据合作原则，由少数没有外界援助，但却毫不畏缩的工人创办的工厂。这些伟大社会实践的价值，无论怎样重视，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sup>②</sup>然后宣言谈到，只要合作劳动没有超出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那就不能粉碎资本主义垄断。“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慧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sup>③</sup>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合作劳动和依靠国家财力促进合作劳动，才能拯救群众。然而，地主和资本家一定要至死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垄断并使它永久化。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宣言的这一节同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关于合作劳动对无产阶级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2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2—13页。

所說的一段話，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宣言強調工人階級的使命是奪取政權，它說，工人們似乎已經了解到這一點，因為運動在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又都同時活躍起來了，並且同時採取了從政治上改組工人政黨的步驟。“工人們已經具備了作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數；但是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並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sup>①</sup>過去的經驗證明，忽視在各國工人間應當存在的兄弟團結，忽視這應該鼓勵他們在解放鬥爭中堅定地並肩作戰的兄弟團結，就會使他們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敗。這種認識就促使在聖馬丁堂舉行的大會創立了國際工人協會。

還有一個信念鼓舞着這次大會。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們兄弟般的團結和合作，那末當存在着那種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洒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麼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宣言指出了美國內戰和波蘭起義。“這個頭在聖彼得堡而在歐洲各國內閣里有其爪牙的野蠻強國所從事的大規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給工人階級指明了他們的責任，要他們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國際關係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分。”<sup>②</sup>《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同《共產黨宣言》一樣，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口號結束。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頁。

② 同上書第14頁。

章程<sup>①</sup>一开始就提出創立协会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可以綜述如下：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斗争不是要爭取新的階級特权，而是要爭取消灭一切階級統治。劳动者在經濟上受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有者支配，是各种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貧困、精神郁悶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以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乃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为它服务的伟大目标。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至今沒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的劳动部門之間，国际工人階級之間缺乏联合。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有現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問題，这个問題只有通过所有这些国家的有計劃的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因此章程宣布，国际工人协会和它所属的一切团体和工人都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对一切人的态度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不仅为自己，也为每个履行义务的人要求人和公民的权利，是人的义务。沒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沒有无权利的义务。

协会的最高組織是总委员会，它应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組成。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圣馬丁堂选出的委员会，执行总委员会的职务。这些职务是：担任各国工人組織之間的国际媒介，使一国工人能經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階級运动情况，对工人階級的状况进行統計調查，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問題在所有工人团体中加以討論，使在发生国际爭端时，所有加入协会的各个团体都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发表定期报告以及其他类似的任务。总委员会由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大会規定总委员会的会址以及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時間。但是总委员会有

<sup>①</sup> 章程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18頁。

权补足委员的数目，它有权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参加国际的每一国家的工人团体可以保存自己的分散组织不受侵犯。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不受限制可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为了总委员会的有效活动，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各国分散的工人团体应该尽可能联合成为由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168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写得十分出色。后来最热心地破坏协会的巴枯宁也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没有创立国际，正如拉萨尔没有创立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可是正如后者给德国工人运动以它可以发挥巨大效能的形式那样，前者也给国际工人运动以这种形式。国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继承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早就说过，统一行动，至少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行动是现代无产阶级解放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可是国际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是多么不同啊！由向资产阶级社会宣布最无情的战争的秘密宣传团体变成一个广泛公开建立的联盟，它容纳各种不同倾向的工人团体，其前提是，这些工人团体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可是这两个组织具有同一种精神，即按照时代变化的要求，变换各种手段，一致地追求它的伟大目的的那种创造性精神。

只要国际存在，马克思就是它的辩护人，早在圣马丁堂的大会把他选入筹备委员会以前，他就参加了准备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宿愿是随着欧洲无产阶级的复兴，“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sup>①</sup>这几句话也确切地说明了国际的内在性质。它决不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

是一个利用恐怖手段活动的秘密团体，这种秘密团体使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感到恐惧，它的影子也使他们害怕。它始终只是一个道德的力量，它鼓舞和加强工人，引导他们前进，它是十九世纪历史中的一座巍峨的里程碑。

自从罗马世界帝国的时代以来，国际团结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完全熄灭过。中世纪的罗马教堂用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种思想。<sup>169</sup> 后来上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使这种思想完全黯然失色，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既创造各个民族，也把这些民族投入争夺世界市场的残酷战争之中。可是这种思想仍然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头脑中不断出现，有时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陶醉于极大的胜利，似乎超出了民族的局限，有时是另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认为得到民族独立的希望是没有的。法国革命者的和德国古典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虽然相似，但其根源却完全不同。资产阶级的国际性总是像一个无血无肉的幻影一样融化在民族斗争的狂飙之中，然后又一再浮现出来。一方面使世界各国人民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日益深刻地分裂，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性。

这种对立性在到处都具有共同利益的现代无产阶级中才完全消失。在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国际团结的思想已经比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思想家和空想家那里坚决得多，明确得多。圣西门提出最发达的国家的同盟，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同盟同封建主义的同盟对抗，以确保和平和文化。傅立叶要想利用他的法伦斯泰尔的巨大联合，破坏旧的国家制度，欧文建立了一个各阶级和各民族的联合会，以宣传社会主义的解放世界的思想。现代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利益了解得越清楚，它就必須越坚决地把各族人民普遍团结的理想从一切空想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国际是由对一个民族起义的同情中发展起来的，它始终是民族自由斗争的

忠实朋友，那么在国际思想以平凡、实际、真实的事实的形式，开始实现的地方，国际就把握住这种思想。英国工会为阻止从外国输入廉价劳动力所做的努力，是国际的主要根基之一。

英国工人团体是这个协会的骨干，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给“协会是幻想家和阴谋分子的团体”的这一谎言以应有的揭露。四年以后，当德国进步党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用英国工人的虔诚的模范少年反对国际的宣传的时候，马克思能够指出，不列颠无产阶级的任何重要行动党，都由它们的领袖，在协会的总委员会中代表它们的利益：奥哲尔、阿普尔加思和豪威耳代表工会总委员会，肖、巴克莱、柯恩、黑尔斯和莫里斯代表参加协会的其他工会，韦斯顿和威廉斯代表英国合作协会，德尔、考威尔·斯特普尼和鲁克拉夫特代表改革同盟，瓦尔顿和米尔纳代表国家改革协会，柯普兰和哈里埃特·劳夫人代表国民美学促进会，而且工会的机关报《蜂房报》同时也就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

在严酷的现实 中植根，国际必须先缓慢地进行搏斗，然后才能得到牢固的基础，这就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是马克思工作起来比拉萨尔耐心得多，顽强得多。成立以后只有两年，国际就发展到可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了。可是正如拉萨尔的联合会那样，假如只从物质观点来考察它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错误的。一切现代作战的神经，总委员会的财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不断增加的负数，而它的精神的和道义的影响是不断增加的正数。国际的工作带来了千百倍的成果，它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它对德国的影响就是这样。直接参加国际的德国工人的数目始终很小，要达到一千以上，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但是协会极有成效地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发生了影响。

## 第二章

### 拉薩尔的继承人

拉薩尔的遺囑也遭到了籠罩着他的末日的不幸。拉薩尔贈送 171 給几个朋友的巨額租金是为了使这些人能够自立，并且能使运动得到发展，可是他們沒有达到这个目标。布赫尔成了俾斯麦的官吏，家庭教师阿列克西成了虔敬主义的反动分子，吕斯托夫虽然始終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但是沒有进行什么宣传活动。

仅仅是这一点，損失还不大。直接涉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遺囑的規定显得更为有害。拉薩尔建議联合会选举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貝克尔为他的后继人，他郑重囑托貝克尔，坚决維護把联合会导向胜利的組織，这些指示显然是針對瓦尔特希反对派而定的，不过，它們並沒有解除旧的糾紛，只是制造了新的糾紛。遺囑中另一条規定也有类似情形，这一条規定每年贈送联合会書記維尔姆斯五百塔勒，五年为期——“作为他为人正直的報酬”的、他个人每年收入的一百五十塔勒在外——使得他可以为了联合会的宣传活动，按照自己的意見慎重使用这笔錢。

拉薩尔的棺材還沒有盖上，他的母亲同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之間就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的父亲在不久以前已經去世，剩下的家属，母亲、姐姐和姐夫（拉薩尔恨入骨髓的商业顧問弗里德兰），在他去世的时候表明，他們在拜金主义的泥沼里陷得多么深。

經過詳細商談，達成了協議，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擔負一方法郎的費用，並負責按猶太人葬禮行事，拉薩爾的家屬就把拉薩爾的遺體  
172 交給她，埋葬在柏林。伯爵夫人打算使棺柩經過聯合會的大支部所在地，到處都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可是她的計劃只有在美因茲得到光輝的實現。當裝在輪船上的棺木到達科倫時，警察當局受拉薩爾家屬的委託扣留了它，把它送到布勒斯勞，他的家屬立刻草草地把它埋在猶太人墓地裡。當最後一個土塊落到棺木上時，弗里德蘭笑嘻嘻地說：現在偉大的鬥爭被埋葬了。

可是這種看法是十分錯誤的。全德工人聯合會表明，它在工人階級中已經扎下了深根。所有支部都嚴肅、隆重地舉行了拉薩爾的追悼會。為人愛戴的領袖的突然去世，沒有使任何地方的會員氣餒，而是到處都增加了对勝利的堅強信心。对拉薩爾個人的崇拜有時稍稍過分，但是一般說來，沒有超過在當時情況下可以理解和原諒的程度。這種崇拜最明顯地表現在路德維希·維爾克特的几首歌里，這些歌向“聖經、教會、主”表示忠誠，或者更明顯地帶有滑稽畫的色采，可是它們都有一個堅固的核心。

路德維希·維爾克特是三月革命前的民主派的老戰士，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他在薩克森王國做了二十五年最優秀的傳教師，後來由於出色地參加了五月起義，被判四年懲役，現在經營薩克森旅館，萊比錫工人不久就稱它是“公道的下處”。作為資產階級激進派的為人稱道的著名人物，維爾克特一直相信關於拉薩爾是反動分子的鬼話，一份民主派報紙的悼詞才使他大吃一驚，那裏面說，拉薩爾是“我們”的人。這時維爾克特閱讀了拉薩爾的著作，這位老革命者才如夢方醒。於是他就常常在他的旅館的大廳里對拥挤的聽眾談論拉薩爾，並且寫詩歌頌這位去世的天才，這些詩的虔誠的比喻是由老神學家的語言，而不是由群眾的宗教感情產生

的。除此而外，在为了追悼拉薩尔而发表的詩文中，都充滿了完全世俗的战斗精神；在汉堡的追悼会上，第一次响起了年輕的雅科布·奧多尔夫的工人馬賽曲，此后它那朴实的歌詞在无数次的工人大会上鳴响，而把海尔維格精心雕琢的联合会之歌完全推到一边去了。 173

拉薩尔死后不久，也发生了几件幸事，假如他还活着，他本人一定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于1864年10月在萊比錫召开，同月2日，美因部的工人大会在奥芬巴赫举行，以便研究将在萊比錫討論的問題。委员会的报告人宗納曼闡述了一切只要工人甘心做資產階級的唯命是从的奴仆就会碰到的好事，可是工人并没有再用慣常的掌声来报答他那慣常的口号。相反地，工人们冷冷地说，他们为了普选权将放弃一切美丽的諾言。宗納曼反駁說，法国的例子表明，普选权对工人没有什么帮助。相反地，只要时间一到，他就准备同工人一起登上街垒。不过这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被爽朗的笑声淹沒了，于是美因部委员会带着痛苦的教訓退却了，这个教訓就是，直截了当地欺騙工人的日子已經快結束了。

在萊比錫的代表大会上，对資產階級說来，黄昏已經来到。一个不妙的預兆已經显露出来。在关于所謂代表一万七千名工人的去年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一个据說有一千五百名會員的佐林根的工人协会也被作为参加者計算在內；这时，佐林根仅有的两个工人协会对萊比錫代表大会提出了严重抗議，它們宣称，說它們“同可敬的宗納曼先生和威尔特先生曾經通过信”，乃是一种“可耻的謊言”，佐林根工人站在拉薩尔一边，所謂舒尔采-德里奇在那里有一千五百名拥护者，乃是幻想的創造物。10月22日和23日举行的萊比錫代表大会，有来自四十个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参加，其中

只有很少几个是工人。

第一天討論了迁徙自由的問題，关于这个所謂治疗工人疾苦的药剂的陈詞濫調用陈旧的方式讲个不停。可是代表莱比錫的一个雪茄烟工人协会的弗里茨舍起来指出，迁徙自由虽然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所共有的天赋权利必須实现，但是它同社会改革毫无关系。唯一能够帮助工人的，就是普选权。弗里茨舍的雄辯的发言博得了与会的工人代表和讲台上的听众的掌声。为了不让弗里茨舍第二次发言，人們不得不借助會議規則，采取巧妙的預防措施。第二天，阿尔伯特·朗格做了关于消費合作社的发言。他說，消費合作社决不是万应灵药，但却是完全有利的机构，其前提是要由工人，而不由資產階級的学者創辦和管理，这些学者不这么多地干涉工人的事情，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工人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比他們清楚。代表大会的幕后操纵者越来越感到不安，当弗里茨舍要想在一次关于生产合作社的討論中发言时，他們就利用一个及时提出的結束討論的提議，打断了他的发言。为此发生了激烈的爭論，为双方所尊重的阿尔伯特·朗格費了很大力气才使這場爭論平息下来。当然他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爭端；弗里茨舍退出了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一个书面抗議，反对对言論自由施加“不体面的强暴手段”。他的冲击并不是沒有成果的。虽然宗納曼和麦克斯·希尔施又被选入代表大会委员会，可是阿尔伯特·朗格和倍倍尔也选上了。抵制革命浪潮的堤防現出了头几道裂痕。

这时炸弹也在美因部爆炸了。在为了听取关于莱比錫代表大会的报告，于11月2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一个工人大会上，拉薩尔的拥护者占絕大多数。他們罢免了美因部的旧委员会，先选了一个临时的，后来又在12月18日举行的有很多人参加的一个工人大会上最后选出了一个新委员会，它的九个委員是全

德工人聯合會的會員。韋爾凱爾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埃爾納爾和奧貝文德爾被選為秘書。同時工人大會宣稱，舒爾采—德里奇、法赫爾、宗納曼和麥克斯·威爾特沒有能力做工人領袖，因為他們不追求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而是到處招搖撞騙。

正當拉薩爾的原則這樣日益深入地滲透到工人階級之中，新的支部不斷成立的時候，下述問題的情況卻截然不同：工人黨的組織是否能像拉薩爾在世時那樣維持，它的策略是否也能照樣繼續實行。時間越久，這種組織和策略就越適合於他個人，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尤其是拉薩爾推薦為他的後任的那個人代替不了他。伯恩哈特的學問和才能都不超出最普通的中庸之材，他所依賴的僅僅是他當時的名望。

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拉薩爾想到他了。拉薩爾對於使德國工人階級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偉大政黨的希望，已經大大降低了，因此他可能認為現在還不是讓一個工人擔任聯合會領導的時候，既然他放棄了這一點，他的選擇就受到很大限制。他同李卜克內西不和，施韋澤在工人群眾中很不得人心，否則他可能選他做自己的後繼人。達姆爾擔任萊比錫的全權代表表現平常。除了貝克爾以外，未必有第二個人能像貝克爾這樣把法蘭克福支部的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並且堅決地排斥瓦爾特希反對派。拉薩爾只能對他死前的情況作概括的觀察，他可以認為比較起來這個選擇是最好的，可是結果表明，這是一個十分不幸的選擇。

起初聯合會尊重它的創始人的最後願望。瓦爾特希被開除出理事會，表決時梅茨內和約克曾反對這一提案。如果說瓦爾特希的反對派仍然帶有某種派系的頑固性，那麼現在他一聲不響地適應他那不公平的命運，對聯合會沒有採取敵對的行動，這就是他受人敬重的地方。選舉主席一事還碰到一些形式上的困難，不過到

11月1日为止，大多数支部已經进行了选举。大家都投票选举伯恩哈特·貝克尔，在拉薩尔的主席任期未滿以前担任主席。11月2日，从这时起脱离运动的副主席达姆尔把联合会的领导权交给了貝克尔。

然而真正的困难才由此开始。当1864年和1865年之交，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新的联合会机关报的最初几期出版的时候，关于組織和策略的爭論就爆发了。

## 一 存在的矛盾

按照资产阶级的看法，拉薩尔死后几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个人爭吵和无謂的糾紛。如果人們只看事物的表面現象，那么这种看法似乎也很对。在互相指責、互相归罪的情况下，要辯明是非是不容易的。可是，如果人們对事态本身作精密的了解（否則历史学家就决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很快就認識到支配事态发展的合理規律。

对于如何清算拉薩尔的政治遺產問題，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最簡捷的意見是，完全按照拉薩尔去世时的样子，把鼓动工作繼續进行下去。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是这种主张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在她看来，运动就是拉薩尔，拉薩尔就是运动。在她对于亡友的哀痛中含有大量的感情成分，这种感情感人至深，可是在政治上却不起好作用。伯爵夫人使拉薩尔的每句話都成为不可动摇的福音，由于她不是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皈依拉薩尔，而是通过拉薩尔皈依社会民主主义的，所以这种死板的信仰，必然更把她引入歧途。假如拉薩尔的策略轉变沒有引起她的同情和爱好（拉薩尔本人却远不是这样），那么她就不成其为天生的貴族了。被拉薩尔視為棋子

的“伟大的大臣”，成了她的理想。

作为拉薩尔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朋友”，伯爵夫人自以为是他的天生的繼承人。因此选举貝克尔对她恰恰是适当的。她希望能够随意支配这个偏狭的人，为了这个原故，她牢牢抓住拉薩尔的策略，并且以同样程度牢牢抓住拉薩尔的組織。联合会應該是貝克尔的工具，正如貝克尔是她的工具那样。貝克尔本人“以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頌揚伯爵夫人是联合会的救星，要是沒有她的帮助，联合会已經垮台了。伯爵夫人为了維持拉薩尔的創造物的生命，尽了很大的力量，而且也毫不吝惜地花了許多錢，这是事实。可是，如果她的企图得逞，拉薩尔要想建立的工人党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热狂的宗派，这也是肯定的。

相反地，施韦泽想把联合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他的聰明足以理 177  
解人亡政息的道理。施韦泽非常迅速地在社会主义理論中找到头緒；他不是一个人独立的理論家，可是他在革命工人运动中活动期間，比德国境内的任何人都正确而明晰地代表科学的共产主义。他甚至超过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論家的地方，就是他对当时德国状况的精确了解和他用来評价这种状况的敏銳的政治眼光。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德人，他用可能使旧普魯士的民主主义者羡慕他的深謀远慮，立刻了解到旧普魯士兵营的情况。施韦泽沒有拉薩尔的磅礴的热情，而且也不会被这种热情吸引。一个政治活动家很少像他这样清楚地了解，怨恨在政策中找不到任何东西。他沒有鼓动家的火一般的热情，在他的鼓动言論中，有时发出痛苦的声調，可是他能够通俗地、明晰地但又决不浅薄地向工人群众說明一种政治局势或一个社会問題，这种能力是人所不及的。

施韦泽完全沒有拉薩尔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中迷恋的幻想。他坚决认为，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是絕對必要的，而且也认为

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組織只有走拉薩尔所走的道路才有可能，他繼續前进并且承认，拉薩尔的策略轉变是环境的力量逼迫而成的。他不完全放弃这种策略轉变，但是用一种排除一切誤解的方式对它加以限制。尽管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逼迫，施韦泽也不肯贊成拉薩尔臨終所拟定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決議。他十分明确地強調，进步党一旦认真准备实现資產階級的自由，工人就應該跟着进步党跑。可是，只要进步党干脆违背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盲目地攻击无产階級比攻击政府还厉害，施韦泽就坚持这样的立場，即

178 工人党無論对資產階級还是对容克階級都必須保持完全独立，它應該警醒地注视着，能从压迫階級的傾軋中为自己得到什么利益。

冷靜沉着的施韦泽任何时候也沒有妄想，能够用計謀或諂媚从封建反动派手里取得資產階級自由。然而他指望俾斯麦被迫实行普选权，也許还实行联合权<sup>①</sup>，他认为这对等于完全缺乏黨組織的合法手段的工人階級有很大好处。三級选举制削去了工人階級所有的选举权的一切鋒銜，几乎所有地方都沒有联合权，出版权和結社权成了警察的无限专橫的牺牲品。工人运动如果要發揮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就必須加强，并为自己創造一个合法的基础，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活动。在資產階級反对派不起作用的状况下，按照施韦泽的見解，这件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那就是工人运动原則上維護自己的完整的独立性，策略上利用資產階級同容克階級之間的斗争，不管进步党抱怨它为反动派服务，也不管反动派抱怨它被进步党牵着鼻子走。因此施韦泽想在拉薩尔奠定的基础上繼續建設，首先坚持已經获得的陣地，冷靜地估計进行社会民主主义

<sup>①</sup> 德文是 Koalitionsrecht，指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爭取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而联合行动（如罢工等）的权利，这种自由叫联合自由（Koalitionsfreiheit）。——譯者

鼓动的实际可能性，为了按照拉薩尔的精神，日益巩固和深入地开展无产阶级运动，他准备放弃拉薩尔的一些言論。

为了这种努力，他试图同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取得諒解。施韦泽和霍弗斯特騰为了出版联合会的新机关报已經移居普魯士的首都，在那里取得了普魯士公民权和柏林居住权。还在拉薩尔逝世以前，施韦泽就到李卜克内西那里去过，談到“老社会主义者”对拉薩尔的鼓动工作的冷淡态度。李卜克内西向他說明了拉薩尔的老朋友所存在的疑虑，后来李卜克内西說：“施韦泽先生似乎明白了这一点。”拉薩尔死后，施韦泽立即建議，由馬克思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馬克思拒絕了，因为他不願同拉薩尔的运动同流，在現时的政治形势下，他不願回到德国来。由于施韦泽的迫切請求，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願意为联合会的新机关报撰稿，当然他們答应得很勉强，只是在李卜克内西明确保证，可以信賴施韦泽的忠誠的情况下他們才答应的。李卜克内西本人参加了該报編輯部。

碰在一起的这对夫妇的秉性大不相同，人們不需要很大的識別力就可以預言，这件婚姻必将不欢而散。李卜克内西是 1848 年的革命者，同反革命进行过武装斗争，在艰苦的流亡生活中怀着旧日的应有的憎恨，他是一个热情的鼓动家，一个伟大的目标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施韦泽則相反，他比李卜克内西足足小十岁，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同李卜克内西的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組織家和政治活动家，用考察的眼光衡量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两个人在关于一般观点的学术性的討論上可能取得一致意見，可是他們在日常的实际行动中，不可能保持同一步調。李卜克内西很想完全推翻拉薩尔的事业，毫不考虑德国的具体政治状况，从根本上重新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后来他說明当时的企图时

說，他想要在德國工人運動的範圍內，用國際代替全德工人聯合會，也就是說，把拉薩爾和施韋澤的工人政黨變成社會主義的一個宣傳協會。

施韋澤對國際從沒有抱敵視態度；他在聯合會新機關報的頭幾期上就刊登了國際的成立宣言。在回答從這個新協會中找不到明確的綱領、統一的目的和一定的手段的弗里茨舍的質問時，施韋澤完全切合實際地說，國際是歐洲所有文明國家編成的一條帶子，這些國家的情況雖然基本上是同一性質的，但不是完全一樣的。應該提出什麼直接目的，應該爭取哪些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這要以各國的特殊情況為準則，而國際在徹底維護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人聯合會的獨立性和特殊性的時候，只追求一個目的，即通過一切歐洲文明國家普遍建立社會民主主義分子的合作，這個目的的根據是，所有文明國家的人民利益的共同性。施韋澤的這種看法是無可指責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作為一個團體，由於德國結社法的阻撓，不能參加國際，這對一個國家的工人黨的政治組織和策略還不起任何決定作用。德國工人一旦只限於作為個人——他們只能這樣做——參加國際，為國際的原則而工作，他們就不再是準備和能夠在本國土地上進行戰鬥的一個政黨。

李卜克內西沒有提出任何適合於德國情況的政治行動綱領。後來他大概反對過“迷信普選權”，十分惋惜地說，拉薩爾沒有宣布拒絕納稅，拒絕納稅是能夠制伏封建反動派的唯一手段。可是拉薩爾在他的憲法演說中就根據最確切的理由指出，在德國的特殊情況下，拒絕納稅是不起任何作用的。這個證明也從來沒有遭到反駁，相反地一切了解德國情況的人都承認它是不可反駁的。1863年秋天，約翰·雅科比進行了沒有必要的嘗試，在一篇引人注目的競選演說中要求拒絕納稅；全部效果就是，雅科比本人被判六個月

監禁，恰恰是两个拒絕納稅的納稅人，东普魯士的約翰·賴騰巴赫-普利肯和萊茵河畔的阿尔伯特·朗格被依法追繳。李卜克內西建議用三人团代替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建議也沒有接触到關鍵問題。联合会的整个組織是适应独裁領導的；如果要取消独裁領導，就必須彻底改革整个組織；在某些情況下，三个人的独裁比一个人的独裁更不恰当。可是李卜克內西很难根据这个突然出現的思想，提出一个經過仔細考虑的組織計劃，而他的見解本身是毫无矛盾的。

拉薩尔曾經希望德国无产階級的階級覺悟在風暴中被激发成为一个不可抵抗的力量，事实表明这是一种幻想。資產階級同无产階級之間的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馬克思也直截了当地說过这一点。他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創立紀念大会上說，德国資產階級太怯懦，不会执行自己特殊的綱領，当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求工人同資產階級一道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他当然期待德国資產階級至少同英国資產階級做同样多的事情。現在李卜克內西指責促使执政党互相厮杀是一种不可容許的策略，事实上这不是別的，只是賦与德国工人运动以一种就像十几年前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社会主义宣传团体的形式。因为德国无产階級要末还没有，要末只有在紙上具有党組織的合法手段：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联合权和选举权。

## 二 意見之爭

拉薩尔死后，在年輕的工人运动中发生的矛盾，最初通过貝克尔和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之間的意見分歧爆发了。当資產者的報紙对“围裙主席”的諷刺和其他种种細小的原因，使得貝克尔这个

可怜虫从他那偏狭的头脑刚刚开始陶醉于其中的虛荣迷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对伯爵夫人的过分的謙恭，就轉变为过分的憎恨。这时貝克尔向拉薩尔的母亲寻求支持，并且还为联合会向她乞討了二百塔勒，由于拉薩尔家庭的无礼态度，这个步骤不仅激怒了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也激怒了所有敬重拉薩尔的人。除了企图爭取拉薩尔老太太以外，貝克尔可能还有进一步的企图。拉薩尔老太太維護她儿子的遺囑，当貝克尔为了自己，对拉薩尔为了联合会的鼓动工作遺贈給联合会書記維尔姆斯的为期五年的五百塔勒的租息苦苦思索的时候，她的恩寵对他就有更大的价值了。

在拉薩尔的所有遺囑条文之中，这一条即使不是最不幸的，也是最不可理解的。他知道貝克尔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联合会还不能給主席支付薪金；虽然如此，他却不把一百五十塔勒的长期私人租息，还有为了联合会的工作而使用的那笔贈款送給他所推荐的主席，却送給每年已經有四百塔勒薪金的联合会書記，那么他就必須承认，这样他就使联合会書記具有超过主席的危險力量。也許拉薩尔的計劃是，让他所尊重的維尔姆斯实际上領導联合会，而貝克尔只得到主席这个名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緩冲器，可以减弱其他工人对維尔姆斯的妒嫉心。可是，即使这样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当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4年12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时候，这种混乱状态也沒有消除。

这次代表大会有代表三十四个地方的二十名代表参加。梅茨內代表柏林，埃尔納尔代表法兰克福，希尔曼代表愛北斐特，勒維代表杜塞尔多夫，佩尔代表汉堡，約克代表哈尔堡，弗尔斯特林代表德累斯頓，弗里茨舍代表萊比錫。联合会金庫有三十九塔勒的現款。一系列的提案，沒有經過深入的討論就被通过。这些提案是，所有支部都隆重地紀念拉薩尔的忌辰，西里西亚織工区的會員

由于貧困，減免他們一半會費，把拉薩尔的階級組織擴展到整個聯合會，在較小的支部則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簡化。最重要的決議是，把書記和主席的職務合并，確定主席年薪五百塔勒。這個決議是根據弗里茨舍的提議作出的，梅茨內、約克、佩爾、勒維和弗爾斯特林都同意，認為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毫無疑問，這個決議是必不可少的。讓主席依靠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或拉薩尔夫人的恩寵過日子，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這種立場面前，一切其他顧慮（不管它們有多么嚴重）也必須退居次要地位。這些顧慮肯定很多而且也很重要。這一決議是對會章的明顯違反，根據會章，書記和主席的職務不能合并，並且在三年以內不能修改會章。主席的權力更提高了，貝克爾的能力同他應該完成的任務之間的距離加大了。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得到了一個合適的借口，以組織受到嚴重損害為理由，把貝克爾當做不合法的僭位者看待。聯合會的最老、最堅固的堡壘之一的佐林根支部，終於破壞了這個決議。維爾姆斯不能埋怨任何正式的不公正行為；<sup>183</sup>他在書記任期期滿以後恰恰沒有再當選；他明確承認，這並不是對他投不信任票，而只是屈服于環境的無情壓迫。但是他沒有瓦爾特希在困難得多的情況下所具有的克己精神，由於他的朋友克林格斯站到他這一邊，在佐林根支部中就形成了一個激烈的反對派，接着又擴展到漢堡、萊比錫和其他支部。

存在的矛盾在聯合會的新報中更為明顯地暴露出來。這個報紙的名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報，試版第一期於1864年12月15日出版，該報的所有者和編輯是霍弗斯特騰和施韋澤，撰稿人有伯恩哈特·貝克爾、約翰·菲力浦·貝克爾、恩格斯、海爾維格、赫斯、李卜克內西、馬克思、呂斯托夫和烏特克。該報綱領只限于三個主要觀點，即整個文明世界的民族利益

和人民事业的共同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废除資本統治。試版第二号于12月21日，第三号于30日出版，从1月4日起，报纸就按期，即每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出版了。

編輯部的領導人是施韦泽，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第一篇社論敘述了拉薩尔对工人階級的功績，第二篇社論論述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文章认为，在現狀的範圍內解决这个問題的任何办法，不論是奧地利或普魯士保持被征服的国家，还是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民族來說，是同样悲慘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德国的积弊，两个大邦的分立将会加强，在后一种情况下，又注定小邦的不幸。如果普魯士并吞这个国家，那么这至少是一切不幸中的一种安慰，全民族的唯一机构，邦联議会的最后一綫生机被扼杀了，那么这些情况必将促成重大变革和民族的最后奋起。

在国内政策方面，施韦泽強調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階級的力量虽然應該供資產階級利用，184 但是如果資產階級自由党对待人民党的态度不比君主专制党对待人民党的态度好，甚至更坏，那么人民党沒有别的办法，只有根据当前的情况，为了个別的目的，在一定的具体問題上，同这个或那个党合作，其前提始終是，“为了个別目的而进行的这种合作絲毫不”伤害“人民党的独立的原則立場”。施韦泽駁斥了自由派报纸关于“同反动派的联系”的叫嚷，他說，这些无用的謠言根本不是用严肃的态度說出来的，“因为这些馴順的教授和高傲的富豪以及他們的雇佣文人清楚地知道，我們是什么人，他們是什么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他們自己的党，如果世界历史的铁的进程早已战胜了現在不可一世的東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則就成为民族生活的血和肉。

施韦泽从1月27日至3月1日发表的論俾斯麦內閣的五篇社論，使得自由派关于“同反动派的联系”的叫嚷达到高潮。事实上，这些社論不过证明，施韦泽的政治眼光比进步党报刊要清楚得多。人們今天閱讀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它們就显得非常平凡，这是因为事实早已证实了施韦泽当时所預見到的东西，而那时德国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对政治形势有同样深刻的理解。

施韦泽在論俾斯麦的文章中从历史上研究，在德国問題上，究竟哪些因素是有行动能力的。他发现只有两个，即普魯士的刺刀和德国无产者的拳头。他指出，邦联議會、奥地利、中小各邦在德国問題上表現得軟弱无力——不論好坏都是这样。要解决这个問題，只有两个办法。要末德意志民族通过一次革命来挽救自己，这是按德国精神解决德国問題的办法，每个民主主义者都认为应当这样做。要末普魯士邦忠实于它的历史传统，吞并德国的其他各邦，目前俾斯麦极有成效地为这样解决德国問題而努力。“这种努力同全民族进行的那种努力——建立一个基本上以現代思想为基础的德意志人民国家——是有根本差别的。表面上，两个努力有 185 其共同之点，即德国至今分裂的部分应该統一起来；可是骨子里它們的不同之点在于，在一种情况下，統一只是为王朝-分立主义利益服务的手段，在另一种情况下，統一 是民族本身的最高目标。”普魯士主义是德意志主义的敌人，但它也是德国“現存势力”的敌人。

施韦泽根据普魯士的历史論述，普魯士的分立主义是对于国家发展最有害的分立主义，因为它是最有力量的分立主义，它同列支敦士登和利佩-德特莫耳特分立主义，甚至同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分立主义都有不同的意义。一个曾經接受普魯士邦的旧传统的普魯士大臣将被事态本身的力量拉着往前走，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回头。进步党的德国政策的缺点是，它既不是普魯士的，也不是德

国的。它要求以普魯士为首的德国的統一，而不了解，德国的統一只有通过德国的革命才能实现，普魯士的首脑地位只能造成一个大普魯士。如果我们今天还要证明这一历史研究的敏銳性，那就是画蛇添足了。

可是施韦泽論俾斯麦的論文也有一些地方是不适当的，他认为普魯士分立主义是一个特別的东西，人們應該根据它的历史起源条件和历史存在条件去理解它，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可是他却用近似歌頌的生动笔調来描述这些条件的特殊性质。施韦泽談到俾斯麦的“卓越政策”，这还是最不足道的。阿尔伯特·朗格在同一时期，认为这个政策具有“敢作敢为和某种了不起的单纯性的特色”；聪明人对于民族联盟为了制伏普魯士大臣而进行的愚蠢的儿戏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施韦泽把普魯士邦說成是“能干的君主”的事业，他贊揚老弗里茨的“伟大的天才”說他是“在各方面都是足以令人敬佩的人物”，以及其他等等，無論在历史上还是在政治上这都是不妥当的。恶毒的敌人（施韦泽應該知道，他必須同非常恶毒的敌人进行斗争），只要从整篇文章中抽出几个句子，就足以引起这样的看法，仿佛年輕的工人运动應該普魯士化。尤其是在前两篇論俾斯麦的文章中，施韦泽的这个錯誤表現得很明显，在后三篇文章中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在这期間，他受到了一次很严厉的訓斥，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反对他的政策。

这两个人不願参加《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是有充分理由的。既然他們对拉薩尔的鼓动工作抱有疑虑，既然他們不願亲自领导德国工人运动，那么对他們來說，让事态像拉薩尔在世时那样发展，是最合适的。仅仅在机关报担任撰稿人，負一半責任，必然引起种种磨擦。施韦泽有一个正直的意图，就是把宣传活动放到适合《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的更广泛的原則基础之上，这一点可以由

下列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他在受到宣言的作者們的严詞拒絕以后，仍然执行自己的計劃。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信任他，李卜克內西的报告很快就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既然李卜克內西也像他事后立即公开說出的那样，往英国写信，那么即使报告人主观上是誠实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国当时的人物和状况，也得不到一个客观上确切的图象。此外，在对易北河东的事物的見解中，他們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萊茵省生人的立場，1848年他們对波尔恩和当时柏林和萊比錫的工人运动的評价，使人有这种感觉，現在他們对拉薩尔及其鼓动工作的評价，也使人有这种感觉。

《社会民主党人报》論拉薩尔的第一篇社論一发表，馬克思就指責它是“阿諛崇拜”<sup>①</sup>，这是一种过分严厉的批評，虽然人們也乐意承认，这篇文章并非每个字都可以放到金秤上去称的。施韦泽請他忍耐一下，事情会渐渐好起来的。蒲魯东在1865年1月死后，馬克思应施韦泽的要求，立即写了一篇論蒲魯东的文章<sup>②</sup>，可是在这篇优秀的論文中，并不是沒有把“向現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說成是对“简单的道德感”的违犯。同时恩格斯寄去了他翻譯的一首古丹麦农民之歌，他在注释中着重指出德国工人必須同容克地主进行斗争。<sup>③</sup>当然施韦泽毫未修改地刊登了这些稿件。可是接着馬克思又对赫斯寄自巴黎的一封信和施韦泽对当时 187 德国开始发展的爭取联合权运动的态度进行新的責难。施韦泽又

① 參閱1865年2月23日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頁。还可參閱1865年2月5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9頁。

② 即1865年1月24日馬克思致約·巴·施韦泽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8—166頁。

③ 指恩格斯譯的古丹麦民歌《基德曼老爷》，載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艺》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440頁。——譯者

一次請他忍耐。2月15日，他写信給馬克思說，一切理論闡明，他都怀着感激心情当作教导加以接受，可是为了判断目前的策略的实际問題，人們必須站在运动的中心。他补充說：“您也不要忘記，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固定的团体，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傳統的約束。事实上任何事物在发展中总碰到一定的障碍。”馬克思和恩格斯于2月23日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sup>①</sup>，作为答复，声明說《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遵循的策略使他們不能繼續参加該报的工作。他們一刻也沒有忽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沒有提出过任何不适合柏林当局的要求。但是，他們一再要求，对內閣和封建专制政党，至少也要像对进步党人那样大胆发言。他們对普魯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工人政党对这种欺騙所采取的正确态度，1847年他們已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闡明过，現在他們仍然认为他們当时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同时李卜克內西退出了編輯部，几天以后，海尔維格、呂斯托夫和約翰·菲力浦·貝克尔也声明同該报脱离关系。在公布的撰稿人之中，只有赫斯和烏特克始終忠实于这个报纸。

資产階級为这一冲突而欢呼，宗納曼的机关报从它的古代道德的崇高立場向“有民主思想的工人”指出，他們对于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首領”應該如何看待，虽然拉薩尔已經向反动派献过媚，但是他們仍然首先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发生了关系。施韦泽对于这一巧妙的攻击发表意見說，虽然如此，拉薩尔的鼓动的最恶毒的反对者仍然认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是不彻底的，人們对于这种战术掩护不必严格分析。可是施韦泽說，人們所以退出，是因为人們看到，在党内不能起首要作用，这种中伤是很不适当的。

<sup>①</sup>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声明，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4—175頁。

馬克思在當時由古伊多·魏斯主編的《柏林改革》<sup>①</sup>上，對此作了尖銳而中肯的答復。除此而外，施韋澤則盡力跨過“這種個人的糾紛”，儘快轉入政治議程。可惜不幸的伯恩哈特·貝克爾沒有做這種打算，他企圖表現自己是拉薩爾的毫不遜色的後繼人，要用大棒打倒聯合會的敵人，當然這種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3月22日，貝克爾對漢堡工人發表了一個長篇演說，其中充滿了對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內西的人身攻擊。

這件事在柏林支部中引起最激烈的爭論。李卜克內西雖然在原則上已同伯爵夫人斷絕了關係，但卻俠義地在貝克爾的攻擊面前為伯爵夫人辯護，並反駁貝克爾從福格特的小冊子和類似的資料中收集來的、對他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可惡誹謗。根據他的提議，柏林支部幾乎一致通過把伯恩哈特·貝克爾開除出聯合會的決議，因為他是“撒謊者、誣蔑者和不可救藥的白痴”。在火熱的戰鬥中，李卜克內西也起了增加混亂的作用。他在工人運動的惡毒敵人，《萊茵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其中說到，拉薩爾的學說不是別的，只是他和他的朋友多年所主張的原則的“模糊不清的仿製品”。在這以前不久，馬克思曾經用下面的話駁斥過在反對工人運動方面同《萊茵報》志同道合的吹牛家布林德：“我不打算向這個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無所有的荒唐的小丑說明拉薩爾這樣一個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動的真正意圖。相反，我深信，卡爾·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獅，僅僅是執行大自然和伊索賦與他的使命。”<sup>②</sup>毫無

① 1865年3月15日的聲明載3月19日出版的《柏林改革》第67期。——原編者（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5—98頁。——譯者）

② 卡爾·馬克思致《觀察家報》編輯的信。載1864年12月10日《北極星報》。——原編者（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頁。《全集》中印的不是“荒唐的小丑”，而是“荒唐的馬志尼-斯嘉本”。——譯者）

疑問，这样就出色地画出一条只要面对資產階級来談論拉薩尔个人及其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須遵守的界綫。

在这次不愉快的爭吵期間，出版了一个論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党的小册子，这是恩格斯在公开冲突以前起草的，大概也是在这以前写成的。虽然这个著作的最后一节是在不断注視着施韦泽的策略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是絲毫沒有进行論战。在头两节中，恩格斯从政府和資產階級的立場來說明普魯士軍事問題，用的是科学研究者的历史公正的态度，这是像赫斯和呂斯托夫这样的人（更不用說自由派政客了）都不能理解的。189 第三节研究了无產階級对政府和資產階級发生的宪法糾紛所采取的立場。它汇合成下面几句话：只要現時的情况許可，首先使工人党保持为有組織的政党；只要可能就推动进步党，使它真正进步，逼迫它使自己的綱領更加激进并遵循这个綱領，坚持不懈地譴責它的一切不坚决性和弱点，并使它們成为笑柄；让真正的軍事問題照它本来的样子发展，要意識到，工人党将来也会建立自己的德国“軍事組織”；用古代《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中自豪的話語来回答反动派的伪善的引誘；我們要手持长矛来接受你的礼物，用矛头对付矛头。

严格說来，这个綱領沒有一点是同施韦泽的見解背道而馳的。施韦泽甚至可以引证恩格斯的著作来反对海尔維格的指責，他怪《社会民主党人报》沒有接受呂斯托夫寄給他的論普魯士軍事問題的論文。呂斯托夫在这个問題上站在比較激进的、但实质上同資產階級相同的立場上。海尔維格也十分坚决地对恩格斯进行了攻击，其激烈程度不下于对施韦泽的攻击。如果人們要想发现恩格斯和施韦泽之間的意見分歧，那就必須仔細研究一下恩格斯为得出自己的結論所說的一些話。

他描述了普魯士政府的波拿巴主义的鬼臉，并认为，如果普魯

士政府恩賜普選權，它一定對普選權加以限制，使它不成其為普選權。他指出法國的經驗，在德國，這種情況還要更壞一些。德國無產階級不像法國無產階級那樣集中，也沒有它那樣長期的鬥爭經驗。可是在德國不是小農而是大地主占優勢；如果說三分之一的德國無產階級受資本家統治，那麼它的三分之二就受封建地主統治。“……在农村無產階級還沒有卷入運動的時候，德國的城市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絲毫成功，直接的普選權對無產階級來說不是武器，而是陷阱。”<sup>①</sup>恩格斯和施韋澤之間的真正意見分歧就在這裡。恩格斯接着談到，德國的整個工人運動只有 190 年在政府任何時候都可以把它扼死的情況下，才可以存在，施韋澤不僅沒有反對恩格斯的這種論點，而且這種不可辯駁的事實恰恰是他的策略的推動力。而且他也從未反對，如果反動派出於對資產階級的憎恨而做一些社會讓步（如聯合權、工廠監督、標準工作日等等），工人階級並不感謝反動派，他也不反對，如果資產階級叛賣了資產階級自由，工人應該不管資產階級，繼續進行爭取出版自由和結社權的宣傳活動。

施韋澤企圖盡力擺脫貝克爾在漢堡的骯髒演說使他陷入的十分討厭的境地。为了不使殘局變得不可收拾，施韋澤就不能反對貝克爾，于是他又努力儘快消除私人爭吵。聯合會剛一克服危機，他就停止一切私人攻擊，始終尊重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卓越的理論家，只是否定他們對德國運動的實際可能性的正確判斷。危機期間，對《共產黨宣言》中論德國社會主義一節仍然耿耿于懷的赫斯，在一封巴黎來信中順便對恩格斯的著作進行了攻擊，施韋澤讓它通過了。危機過去以後，施韋澤本人切實而鄭重地做了答復，正如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頁。

恩格斯沒有提他的名字那樣，他也沒有提恩格斯的姓名。

施韦泽說，对普选权有两种反对意見。第一种意見是說，即使正直和正确地行使普选权，由于人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实际教育程度，普选权就会成为反动势力的支柱。反駁这种意見的要点是，就目前來說，問題不在于在人民代議机关中占多数，而在于使人民的輿論在公认的、具有正式权力的国家机关中发生作用，这在实行三級选举制时期几乎是做不到的。如果工人党在議會中有自己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也是一个大胜利，一个很大的胜利。

第二种反对意見是說，如果普选权不用出版自由和完全的結  
191 社自由加以适当的补充，它就不促进人民的事业，而促进压迫者的事业，施韦泽认为这种意見事实上不是什么反对意見。不言而喻，工人党要求的普选权只是包含在自由国家这个概念中的一切权利的彻底扩大；沒有这些权利的普选权就会是藏在民众外衣之下的、与人民为敌的君主专橫統治的危險礼品。当然，这时还会产生一个問題，即同現行的选举法相比，是否應該把这种选举权也当做一个进步，当做一个較小的禍害加以欢迎。

施韦泽认为，这个問題可以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答案。如果人們考虑到，在群众特別頑强的情况下，这种选举权就是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就給这个問題以肯定的答复。如果人們考虑到，一种权利的絕大部分只是假象，它对群众的发展可能比直截了当地压制一种重要权利更危險，那么就給这个問題以否定的答案。“我們也确实相信，在我們党内对于这个問題存在着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看法。可是其中有一点——在这里这是主要問題——在任何情况下我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如果一个政府在某个地方实行普选权，而不同时保证其他相应的人民权利，那么人們就應該首先把这种选

舉權專門用在爭取和保持那些別的权利方面。因為我們首先需要自由——自由。”恩格斯說過，普魯士政府頒布的普選權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施韋澤則認為，它雖是陷阱，但是可以成為武器。這就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一方，以施韋澤為另一方的意見分歧的症結所在。

三年半以後，1868年10月13日，馬克思寫信給施韋澤說：“我絕對承認您在參加工人運動時發揮的才智和毅力。我在任何朋友面前都沒有隱瞞我的這一看法。”馬克思還補充說：“我不會忽視您的處境的困難，並且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受環境的支配甚於受自己意志的支配。”<sup>①</sup> 這樣他就用不同的話說出了施韋澤在1865年2月15日請求他寬恕的那個思想，那就是，事實上任何事物在發展中總碰到一定的障礙。施韋澤在他十分困難的處境中，沒有始終遵守他的策略的正確界綫，比如在論俾斯麥的文章的個別論點中就是這樣，可是事態的歷史進程證實策略本身是正確的。

關於工人黨的任務的最後一次意見爭論，同一時期在阿爾伯特·朗格<sup>②</sup>和施韋澤之間展開。朗格在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萊比錫代表大會上採取了調解的立場，加之他又被選進委員會，這就促使他系統地對工人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以免受到立場模糊的譴責。他的小冊子對於工人運動有許多精采確切的評論，可是其根本缺點在於，他牢牢抓住馬爾薩斯的人口律不放，這個人口律通過

① 見約·巴·施韋澤：《政治論文和演說》，1912年柏林版第279頁。——原編者

② 參閱1865年3月29日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和1870年6月27日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0—183頁和258—260頁。

达尔文的正在流行的理論，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朗格的自然科学知識給他的社会科学思想設下最后一道木柵，因此他沒有得出庸俗經濟学家由馬尔薩斯的理論中得出过并且正在得出的腐朽結論。

在实际要求方面，朗格接近拉薩尔远甚于接近舒尔采。他要求工人运动完全独立，工人階級首先在政治方面，其次在合作社方面独立行动，教育活动服从于这些更为迫切的目的，通过毫无限制的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通过一切国民所共有和必需的事物方面的普遍的、免費的社会教育，通过从經濟上和法律上促进生产合作社，尤其是促进农业的大規模經營，来使国家民主化。朗格不像拉薩尔那样相信普选权的作用，但是他承认，只要群众要求，普选权就一定会实行，而且也承认，对于实现社会理想來說，沒有更好、更合理和更有希望的鼓动手段了。由于提出这个綱領，朗格就为资产階級所摒弃，而且他更为痛心感到“这本著作在工人及其領袖中完全不为人注意”。事实上，施韦泽用一种同这本著作的精神意义不相容的相当輕蔑的方式，評論了这一著作。当朗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杜伊斯堡支部做了一个报告，闡述自己的观点时，好像也沒有受到特別友好的对待。

199 朗格的这种不应有的遭遇有一部分可以由此得到解释，那就是他的著作恰恰是在联合会的危机深深刺激了人們的情緒的时候出版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朗格要想調和不可調和的东西，尽管他很有信心地保证說，他沒有任何調和的企图。当时，他談到“柏林新普魯士的伪造的社会民主主义”，后来他又經過适当考虑，在可能范围内同施韦泽取得諒解。

从1865年秋天到1866年夏天，朗格在杜伊斯堡出版一个每周出三次的报纸：《下萊茵使者》，他在这个报纸上責备拉薩尔有一

个根据当时的情况虽然大可原諒的缺点，那就是拉薩尔按照舒尔采的小資產階級的狹隘观点，过分片面地看待合作社事业，忽略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英国、法国，部分也在德国的工人合作社中已經扎下了根。“当犹太人从流放地回来，建筑自己的庙宇时，他們一手拿劍，一手拿鋸刀。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合作社就應該保持这种关系。它們的任务不同，但它們是互相补充的。”正如朗格論工人問題的著作已經表明的那樣，这是他討厌拉薩尔的宣传活动的真正症結所在。朗格并不是要无原則地抹杀矛盾，而是要把很可以結合起来的事物結合起来。可是他忽視了那种沒有它就沒有伟大实际行动的片面性。

施韦泽欣然承认，拉薩尔的所謂缺点有它有害的一面。可是唯其如此，它乃是他的鼓动綱領的一个重大优点。“相反的缺点最多只能引起一些专家的純理論的論战，而不能引起火热的工人鼓动。”施韦泽接着說，朗格所指責的缺陷，在实践中将得到調整，并且已經开始得到調整。可是决不可因此而产生还没有充分反对和消除的幻想，即认为以所謂“自助”为基础的合作社能够长期地、彻底地改善无产階級的階級状况。朗格对此作答說，这种說法也許有点道理，只是必須注意，工人群众并非对自助估价过高，而是干脆不願意参加。恰恰是参加了真正的合作社的工人，比毫不关心的群众，已經接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 194

同时朗格也反对宗納曼对这次討論发表的一些孟浪的意見。这位資產階級思想家硬說，德国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是同英国、法国、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完全一致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而全德工人联合会却飄浮在空中，它那幻想的未来政策一方面要求普选权，即多数人的統治，另一方面却要給这个多数規定一个固定的社会主义綱領。朗格駁斥他說，德国工人协会同美国、英国和法

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充分一致，这种一致刚以脱离舒尔采的怯懦的片面的领导开始，在这一方面应该感谢拉萨尔的鼓动的间接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政策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一个议会是用普选权选举出来的，拉萨尔的拥护者就很难指望取得全面的胜利。“但是可以断言，即使只有半打坚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参加议会，议会的整个性质也将改变。从这时起，报纸上对于社会问题也将有不同的对待。”可是这件事已经具有某些意义了，尤其是三级选举制不会让这一派的任何人当选，否则选举就会随意中止。

施韦泽可以满意地记下朗格的这些意见。他同朗格的讨论和他同恩格斯的讨论达到了同一点，这又一次证明，这一点是拉萨尔死后发生的整个争论的重心，这个争论在理论方面还没有停止，工人们在实际方面却早已做出了决断。

### 三 工人的决断

195 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发表在該报第二十九号上。只经过短短的时间，这棵小树就长得非常结实，可以经得住狂风暴雨了。

1864年末给工人事业带来的胜利，在1865年初不断地继续下去。伯恩哈特·贝克尔不是一个老练的鼓动家，可是当他1月间访问西里西亚织工区时，他的出现就为联合会争取到一千多个会员；那里不久就有了十个支部，其中一个有五百会员，一个有四百会员，大多数支部都超过二百会员。美因部的新委员会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在美因兹的选帝侯大理石大厅召开了一个大会，会上有二千名工人欢欣鼓舞地表示拥护拉萨尔的原则。事先，希尔曼

已經向雷姆夏特、哈根、伊塞隆进行了突击，取得了輝煌胜利；在新爭取到的會員之中有哈森克莱維尔和特耳克。

伊塞隆的事态发展，吸引了远远超过联合会范围以外的社会人士的注意达几个月之久。一个官僚一旦决定随意扩大警察的专横权力，事实表明，他的随意是沒有止境的。市长許尔斯曼简单地决定，不让伊塞隆的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当他以为看到工人运动的一点苗头的时候，就拼命禁止、迫害、逮捕。比如他曾經命令，进行監視的警官應該解散一切談論“工人”或“工人联合会”的集会。高級官僚当然滿意地把目光落到这位意志坚定的干将身上。可是特耳克却有办法馴伏他，尽管有时是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

比如，3月22日，特耳克叫“伊塞隆工人协会”发出一个祝賀威廉国王誕辰的賀电，当天晚上召开了一个會員“联欢会”，迎接国王的回电。蒙国王厚恩，回电准时到了，可是警官禁止工人們朗讀电文，因为收电报人是“工人联合会”，根据市长的命令，这个名詞是不准公开說出来的。于是行政区长官不得不亲自赶到，他不敢禁  
196  
止朗讀电文，只得违背自己的意願把忠实奴僕許尔斯曼狠狠訓斥了一頓。要把特耳克使市长受窘的妙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1865年9月，这位沒头脑的市长竟达到完全瘋狂的地步，他給伊塞隆的飯店和酒館下了一道命令，“只要容許前私人司书，現失业者卡尔·威廉·特耳克在营业人的店房里逗留，或以任何方式供給他飲食”，立即撤銷該店的营业執照。可是这个命令沒有考虑到由于不認識特耳克这个人而违反命令者應該免罪。对这个命令的申訴虽然是可以容許的，但是那些感到受了委屈的人，都被“作为沒有为正式营业提供充份保证的人”，禁止繼續营业。这种海外奇譚甚至能使普魯士警察笑死。不久特耳克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出他收到的威斯特伐里亚大香腸和其他礼品的收条，

这些东西都是幽默的市民朋友怕他餓死寄給他的。

这时，鼓动工作首先在柏林开始扩展。拉薩尔在他的容斯多夫演說中就曾說过，柏林工人协会开始对进步党采取强硬态度了。人們說他是吹牛，可是他死后的事实表明，不是吹牛。大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迫切需要联合自由；假如进步党接受了好建議，那么它就会及时拥护它自己的自由貿易学說的这一結論。可是由于它慣常的不彻底性，它却像 1848 年的庸人那样，希望建立一个有大公的共和国。1864 年 10 月，由自由貿易派控制的、那个有名的劳动階級福利中央协会决定进行宣传活动，爭取联合自由，但却是爭取有限制的联合自由；应该頒布特殊条例懲罰濫用这种自由的人。参加这次討論的工人大概觉察到这种意图，可是他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他們的不滿，值得尊敬的格奈斯特就用营业法規的奸計突然襲击了他們，中央协会贊成名不符实的联合自由。对于这件事情的不滿情緒在工人中蔓延，1865 年 1 月 22 日，柏林工人协会在音乐堂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抗議中央协会的決議，尤其是抗議不是由一般国家法令所規定的、对联合自由的任何限制。

《社会民主党人报》十分巧妙地同这个运动发生了联系。它认为联合自由是工人階級不可缺少的权利，同时也不諱言，联合自由是自由主义經濟制度的簡單結果，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进步党議員被邀参加 1 月 22 日的工人大会，可是出席的只有二十人左右，在这些有名望的大人物之中，沒有一个人說过一句使工人感到溫暖的話。他們企图把中央协会的主謀者捧为高貴仁慈的人，他們說，如果进步党还代表工人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工人不应感到惊奇。工人們在自己的发言中清楚地表明，工人对于进步党的領導已經漸漸感到厌倦了。报告人迪特曼声称，迷信高貴的人民之友就是偶像崇拜，工人不願再受特別法的統治了，拉薩尔对普选权

的估計可能过高，可是普选权毕竟是工人的权利，权利必定始終是权利。說这話的这位工人，不到两年以前，还主持过审判拉薩尔的秘密法庭。大会一致通过迪特曼提出的抗議，这时舒尔采和法赫尔确实自卑身价地在众議院提議，1845年普魯士营业法規的第一百八十一和一百八十二条應該廢止，前者是禁止企业主联合的，后者是禁止工人联合的。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起来揭发这个議案是拿工人开毫无价值的玩笑。舒尔采和法赫尔对营业法規的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一字不提，前者用罰金和監禁威胁工厂工人、帮工、助手、学徒的联合，后者用同样手段威胁工人的民法上的违反契約以及严重的不服从和坚决反抗。伯恩哈特·貝克尔指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到处召开大規模的工人大会，让它們作出決議，說舒尔采和法赫尔的提案不能滿足工人階級的正当要求，工人必須要求沒有限制的联合自由，要求廢除一切营业法規中所包含的违反他們的利益的例外法的規定。 198

提出議案的人企图为他們的阴謀詭計辯护，正好比火上加油。舒尔采說，第一百八十三条已被宪法廢除了，宪法允許成立一切其宗旨不违反刑法的社团；明确地廢除它，就是怀疑宪法的法律有效性和侵犯人民的最神圣的基本权利。这种遁辞最多只是可悲地证明，这些人敢向工人提出何等无理的要求。根据最高法院的、不管多么應該排斥，但形式上合法的裁判，宪法的一般原則沒有廢除起限制作用的特殊法令。廢止第一百八十三条，沒有触犯“神圣的基本权利”，只是清除了使无产階級的結社权比資产階級的結社权变得更为渺茫的障碍物。舒尔采还說，第一百八十四条可能是令人厌恶的，可是它不能随便廢除，而只能同那些还违反个人自由的限制一起廢除。如果說舒尔采真正愚昧，竟然老老实实在地說出这种

遁辞，那么《人民报》无论如何还更为老实，它宣称，进步党要想保持对破坏契約者的刑事懲罰，当然仅仅是对工人。它仁慈地承认，第一百八十四条可以在它的懲罰条文方面从輕修改，可是破坏契約的工人犯了錯誤，犯了錯誤就應該受到懲罰。只有“无知的煽动者”才会硬說，对破坏契約的刑事懲罰同联合自由有某种关系，“看看吧，看看吧，工人们，你們被这样一些人煽动，反对沉着而慎重地維護你們的事业的学識淵博的人”。

在这种道义上的憤慨爆发的那一天，那些“学識淵博、沉着、慎重的人們”决定做“无知的煽动者”所要求的事：討論了舒尔采-法赫尔提案的众議院委员会把这个提案扩大到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鞭子的响声使进步党的护民官从資本主义的睡椅上惊醒过来；法赫尔叹着气承认，“运动的危险的扩展”不容人再躊躇不决。2月中旬，众議院进行了为时三天的著名的关于联合自由的辯論，在这个富豪代表机关中，引起了建造巴別之塔<sup>①</sup>的語言混乱。舒尔采喊叫：請你們不要給野兽解开繩索，法赫尔說 Trade Unions〔工会〕是中世紀行会的反动殘余，列翁諾尔·賴辛海姆装扮成一个受迫害的无罪的人，頌揚西里西亚紡織工厂主是受苦的人类的最仁慈的恩主。进步党的第四位英雄許願說，舒尔采的合作社將使工人全部成为富裕的市民，第五位英雄說的却相反，他說个别工人可以得到帮助，但不是整个工人階級，第六位英雄用幽雅的談諧引起朗朗的笑声，他說，阿尔伯特·朗格同拉薩尔的关系就同克尼佩尔多林同穆罕默德的关系一样。享受了这些口头上的胜利以后，进步党的多数議員就想通过委員

① 見《旧約全書》創世紀第 11 章，耶和華看到諾亞的子孫要在示拿地造一座塔通到天上，就下來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言語彼此不通，造不成塔，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譯者

会的提案，可是当他們仔細檢查自己的工作時，才發現他們誤解了主席十分清楚地提出的問題，只決定廢除了第一百八十一條和第一百八十二條。工人們懷疑這個可笑的事實是一次陰險的突然變卦，這是十分自然的，這時《社會民主黨人報》來安慰他們。它寫道，在一個工人大會中，當然不會發生這種錯誤，可是這次工人的有力行動，把進步黨人的惡意徹底排除了。大議員們只是要表明，他們的惡意在哪裡停止，他們的無能也就在那裡開始。

保守黨和政府關於聯合自由的辯論中沒有得到比進步黨人更好的結果。瓦蓋納高唱他那被等級制所破壞的普選權的陳舊理論，提出一個要求政府主動解決社會問題的美妙提案。俾斯麥幻想十六世紀反對西班牙統治的尼德蘭貴族的國王，霍亨索倫家族從一開始就應該證明自己是這樣的人。可是商業大臣伊岑普利茨發表了一個官方聲明，說政府準備實行聯合自由，不過這樣做還遠遠不夠；應該在有業主和工人參加的情況下，成立一個委員會，以便討論促進近代的合作社事業，促進消費合作社、信貸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工人階級的主要物質狀況”。《社會民主黨人報》認真對待這個聲明，或者做出認真對待這個聲明的樣子，以便用它來對付進步黨人，這就是馬克思對施韋澤對爭取聯合權運動的立場感到不滿的原因。除此而外，這個立場完全適合馬克思時常表明的觀點。<sup>200</sup>

在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找不到一點宗派傾向。它處處結合工人階級的實際活動，堅決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哪裡開展爭取較好的勞動條件的鬥爭，《社會民主黨人報》就在那裡出謀劃策並用實際行動進行幫助，比如對布爾克的織布工人、阿波耳達的織襪工人和萊比錫的排字工人都是這樣。尤其是1865年春天，萊比錫的排字工人罷工引起人們的極大重視；這是德國的第一次罷

工，共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是因为这几年以来，在薩克森王国有了一定程度的联合自由。排字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经过十个星期的苦斗，增加工资的目的只达到一半；由于印刷厂主找来了足够数量的罢工破坏者，因此罢工者的力量受到挫折。《社会民主党人报》差不多是德国唯一没有反对和咒骂罢工的排字工人的报纸，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唯一坚决而巧妙地赞成他们的事业的报纸。报纸十分雄辩地教诲工人，罢工破坏者的行为多么可恶，这件事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那时宗纳曼和类似的工人朋友已颂扬破坏罢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事情，比如他们就曾赞扬充当工贼而破坏了巴黎蹄铁匠的罢工的法兰克福蹄铁匠。

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为什么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群众赞成施韦泽的策略。没有任何对他个人的偏爱在这里起作用。同过去一样，工人们并不喜欢施韦泽；在幸运把他抛弃以后，他没有被杜塞尔多夫代表大会再选进理事会，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联合会机关报一事，也不是毫无障碍的。工人群众仅仅受他们自然的阶级本能支配，才承认施韦泽的策略是最适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所谓“向反动派献媚”吓唬不了他们。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在无产阶级中造成对这个党派的嫌恶，以致施韦泽当时和以后可以有理由驳斥对他的指责（说他煽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他可以正确地說，他没有挑起对进步党的憎恨，反而时常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抑制这种憎恨。

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大会作出了第一个对他的策略有利的决断，这个大会是3月12日在巴門举行的，参加大会的有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韦默耳斯基尔兴、佐林根、伊塞隆以及几个較小的支部的代表。大会决定，工人们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場感到满意，因为它完全维护工人党的独立性；也应该赞同，先等政

府提出对工人問題的建議，然后再对此作出判断；政府废除三級选举制，实行普选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贊成这个決議的三名发言人中，有两个是《新萊茵报》时代的老革命者：希尔曼和勒泽尔，勒泽尔沒有像同他一起在共产党人案中被判刑的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那样，抛弃共产主义事业。萊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党代表大会的決議逐渐得到所有支部的贊同。1865年5月23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了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紀念大会，有三十二个支部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很是庄严隆重；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从7月1日起每天出版。

固然，还有一个反对派，它使柏林、阿尔托那、科伦、佐林根、美因茲和其他許多地方，产生了特殊的反对派支部。它們有一个共同的机关报，就是受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支配的《北极星报》。如果人們今天还要找一个可以說具体的证据，說明施韦泽的策略为什么必然胜利，那么人們只要把1865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北极星报》放在一起比較一下就行了。前者所表現出来的，是当时工人們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充滿了新鮮活泼的气息，而从后者，人們只能看到一些阴暗模糊的影像。拉薩尔說过，群众的精神（同他們的地位相适应），始終朝向客观的、实际的目的，不安的、自私的个别人的声音沒有被人听见就在这个和音中消失了，这几句話有其深刻的含义。在《北极星报》里，有多少这样的声音消失得无影无踪啊！只举几个比較有名的人說說，比如海尔維格和呂斯托夫202的声明，越是沒有什么道理，就越高傲自大。从来沒有为联合会操过心的馬丁尼，是不是現在为了声明退出，才第一次动笔，对工人來說也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正直的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在好几期里用来攻击“小伯恩哈特”的“率直的話”，時間一久，也就使人討厭了。这位老战士至少企图組織反对派支部。可是他的努力的

唯一結果，就是現在這些支部完全瓦解了。他曾計劃用一個三人團代替聯合會的主席，這個三人團又受一個由十個委員組成的委員會的監督，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十分激烈地反對他這個計劃，在萊比錫舉行的、沒有得到任何成就的一次或兩次代表會議以後，事情就停滯不前了。不久，反對派的殘余大多又回到舊基礎上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參與這一切。可是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反對派支部中不久就同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擁護者發生了衝突，他同他們當然是不能合流的。此外，他在印刷工人協會做了几次關於農民戰爭的報告，《社會民主黨人報》對這些報告表示贊揚，並做了公正的評價。1865年夏天，李卜克內西被逐出普魯士，差不多同時伯恩哈特·貝克爾也被逐出境。封建反動派經常像母親那樣細心，對工人運動的不同派別施以同樣殘暴的手段，以便使它們明了牢固團結的必要性。

#### 四 策略和組織

眾議院的資產階級反對派不僅在關於聯合自由的辯論中得到奇特的榮譽。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事件上，它也根本沒有綱領，而在憲法糾紛上更沒有綱領了。甚至它也不說過分激烈的話了。當格奈斯特把“違背誓約的污名”送給陸軍大臣，羅恩冷冷地回答說，格奈斯特是“無耻的”漢子的时候，犯罪者恭順地表示悔悟，正在執行職務的副議長翁魯滿足於像聽見打雷的公貓那樣，做出一副驚愕的面孔。

被誘進圈套的齊格勒老人在這種悲慘境況中感到熱血沸騰，他在這些場所所做的最動人的演說中向進步黨說了阿爾芒·馬拉斯特的心痛的話：“邪惡進入了你們的頭腦，你們已不能仔細思

考。”古伊多·魏斯在《柏林改革》上关于这个演說写道：“这篇演說以溫和的言詞开始，舒适地散散步，甚至在經歷者的彩色图象中徘徊，它突然跳起，到了微笑的听众的上方，用利爪抓他們——我們不知道是深入他們的胸部，还是只及于他們的腹部。”哎，听众沒有把这些話放到心里去。《人民报》用令人不能理解的文字使这个演說沒沒无聞，一位官方議會記者在《愛北斐特报》上发表意見說，齐格勒是議院的一个滑稽人物，虽然不起很大作用，但是是有趣的。这个陷入泥坑的人已經不能活动了，即使用鞭子抽他，也动不了了。

6月，邦議會會議在傳統的爭吵中結束以后，进步党像平常一样，为祝賀它沒有做过的功績而碰杯。可是这次俾斯麦使它的打算落了空，也許因为他不能控制天生的暴行（在他身上經常可以这样假定），也許正如当时許多人所說的，因为他本人对这个反对派的悲惨状况感到痛苦，要想稍稍推动它，使得他的救国活动对国王更加成为不可缺少的。7月11日，科伦警察局长禁止定于7月22日和23日在萊茵省首府举行的議員集会。这个禁令純粹是警察的专橫行为，沒有任何法律根据，甚至連表面上的根据也沒有。看来，进步党終于要振作起来了。以市議員克拉森-卡佩尔曼为首的科伦集会委员会公开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集会都要举行，被邀請的二百五十名議員中，有一百六十人答应出席，有一部分議員是在措辞严厉的信中表示这种态度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急忙号召工人在进步党要想实际維護民权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它。7月23日，德国凡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組織的地方，都根据伯恩哈特·貝克尔的命令，举行了盛大的工人集 204  
会，工人們在会上表示，在維護依法存在的結社权方面，对进步党表示充分的同情和有利的支持。在柏林大会上，根据施韦泽的提議，成立了一个常設委员会，商討进一步的措施。代表柏林所有工

人协会的这个委员会，7月30日在阿尔汉布拉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几乎每天被警察没收，柏林和馬格德堡的支部由于所謂违反結社法而被解散，伯恩哈特·貝克尔接到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普魯士国境的命令。可是参加7月30日的群众大会的人比預期的还多；大会强硬抗議驅逐貝克尔和李卜克內西，以及对結社权的任何侵犯。

資產階級反对派远沒有这种坚强精神。答应参加集会的一百六十个議員，实际到科伦去的只有八十人。尤其是众議院的議長沒有出席；格拉博夫寄来了一个四十五磅重的半身塑像，代替他本人受人欢呼和祝酒。同客人一样，主人也沒有首脑：克拉森-卡佩尔曼由于害怕可能被捕，在两天集会期间到比利时去了。这种英勇的逃脫行为公然受到粉飾，說什么拘捕受民众爱戴的人可能引起流血事件，而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須避免的；占卜者們有一点是暗中一致的，那就是克拉森-卡佩尔曼被捕以后，出席的几十个議員也会偷偷溜走。科伦的宴会由于军队和警察阻碍未能进行。第二天，参加集会的人到了奧貝朗斯坦，在那里举行会餐，沒有受到拿騷军队的阻撓，因为军队到得太迟了。他們沒有对警察当局提出抗議，只是給克拉森-卡佩尔曼写了一封致謝信，也只有四十六名議員敢在这封信上签名。南德的一个民主主义者埃卡尔特教授，为了景仰进步党人应許的英雄行为到了科伦，他半揶揄、半气愤地写道：“俾斯麦，安安静靜地睡小觉吧！这些先生不干革命，他們想安分守己地举行集会，安安静靜地吃飯，发表漂亮的演說，使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至于对你进行反抗——他們不干，至少决不用武装，而只用憤怒。”当时住在国外的自由派历史学家鮑姆加尔騰写得更为痛切：“我希望举行这种集会的先生們，今后几个星期在外国就是欧洲各国人民談論德国时表示的輕蔑态度的证人。”

談論德國，這就是說談論德國資產階級。

德國工人充分盡了自己的責任，他們不要求，也沒有得到資產階級的感謝，對這一點他們並不介意。在柏林，《人民報》到處訴苦，說工人中的舒爾采的擁護者同拉薩爾的擁護者為了一種共同利益也共同行動。在科倫，愍直的市民撕下邀請參加工人抗議大會的街頭通告。在法蘭克福，宗納曼帶著明顯的幸災樂禍的心情寫道：“社會民主黨人孤注一擲，必將失敗。”資產階級胆小鬼最害怕他們投到報紙上的資本受到損失，他們所謂的賭博失敗，可能是《社會民主黨人報》在短時期內接連被警察沒收了十二次，而且也受到差不多同樣次數的根據一切可能的彈性條文提出的控告，負責的主編施韋澤被判十六個月監禁，剝奪公民權一年。從政治上來說，這一鬥爭却勝利了，大大勝利了。在德國沒有一個報紙哪怕只有一點點像《社會民主黨人報》那樣堅決而勇敢地保衛受到威脅的結社權；在這次鬥爭中，像在以前爭取聯合權的鬥爭中那樣，工人們找到《社會民主黨人報》這個比所有進步黨報紙都可靠的指路人。他們的觀點的變化，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10月1日，當柏林工人協會邀請舒爾采-德里奇在阿爾漢布拉做一個公開報告的時候，他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才答應的，這個條件就是不要對他的發言進行討論。

為了防止任何不愉快的反駁，舒爾采只用一句文雅的話結束了他的報告：一切社會主義者都該進瘋人院。接着，施韋澤召集柏林工人於10月8日和15日也在阿爾漢布拉开會，在完全自由討論的情況下，向他們闡明社會主義綱領，以便證明社會主義綱領不是像舒爾采所說的那樣荒誕可笑。參加這個大會的工人很多。他們不久就覺得，放在他們面前的是同舒爾采的陳詞濫調大不相同的食品，他們的興趣迅速增長，因而在科倫集會事件中成立的那個 206

工人常設委員會，定于11月6日在阿尔汉布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来討論“社会問題中的两条主要路綫”。委員會一方面邀請舒尔采-德里奇、法赫尔、普林斯-史密斯和米謝利斯，另一方面也邀請施韦泽和烏特克参加。舒尔采和法赫尔到外地去了，烏特克有別的事情不能參加，米謝利斯和普林斯-史密斯以高傲的态度拒絕到会。在这个异常拥挤的大会中，施韦泽找不到一个哪怕只能同他稍稍周旋的敌手。他十分正确地对他的胜利作了估价，他說，面对着統治階級所散布的偏見垃圾，用正規的方式使工人了解社会主义原則是困难的，可是一旦出現这种情况，这些原則就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取得永远巩固的統治。除去这些一般的工人集会以外，施韦泽还代替被警察解散的支部，举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自由集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可惜很有成功希望的鼓动工作，由于施韦泽被捕而中断了，11月下旬，他第一次被判罪以后就被捕了。

进步党对这一切却感到十分恐惧。拉薩尔死后，进步党的領袖（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所证明的那样），就发出使工人运动沒沒无聞的口号，可是在这一方面，他們沒有很大进展。然后他們就想用謠言——說封建集团为施韦泽和霍弗斯特騰进行募捐——来抵消工人党保卫結社法在全德国造成的深刻影响。进步党报刊上刊載了两篇匿名文章，也就是进行了两次可怜的誹謗。施韦泽被捕以后，勇敢的欧根·李希特尔就接受了进行第三次誹謗的任务，他从全德工人联合会危机时期发表的一些个人声明中摘取片言只語湊成一套骯髒言論，以《斐迪南·拉薩尔死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为题匿名出版。这个誹謗著作同他的作者的性格一样阴险恶毒，可是进步党却花了很多錢印出来，寄給所有它可以接近的工人协会。后来在咒罵工人階級方面成了欧根·李希特尔的有資格的伙伴的弗里德里希·施特方尼，当时以郊区手工业工人协会主席

的身分拒絕在工人中散發給他免費寄來的一包骯髒著作；他在一個公開聲明中，除了對作者作了別的恭維而外說：“這個所謂的社会民主黨史的特色就是對社会民主黨的個別人，尤其是对現在坐在監牢里，因此不能為自己辯護的施韋澤編輯的雖不是令人作嘔的，但却是令人很不愉快的誹謗。”既然工人的假朋友都這樣說，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如果這種骯髒著作落到真正的工人手中，將會遭到什麼命運了。

如果“社会王國的國王”還要使工人產生尊敬的心情，他就必須對社会主义進行“科學的”反駁。差不多在拉薩尔的《巴師夏-舒爾采》一書出版兩年以後，舒爾采-德里奇才以《拉薩尔先生廢除營業上的風險》為題，發表了對上述著作的答復，可是這不起什麼作用。俗語說“大器晚成”，可是這次“晚成”的却不是“大器”。舒爾采雖然吹毛求疵地對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進行了這種或那種駁斥（因為拉薩尔的這個要求還帶有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的最後殘余），但是就是這一點點勝利，這位節約使徒也只有通過虛構才能得到，他說拉薩尔是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為了以資本和投機為基礎的個人經濟的世界而提出他的要求的。除此而外，作為舒爾采的著作的基礎的兩種“思想”，像馬戲團的兩個小丑互相饜以清脆的耳光。為了頌揚他的自助，舒爾采聲稱，個人的經濟命運主要決定於個人的能力和才干；為了挽救企業主利潤，他反過來說，把勞力和財產放到一件事業上的人，經常有失去兩者的危險，必須用資本利潤來彌補這種絕對不可避免的風險。資產階級報刊當然把這本拙劣著作捧為對拉薩尔的“卓越的駁”，可是在它本來應該發生作用的地方，它卻受到致命的批判。

在社会民主主義的鼓動的精神影響下，工人教育協會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1865年8月在斯圖加特舉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208

它們就已經作出每個工人都必須為爭取普選權而努力的決議。工人教育協會的機關報，科堡的《工人報》經常勇于咒罵拉薩爾，說舒爾采的好話，可是這次卻把舒爾采的新作說成是不可救藥的狹隘性和陰險的虛構的混合物。它在結束這一評論時說：“的確，就是沒有私人關係的批評者，也必須嚴格控制自己，才能在非常正當的無限憤怒爆發時，在譴責有計劃的背叛時，不把自己受到侮辱的正義感發泄出來。可是，舒爾采先生究竟怎麼會做出這些觸動人的良心的事情呢？一個至今受到尊敬的人，為什麼會這樣沒有良心呢？一定是腦子裡有一種錯誤思想，使他的心靈發生了混亂。我們只看到一個謎底：舒爾采先生盲目地站在企業主的立場上，絲毫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情況，即今天個別資本的競爭、從這種行業到那種行業的投機行為、幾百萬塔勒之間的戰爭將要停止。雖然舒爾采先生不可思議地經常對工人講話，但是他可以不理工人，而且連一句話也不說……關於同僱傭勞動鬥爭中的大資本的重大問題，他連最起碼的知識也沒有；他對十九世紀的較大危機也沒有初步理解。他在次要問題——手工業怎麼能夠抵抗正在侵入的大工業呢？——上挑毛病和添枝加葉，這是他的特殊本領，人們在哪裡讓他過關，他就在那裡不麻煩任何人。如果舒爾采先生僅僅滿足於自己的成就，如果他不經常硬說什麼，談談‘工人問題’，甚至解決工人問題，那就好了！我們希望，通過這個評價使他終於認識自己，將來只在國家警察的有益和有效措施方面發表發表意見，而小心謹慎地毫不沾染社會問題。因為，即使拉薩爾是他那個時代的最大的傻瓜，舒爾采-德里奇也不會因此而變得比較聰明一點。”最忠實的侍臣就這樣開始反抗“社會王國的國王”了。

在資產階級方面做了準備工作以後，施韋澤本人就來演奏《死舒爾采反對活拉薩爾》這支舞曲。這本書是施韋澤在獄中所寫的

一組杰出的論文，是他的經濟著作中唯一的（可惜是唯一的）、由 209  
于特別重印今天還為較多人所知的一組論文。在這個著作中，他  
把重心放在社會化生產的現實性和它的巨大優點方面，并把國家  
資助的生產合作社僅僅看做是過渡手段；換句話說，他主要以拉  
薩爾的《巴師夏-舒爾采》為依據，而不是以它的《公開的答復》為  
依據。因此他總是努力，按照拉薩爾的精神，去除拉薩爾的言論  
里可能包含的一切可以攻擊的和誤解的東西。有人認為施韋澤是  
拉薩爾的模仿者，因為他把外壳誤看做是核心，這種看法是完全沒  
有根據的；我們只要翻一翻《社會民主黨人報》的舊的合訂本，這種  
看法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並不是說施韋澤在理論上超出拉薩爾，也不是說他已經把握  
了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中闡明的觀點。在這一方面只能說，施  
韋澤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許多比拉薩爾正確的認識。在同《北  
德總匯報》的一次較長時期的論戰中，他刊印了馬克思在 1859 年  
的著作<sup>①</sup>的序言里寫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性綱領，並且懂得  
巧妙地用它來歷史地說明法國大革命的特點。因此他也按照馬克  
思的意思說，拉薩爾常用的一個名詞“工人等級”是不精確的，舊的  
歷史等級在現在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失，階級代替了它們的位置。  
可是在馬克思後來才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說明的那些問題上，在工  
資鐵律、剩餘價值的道德-法律觀以及類似的問題上，施韋澤仍然  
走着拉薩爾的路子，只是他一直向前，追求這些道路的革命的最終  
目標，這個目標在《共產黨宣言》里已經提出來了。

施韋澤認為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是分裂資本主義社會，給  
社會主義社會開路的楔子。他注意防止認為生產合作社可以創造

<sup>①</sup> 指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譯者

新的富裕的小市民階級的誤解，特別強調，根據拉薩爾的原則建立的生产合作社，同根據舒爾采的原則建立的生产合作社不是大同小異，而是有原則差別的。資產階級想為工人建立的生产合作社是普通的營利事業和金錢投機，沒有什麼更深刻的意義，而無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生产合作社是實現偉大的文明理想的、影響全人類

210 是普通的營利事業和金錢投機，沒有什麼更深刻的意義，而無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生产合作社是實現偉大的文明理想的、影響全人類的社會嘗試。

在同一家保守黨報紙論戰時，施韋澤就拉薩爾的一億計劃寫道：“每個有理智的和公正地下判斷的人知道，拉薩爾舉出這個數字只是要說明，用較少的款子就可以開始採用新的生產方式。他從來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說過，如果人們給他一億，他就接收這筆錢，並把它用於這個目的。”因此，施韋澤也始終重視，對普選權和拉薩爾所要求的國家資助進行正確解釋。他既不諱言，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要求的普選權，同社會民主派所要求的普選權完全不同，也不諱言，有產階級的國家同無產階級的國家完全不同。對資產階級民主派，即有產階級民主派來說，普選權是平權和個人自由的要求，對於社會民主派，即勞動階級的民主派來說，普選權是對一切國家權力機關的直接統治。對於有產階級來說，國家是控制無產階級的手段，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國家則是廢除一切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手段。因此，有產階級對於強大的國家權力很感興趣，而勞動階級却不是這樣。勞動階級所關心的是，不要有一個首腦，尤其是不要有一個不負責任的首腦擔任國家的領導，而是自己通過負責的機構處理國家事務，使國家同社會完全適應。君主立憲制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是最適合有產階級利益的國家形式；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是社會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里，不是一個有特權的社會階級，而是人民掌權），或者是一個強大的獨裁的王國，這個王國嚴防財產占有優勢，在群眾中尋找自己的支持。當然這樣一個王

国不能消除階級矛盾的基础，不能給予政治自由。这一点只有通过建立純粹社会的人民国家，理想国家才能做到，劳动階級必須为 211 爭取这种国家而战斗。

只有一次，施韦泽不是防止由拉薩尔的精神遗产产生容易被 人誤会的口号，而是增加了一个容易被 人誤会的口号。在拉薩尔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把拉薩尔对柏林工人演說的草稿付印了。这篇演說中說：“我对反动派采取最敌对的态度，我只有当进步党同反动派站在同一个立場上的时候，才反对进步党，关于这一点，你們可以从一个反动議員瓦滕斯累本伯爵最近在議院发表的一个声明中十分簡捷地推断出来。菲尔肖夫把誹謗（說我同反动派勾結在一起）帶到議院里来。对此，瓦滕斯累本伯爵声称：‘拉薩尔不是我們的同盟者，我也不认为他是进步党的同盟者。他是站在門外的、我們的共同敌人。’这一声明的真实性是不容反駁的。瓦滕斯累本伯爵把我叫做他們——反动派和进步党——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已經站在門口，他們必須共同抵抗。平时使反动党和进步党分开的那些差別和对立，在我面前消失了。尽管有这种差別，可是它們在我面前已經墮落为一个共同的反动党了。”随后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几乎每天受到进步党的誹謗和警察的迫害，因此它就时常引用拉薩尔的这些话。由此漸漸发展成为工人党以外的其他一切党派构成“反动的一帮”的口号，后来这个口号的真正起源被人遺忘了，很不正确地被理解为拉薩尔政策的一个原則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引起了种种誤解。当然主要是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实践中，因为资产階級自由主义很难不在某个时候对工人运动表示友好，这种友好至少同它經常对封建反动派表示的同样强烈。

施韦泽运用他的策略在一年之內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並沒有

損害社会民主党的原則。美因部和貝爾格-馬爾克工業區的無產階級完全充滿了社会主义傾向。212 宣傳活動由漢堡擴展到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由德累斯頓和萊比錫擴展到開姆尼茨、格勞豪，一直深入到厄爾士山區。在不倫瑞克，一個小支部在威廉·白拉克的細心培植下，極有希望地發展着，白拉克是一個年輕的商人，他從純粹的理想主義出發，熱心於窮人和無產者的事業，他善於把幻想的熱情同實際的活動結合起來。在普魯士的薩克森省，全德工人聯合會分布到馬格德堡、瑙姆堡、愛爾福特，又從這裡進入圖林根的小邦，分布到阿波耳達、魏瑪和耶拿。在易北河東，西里西亞的支部發展成為聯合會的日益強大的支柱，在施泰廷，出現了第一批會員，尤其是在柏林，展現出最可喜的前景。比聯合會的直接發展幾乎更有意義的是，無產階級運動有日益強烈地向社会主义方面靠攏的動向。

在實踐中，由於工人羣眾的任何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的行動都遭到資產階級的頑強反抗，因此他們体会到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在理論上，他們在同他們的社会民主黨的伙伴的爭論中，受到了教育，這個爭論是資產階級想方設法地使他們進行的。進步黨人硬說，只有無產階級的無用的渣滓才渴望拉薩爾的國家資助的金雨，這種說法日益表明是一種別有用心的謊言。現在某些比較有眼光的資產階級報紙也不得不承認阿爾伯特·朗格立即認識到的事情了，那就是恰恰是最有才能、最堅強的無產者參加了社会民主主義運動，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發展起來的力量同在舒爾采的無關宏旨的教育協會和消費合作社中發展起來的力量完全不同。同時，社会民主黨的集會也是有力的鼓動手段；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在它活動的初期就懂得向衰老的資產階級表明，政黨應該怎樣舉行它們的集會。在普通工人的致詞中，顯露出精神力量的萌芽；

1865年秋天，在奧格斯堡紀念拉薩尔忌辰的一個集會上，一個十分年輕的剪布工人瓦爾（可惜第二年他就患胃癌去世了）所做的演說，也引起資產階級人士的極大重視。

雖然有這些進展，但是拉薩尔的死所提出的任務才解決了一半。年輕的工人黨的組織沒有達到它的策略所達到的高度。的確，<sup>213</sup>聯合會的嚴格的中央集權在爭取集會自由和結社權的政治行動中表現出很大的優越性，以致誰也不能設想去觸動它。它所产生的精神影響遠遠超過聯合會實際上能夠發揮的力量。可是精神影響不管多麼巨大，仍然不是政治力量；除去能做闡明和說服工作的精神而外，工人運動還需要一個能夠行動和戰鬥的軀體。

在這一方面看來情況是不妙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始終還沒有站穩腳跟；尤其是它仍然缺少一個良好的財政支柱。《社會民主黨人報》依靠霍弗斯特騰私人出錢維持；它只有幾百個訂戶，遠不能彌補它的開支。拉薩尔的个人獨裁，到了貝克爾手里變成了一幅諷刺畫。貝克爾發布的幾項合適的命令都是施韋澤給他策劃的；在他企圖獨立行動的時候，他幾乎經常惹禍。他對聯合會的唯一功勞仍然是1865年1月他在西里西亞織工區所做的鼓動旅行。正如他通過私人干涉，毒化了馬克思和施韋澤之間的爭論那樣，他也使聯合會當眾丟臉；他裝模作樣地以“人類的主席”自居，他在法蘭克福作為不速之客出席了進步黨人的一個宴會，造成了一件不愉快的地方丑聞，他在不倫瑞克（有白拉克作證）表現出來的粗野舉動使剛剛爭取過來的工人大吃一驚。因此工作不能繼續開展。聯合會只有清除一切宗派性的東西，只有擴大成為一個真正的工人黨，儘管在嚴格的中央集權的情況下，但是這個黨有很好的組織，萬一主席無能也不致使它癱瘓，只有這樣才能保住辛辛苦苦奪來的陣地。這就是施韋澤的見解，許多最有才干的

會員，如奧多爾夫、白拉克、弗里茨舍、約克等人都或多或少贊成這種意見。

貝克爾被逐出柏林以後，住在法蘭克福，他堅持定於 1865 年 11 月 25 日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法蘭克福舉行，這時聯合會主席同聯合會機關報編輯部之間的对立就公開爆發了。他作出這個  
214 決定，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實際上却是利用宗派破壞聯合會的又一步驟。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杜塞爾多夫舉行的，後來成立紀念大會，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非正式的代表大會在法蘭克福舉行，而現在，當東北部正在醞釀一個大規模的政治事變，同時在它的中心柏林，工人運動開始掀起巨浪的時候，第二次代表大會又要在西南部舉行。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聯合會離開政治決戰的射程，同時使貝克爾的無能獨裁至少延長一年。正是在法蘭克福，他由於過去工作較好，有一些擁護者，而且可以預見，如果代表大會在這裡舉行，從外地來參加的人就不多。尤其是不能期望貧窮的薩克森支部和西里西亞支部，一年之內第三次花很多錢派代表到這麼遠的地方開會。可是為了改組聯合會，需要召開一個有盡量多的代表參加的代表大會，因此施韋澤要求會議在萊比錫舉行，這個地方在各方面都比法蘭克福適當。

然而他給貝克爾提的書面意見沒有結果。貝克爾先用空洞的遁辭，後用威脅來代替回答。於是《社會民主黨人報》在 11 月 19 日公開要求代表大會改在萊比錫舉行，它這樣做只是因為它考慮到在萊比錫開會是公平合理的。它的要求得到許多支部的熱烈贊同。然而貝克爾卻在 11 月 21 日宣布代表大會無限期延期，並辭去了主席職位，把自己的職權交給副主席弗里茨舍。

貝克爾不是一個英明果斷的人，因此更難肯定地說，他這樣做是因為感到失望而永遠放棄職位呢，還是企圖製造混亂，給自己帶

来胜利。不管怎么样，他制造了一场巨大的混乱，由于施韦泽在这几天被捕，混乱的程度更增加了。为了从貝克尔手里接收联合会公文，11月26日，同意施韦泽的计划的弗里茨舍到了法兰克福，在这里遇到了几个来参加已經延期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們促使 215 弗里茨舍决定11月3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新的代表大会。这个举动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弗里茨舍召开的代表大会甚至缺少貝克尔原来召开的大会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合法性。决定来到法兰克福的代表們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如哈森克莱維尔和特耳克认为，联合会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对它的存在的关怀应该压倒一切其他要求。另一些人，如希尔曼，从他們后来的态度来看，似乎是出于反对联合会的彻底改組和与此相联系的消除財政紊乱状况的不值得称赞的动机而这样做的。弗里茨舍提議对会章作必要的修改，沒有得到响应，11月30日，当他主持由他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立即有人对他表示不信任，提議另选一位主席。弗里茨舍把副主席的职权交给希尔曼以后，就退出了代表大会，回到萊比錫，以便在那里辞去全权代表的职务。这时他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雪茄烟工人工会，这个工会的筹备工作已經进行了一些时候了。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举行。有代表五十八个地方的九千四百二十一名會員的二十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些代表大多来自美因部和貝尔格-馬尔克工业区。經過激烈辯論以后，作出了一系列的決議，这些決議同时也是一种妥协和应急措施。代表大会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表示“坚决不同意”，因为它公开批評了貝克尔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合理合法的行动，可是大会选举特耳克代替貝克尔担任主席，任期一年，不过这一选举需經會員大会认可。在召开會員大会以前，会务由副主席希尔曼处理。

弗尔斯特林代替勒維被任命为联合会司庫。这些決議在許多支部中引起了劇烈的爭論，因为它們的合法性是很成問題的。然而首先維持联合会的存在的願望战胜了一切顧慮，1866年1月1日特耳克接替了联合会的領導工作，因为會員大会已經同意由他担任主席。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承认，为了使联合会免于分裂，必須暫時承认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決議。可是它补充說，應該尽快地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討論联合会改組的問題，它繼續按照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个集合体的精神，准备改組工作。这时同杜伊斯堡的联合会會員关系极好的阿尔伯特·朗格，在《下萊茵使者》上确切地解释整个危机說，《社会民主党人报》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和消除阻碍这种努力的那些片面性，而它的敌人却认为使联合会类似一个宗派处于隔絕状态是必要的。因此佐林根的一个宗派主义分子指責朗格是“工人的敌人”，而12月17日在杜伊斯堡举行的萊茵-威斯特伐里亚联合会會員大会却給朗格恢复了名誉。瓦尔特希对这一情况的看法同朗格相似，他給《社会民主党人报》寄去一个簡短的声明，表示願意在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或在联合会机关报上，說明他在同拉薩尔的冲突中的态度。希尔曼把刊登这个簡短但很有价值的声明，看做是“对我们伟大的老师拉薩尔的可耻咒罵”，认为可以借此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可是却得到了关于“主席的高压手段和宗派热狂”的十分确切的答复，因而他放弃了进一步的討論。但是，他在担任副主席的最后一天，断然剝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自称联合会机关报的权利。不过这对这个报纸却是十分合适的；从1865年最后一期起，它就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了。

特耳克的就职給結束混乱带来了希望。他是一个坚强而干练

的人，是用同貝克尔不同的材料制成的。他是拉薩尔的忠实信徒，十分尊重严格的中央集权，还不能同意施韦泽的比較高超的見解。他在他的第一个声明中立即答应除去紧急状况而外，重要命令經常要征得理事会的同意。他也同意修改会章的計劃，并且由理事会作出最后决定，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联合会机关报。現在，<sup>217</sup>建立一个能把策略的成果送进谷仓的組織，是大有希望的。可惜，要使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力量，还需要做許許多多的工作；当特耳克担任联合会领导的时候，联合会金庫里还有整整六个塔勒。要花費好几个月的時間，才能弥补貝克尔担任主席期間所耽誤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

因为在政治地平綫上集聚着濃密的阴云，在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幼芽能够受到牢固的木柵的保护以前，自上而下的革命已經像一股挟着泥沙的洪流向这些幼芽冲来。

## 第三章

# 自上而下的革命

### 一 哈布斯堡同霍亨索伦的冲突

218 1864年10月的維也納和約使易北河公国成为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共同财产以后，这两个大邦立即为掠夺物发生了爭吵。在专制独裁、举行政变的欲望方面和完全缺乏民族意識方面，柏林內閣和維也納內閣可以互相媲美。不过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上，俾斯麦比他多瑙河边的同样反动的竞争者有較大的王牌。

由于盲目的妒嫉，并且毫无根据地害怕“革命”，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刚一发生的时候，維也納的政策走进了普魯士的圈套。因此它伤害了中小邦的分立主义，危害了它对德意志邦联的霸权的最可靠的支柱。而当它拿这个不受欢迎的礼物没有办法的时候，共同占有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对它就更不是一种补偿了。因此它沒有别的办法，只有悔恨地回到老政策上去，决定让邦联議會去处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这就等于說易北河公国應該交給奥古斯滕堡僭位者。

这件事不得到共同占有者普魯士的同意是行不通的，俾斯麦不想为了奥古斯滕堡家族的利益，装做一个寬宏大量的人。他最多想让孤立无援的僭位者做普魯士的臣僕，可是他把他在1865年

2月的条件下端上来的湯，做得这样无味，以致对于奥地利的妒嫉心來說，这湯是不堪入口的，他通过自己的雇佣文人給这湯加了諷刺嘲笑的調料，因而对于奥古斯滕堡家族和其他奉天承运的小邦国王的自負來說，也是不堪入口的。普魯士的外交为霍亨索伦王权服务，奥地利的为哈布斯堡王权服务。这两个王室都沒有<sup>219</sup>什么德意志民族观点，它們互相攻訐，說对方推动“革命”，双方的这种攻訐都只能认为是一种滑稽行为。俾斯麦的有利一面只是，保持邦联議会的职权和在易北河公国建立一个軟弱无力的小国同德国的一切經濟利益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因此普魯士的并吞政策和暴力政策就更加得势。

1865年夏天，事态已經发展到使奥地利和普魯士完全决裂的地步。可是两个对手暂时都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决战。他們又用加斯泰因条約勉强粘合了这条裂縫，保留了共同占有权，并决定霍尔斯坦公国归奥地利管轄，什列斯維希公国归普魯士管轄。誰都知道，这样做只能赢得一个苟安的机会，对这一点，任何人也沒有訂条約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双方都寻找同盟者，而俾斯麦又掌握了較大的王牌。由于普魯士政府曾經参加鎮压波兰起义，俄国被普魯士爭取过来了，波拿巴由于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处于窘境，不得不又把威尼斯当做一块食物扔給意大利运动，而無論是用金錢或用好話交換，奥地利都是不肯放弃威尼斯的。1865年秋天，俾斯麦到法国謁見波拿巴，請求这位“各民族的”崇高的“保护者”恩准“德意志統一”。为了王朝的侵略目的同外国勾結，是旧普魯士的政策，当俾斯麦企图通过得到波拿巴的善意庇护的普魯士-意大利反奥同盟，一跃而成为“民族英雄”的时候，他对于老弗里茨的光荣传统，决不是不忠实的。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說法，說他負担了一定的义务，即取得胜利时，要割让一部分德国領土給法

国,这种說法在形式上可能是过甚其詞;不过他长期助长了波拿巴侵占德国領土的野心,这是肯定的,这一点就足以說明他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特征。当然不能忽略,所有别的“德国国务活动家”,不管是維也納的、慕尼黑的、德累斯頓的,还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在同样場合也不会有別的做法。为了王朝的目的牺牲民族利益,是他們一貫喜欢使用的伎倆。至多他們沒有俾斯麦欺騙波拿巴的才能,在道德上他們都是半斤八兩。俾斯麦比他們乃至他的塞納河畔的好朋友高明的地方是,他具有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两种特性:首先他有一种意志,其次他有一个目标。

俾斯麦的邦联改革計劃同波拿巴的保护和意大利的同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他对从意大利到柏林来談判的高封納將軍說,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很容易引起一場战争,可是这个問題还小,不足以引起一次大战。一般的德国問題必然被扯到这一事件中來。事关巨大的民族利益,欧洲就更安靜地作壁上观。俾斯麦在这里所說的欧洲是指波拿巴,俾斯麦的邦联改革迎合了波拿巴的陰謀。1866年4月8日,在普意两国对奥地利的攻击同盟締結以后,4月9日,普魯士政府向邦联議會提出一項提案:召集一个由全国直接选举和根据普选法产生的議會(會議日期需要进一步确定),以便接受和討論德国各邦政府关于改革邦联制度的議案,这些議案在开会以前,通过各邦政府彼此間的协商提出。

这个提案的表面理由照例包含长篇廢話。一切波拿巴主义常常用这种廢話来掩盖自己的沒有理想、玩弄陰謀的政策。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被說成是保守党的原則,是从保守党的立場出发,宁願采用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不采用任何別的以巧妙的配合为基础的选举形式。目前的邦联制度在欧洲巨大危机期間,不是把德国交給革命,就是把它交給外国統治;为了避免这两者,有必要进行

一次邦联改革,根据 1848 年的經驗,无论是各邦政府的片面行动,或是民族的片面行动都不能实现这一改革;只有双方齐心协力,才能在旧邦联的基础上并在它的范围内,产生一个新的能够存在的創造物。俾斯麦提出革命年代的議会在这上面栽了跟斗的著名的协商原則,說它是解决德国糾紛的不可缺少的灵丹妙药。要末他<sup>221</sup>就是真正出于一种可笑的誤解(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他那偏頗的头脑往往产生这种誤解),要末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少量廢話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是无足輕重的,因此許多事件可以由他的政策得到說明。

他的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報紙的言論毫不含糊地說出了这些真正的目的。以波拿巴为榜样,俾斯麦玩弄两面手法,也就是两种两面手法,即在王朝与民族之間两面討好和在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之間两面討好。《十字报》对中小邦政府說,把你們还能得到的东西拿走吧;俾斯麦給你們的东西,你們将来任何时候都不会再得到。单是你们,决不能控制資產階級民族运动;如果你們想用議会制度的武器打击它自己,你們就需要一个德国議会。当然这样議会里更会发生騷动,可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制止这种越軌行为,那就是不管这种事情。最近六年的普魯士历史最确切地证明,这是可能的。”相反地,《北德总汇报》說:“普魯士不得不遺憾地觉察到,目前出現了这样一种現象,德国各邦政府仿佛利用武力反对国家改革。維尔騰堡、汉諾威、薩克森、黑森-达姆斯塔特和邦联其他各邦,不願出于对奥古斯滕堡王子的爱而投身于一場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是显而易見的。如果人們断言,备战的各邦政府引起了反对普魯士的大战,同时也就用武力反对实现哪怕是最起碼的民族要求,那么人們就大大接近了真理。”然后这个半官方的主要報紙就几乎毫不掩飾地以“革命”相威胁,也就是說利用普魯士暴

力推翻反抗的小国君主。

除去在王朝与民族之間两面討好以外，还在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之間两面討好。半官方的《地方通訊》用幻想誘惑进步党說，通过統一集中德意志軍隊，所謂的邦联改革将把普魯士的軍事負擔轉嫁到全德国身上，就用这个办法消除宪法糾紛。全官方的《国家通报》給資產階級端上一碗美味的菜肴，它列举了許多經濟改革作为邦联改革的要点，如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統一的币制和度量衡制、在国外对德国貿易的保护、德国領事和其他答应彻底取消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的許多經濟改革。

如果資產階級仍然不听这一套，那么就用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誘惑无产階級。俾斯麦认为現在可以打出这张王牌。他考虑到易北河东的农村群众，在他們的精神的黑夜里还没有露出政治認識的曙光。俾斯麦希望，像他通过废除等級选举扩大选举权那样，通过拒絕发給議員日薪，在同样程度上限制被选举权，然后他仍然在关于“君主主义者”拉薩尔的美梦里生活。可以吵醒这场舒服的小觉的許多鬧钟，已經响过了；后来柏林警察厅在一个官方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承认，起初它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当做一种“冷靜的合法的宣传活动”，所以尽管它违反結社法第八条（政治团体的联合），仍然容許它存在，可是在科伦集会事件中，警察厅才睜开了眼睛，于是就急忙封閉柏林支部。然而平庸的警察所理解的东西，天才的政治家还没有理解。这时俾斯麦还认为可以玩火。

政府在关于联合自由的辯論中准許成立的工人問題商討委员会于1865年夏天召开會議，可是經過几次不着边际的辯論以后又散了会，除去一堆沒有价值的廢紙，用普魯士官僚的話來說，就是“有价值的材料”而外，沒有留下任何东西。必須更严厉地鎮压紅色鬼怪。1865年10月，布赫尔写信給馬克思，請他担任官方的《国家通

报》的撰稿人。<sup>①</sup>当他遭到馬克思的拒絕以后，他就向当时刚刚发表了一些国民經济学的著作而为人所知的私人讲师欧根·杜林，提出同样的請求。杜林又拾起西斯蒙第的关于劳动階級消費不足的旧观点，把它当做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弊害，然而他不像洛貝尔图斯那样，通过国家实行的正常工作日制医治这种弊病，而想223通过工人在自由联合的情况下，爭取到較好的劳动条件，而發揮独立自主的首創精神来医治这种弊病。杜林担任了《国家通报》的撰稿人，可是不久就同編輯部鬧翻了。虽然如此，1866年4月，瓦蓋納还去找过他，約他写一个关于如何能够“为工人做点事”的建議书，以备內閣“直接使用”。杜林也交出了这篇作业。5月9日，施韦泽被假释了，冬天他因为有病就提出过許多医生证明，可是沒有发生任何作用。从1866年年初起，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终于又以十倍的力量恢复了她从沒有完全停止的煽动。她昏头昏脑地把普魯士的邦联改革理解为实现拉薩尔的民族綱領，她的蠱惑活动使得全德工人联合会成为俾斯麦的工具，不管她同“伟大的大臣”的关系是近是远，也不管她花的許多錢是她自己的财产，还是从别的基金中弄来的。

自上而下的革命就是这个样子。它非常强大地武装起来反对邦联議會的不幸統治。如果要鎮压这个革命，那么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可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想革命的工人階級不能革命，能革命的資產階級甚至早就不想在口头上革命，更不用說实际进行革命了。一旦事态开始严重化，曾被吹得天花乱墜的进步党的团結就化为一片混乱。普魯士分立主义利用民族的华丽詞藻在某一个人身上发生了效力。特韦施騰声称，

<sup>①</sup> 參閱1867年12月7日，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原編者（載馬克思：《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頁。——譯者）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普魯士政策遭到失敗”，齐格勒对他的布勒斯劳选民高呼，民主派的心經常寄托在国家的旗帜上。其他一些人又声嘶力竭地抱怨即将爆发的战争威胁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同样声嘶力竭地咒罵破坏国内和平。民族联盟在这一方面做得更为突出，它也庄严譴責俾斯麦的邦联改革。卡尼格先一伙为“普魯士的领导”做过很多工作，几乎已經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而現在却大喊救命，因为“普魯士领导”暴露了它的本来面目，而它只能是这个样子，不会是別的样子。

德意志人民党构成了第三个小組，这个党认为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政策沒有成功的希望，一年以前就开始脱离这种政策。人民党中有許多正直和能干的民主主义者，如毕希納、埃卡尔特、拉登多夫、普福等人，但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分子，如法兰克福的宗納曼之流的狹隘共和主义者，奥古斯滕堡的和汉諾威王党的分立主义者，后者由于他們的世襲君主的特权受到威胁所洒的眼泪，即使不比他們为俾斯麦的其他暴行所洒的眼泪更为辛酸，也是不相上下的。1865年9月，当德意志人民党在达姆斯塔特举行成立大会时，事实立即表明，在当代的两个重大問題，即民族問題和社会問題上，党内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的。分立主义者死抱住他們所喜爱的联邦原則不放，而对这个原則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从君主主义观点，有的从共和主义观点看問題。交易所民主主义者反对社会改革的要求，而毕希納和埃卡尔特则想通过这些要求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接近。德意志人民党的机关报，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声称，要把民族問題和社会問題当做沒有解决的問題加以討論！

只要“中小邦的联合”能够成为德意志的統一和自由的萌芽，在最迫切的問題上，就会达成一种諒解。路德維希·普福在一份特別的传单中說明，这并不是重提鼎足三分的老主意，即把德国分

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中小邦联邦三个部分；这种鼎足三分思想是“一个三头怪胎，是由教授的幻想和对君主的屈从在受到侮辱的革命之床上生产出来的”。德意志人民党所追求的中等邦的联盟，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其他枝节可以聚集在它周围的第一个核心。而埃卡尔特却在《德意志周刊》上发表意见说，人们指责德意志人民党，说它既打着正统主义的旗帜，又打着共和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党员是共和主义者，可是他们却认真对待中小邦的联盟，这是德国人民对他们的君主的一个请求。如果君主希望有一个君主制的联邦国家，德意志人民党将号召人民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要这种国家，他们就心甘情愿地被俾斯麦所吞并。既然德意志人民党的最正直、头脑最清楚的分子，在这种确实认真对待，但却模糊不清的观念上打圈子，这个党就没有本领解决德国问题。 225

年轻的工人党必须在对立的利益和意见的混乱状态中寻找自己的道路。

## 二 普奥战争前的工人阶级

自从发表论俾斯麦的文章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始终不渝地追求这种德国政策，只是避免用来装饰论俾斯麦的文章的、容易被误解的词语。《社会民主党人报》曾在那些文章中谈过俾斯麦的“卓越的”政策，这次却严厉批评俾斯麦到波拿巴王宫去朝觐，并为“可怜的普鲁士”叹息，它为了用“出卖德国”博得波拿巴的恩宠，而“满载它的伟大计划”，赶到“巴黎去”。《社会民主党人报》同瓦尔德克和齐格勒一伙的旧普鲁士民主派毫无共同之处。它说，普鲁士领导就是普鲁士领导，如果它装做隐蔽的反动派，装做假自由主

义,目前的混乱还要严重得多。就其内在的性质来看,普魯士是一个专制国家,从来没有存在,也决不能存在什么自由主义的普魯士。“等待它将来可能发生变化,那就是期待某种本质上不可能的事物。”要是这样,人們也就有理由希望土耳其的教法說明官和宗教学者宣揚基督教。

《社会民主党人报》像反对“普魯士专制制度”那样尖銳地反对“奥地利同天主教締結協定”。它說,奥地利是德国分裂的保护者,因此中小邦的反动政府都站在它那一边。可是,如果說德国的奥地利化和普魯士化是損害公共利益的,可恨的,那么任何形式的“鼎足三分”都是可笑的和不屑一顾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欢迎德意志人民党,說它是德国現有的资产階級民主主义分子的最值得贊揚的組織尝试,也欣然表示,只要工人階級的利益需要,就在策略上同它合作,但是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它在民族問題和社会問題上的模糊观点。《社会民主党人报》強調,現在要想装扮成“純德国的国务活动家”的博伊斯特和达尔維克一伙以及中小邦的其他政治家,是“最殘酷的极端反动时代的大臣,是王侯的彻头彻尾的奴僕”,报纸用一句简单的話駁斥了德意志人民党所追求的“中小邦的联盟”,它說,“如果事态严重,比如某些君主必須最終地和不可更改地决定,他們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一个大王室而放弃他們的全部主权,这些君主宁願呻吟着匍伏在他們同儕的脚边,也不願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走过他們首都的街道。”

《社会民主党人报》认为通往德国統一和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德国革命。因为德国的大邦的武装冲突造成許多机会,給德国革命带来最后一綫希望,所以报纸不贊成资产階級的和平叫囂。阿尔伯特·朗格也在《下萊茵使者》上写道,由于比較深刻的理由,真正希望俾斯麦由于企图执行他的綱領,而使共和党有可乘之机的人,

現在最好让他为所欲为，一直到他不能回头为止。在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在萊比錫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人們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发出沉痛的叹息，倍倍尔作为唯一的反对者在大会上宣称，不要这样害怕；战争将会发生同作战双方所想像的完全不同的情况。人民将在适当的时刻起来，按照自己的意志結束战争。做好战斗和行动的準備，待机而动。不信任任何人，但信任自己，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66年的危机中向工人阶级推荐的政策。

它把俾斯麦实行普选权的这一措施，看做是进行实际干涉的第一个机会。当然它沒有誤解俾斯麦的动机，对于半官方报纸的<sup>227</sup>誘惑反駁說：“至于我們，我們知道，我們既不要大普魯士，也不要大奧地利，而是要一个自由、統一的德国，根据民族願望而实现自由和統一的德国。如果普魯士願意帮助締造这个德国——好，它可以嘗試一下，那就要它变成一个同它至今恰恰相反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它使它的事业成为我們的事业，我們願意暂时合作，但是在别的意义上，我們决不这样做……我們觉得工人的情緒正好表明工人对普魯士政府及其权力欲所采取的合适的态度，这对大普魯士主义沒有有什么好处。其他一切都是官方的願望和幻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声称，俾斯麦“不是出于自願，而是为形势所迫”才采取“不彻底和沒有力量的召集議會”的步驟的；它也公开声称，如果工人因此受到欺騙，那就是“一切事情中最悲慘的事情”。但是它建議利用普魯士首相的窘境。从来还没有一个历史上的进步，是由于当权者的好心造成的，可是巧妙地利用他們的窘境，往往会造成历史的进步。工人阶级應該利用現有的武器，“不是按照那些人的願望，而是按照我們的願望”。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我們参加选举！我們不是因为俾斯麦召开了这个議會而参加选举，虽然他召开了这个議會，我們也

不選舉，我們所以選舉，是因為我們反對袖手旁觀的懦弱政策，因為我們要參加社會事務中發生的一切事情，只是因為我們，——工人黨能夠阻止怯懦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最近出賣人民的事業。”同時，《社會民主黨人報》建議，為了推動俾斯麥在他勉強走上的道路上前進，而為普選權進行最有力的宣傳活動。

228 這裡簡單扼要地說明的策略，像一根紅綫貫穿着《社會民主黨人報》在施韋澤被捕前後發表的論述德國問題的文章。政府可能出於某種打算才把他假釋出獄，可是施韋澤卻沒有付出政府所希望的報酬，就像馬克思對待布赫爾的拉攏那樣。在這個時期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也找不到一句話，是為了直接或間接推動普魯士的暴力政策而寫的。毫無疑問，假如拉薩爾還活着，他向工人階級推薦的政策，就是施韋澤向工人階級推薦的政策。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弱點不在於它當時的策略，而在於它當時的組織。它還沒有鞏固到使闖進來的戰爭風暴不能把它吹得搖搖欲墜的程度。許多德國工人還沒有階級覺悟，而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對他們的階級利益還不明確，而被卷入漩渦之中，德國事件在這個漩渦里趨向普遍的災難。聯合會的老核心部隊是够勇敢的，但是不够堅強，不能控制自上而下的革命引起的憤慨的浪潮。

在德國，沒有一個地方像薩克森王國那樣，在狹小的地區內，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發生如此嚴重的衝突。在這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小邦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直接對立，現在這個小邦夾在普魯士和奧地利中間，有成為戰場的危險。薩克森政策的主宰是親奧地利派的博伊斯特，他也許是那些侏儒外交家中最能干的，無論如何是最惡劣的一個，這些外交家的手上還塗滿白色恐怖的血污，却亂喊德意志民族的口號。博伊斯特的備戰引起薩克森資產階級的不滿，薩克森資產階級決不願看到自己的買賣受到損失，尤其是該

邦的大工商业城市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对于小邦的狭隘守旧感到厌倦，希望为普鲁士所并吞。因此，萨克森的无产阶级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不能进行革命，但它也不能像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无产阶级那样容易地采取一种待机攻击的立场，因为战火已经烧到它的手指了。

本来，这个时期萨克森无产阶级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形成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核心和骨干；德累斯顿协会在鞋匠克内弗尔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倍倍尔使莱比锡协会保持原有的水平，在这个协会的教师中，李卜克内西特别活跃，他被逐出柏林之后，就定居在莱比锡。尤其应该感谢倍倍尔的努力的是，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组成了一个地方联合会，二十九个协会共有四千五百七十九名会员，由他们举办的合作组织有：五个储蓄所、两个信贷合作社、五个消费合作社、一个消费面包房、四个疾病互助会、两个残废互助会、两个丧事互助会和一个织工合作社。在这些协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萨克森支部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两个组织常常共同举行大规模的民众大会，正是现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十分坚决地同《人民报》的进步党-自由贸易派的宣传活动断绝了关系。起初民族问题也不是造成意见分歧的原因。4月28日，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个有二千五百名工人参加的大会；这个大会由弗尔斯特林和克内弗尔召开，并在他们共同主持下进行讨论。大会要求召集一个德意志制宪议会，这个议会以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为基础，进行秘密投票，被选举权不受限制，这样做不仅为了调整政治关系，也为了着手解决社会问题，大会还要求全民武装，以支持这个议会。这个决议在原则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它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德国革命才能拯救德国的统一和自由。当然，关于无产阶级对于交战国的策

略态度，一点也沒有談到。

当萊比錫資產階級在市当局的领导下，要求薩克森內閣立即停止备战，并开展与普魯士友好的宣传活动的時候，問題就变得紧迫了。为了对抗这个宣传活动，5月8日在萊比錫举行了一个有将近六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也同德累斯頓大会一样，薩克森无产階級的两派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弗里茨舍、烏特克、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是继弗里茨舍之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萊比錫支部的施坦納。这个大会在对資產階級的俾斯麦傾向提出正当抗議方面，超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努力保持的界限。

230 1848年的老民主主义者认为，博伊斯特的过去，有許多地方是應該反对的，可是現在他同奧地利一样，站在德意志的立場上。倍倍尔提出的一个決議案，就其主要內容而言，还以德累斯頓決議为主臬，但也已片面宣布反对普魯士侵略政策，贊同博伊斯特內閣的备战，认为它是“防御措施”，而由烏特克提出的一个決議案則等于毫无保留地鼓励博伊斯特的政策。在除了原提議人和其他一些人之外，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內西也表示贊成以后，两个決議就一致通过了；这样就造成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策的第一次严重背离。

美因部的情况同薩克森王国相似，只是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矛盾在这里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彻底攪乱了德国状况的风暴，在德国西南部揭开了小市民的底。5月20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个有三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虽有工人参加（比如工人教育协会的倍倍尔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韦尔凱尔），却被德意志人民党的首領所控制。这个大会的決議同德累斯頓和萊比錫的決議有十分显著的差別。它专门反对俾斯麦破坏和平的政策，把任何中立都叫做怯懦和出卖。它一方面无条件地否定普魯士的邦联改革，一方面要求立即把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組成一个特別

国家,此外还要求“一个有必要权力的制宪议会”,但一点也没有提到选举权问题,最后表面强硬地要求“各邦政府依法实行全民武装”。韦尔凯尔已经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个决议,而倍倍尔还表示赞同并参加了起草反对普鲁士统治欲的纲领的人民党委员会。这个不久就发表的纲领以法兰克福大会的决议为依据,不过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让步,即除了反对普鲁士领导而外,也明确反对奥地利领导。它希望在自决权的基础上,把德意志各邦组成邦联,以实现德国的统一,它主张邦联成员在战争中不执行王朝政策而执行民族政策,以此在奥地利一方缓和战争危机。这个要求本意很好,可是向博伊斯特及其一伙提出,实际不能起别的作用,而只等于要求盗墓贼不要亵渎陵墓,而像羔羊一样在草地上吃草。

这一年,由于时局不稳定,德国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没有举行,可是6月10日委员会在曼海姆开会,结果少数人倾向亲普鲁士的立场,多数人则赞同人民党的立场。此外对于工人教育协会的冷淡态度的怨言越来越多,它们之中的大多数,迟迟不缴会费。德国无产阶级中的混乱状态显得这样严重,以致阿尔伯特·朗格都不再希望起到有益的作用。他使《下莱茵使者》停刊,在6月29日的最后一号中说,他不断努力推动工人团结一致,认真思考,有计划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而现在群众受到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似乎拥有大量资财的代理人的挑拨。秋天,朗格迁居瑞士,可惜他直到病得要死的时候,才从那里回到德国来。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对拥有大量资财的代理人发出了许多怨言。不过它直言不讳,并揭发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给这些代理人撑腰。她企图利用工人对发财致富和有一个有权势的保护人的幻想争取工人,可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应忘记,它是一个德意志民主党,对这个党说来,自由和平等同样重要,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达

到平等。因为伯爵夫人不能把她的真正意图告诉工人，所以她就抓住两个表面现象不放，其一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在地莱比锡的警察署在特耳克证明他被剥夺普鲁士国徽，但并没有丧失公民权以前，不肯承认特耳克被选为主席，其二是，把主席和书记的职务合而为一，违背了联合会章程。3月12日，伯爵夫人和特耳克在爱北斐特附近的福文克尔会谈，她劝他举行一次“拯救性的政变”。她叫特耳克以主席的身分发布一道命令，宣布杜塞尔多夫代表大会以来，联合会中发生的一切完全无效，并声明自己是拉萨尔的直接后继人，维尔姆斯是联合会的书记。这样，伯爵夫人就答应消除莱比锡警察署对选他做主席一事的反抗。特耳克坚持立场，但是为了尽可能消除伯爵夫人重新争吵的一切借口，在3月29日发布了一项命令，把主席和书记的职务重新分开，并任命哈森克莱维尔为联合会书记。5月1日，哈森克莱维尔就要迁到特耳克的住处伊塞隆去；为了薪金问题，两个人达成了“不影响财政状况的协议”。此外特耳克还任命汉堡的全权代表佩尔为副主席，任期直到警察当局承认他是主席为止。

这一切当然不能使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满意。她在同特耳克会谈时，虽然特别指责希尔曼是使联合会发生财政困难的罪人，但是现在她又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变，使这个罪责严重的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希尔曼担任了这个不值得羡慕的角色。只要官厅不承认选举特耳克当主席，特耳克就不能以主席的身分发布合法的命令；联合会的唯一有资格的代表仍然是希尔曼，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曾委托希尔曼领导直接选举，经过直接选举，特耳克才当上主席的；希尔曼、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莱比锡警察署就这样得出了结论。

这个官署的态度是非常模糊的。普鲁士十一月政变的不公正的法律剥夺了许多正直人士佩带国徽的权利，齐格勒也是其中的

一个，他常常喜欢取笑摘掉他的这个宝贵的装饰品的行为。普鲁士容克请求齐格勒不要常常用这种他们不愿意重提的旧事嘲笑他们，而像莱比锡警察署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市政机关，却用这件陈案给特耳克擰了一条道德的绳子。特耳克徒然地利用法律判决证明，即使他过去确实没有公民权，他也早已恢复公民权了。莱比锡警察署要伊塞隆警察署开一张证明，可是特耳克的死敌，许尔斯曼市长拒绝发给证明。不仅如此！莱比锡警察署越是热心地在特耳克的眼睛里找木片，就越是忽略希尔曼眼里的横梁。一年以来，希尔曼就处在破产的境地，按照萨克森结社法，他连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也不能当，更不用说当主席了。莱比锡警察署的奇怪态度也许可以由乍看之下使它显得双倍奇特的那种状况来解释；作为市政机关，它受到市议会和这时正对俾斯麦政策讨好的市议员的约束，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就是这样，她用她对莱比锡警察署的影响来自夸，是决不为过的。

5月10日，希尔曼进行了特耳克拒绝进行的“政变”。他定于5月20日由各支部会员选举新主席，6月3日在巴门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并任命维尔姆斯为联合会书记，同时让现在终于应该付给维尔姆斯的拉萨尔的遗赠发出金光。特耳克用5月21日在汉堡召开理事会会议的行动，回答这个政变。于是不可救药的混乱发生了。老会员虽然忠贞不二，5月20日，只有个别支部遵照希尔曼的命令选举主席，但是现在事实再一次表明，可悲的财政状况多么严重地削弱了联合会的行动力量。4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不得不改每日出版为每周出版三次，因为会员不断地抱怨订费太贵。金库里的钱越来越少，而伯爵夫人却大量挥霍钱财；特耳克连到汉堡出席自己召集的理事会会议所需的旅费都筹措不到。到会的理事根本不够可以作出决议的人数；只有六名理事出席，他

們大多是漢堡本地的或漢堡附近地方的：除去奧尔多夫和佩尔以外，有哈尔堡的約克、不来梅的德克維茨、不伦瑞克的白拉克和德累斯頓的弗尔斯特林。

施韦泽以联合会机关报代表的身分从柏林来开会，同时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也来了。她現在公开拿出了自己的計劃。她答应，只要选举希尔曼担任主席，她就使联合会摆脱一切困难，主席和書記的薪金都由她掏腰包。到会的大多数理事都用《奥尔良的姑娘》<sup>①</sup>中的利昂涅尔的話回答伯爵夫人說：“夫人，您回家去吧！  
234 我們要用好武器取勝，而不用女人。”可是伯爵夫人爭取到德克維茨，尤其是联合会司庫弗尔斯特林，他不久就到萊茵省希尔曼和維尔姆斯那里去了。現在联合会沒有一个干部的权利名义是可以不受攻訐的，从这一点來說，它的組織已經完全瓦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施韦泽和忠貞不二的理事們在向萊比錫警察署的看法让步方面取得一致意見。他們估計大多数會員不会被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明显的陰謀所欺騙，可是，如果代表大会拒絕选举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寵臣当主席，那么这种严重的混乱状态就可以最快地得到制止。因为特耳克沒有到漢堡参加會議，不能同他进行协商，于是决定由《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建議佩尔为主席候选人，不願使联合会落到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及其教唆者手中的所有會員所投的票必将集中到佩尔身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同时，使工人們清楚地看到，他們必須設法为联合会建立合理的財政制度。依靠捐款和遺贈过日子，對他們說來是不体面的。如果說他們在至今在联合会占統治地位的“前所未有的貨幣經濟”的情況下，不願牺牲自己的金錢，是可以理解的，

① 指德国作家席勒的劇本《奥尔良的姑娘》(1801)。——譯者

那么建立和維持一个良好的財政組織也是必要的。英法两国的工人联合会从沒有由于这种可怜的障碍而遭到失敗，德国工人运动也不应由于这个障碍而失敗。

强有力的干涉正在发挥作用。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和她的傀儡又企图贏得時間进行阴谋活动；他們要求代表大会由6月3日延至17日举行，而当大批萊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同希尔曼断絕关系的时候，他們又要求大会由巴門移至萊比錫举行。可是左进右跳都无济于事。6月17日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萊比錫举行，贊成佩尔到年底为止担任主席的有六千零八十二票，而贊成希尔曼担任主席的只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代表三十四个地方。如果不是到西部去的铁路交通已經中断，以致几乎全部贊成佩尔的萊茵-威斯特伐里亚各支部只有巴門有代表出席大会的話，佩尔得的票数还要多得多。希尔曼答应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接受了大会对他的态度表示的謝意，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女保护人在第二天就又开始了新的煽动。

由于哈森克萊維尔和維尔姆斯都被征当后备軍，关于書記职位的爭执，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于是临时任命汉堡的J. 列文为書記，爱尔福特的J. M. 希尔施为會計。希尔施虽是一家酒店的經理，却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織麻布的工人，仅仅四岁，希尔曼就坐在紗桃旁边工作了，他嚐尽了由于机器生产而无产階級化了的織工們的一切苦难，直到一个偶然的机机会使他到酒店(先当小伙計)为止。

这样，联合会暂时又得到巩固，又可以考虑政治行动了。在延續几星期之久的混乱期間，《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治活动陷于停頓状态。它說，只要全德工人联合会不由一个游戏联合会和吵架联合会变成一个严肃的行动党，推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可笑

的，它就用这种痛心的話中斷了論《哈布斯堡、霍亨索倫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組論文。有人說，施韋澤被假釋以後，一半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一半在全德國的鼓動旅行中，為俾斯麥的政策進行背叛活動，這是鬼話。6月里，他一共發表三次言論，一篇論文刊登在6月6日至8日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一篇演說，是在6月11日對愛爾福特的二千五百名工人發表的，還有一篇演說，是6月16日在舉行代表大會的前夕在萊比錫發表的。這些言論既證明他為人正直也證明他很有才華。

發表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的論文對信貸銀行發表了評論，這個銀行是普魯士政府於5月中旬建立的，其目的是發行二千五百萬塔勒的證券，所有國家機構都必須按票面值接受這種證券，在私人來往中，並不強迫接受它。銀行的目的據說是“滿足信貸的需要”，政治危機越是帶來經濟危機，尤其是小市民就越感到這種需要。就這一點而言，信貸銀行毫無疑問是俾斯麥政策的一個輔助手段。保守黨和自由黨報紙，向兩個相反的方向誇大它的作用。按保守黨報紙的說法，成立信貸銀行彷彿是政府的一項令人驚嘆的天才行動，政府想用它來根本上消除群眾的經濟困難。而自由黨報紙則警告不要接受“偽幣”，因為政府是否有符合憲法的權力建立信貸銀行，至少是很值得懷疑的，它決不會得到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的眾議院的追認。此外它還斷言，信貸銀行只應幫助大資本，現在正直的自由貿易派突然在信貸銀行面前表現得惶恐萬狀。

在左右兩邊所進行的蠱惑面前，施韋澤履行了政論家的首要義務即揭發欺詐，對群眾說明對他們最重要的問題——新貨幣是怎麼回事。它首先研究了新貨幣發行的財政技術條件，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張紙決不是貨幣，而只能代替貨幣，但是信貸銀行的證

券同普魯士國家的一般紙幣同樣可靠。一種紙幣是根據憲法發行的，另一種紙幣不是根據憲法發行的，這與金融無關，金錢往來比人類社會中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多地注意實際情況，而不注意純理論的爭論，而普魯士憲法糾紛早就成為這種爭論了。如果普魯士的情況良好，接受信貸銀行證券就沒有什麼危險，在相反的情況下，當然缺乏一切保證，因為在困難時期，各邦政府就草草應付它們所負擔的義務。

關於信貸銀行本身，施韋澤說，它不是什麼天才的啟示，而是各邦政府在大危機時期為了稍稍緩和困境而常常使用的一種手段。它不能改變整個經濟狀況。現在的經濟危機應該由那些為了王朝的利益而造成戰爭危機的人負責；信貸銀行不能消滅危機，只能使它稍稍減弱。只有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終於都对大資本有利的时候，信貸銀行才对大資本有利；在這個一般的前提條件下，信貸銀行主要對小資本有利，“當然其方式是只有在現在的情況下才可能的、不十分令人欣慰的”。至於工人，他們是受資本剝削的，不管受大資本剝削還是受小資本剝削都是一樣；對他們說來，信貸銀行只可能有這樣一種好處，那就是仍然選擇繼續受剝削的可能性，而不選擇簡單地餓死。如果進步黨反對信貸銀行的宣傳鼓動能夠保證人民代議機關的批准預算權，那麼工人就必須站在鬥爭者的前列，可是，在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怯懦早就放過採取決定性行動的正確時機以後，就沒有一點這樣做的希望了。

6月11日，施韋澤在愛爾福特做的報告論述了社會主義和土地私有制。他極為通俗地說明了地租的性質，粉碎了土地改革論者今天還抱有的妄想。他指出，只有社會化生產才能消除土地私有制給勞動階級帶來的可怕弊害。這個報告不僅是施韋澤的最好的業績之一，也是論述土地問題的社會主義文獻所提供的最優秀

的作品之一；恐怕还没有人这样清楚明白地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論述过这个问题。

最后，施韦泽在莱比錫所做的报告論述了社会民主党目前的任务。他扼要地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闡明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观点。无限悲惨的、也就是形势的无可名状的禍害就是，问题仅仅在于，应该由普魯士，还是由奥地利在德国进行統治，在这个时刻以及在可以預見的将来，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刚刚成立了几年的年輕的工人党不能用魔法改变这种状况，它在这种不幸的时刻只能确定，如果人民不能起来反抗王朝，应该由自由派的，尤其是小德意志派的資產階級哥达派負責。工人党既不能热中于普魯士专制主义，也不能热中于奥地利的愚化政策，它只能把力量放在使困难的政治形势迫使普魯士政府对工人階級所做的让步成为真正的成就方面。“首先在整個普魯士国家，其次在全德国我們影响所及的地方，必須召开群众大会，强制地，甚至用威胁手段向普魯士政府要求普选权，把它看做是人民的不可缺少的当然权利。”如果人們終于要問，工人在奥地利和普魯士的爭执中应不应该表示态度，回答是：“还不！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向我们让步的道路上，把普魯士政府繼續向前推动——如果事态变成这样，即我們的作战基地只能在普魯士，而在奥地利，我們仍像过去一样被捆住双手——那么，我們就表示态度，不是像說謊者和头脑简单的饒舌家所說的，反对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反对奥地利的統治和邦联制度；然后我們就希望（并且做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不是奥地利軍隊取得胜利，而是普魯士軍隊取得胜利，不是貝奈德克的軍隊取得胜利，而是俾斯麦的軍隊取得胜利。”第二天，代表大会就根据这种見解决定，毫不懈怠地尽一切力量进行爭取普选权的宣传活动，不仅德国議會应该根据普选法选出，就是各邦的邦議會也应该

根据普选法选出。

当这个决议做出来的时候，德国人民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了。

### 三 普奥战争后的工人阶级

几个星期之内，情况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军队很快就打败了奥地利的和在紧要关头站到哈布斯堡王朝一边的中等邦的军队。被打败的各邦政府，包括维也纳宫廷（卡尔斯鲁厄宫廷除外），都投入波拿巴的怀抱乞求援助，以此来表现它们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法国的抗议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前进，根据法国的建议缔结了和约。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一方面也证实了它的性质，当它被一个外国专制君主的命令所阻止的时候，它就必须在半路上停止不前。 239

因此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奥地利放弃对德国事务的任何干涉，可是这样一来，它的德国各省也就不属于德国了。美因河以北的各邦组成了一个联邦，使得由于并吞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而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王权，十分沉重地压在一群小藩臣的头上。而美因河以南的各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一部分却悬在半空中；它们可以个别地或共同地充当欧洲国家，也可以同北德意志联邦发生“民族的联系”，一切都随它们的便。

一开始就很明显，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事实上，也没有人相信它会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同过去一样，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即通过在普鲁士军队取得重大胜利以后，被推得比1848年三月事变以来更远的革命，才能得到包括德意志-奥地

利諸省在內的德国的統一，可是不管美因河綫如何适合普魯士政治的傳統，不管它在俾斯麥同波拿巴的會談中能起多大作用，自从奧地利被逐出德国以后，它就失去它旧日的叛国的意义了。在柯尼希格累次<sup>①</sup>附近得胜的不是普魯士的學究（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恭維話，要想宣布这是撞針<sup>②</sup>的胜利），而是三十年来創造了巨大的經濟領域的關稅同盟。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天都在这个經濟領域內征服新的地区，这个經濟領域的經濟需要就是产生統一国家的要求的真正土壤。使得这个經濟領域同奧地利結合起来的政治紐帶越是成为束縛它的經濟穩固的枷鎖，就越容易被扯断，而它自己的經濟联系更不会由于拘泥于国家法律而被拆散。南德各邦不能扮演欧洲国家的角色，它們也不能成为法国和奧国的藩臣，除非

240 三十年来共同成长的、处在資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的大經濟領域被分为上千的碎块，而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俾斯麥了解形势，懂得用不可否认的技能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种形势。現在他正在执行 1864 年他对俄国樞密顧問艾維尔斯闡明过的或者可能闡明过的綱領：“我要收买一些人，吓倒一些人，打击一些人，最后我領着他們大家反对法国，把他們都爭取过来。”俾斯麥抑制着国王的貪心，本来人們用尽一切力量才把国王推入战争之中，而現在国王却威胁說，如果他不能按照旧普魯士的习惯并吞同他目前的力量相适应的土地和人口，他就退位。同奧地利一样，南德各邦也在非常溫和的条件下得到了和平；俾斯麥由它們那里得到的暫時保守秘密的攻守同盟，对他說来比巴伐利亚或士瓦本的若干平方里的土地更有价值。俾斯麥根据“用一个半流氓

① 捷克城市，在布拉格以东，現名赫腊德次-克腊洛佛，1866年7月3日，普奧兩軍在这附近决战，普軍得胜。——譯者

② 普奧战争中，普軍用的是优于奧軍老式枪的撞針发射枪。——譯者

对付一个流氓！”这句諺語来对付现在低声探問“补偿”的憨直的波拿巴。从这时起他扮演德意志荣誉的严格的保护者，并不是出于他和他的国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的德意志的意向，而是为了普魯士政策的十分明显的利益。他仍然用对波拿巴对德国領土的野心“暂时不理”的办法，得到这种利益，这种办法只是引誘狐狸进入陷阱的誘餌。

資產階級也以它的方式(可是也只是以它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形勢。战争爆发以前，俾斯麦解散了众議院，这次他对民族神經的投机比1863年有較好的成果。在进行普奥战争的主要决战的那个7月3日，众議院的进步党多数派在初选中消失了，至今进行統治的党也分裂了。从旧封建党中分离出一个自由保守党，它了解，不对資本主义作某些让步，就不能实现德国的普魯士化，从进步党里則分离出一个民族自由党，只要資產階級的物质利益得到滿足，这个党就毫无怨言地放弃資產階級的政权要求。当俾斯麦要求議會追认过去几年的沒有預算的財政时，民族自由党深受感动；众議院里的絕大多数議員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政府多么需要这种追 241  
认，也沒有企图修改宪法第九十九条，使得将来众議院的批准預算的权力得到明确的保证，他們就同意了追认法案，以致后来国王就說，他在同样的情况下，經常像在宪法糾紛的那几年里那样行动。瓦盖納解释这种追认說，它不是糾正政府的过錯而是证实政府的正确，这种說法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假如从进步党的保留旧名称、坚持旧綱領的殘余分子中至少产生出一个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就好了！可是这一点也談不到。在逐漸消失的进步党中，分子非常复杂；除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而外，还有像克拉森-卡佩尔曼这样的立宪主义懦夫，像瓦尔德克和齐格勒这样的热狂的普魯士人，像欧根·李希特尔这样的大

資本的狡猾的佞臣(他是布萊希勒德家族的天生的代理人,由于职业不适合感到煩惱而产生了不幸的思想),扮演着党的領袖和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旧进步党中只有一个人无视胜利的掌权者,仍然正直而勇敢地想把资产阶级的理想放在崇高的地位上;約翰·雅科比用羅馬十二銅表法中的話說: *contra hostem aeterna auctoritas esto* [你應該是反对敌人的永恒的权力], 人民有权要求反对自由的敌人。

无产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这样执行这种悲惨的政策。德国的变革根本没有接触到它伟大的最終目标, 問題仅仅在于, 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不是改变了。这个問題也立即得到了解答, 因为普魯士的胜利也就是反动派的胜利, 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沒有政治自由, 无产阶级就不能达到它的社会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必要了。剩下来要决定的問題只有一个, 即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进行; 是以新情况为基础呢, 还是站在这个基础之外。問題在于正确评价柯尼希格累次的那一天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呢, 还是一个冒险政策的偶然胜利, 它給德国的发展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呢, 还是使德国陷入一条死胡同, 不得不首先从这条死胡同里走出来。对这个問題的不同回答, 使德国工人阶级发生了几年的糾紛, 因而为德国悲惨的分裂状态付出了最后的代价。

全德工人联合会决定在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战争期間, 在萊比錫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争取普选权的宣传活动波瀾壯闊。根据暂时迁居柏林的新主席佩尔的指示, 西里西亚的会员首先召开了大会, 这些大会于7月的第一周在恩斯多夫、德拉杰希胡本、郎根比劳、彼得斯瓦尔道、施坦塞弗尔多夫、施托尔貝斯多夫、維斯特-吉尔斯多夫举行, 以在維斯特-瓦尔特斯多夫举行的西里西亚工人會議結束。7月的第二个星期里, 北德的几个支部召集工人在

汉堡、阿尔托那、基尔、平納貝克、埃耳姆斯霍恩、格吕克施塔特、伊策霍、不来梅、哈尔堡、汉諾威、不伦瑞克、馬格德堡、施泰廷等地开会；这一系列的大会以在汉堡举行的北德工人會議为其頂峰。7月下半月，中德和南德的各支部以同样方式在下列各地举行集会：萊比錫、童貝克、施忒特里茨、諾伊斯塔特、奧貝尔肯德勒、格林那、普劳恩謝尔、格龙德、格罗森海因、格劳豪、德累斯頓、来斯涅希、伯伦、璣姆堡、阿波耳达、貝尔費尔登、爱尔福特、美因茲、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奧芬巴赫、奧格斯堡、波希米亚的阿什；在萊比錫举行的中德和南德工人會議給这些大会做了終結。最后輪到萊茵-威斯特伐里亚各支部在下述地点集会：科伦、巴門、爱北斐特、容斯多夫、雷姆夏特、佐林根、瓦尔特、韦默耳斯基尔兴、杜塞尔多夫、盖雷斯海姆、希耳登、德伦多夫、杜伊斯堡、梅德里希、丁瓦尔特、米耳海姆、阿耳特納、哈根、伊塞隆、赫尔德和其他許多地方；在巴門举行的萊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會議，結束了8月里的大規模的群众集会。

这时候，硝烟已經逐漸消失，可以对战争的結果作一个概观了。在德国，沒有一个报纸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看得清，看得远。它无情地鞭責了奥地利內閣和“卑賤的”小邦可耻地匍匐在波拿巴面前，同时也在接連被警察沒收的三期中，譴責了《十字报》和《国家报》协调一致地为美因河綫进行的宣传。“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把我們祖国的可耻的分裂状态，变成更为可耻的分裂，而要求铁和 243  
血，那么很明显，你们为了可怜的王朝利益使我国人民流血流汗，是沒有良心的。”在締結和約的前夕，《社会民主党人报》既抑制了关于現在已經造成的美因河綫的反普魯士叫囂，也抑制了关于現在已經建成德国統一的亲普魯士叫囂。“新德国不是以美因河为界的德国……根据情况，計劃中的南德联盟在已經巩固的北德力量

面前，只能像一個影子似的存在着，簡直難以想像真正同普魯士對抗，那里的民族活動也必然被吸引到普魯士周圍。整個南方將成為一個附庸國，它本身帶有同主要國家聯合的傾向。”可是，即使不談習慣意義上的美因河綫，普魯士政府也應該受到同樣嚴厲的譴責。如果不是從這次戰爭中產生一個真正民族的創造物的話，它可以不對流掉的鮮血負責。普魯士政府的官方報紙要求停止為建立一個包括整個德意志的國家而進行的宣傳活動，認為不進行這種宣傳就是履行了愛國義務。“可是，這裡要考慮的不是什麼事情使普魯士政府及其官報感到舒服或不舒服，而是民族的不變的和未失時效的權利。我們沒有得到美因河綫，這是事實，可是，我們沒有爭得統一的德國，這也是事實。不到完整的偉大的德國屹立于歐洲的心臟，民族的宣傳活動就不可停止。”

約翰·雅科比在普魯士眾議院發表了一篇演說，抗議德國的新局面，《社會民主黨人報》在對這篇演說的批評中最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場。《社會民主黨人報》把這篇演說登在報紙的顯要地位上（因而又被警察沒收），並且補充說：“這篇演說怎能不使我們敬佩呢！在絕望逃跑、土崩瓦解的情況下，我們聽到了一個人的有力的聲音，這個人不為在他眼前發生的一段世界歷史的深刻印象所迷惑，不為自己陣營內部的背叛和墮落所迷惑，發出了爭取自由的舊日呼聲——他的漫長的一生的戰鬥呼聲。”雅科比說，他不能為普魯士的勝利感到高興，這些勝利甚至比從前的邦聯議會和戰前的狀況，把人們所渴望的德國統一和自由的目标推得更遠，《社會民主黨人報》不同意雅科比的這種說法，它認為必須防止一種誤解。普魯士的勝利肯定是可悲的，因為德國的統一是通過一次王朝戰爭，不是通過獨立的和普遍的民族起義開始建立的。“可是決定性的結果產生了，我們不能使世界歷史倒退。德國的兩個大邦

为了爭夺对我们祖国的統治进行了战斗——胜利在普魯士一边——今后只有一个德意志大邦。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解决办法，但是它是一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事实上已經存在。如果情况是这样，即仅仅是奥地利同普魯士之間发生爭执，而不是民族同它們之間发生爭执，那么德国的自由派分子，尤其是工人阶级一定为普魯士胜过維也納，而不为奥地利胜过柏林而感到高兴。我們希望人們正确地領会我們的意思：仅仅是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之間发生爭执，是很值得遺憾的事，而这并不是我們——刚刚成立的工人党的过錯。可是，当問題已經这样摆着的时候，普魯士得胜比奥地利得胜要好一些。哈布斯堡的胜利会給我們带来什么呢？那就是具有旧日的缺点的新成立的邦联組織，德国对外沒有防禦力量，而国内的情况却是可笑的、卑劣的，此外还有耶穌会的教义，沉重的压迫和腐化堕落。我們也知道，普魯士不会給我們带来很多好东西，可是这里还有改善的希望，德国的一切民主主义分子現在正应该为实现这种希望进行宣传鼓动。不，我們决不比实行邦联制时期，离开德国統一更远一些。”

毫無疑問，这种見解符合在工人群众中，尤其在北德工人群众和中德和南德的部分工人群众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由于邦联議会的統治給无产阶级带来許多苦难，因此情况的一种轉变只要能使他們至少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即使得不到什么真正的改善，他們也认为这是較小的禍害，这是十分自然的。从全德工人联合 245  
会里沒有发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場的声音，可是有許多言論比《社会民主党人报》靠近普魯士得多。被征当后备軍，住在奥古斯滕堡家族的祖遺城堡中的哈森克莱維尔，在弗伦斯堡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致統一締造者俾斯麦的诗，特耳克在一組論文中闡明了党的綱領，这个綱領的奋斗目标是在有完全的政治自

由和营业自由的霍亨索伦帝国統治下的德国的完全統一”。施韦泽在这里,也像对待工人对进步党的厌恶那样,不是进行鼓励而是进行抑制。

他在論《我党綱領》的一組論文中反对特耳克的意見,他說,无产階級的社会要求,劳动从資本束縛下的解放比政治状况的一切变化都重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只能要求人民国家来解决工人問題,德国工人决不能成为有統治欲的容克階級的工具,这也是十分明显的。普魯士对奥地利的胜利,使普魯士的反动分子比过去更为强大,爭取自由的事业完全停留在旧日的斗争的地步,而統一問題只发生了一点变化,那就是德国的两强对峙的局面終止了。“普魯士統治的功績在于,它創造了一个民族力量的核心,这个核心虽然还不是权力的基础,但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这个基础,如果民族尽了它的力量,就将成为这个基础。”因此人們不可不了解,普魯士統治是为了專門的普魯士制度的利益进行的,它对德国統一的所謂关怀只是一个空洞的保证。可是这些欺騙在政治上是十分有害的;为了使这些欺騙为人所信,必須做点什么。因此普魯士政府建議在普选权的基础上选举德国議會,通过事变的过程,这个計劃只剩下一些殘缺不全的东西,可是,甚至同变得如此强大的普魯士政府相比,这样弱小的一个手段——北德意志議會,也必須被工人階級用来为民族事业服务;在一定情况下,北德意志議會也能成为一个力量。但是,民族的任务不能是,使 1866 年的事件不发生,恢复旧日的两强对峙的局面,或者用更加反动的奥地利集团代替反动的普魯士集团。

柏林是权力中心,为了建立德国統一,必須对它发生影响。“不仅南德各邦必然被現存的这个核心所吸引,而且德意志-奥地利(只要那里說德国話),也属于我們,将来也属于我們。”必不可少的

是一个統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邦联。在一个邦联中,一个邦的力量比其他所有的邦加在一起还强大,这个邦联内部就經常存在矛盾,所謂邦联也就是公开的謊話,它比統一的国家对自由事业尤其有害。因为一个过分强大的邦的統治,事实上掌握了一切权力,而同它对峙的人民力量却很不自然地分裂了。“当然可能在一个小邦里,可以比在首要的邦里說話說得更响亮(这一点使許多人产生了錯觉),可是我們應該考虑到,那里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工人階級支持普魯士政府,反对分立主义的和哈布斯堡-二元論的努力,在同喜欢干涉的外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尤其如此,这里也表现出充沛的爱国热情。可是工人階級無論如何應該坚决同自由的人民政权对立,不为掌权者的欺騙性的贊美所迷惑,处处警惕地保持一切真正的人民党的那种保证:民主主义的怀疑。

当施韦泽发表这个綱領的时候,薩克森工人已經在战争的影响下,根据1866年8月19日在开姆尼茨“薩克森民主派全邦大会”所討論和通过的另一个綱領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参加这个大会的全是,或者主要是薩克森工人协会的代表,其中的大多数,如罗斯梅斯勒、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克内弗尔、施腊普尔律师和弗賴塔克兄弟都是工人教育协会派出的,少数是德累斯頓、萊比錫、格劳豪、林巴赫和开姆尼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支部派出的。經過六小时討論,通过了一个綱領,这个綱領虽然也主张参加北德意志議会的选举,可是其目的只是同战争所造成的状况进行不可調和的斗争,完整地保持大德意志-民主主义的統一傾向,为召集一个制宪議會而努力,这个議會里應該有包括德意志-奧地利在內的德意志各邦的代表。

开姆尼茨綱領的其他要求都归结为国家的完全民主化,如根

据普选法选举一切公共团体、用国民軍代替常备軍、自由出版和自由集会結社权、村鎮自治、司法独立、学校同教会分离、教会同国家分离、国民学校的改革以及其他类似事項。为无产階級提出的要求有：从一切压迫和束縛下解放劳动和劳动者、改善劳动階級的状况、迁徙自由、营业自由、普遍的德国居住权、促进和支持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以此来消除資本和劳动之間的对立。所有这些要求在表面上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綱領都是一致的，可是同它的根本差別在于，这些要求是按照資产階級民主主义的精神提出的。它們既不把普选权理解为工人階級对国家权力的統治，也不把国家扶助生产合作社理解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变革。罗斯梅斯勒曾經十分激烈地反对拉薩尔的綱領，現在当然也老老实实地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反对拉薩尔是不对的，在他的主持下对开姆尼茨綱領进行了討論，这个新党自称薩克森人民党，自认为是德意志人民党的一个分支。

当然，因为这个党的骨干是工人，所以它不会一开始就陷入像德意志人民党那样混乱的境地。德意志人民党在达姆斯塔特和法兰克福发动了混乱的攻击以后，仍然不知道自己在民族問題上和社会問題上需要什么。它仅仅在維尔騰堡在一定程度上組織起来，在这里，它的土瓦本分立主义开放了十分奇特的花朵。它的主要机关报《斯图加特观察家》利用魏瑪邦議會削減了公爵几千塔勒的王室費这一不重要的事实，“以国民指导人的身分”向南德君主指出，北德意志联邦对他們是一种威胁；报纸說，如果南德君主决定同德意志人民党一起为共同事业而努力，建立一个議會-軍事的南德联盟，那么“人民就由于考虑到动摇王室的經濟基础沒有任何可能”，而負有一定的义务。薩克森人民党当然不会受这种“三元制的把戏”欺騙。綱領里的論点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德国問

題的立場：“利用民主的国家形式統一德国。不要世襲的中央权力——不要由普魯士領導的小德意志、不要由于吞并而扩大了疆土的普魯士、不要由奥地利領導的大德意志、不要三元制。民主党坚决反对这些和类似的只能导致不自由、分裂和外国統治的王朝-分立主义企图。”这种見解原則上也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持的見解。差別仅仅在于，1866年的变革是否要求改变策略这个問題上。开姆尼茨綱領給了否定的答案，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則給了肯定的答案。

参加討論开姆尼茨綱領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會員向联合会机关报报道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机关报在为报道写的一些編輯部按語中劝他們要“慎重”；报纸說，誰对工人怀有好意，誰就可以干脆参加社会民主党。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公开爭論。两个組織也能很好地并存。薩克森王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但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恰恰在这里同該国的工业发展很不相称，远不如汉堡和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发展得那样壮大。如果人們要想利用这一点来解释这种現象，即薩克森工人觉悟很高，因而遭到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所謂亲普魯士性质和宗派性质的排斥，那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亲普魯士的和真正宗派的形式，即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正統的拉薩尔主义，这时在薩克森安家立业，在这里得到的新的拥护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如果人們推測（其他許多事情也证明这是真的），一方面薩克森的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还很健康，能使比較进步的工人阶层依附于自己，另一方面薩克森无产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家庭工业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比較起来还很不发展，那么这是接近事实的。

如果这种推測是正确的，那么薩克森无产階級的民主主义分子在一个綱領的基础上組織起来就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这个綱領

就其內容來說，充滿了无产階級精神，只要把資產階級形式去掉就可以同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綱領完全吻合。必須把民族問題上的偏離策略看做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禍害，因為開姆尼茨綱領的觀點，毫無疑問適合薩克森以及許多中德、南德工人團體的觀點。真正嚴重的倒是，薩克森人民黨清楚地知道它自己不能進行大德意志革命，而企圖同德意志人民黨發生聯繫，其實它同德意志人民黨除了憎恨普魯士的純粹消極的特性而外沒有任何共同之點。而且這種憎恨的來源在雙方也又大不相同。在薩克森人民黨那里主要是出於民主主義的革命意向，在德意志人民黨那里主要出於分立主義的狹隘觀念或者其他把大德意志綱領用作掩蓋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假面具的動機。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對於宗納曼和有階級覺悟的无产階級的類似敵人集合於其周圍的那面旗幟，具有明顯的，同時也有道理的厭惡心情。

開姆尼茨大會後兩星期，國際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地點在日內瓦，約翰·菲力浦·貝克爾在那里為國際的德國支部建立了一個組織中心，並從1866年初開始出版《先驅》，它是一個月刊，是說德語的各支部的中央機關刊物。在德國，僅在西里西亞、薩克森、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和萊茵河畔有國際的分散的小支部。在9月的第一個星期舉行的代表大會，總共有六十名代表參加，其中有三個德國代表、七個英國代表、七個法國代表，而大多數是瑞士代表，這是理所當然的。

代表總委員會的主要是奧哲爾、埃卡留斯和鐘表匠榮克；由榮克主持代表大會的會議。國際的綱領和章程在做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後，最後被通過了，法國代表團曾經提議，只讓體力勞動者參加協會，這個提案被多數人所否決。詳細敘述代表大會會議是國際歷史的事情，這裡只能談一談代表大會的那些給國際无产階級

的共同解放斗争确立了共同目标的决议，而代表大会的重心也就在这些决议上。

对现代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一般统计的决议，起初只有起到一种有效的鼓舞作用的学术性价值。代表大会根据成立宣言的精神对合作社问题作出了决议：合作社的伟大意义在于指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不是生产的目的所必需的，但是合作制本身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防止合作社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商店，代表大会建议合作社把总收入的一部分变为一种宣传基金，凡在合作社工作的工人，不管他是不是股东，都分给他同样的红利；作为暂时的措施，代表大会容许按照股分给股东以低利。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工人保护法和工会的决议，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两个武器，英国工人估价过高，法国和德国工人又估价过低。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工人必须为争取工人保护法而斗争。“工人阶级实施这些法律，并不巩固统治力量。恰恰相反，它把现在用来反对它的力量，变为自己的工具。”利用这种一般立法，它就能实现孤立分散的努力所不能实现的事情。代表大会提议把缩短工作日当做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一切其他努力都必然归于失败。为了恢复工人的体力和健康，为了使他们有可能增进学识，进行交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缩短工作日是必要的。代表大会建议把八小时作为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这八个小时必须安排在白天的一定时间内，这个时间包括八小时劳动和吃饭的休息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对所有成年人，不管男子或妇女都适用，凡满十八周岁的就算成年。夜工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必不可免的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尽量严格地不让妇女做夜工，也不让她们做有害妇女健康的或有违女性品德的劳动。

大会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的倾向是有益而正当的进步，虽然在資本統治下，实现这种进步的方式是可恶的。在合理的社会状态中，每个儿童毫无差别地从九岁起都必须成为生产工人，同时没有一个成人可以置身于要吃饭先做工这个一般自然规律之外，而且不但用脑劳动，还要用手劳动。在现代社会中最好是把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級，分別待遇：九岁至十二岁的儿童为一級，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儿童为一級，十六岁至十七岁的男女少年为一級。无论在工厂或家内，第一級劳动時間不得超过二小时，第二級不得超过四小时，第三級不得超过六小时，同时必須給第三級保留至少一小时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可是，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只有同教育結合起来，才是可以允許的，所謂教育就是：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技术教育传授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理，同时使成长中的一代学会实际使用各个劳动部門的簡單工具。

日内瓦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工会的決議，決議认为工会活动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会是无产階級用以反抗資本所集中的社会权力的手段，是无产階級所占有的唯一社会权力，也就是它的数量。只要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工会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必须通过国际联系使工会活动普遍化。工会在自觉地反对資本的无限肆虐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正如中世紀的地方自治体变成市民階級的組織中心一样。在进行劳資之間的每日斗争的不息的游击战中，工会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将成为废除雇佣劳动的有組織的动力。过去工会过于专门注意反对資本的直接斗争，将来工会不应远离本階級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如果广大无产階級群众相信，工会的目的不是狭隘的、自私的，而是要争取被践踏的千万人的普遍解放，那么工会就会大大

发展。

正当招来一个“铁和血”的新时代的战争的轰鸣还在欧洲发出回响的时候，现代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会议用远大、坚定的眼光为人类解放做了准备工作。

#### 四 普选权的最初尝试

尽管俾斯麦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也不能设想把自己在战前打出去的那张普选权的王牌收回。他需要一滴民主的油，在欧洲面前把自己涂抹成民族意志的实现者，同时抑制那些门户的噪音，北德的中小诸侯要通过这些门户进入德国统一的殿堂。

同时他也不是没有根据地估计到，在胜利战争的影响下，普选权可能给他提供一个比现在的普鲁士众议院更加听话的议会。这个可敬的人民代议机关也有同样的看法，它削减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职权，比俾斯麦要想削减的还要多，它想用这种办法来保存自己；它剥夺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协商”权，它保留各邦议会批准或否决帝国议会决议的权利，从而只给帝国议会以审查核定的职权。对于这一点，俾斯麦举双手表示赞成。现在他更加不受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约束了，作为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他当然清楚地知道，如果各邦政府同一个由普选选出的议会对于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取得一致意见，各个邦的检查代表机关就不能对此作任何变动。

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仅仅在于，俾斯麦所给与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能否成为实现工人阶级目的的有用武器。《社会民主党人报》强调指出，北德意志帝国议会没有抵抗力量，没有把人民的革命力量集中在自己周围的希望，面对着一个在国内外

取得胜利，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大国的一切其他权力手段的政府，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力量的議會是不容易存在的。虽然如此，工人必須参加选举，首先因为无所作为和袖手旁观則一事无成，其次因为工人在一个正规的政团中提出自己的要求，从而打破敌人的压制言論和造謠誣蔑的阴谋，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因为使議會变得沒有权力的局势，虽然沒有很大可能发生变化，但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口号是参加选举，不仅仅参加选举，而且要先进行充分的准备。

施韦泽参加了这项准备工作。战后頒布的大赦使他免受剩余的徒刑和許多新的控告，他又可以自由活动了。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支部被警察解散了的地方，如柏林，他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为了給联合会筹备一点基金，他在菩提树街的一家豪华的旅館里做了六个关于資本和劳动的报告，入場券卖一个塔勒一张，来听报告的也有許多資產階級人士。可是这些和其他一些补救手段就像滴在热鍋上的一滴水。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十分沉重地压在工人階級身上，使它不可能为了选举募集大量捐款。这个时期对于改組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很不适合的，加之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还用同样的力量繼續进行煽动。她宣称选举佩尔当主席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次选举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沒有經過會員的直接投票。虽然会章中的清楚明白的規定同她作对，但是为了把原文的意思变得恰恰相反，并不需要最巧妙的解释。今天沒有任何必要来評論她的詭辯和穿凿；事实上伯爵夫人所关心的，就是选举她的寵臣当联合会主席，可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还有許多比每个正統派的神学家可能都感到羨慕的解释术更为有效的手段。

她的力量在于，在許多工人眼里她是拉薩尔的老朋友，是所謂最确切地了解他的意志的人，因而具有一定的威望。她的力量还在

于她有經常得到补充的作战經費，她利用这笔經費爭取到运动中心的个别有影响的鼓动家，如莱茵区的希尔曼、薩克森的弗尔斯特林、西里西亚的弗洛里安·鮑尔，还有汉堡的个别会员。依靠他們的帮助，她把一个竞选綱領散布到群众中去，并得到工人大会的批准，这个綱領同拉薩尔的某些言論有正統的联系，一半是空想的革命綱領，一半是狹隘的民族綱領，它的实际要点就是：通过統一求得自由！可是它同民族自由党的綱領一模一样。这时伯爵夫人希望在由佩尔召集于12月27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正式的代表大会上，終於达到她所追求的目的，即选举弗尔斯特林为联合会主席。

可是第四次代表大会表明，联合会的老骨干分子是不可动摇的；代表二十六个地方的十二名代表，其中有奥多尔夫、埃尔納尔、特耳克，不想跟着伯爵夫人的口哨跳舞。伯爵夫人的侍从，出席的有六个人，其中有弗尔斯特林和德克維茨。他們立即看到自己的打算失敗了，他們拒絕把他們据說由不来梅、汉堡、德累斯頓和开姆尼茨得来的委任证书交付审查，他們硬說，佩尔根本不能召开合法的代表大会。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本人也到了爱尔福特，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施韦泽就同她进行了友好的商談，对她作了很大的让步。他同意今后主席不領薪金，書記的薪金同拉薩尔在世时一样 255 定为四百塔勒；尤其是在施韦泽的推动下，代表大会通过了伯爵夫人散发到群众中去的綱領，只作了一些虽不是彻底的，但无疑是有益的修改。然后十二名代表同伯爵夫人的六个拥护者进行討論，奥多尔夫提議，反对派在把他們的委托证书交付审查以后参加的主席选举，还應該提交联合会全体会员复决。經過几小时討論以后，弗尔斯特林及其一伙带着这个建議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可是一直到半夜也沒有回来，随后代表大会就选举佩尔为主席，奥多尔夫为書記，J. M. 希尔施为司庫。因为选举弗尔斯特林为主席一事

毫无希望，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也就不再为此进行活动了。

施韦泽向代表大会建議的策略，无疑是很冒險的。它使《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了“老社会主义者”中的最后一个撰稿人，到那时为止这个人始终是始終忠实于这个报纸的。莫泽斯·赫斯反对爱尔福特竞选綱領。事实上，这个綱領的第一条要想废除一切联盟、联邦，通过一种内在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国家統一，把德意志各邦联合起来，从統一走向自由，对于在“这个主要問題”上，想同无产階級同心合意的各种奇特的工人朋友來說，这一条有一种可疑的吸引力。他們也认为，竞选綱領的其他各点——給所有德国議會支付日薪的普选权，自由的国民权利的保证，北德意志帝国議會不仅有討論的职权而且有作出決定的职权，根据拉薩尔的原則組織自由的工人合作社等为解决社会問題开辟道路的措施——“基本上”可以接受；他們最多只做这样的保留，即国家对工人合作社的資助不是刻不容緩的。这里肯定有一个重大的危險，这件事本身就是令人不愉快的，那就是年輕的工人党打着一面有問題的旗帜走上第一次竞选的戰場。不过施韦泽把在竞选斗争的前夕，提出一个刀枪不入的竞选綱領在无产階級中引起兄弟之爭，看做是一个更大的危險。他认为带着已經瓦解的队伍走上戰場是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坚持自己的綱領，那么可以利用这个綱領进行的資產階級誘惑伎倆，碰到联合会的經過訓練的核心部队就会自然而然地失敗，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而且施韦泽还向工人提出一个高明的建議，先不問資產階級的工人朋友对爱尔福特竞选綱領的态度，而先問他們願不願意代表作为階級的无产階級，如果他們避而不答，就馬上不理他們。

幸而施韦泽对工人的常識的信任发生了作用。爱尔福特竞选綱領沒有造成任何实际的錯誤，相反地它使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

在选举期间的宣传鼓动完全陷于停顿。于是她用一种不体面的手段来表示她对这件事的怨恨，她试图在施韦泽有希望当选的两个选区进行破坏，使进步党和反动派候选人大为高兴。在爱北斐特-巴門，她煽动希尔曼反对施韦泽，在这个选区中大量散发在日内瓦出版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毫无根据地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加上一些罪名。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她的代理人甚至毫不隐讳地反对施韦泽，支持地方长官奥拉茹斯。施韦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可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却丧失了至少还在莱茵和西里西亚工人中享有的最后一点威信。

由于她那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全德工人联合会几乎毫无装备地走上了竞选的战场，用赤裸裸的身体对抗政府的长矛和棍棒以及金钱力量的千百种看不见的、但更为危险的武器。工人们企图用一种真正的火一般的热情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外部物资。很晚，政府才把选举日期定在1867年2月12日，决战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社会民主党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它在那里得了大约一万八千票。在阿尔讷纳-伊塞隆，哈森克莱维尔得了一千一百二十四票，在哈根，赖因克医生得了一千五百八十九票，赖因克医生的舍己为人的行动，博得工人的热爱，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为社会主义信念服务的。还保留着一些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的空想倾向、把人民的直接立法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杠杆的里廷豪森在科伦得了一千零九十五票。施韦泽在杜塞尔多夫得了六百六十四票，裁缝寿普在莱茵河畔的米尔海姆得了一千零五十九票，铁路工人柏梅在杜伊斯堡得了一千六百八十六票，马丁尼在佐林根得了一千四百三十七票，奥多尔夫在累内普-梅特曼得了四千零三十四票，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巴門得了四千六百六十八票。

在愛北斐特-巴門，施韋澤同保守黨候選人俾斯麥，自由黨候選人普魯士眾議院議長福爾肯貝克競選。百分之七十的有選舉權的人參加了轟動全德國的這一鬥爭。保守黨報紙，尤其是自由黨報紙對施韋澤的咒罵超過了一切限度。它們不僅宣揚他青年時期的性的過錯到令人作嘔的程度，同時還指責他是騙子和小偷。他的資產階級敵人的一切憤恨恐怕還抵不上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和她的工具的誹謗和攻擊。可是愛北斐特-巴門的工人一刻也沒有不知所措；他們簡單地宣稱：哪怕施韋澤是殺人犯和強盜，我們也選他。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麼他們的候選人受到這些攻擊。在萊茵區做了兩年最受歡迎的鼓動員的希爾曼，作為同社會民主黨競選的候選人，只得了五十二票。當然工人還不能穩操勝券；施韋澤甚至沒有資格參加復選，因為俾斯麥得了六千五百二十三票，福爾肯貝克得了六千一百二十三票。

社會民主黨的競選活動在德國西北部取得了僅次於萊茵省的巨大勝利。在漢堡市的兩個選區中，佩爾共得三千二百二十三票，約克在哈爾堡得了三千六百六十票，薩克森作家瓦爾斯特在不倫瑞克得了二千二百六十七票。在這九千票以下是西里西亞的四千票，其中施韋澤在賴辛巴赫-諾伊羅德得三千一百零九票，聯合會的一個熱心的老會員織工亨利希·施納貝爾在瓦爾登堡得了八百九十一票。

在薩克森王國，維爾克特作為萊比錫市的候選人，弗里茨舍作為萊比錫地區的候選人各得一千票左右，維爾克特多一點，弗里茨舍少一點。此外，全德工人聯合會在薩克森還得到了六千票，其中德累斯頓八百票，開姆尼茨一千三百票，弗賴堡三千零八十一票，不過這些票大多為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擁護者所得。在薩克森人民黨的候選人中，倍倍爾在格勞豪-梅朗內，施腊普斯在茨維考-

格里米乔都是經過复选才取得了胜利。李卜克内西这次在施托貝克-施内貝克就遭到了失敗，估計是因为他由于嚐到了“德国統一”的第一个苦果，因此沒有能够进行有效的宣传鼓动。普魯士頒布大赦令以后，他到了柏林，在排字帮工协会中讲了話；因此以违犯禁令罪被捕受审，被判三个月监禁，他在監獄里一直待到刑滿的那一天。甚至法官对于这个可耻的判決也感到有点羞愧，在申述理由时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托辞，可是对李卜克内西來說，市監獄的臭气并沒有因此变成德国統一的清晨的空气。在推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施腊普斯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里，家庭工业对机器劳动进行可怕的垂死掙扎；在格劳豪-梅朗内的家庭織布工場中，1863年共有三万零七百余台手織机，1880年只剩下三千一百九十四台；在十几年的時間内，在这一个地区，动力織机至少使四万人成为“多余”的人。薩克森人民党在1867年2月的选举中到底得了多少票，誰也举不出一个比較确实的数字，因为当时这个党还没有精确地記載自己取得的成就的机关报；根据一些分散的記錄估計，它大概得了一万二千票至一万五千票。

可是它得到了两个議席，而得了四万张选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却一个議席也沒有得到。只有奥多尔夫一个人在累内普-梅特曼参加了复选，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巴門、賴辛巴赫-諾伊罗德，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必須在保守党候选人和自由党候选人之間进行抉择。《社会民主党人报》为选举提出过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进行选举妥协，在只占最少的少数，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宁可按照自己的原則投自己的候选人的票，也不牺牲原則，进行一种不自然的联合。可是，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它认为同别的党派进行协商是可以允許的，即在不損害双方的原則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在某个选区投一个資产階級政党的候选

259 人的票，其条件是，这个党有义务在另一个选区保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这种可能性在初选的时候根本没有，可是在复选时却是很值得重视的。1867年2月的情况很简单。如果进步党人在累内普-梅特曼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反对俾斯麦党人济贝儿，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可以在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巴門和賴辛巴赫-諾伊罗德反对保守党候选人，而使进步党候选人当选。然而正直的进步党人当时就已经信奉(从这时起几乎经常是这样)一种奇特的观点，即如果他们在复选中宁可选最没有理性的反动分子，而不选最有理性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坚强的男子心胸”也决不受玷污，相反地在复选中不支持进步党的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就给自己打上了“反动派的雇佣”的烙印。进步党人在累内普-梅特曼决定选举济贝儿而不选奥多尔夫。

于是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复选中不得不独立行动。在杜塞尔多夫，他们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政治自由对人民福利十分重要，尤其是工人阶级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可是在爱北斐特-巴門，他们决定在复选中弃权，因为工人党根据原则不能投保守党候选人的票，而由于进步党采取无比可恨的态度，这次也不能同它走一条路。这两个决议都是由施韦泽提出和执行的，在杜塞尔多夫和爱北斐特都遭到工人的激烈反对，进步党的工厂主使工人遭到饥饿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愿选举保守党候选人。可是爱北斐特决议也是很有道理的。不管是俾斯麦，还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他的“好朋友”福尔肯贝克坐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里，比较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工人党迫切需要摧毁进步党仍然用来使工人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不接受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一套谎言。賴辛巴赫-諾伊罗德的情况同爱北斐特-巴門相似，

260 两个地区的不同之点在于，西里西亚工人真正弃权，或者甚至给了

自由党候选人特韦斯騰一些帮助，使他战胜了奥拉茹斯，而萊茵省的工人却投票选举俾斯麦，沒有选福尔肯貝克。

除去对于进步党的选举策略感到十分愤怒而外，这个决定恐怕还受了这种考虑的影响，即俾斯麦已經在一个老馬尔克选区当选，他的胜利必然引起一場新的选举斗争。施韦泽把工人的这一决定叫做“不幸的步骤”，但也說它对进步党是一个“深刻的教訓”，不管它是一张证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的骯髒誹謗和对普选权的可耻阻碍的收据，还是对首相（不是对保守党候选人）表示的一种敬意，因为首相自动地归还了自由党反对派这样执拗地不肯要求的人民权利。俾斯麦的确拒絕接受委托，于是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施韦泽以四千九百十九票，自由党候选人格奈斯特以四千二百九十一票参加复选。这时保守党人自己消除了认为他們可能对工人友好的一切幻想，他們使格奈斯特取得了胜利。于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第一屆北德意志帝国議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的最后希望消失了。可是工人們在爱北斐特-巴門竭尽全力工作了八个星期并不是徒劳无功的。正如施韦泽在对他的选举人发表的告別詞中所說，他們看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进步党利用一切手段，甚至最恶劣的手段，极力企图压制工人的事业，另一方面，保守党不管說得多么好听，到了紧要关头就不照自己所說的話办了。

关于普遍落选問題，《社会民主党人报》写道：“等待了很久、渴望了很久的2月12日已經过去了。我們在各处都遭到失敗。我們之中有少数人可能已經預料到这种情况，可是肯定有不少人会把这个結果看做一个难解的謎。所有这些声势浩大、振奋人心的成功的集会，群众中的这种汹涌澎湃的运动——这一切都失敗了，在少数地方光荣地失敗了，在多数地方不光彩地失敗了。”这种痛苦

失望的感情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說甚至在光榮失敗的地方，選舉成績同合理的期望不符，那么在德国有許多这样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几年以来在那里已經生根，大規模的選舉集会似乎可以保证胜利，可是在選舉的这一天，这个党脚下的一片土地却像流砂那样松軟。比如在图林根行政区，在美因部这些曾經有过許多胜利的地方都是这样。在法兰克福，韦尔凯尔得了可怜的一百五十票，而相当于这个数目四十倍的票数集中在一条金牛犢身上，资产阶级政党的混合体用这条金牛犢——路特希尔德来同韦尔凯尔对抗。在柏林的失敗更为可叹，那里的工人两年以前就已經开始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周围了。不願跟着进步党跑的所有柏林工人团体的共同候选人，印刷工人法斯特尔在六个选区共总得了約七十五票。

当然为了辯解和解释可以举出許多理由。在柏林的庸人中，正流行着一种可恶的沙文主义，反动派提出由于1866年的战争而得到好处的大臣和將軍做它的候选人；为了至少阻止他們取得胜利，許多工人在最后关头决定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票。在莱茵河畔以及其他地方，狡猾的选区几何学发挥了它的作用；奥多尔夫所以在累内普-梅特曼遭到失敗，主要是因为符佩尔塔耳的織工村，不是像普魯士众議院选举时那样，同佐林根合并，而是同手工业还有相当牢固基础的雷姆夏特合并。加之選舉人名簿有巨大缺口，警察施加压迫，工厂主用飢餓威胁工人，官僚和资产阶级在選舉实践中使用其他可耻手段。可是同選舉失敗后到处寻找原因，就是不在自己本身寻找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相反，无产阶级反对派始終遵照值得称贊的原則，如果它沒有达到它想达到的目的，經常首先打扫自己的門前。它懂得认真总结自己的缺点，并使自己明白，它正面临抉择。

无产阶级反对派因为没有可以贮藏所得财富的仓库，所以四年以来它所取得的许多成果，不断地在它手里消失了。保守党支配着有古老的牢固基础的政权组织，自由党支配着看不见的、<sup>262</sup>但到处存在的社会金钱势力的活动。如果工人党要想在同这样强大的敌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它就必須也建立一个持久力量的牢固组织。这一方面进展极小，以致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有的大钱袋使工人运动成为人们的嘲笑对象达几年之久。老前卫仍然集合在其周围的旗帜有降下的危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少量资金几乎已经耗干了，如果全德工人联合会不最终站在稳固的财政基础上，报纸就要停刊。破坏拉萨尔的組織是不行的，因为由于有了这个組織，联合会至少获得了精神力量，相反地要实现这个組織，以使用政治力量做精神力量的后盾。

由物及人，就无非是拉萨尔死后，施韦泽所享有的精神独裁必須变成政治独裁。工人对施韦泽的嫌恶已经渐渐消失了。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报纸对他进行的诽谤，起了同预期相反的效果。施韦泽很聪明，他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可以长期受个人独裁支配，可是联合会会员也很有见识，他们认识到，在当时各方面都蕴藏着危机的情况下，暂时的独裁还是必要的。正如特耳克所证实的，甚至对拉萨尔的独裁已经感到不满的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约克，对暂时需要实行独裁的时间估计得比施韦泽还要长一些。任何独裁对于独裁者本人来说都是最坏的命运。施韦泽也遭到这种命运，他用自己的名望这个崇高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错。可是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1867年联合会的最老、最忠实的会员认为他的独裁是必要的。

事实上，他已经选举运动的领导人，选举结束后，他通过主席佩尔于5月19日在不伦瑞克召开了一个非常代表大会。大会有

代表四十五个地方二千五百零八个會員的十八名代表参加。會員的数目很少；它还不到一年前萊比錫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會員人数的四分之一，可是，只要对于繳納会費沒有严格的监督，这些数字的价值就很成問題。

第五次代表大会首先通过了一个驅逐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追随者的綱領。它的要点是統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共同的社会生产；为創造新的社会状况，根据斐迪南·拉薩尔的原則成立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各文明国家工人利益的共同性；实行直接、秘密投票的、支付日薪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以影响社会力量。根据这个綱領，應該审查會員名单，把所有不是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綱領的會員开除出会。然后重新选举所有全权代表，他們的任期限于一个正式的代表大会到另一个正式的代表大会中間的这段時間。主席仍然有权批准选出的全权代表，甚至表面上主席有任命全权代表的无限权力，因为警察把选举全权代表当作一个“独立的联合会”的标志。可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接受对主席的可能有的告发，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报告。此外，为了防止警察迫害，也取消了“成立分会”的一切意图，废除了把地方組織叫做支部的規定，确定了联合会的統一和团結的性质，联合会会址設在萊比錫，受薩克森結社法的約束，而在各个地方只可举行會員的集会，这是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取得了一时成果的預防措施，可是在德国結社法有扩大性和不完备的情况下，就不能长期防止警察的专橫行为。为了保证良好的財政管理，其中規定，地方上所收的会費至少上繳一半給联合会金庫，司庫應該每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到期不繳会費的地名。担任司庫的是 J.M.希尔施，可是不久以后他就因为发表第一本社会民主党的歌曲集被捕，被判了好几个月的监禁，于是白拉克接替了他的职务。施韦泽当选为主席，办公处設在

他居住的地方。第二年奥多尔夫到俄国去了，速記員罗勒尔接替了他的工作。

这次改組的第一个效果在于，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完全脫离了关系。現在她以拉薩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建立了一个特別的宗派。她夺去了旧联合会的約六分之一的成員，即薩克森王国的大多数會員和基尔-不来梅和其他地方的个别會員。她让費尔斯特林当选主席，輔佐他的是伯爵夫人的得力助手，年輕的弗里茨·門德，这人缺乏一个工人領袖的活动所应具有的最簡單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伯爵夫人损伤她的亡友的遺物的这种做法，是无法辯解的。她的行为已經没有什么危險性了，因为可以預料（而且已經成为事实），被她用拉薩尔的名字所迷惑的几千正直的工人，不久就有了正确的認識，回到老联合会，或者参加了薩克森人民党。可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是，資产階級有好几年能够利用伯爵夫人所做的这件蠢事，鍛炼它的挖苦才能。

全德工人联合会做出不伦瑞克代表大会的決議以后，又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名列前茅了。关于这一点的一个試金石是不久以后，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洛桑举行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四名代表，其中瑞士代表最多，此外有六名德国代表，六名英国代表，十七名法国代表，两名意大利代表和两名比利时代表。德国代表中有阿尔伯特·朗格、路德維希·毕希納和拉登多夫。

代表大会作出決議說，工人階級的社会解放同它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爭取政治自由是絕對必要的首要措施。这同不伦瑞克綱領完全一致。可是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出現了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早就明白的土地公有制的严重意見分歧。这个社会主义的要求沒有直接列在洛桑代表大会的議程上，可是它有了好几

个出現的机会。它在大会再一次討論的合作社問題（关于这个問題，代表大会作出決議說，只要在資本主义社会，合作社就构成十分可怜的第五等級）上出現过，在大会所肯定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否需要国有化这个問題上也出現过。尤其是法国代表热烈拥护土地私有制，而其他贊成公有制的人，如拉登多夫，同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观点是有很大距离的。几乎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員，现在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的埃卡留斯和列斯納，才像施韦泽一年半以前在爱尔福特演說中那样彻底和明白地論述了这个問題。

一个月以后，德意志工人协会在格腊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現在，在討論过程中，代表們的意見越来越明显地发生分歧。烏利希提出了一系列的決議案，根据这些決議案，应该按照“人类灵魂的永恒法則”建立国民学校，宗納曼用一个有趣的通知使与会者大为驚訝，他說，他終於解决了社会問題，在法兰克福社会印刷厂建立了一个生产合作社，他在那里是排字工人的普通“协作者”，五年以后，这些排字工人将同他友好地共同占有这个企业。不言而喻，这是一种資本主义活动；今天法兰克福社会印刷厂是一个有儿百万資金的企业，“工人的朋友”宗納曼同任何一个資本家一样，剝削“他的”排字工人。同这些可恶的宣传相反，倍倍尔雄辯地叙述了卢部<sup>①</sup>煤矿惨案，那里有一百多个工人成了資本的罪恶的追求利潤的貪欲和薩克森矿山警察的严重失职的牺牲者，織布工人莫特勒在一个动人的报告中，叙述了工厂童工的无可名状的痛苦。两个人都要求政府对資本剝削进行无情的干涉。工人协会中的比較坚强的分子，不可遏止地趋于团結，这种团結比迄今通过分散在全德

<sup>①</sup> 德国城市，在卡尔-馬克思城（开姆尼茨）西南。——譯者

国的委员会所达到的更为紧密。这里也必须用种种细微的区别，来回避德国结社法的陷阱。一个较大的协会受到委托，处理代表大会的一般事务；这个协会的地址成为代表大会的召集地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仍由七个委员组成，主席由代表大会本身选出，其余六个委员由主要协会从自身选出。其实，问题在于，代表大会是想继续受资本主义监护呢，还是想在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发展。在选举主席时，倍倍尔和麦克斯·希尔施被提名为候选人。倍倍尔以很大的优势取得胜利，这样，协会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这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改组正在积极进行。11月22日，在柏林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代表三千四百零八个会员的二十名代表。会员数仍然是不确实的。代表大会这次还没有实际执行不伦瑞克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只有对联合会金库尽了自己的义务的地方的代表才可以参加代表大会。可是白拉克已使金库情况大大好转了。从这年年初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即由四百五十个订户增加到一千二百个订户；订报不足十份的有八十三个地方，不足二十五份的有二十五个地方，较多的是法兰克福约五十份，爱北斐特-巴门约一百七十五份，尤其是汉堡大约订了三百七十五份。一致再选施韦泽担任主席是很自然的。代表大会对会章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这个修改在不伦瑞克就曾计划进行，可是当时又推迟了。这个修改是：今后主席必须在每次正式的代表大会以前至少六个星期，由会员投票选出。决议以二千二百六十四票对八百三十八票通过，而施韦泽掌握的三百零六票弃权。反对派中主要有汉堡和伊塞隆的会员。使主席的实际独裁尽可能地民主化，这是对的，可是这个决议对双方都不利；它加强了主席对联合会的其他干部和机构的权力。

在已经恢复了的团结上，暂时还没有出现阴影。经常注意推

动工人独立思考的施韦泽，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間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公开會議，討論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議程有点过于丰富了；需要討論的問題有普魯士和德国問題、普选权、高利貸取締令的廢止、女工、感化院的劳动、粮食摻假和广告、正常工作日和英国工厂立法。許多片面的和肤浅的論断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演說者和听众的铁一般的坚持力，也使資產階級的比較有見識的报刊大为敬佩。它們写道：对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敬意！到現在为止，有誰为了討論改革問題，在很不暖和的房間里，坚持十一小时之久呢？在各种科学的代表大会上，人們可以使自己舒服一些，适时地恢复体力，来減輕精神上的紧张。

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了第一次議會战役，虽然不是沒有損失，但是也获得了荣誉，这对提高这次代表大会的情緒并不是沒有帮助的。

## 五 社会民主党議會活动的开端

2月12日选出的帝国議會同北德意志联邦的各邦政府共同討論的宪法，是完全根据俾斯麦的指示制定的。这件事應該由被吞并的或还未被吞并的中小邦的、向往統一的大經濟区的美景的資產階級負主要責任；过去它向已經解散的民族联盟提供过最囂張的吹牛家，現在他用同样的“国务活动家”給普魯士专制制度提供了最不敢声張的变节分子。老进步党的殘余分子在一个官方文件中，虽然还像平常那样昏乱，但有理由气憤地发出悲叹說：“新宪法給政府的和从人民那里夺走的权利比他們現有的都多。”尽管俾斯麦使长期拒发日薪成为一个內閣問題并且已經实行，可是至少普  
268 选权是得到了。工人們說，我們決不讓我們的議員挨餓，当1867年

8月31日北德意志帝国議會选举的时候，工人们重新鼓起勇气进行工作，新联邦宪法规定，帝国議会有三年的立法期限。

社会民主党这一次的选举成果，从数字上看还远远落后于它在二月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除去埃森区和汉諾威市第一次各以一千一百票走上了战场以外，其他沒有占领新的阵地，除去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巴門在第一仗中得了六千一百一十票以外，其他地方沒有达到六个月以前那样高的票数。甚至推举书商奥古斯特·盖布为候选人的、久經考驗的堡垒汉堡也只有二千票多一点。可是联合会正对正在进行的有效改組抱有希望，因此并不特別沮丧，加之其他党派都抱怨更大的不振，它就更不沮丧了。同在爱北斐特-巴門一样，施韦泽在賴辛巴赫-諾伊罗德也进入复选，虽然他在这个地区只得到了2月他在这里所得选票的一半。此外，哈森克莱維尔在埃森进入复选，他的对手是保守党地方长官德芬斯，賴因克在累内普-梅特曼进入复选，对手是年迈的卢道夫·康普豪森。夏天，賴因克曾在威斯特伐里亚报纸上同进步党人哈尔科特，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利問題进行了长时间的論战，从而得到工人的怀着感激心情的贊揚，他在萊茵-威斯特伐里亚的許多选区（除去在累内普-梅特曼以外，还在杜塞尔多夫、米尔海姆、杜伊斯堡、佐林根和哈根）被提名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受不伦瑞克代表大会委托，领导选举的施韦泽徒然地促使工人注意，不要这样害怕竞选。他說，有人认为工人沒有足够的威望当議員候选人，这是一种“可恨的偏見”，是必須彻底去除的，因为統治阶级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工人灌輸这种偏見。正如常見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經驗也应该表现为有效的教师。

施韦泽为复选发出了口号：在一切情况下——即使只有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竞选，工人也应该参加复选。从原則来看，是因为 269

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工人总是关心哪个候选人当选对自己有好处，从实际来看，是因为一个政党應該利用一切机会发挥作用。工人應該支持哪个竞选的政党的問題，首先以这些政党(尤其在主要选举中)对工人的态度而定。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年輕的党必須首先站稳脚跟，粉碎旧党想用来压制它的中伤和誹謗。在二月选举时，工人在杜塞尔多夫使进步党取得胜利；可是在杜塞尔多夫出版的《萊茵报》整个夏天淨是发表恶毒咒罵工人运动的文章。自由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斗争方式必須制止；在他們犯这种錯誤的地方，工人在复选中一定选同他們竞选的候选人；促进党的事业，比其他任何考虑都重要。可是，在自由党人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同工人党进行斗争(这当然是他們的权利)的地方，工人就在复选中选举自由党候选人，可是所謂民族自由党人不能算自由党人。他們不过是披着自由派羊皮的伪善的反动分子，对社会的危害比公开的保守党人还要大。

在貝尔格-馬尔克工业区，人們就是根据这些观点来对待复选的。在杜塞尔多夫，工人帮助俾斯麦派的米謝利斯取得对进步党候选人毕尔格尔斯的胜利，而一部分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选举人在爱北斐特-巴門使施韦泽取得对进步党候选人洛厄佛-卡尔貝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所遵守的这一策略当时受到各方面的猛烈譴責，这个策略肯定是有不妥之处的。不过，說它以同保守党和政府的某些秘密的和背叛性的协定为基础，是錯誤的。相反地，在主要选举以前很久，《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公开发表了这个策略，不过它不是一个原則上正确的，而是一个原則上不正确的，但在一定的困难情况下为进步党的无原則的不体面的政策所迫而采用的策略。無論如何，它有达到它應該达到的目的的优点。只要进步党看到，工人不是沒有意志的投票机器任人踢来踢去，它也就規規矩矩了。經

过双方协商，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哈根和佐林根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票，进步党选举人在埃森和累内普-梅特曼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实际结果是，哈尔科特在哈根，赖因克在累内普-梅特曼取得胜利，而哈森克萊維尔在埃森和欧根·李希特尔在佐林根落选。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施韦泽为自由党候选人特韦斯騰击败。

于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取得两个议席。而萨克森人民党不仅保住了格劳豪-梅朗内和茨维考-格里米乔两个选区，而且还得到了两个新的议席；李卜克内西在施托貝克-施内貝克，圭茨医生在莱比錫地区取得胜利。在并非完全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弗尔斯特林在开姆尼茨选区取得胜利。他在复选中同一个大德意志派的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据说弗尔斯特林在复选中比主要选举中多得了三千五百票，其中一部分是工人的敌人投给他的，因为这些人希望弗尔斯特林当选帝国议会議員能够损害社会民主党的事业。

不管这是真是假，总之当帝国议会于9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弗尔斯特林在奏折辯論中就不用头脑，机械地重复拉萨尔著作中的片言只語，使自己失去了議員的作用。可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失去了一个議員，因为赖因克随意利用一个机会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宣称社会主义的任务决不是促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互相斗争，而是互相和解。联合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同这个议会代表断絕关系，这件事是在柏林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圭茨和施腊普斯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他们很快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凶恶敌人，而倍倍尔还处在由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观点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转变的阶段。因此在议会中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而在他们之间，关于正确策略的旧争论又立时发生了。 271

李卜克内西认为北德意志联邦是一个暴力的、非正义的反动組織，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摧毀的。为了不加强北德意志联邦的力量，他反对給帝国議会的立法任务以任何实际帮助。对他來說，議會讲台只是他能够从那上面向群众表示他对德国新形势的抗議的地方。相反地，施韦泽把北德意志联邦看做是一个很討厭的、很不受欢迎的，但又是不可取消的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要想保持政党的身分，它就必須承认这个事实，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准备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李卜克内西嘲笑他是“瓦盖納的影子”，而他並沒有說，李卜克内西为被废的君主和奥地利政府服务，或者为了他們的利益工作，而是說，他不能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立場，因为在資產階級投入俾斯麦的陣营以后，除非利用外国的暴力，不能摧毀北德意志联邦，而这就是逃出虎口又入狼窩。根据施韦泽的見解，工人階級必須同本国的一切其他階級團結起来对付波拿巴的阴谋活动和被提升为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的复仇心，而李卜克内西把波拿巴和博伊斯特压迫俾斯麦，看做是强暴的侵略政策的必然命运。

因此，10月17日，討論关于兵役义务的联邦新法令时，李卜克内西发表意見說，历史将无視北德意志联邦这个暴力机构，它不表示別的，只表示德国的分裂、削弱和奴役，历史也无視北德意志帝国議会，它无非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李卜克内西反对常备軍，說它是俾斯麦所执行的暴力政策的工具；他所以沒有提出关于仿照瑞士的榜样成立国民軍的決議案，只是因为他在企图提出这个決議案时，中了議會規則的圈套。李卜克内西的演說以无情的鞭笞，击中了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一切要害，統治階級的十足的爱国者对演說人发出可怕的喧囂声，这就加倍贊揚了他的勇气。不过一种批評的純洁性和尖銳性，还不能在各方面保证它的正确性。如

果說李卜克內西預見到，俾斯麥要同波拿巴較量，那時北德意志聯邦的命運就處在戰爭運氣的天平上，那麼施韋澤根據歷史發展的整個情況看得更遠，他預料這個天平將在有利於俾斯麥的一邊下沉。

李卜克內西發言以後，施韋澤要求發言，以便指出他同李卜克內西的意見分歧。當時還用發言人登記簿，施韋澤在簿上登記反對議案。後來有人提議結束討論，在表決前，念了發言人登記簿，結果施韋澤在表示反對法案的發言人之中名列第九，而表示贊成法案的只有兩個人登記發言。施韋澤為了得到發言的機會，就轉到贊成法案的發言人一邊，這是在使用發言人登記簿期間，所有黨派為了發表並不接觸本來的討論對象的簡短訂正和解釋，在議會中常用的一種手段。假如這個完全無關緊要的插曲不是從那時就成為施韋澤的所謂背叛的主要證明，今天就毫無敘述的價值了。他“擁護”普魯士軍國主義；當時的國會發言人登記簿提供了文字證明。

事實上，施韋澤既沒有發言，也沒有投票贊成關於兵役義務的聯邦法案。他只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他有理由說，他是代表選他為領袖的幾千工人發表這個聲明的。這個聲明的意思是說，他同李卜克內西雖然都是反對北德意志聯邦的內部狀況的對派，可是他並不同意摧毀聯邦本身的企圖。他特別強調，他和他那一派的工人站在普魯士一邊反對外國。如果說他當時使用了不妥當的表達方法，說他不想對去年敵方驚嘆地承認的普魯士的特性亂加評論，那麼這種誇大是由李卜克內西的誇大——在國外，北德意志聯邦比去世的邦聯議會還要受到蔑視——引起的。今天他們的對立早已成為歷史了，在這個人或那個人所說的話里挑毛病，都是不公平的。可是李卜克內西認為，每個同施韋澤一起承認鐵血政

策的創作的人，同社会民主党之間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沟，这一点只有这样說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时在有階級覺悟的无产階級之間橫着一條鴻沟，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鴻沟。还不到十年，这条鴻沟就被填平了。

实际上，李卜克內西和施韦澤的新爭執可以溯源于他們旧日的意見分歧。李卜克內西的演說是一种純粹的宣傳性發言；在戰爭期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熱中于瑞士的国民軍時，恩格斯帶着輕蔑的口吻寫道：“人們所想像的那種形式的民兵，目前對於一個擁有一千八百萬人口而且邊境完全沒有設防的國家來說是不行的；即使在另外的條件下，所能實行的也不是這種形式的民兵。”<sup>①</sup> 李卜克內西肯定對這一點也很了解。他主要只是進行民主理想的宣傳。相反地，施韦澤認為，一個工人政黨必須執行實際的政策，當然並不是資產階級所考慮的實際政策，而是從无产階級的原則立場出發的實際政策。他投票反對軍事法案，可是他認為，為了使工人階級得到一點好處，不應該把議會的杠桿放到這上面，而應該放在別的地方。

北德意志聯邦的重心不在軍事方面而在經濟方面。這個軟弱的議會不能改變這種情況，即普魯士的軍事力量伸展到中等邦薩克森和參加北德意志聯邦的幾十個小邦。不過議會在制定一定程度上清除封建-行會殘余的經濟法令時，可以發表意見。資產階級把它的政治理想出賣給俾斯麥的代價，就是滿足它的物質利益。俾斯麥必須付出這個代價，他也願意付出這個代價。按照施韦澤的見解，社会民主黨議員在北德意志帝國議會中應該執行的實際政策，就是立即用工人階級的不從時效的要求阻礙資產階級开辟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頁。

更彻底地剝削无产阶级的道路。

在废除高利貸取締令方面，施韦泽按照英国立法的榜样，提出了一个提案說，一百塔勒以下的貸款禁止收取重利，并且发表了<sup>274</sup>一篇在德国議會中第一次闡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杰出演說，來說明自己为什么提出这个議案。同时他也很好地为进步党要求取消結社禁令的提案作了辯护。可是他在短期的議會會議期間的主要工作，乃是草拟反对資本，保护劳动的法令。这个法令草案共有四十七条，其中一部分是由普魯士立法关于禁止童工和实物工資制度已有規定的条文綜合而成，此外还要求所有成年工人都实行十小时工作制，設置有十分适当的职权的工厂視察員，最后还要求成立一个議會常設委员会，以“調查和确定在北德意志联邦范围内的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的状况”。这个法令應該扩大到雇用十个以上的雇佣劳动者的一切企业，而且不仅适用于狭义的工厂，也适用于农庄、碼頭、铁路、輪船，最后也适用于家庭工业。根据英国工厂立法的經驗，施韦泽把重点放在設立一个有效的工厂监督机构方面，同随意写在法令汇编的紙上，冷眼旁观的最广泛的禁令和懲罰条例相比，这种办法起的作用更大。施韦泽曾把他的草案讀給几个进步党議員听，这几个人高傲地說，这不算什么，他們将提出加重的修正案。对这些人了如指掌的施韦泽冷冷地回答說：那我很高兴。

首先他在由工人选出的議員中，征求提出草案所需要的十五个人的签名。可是弗尔斯特林和賴因克拒絕签名，李卜克内西为自己和他的同志声明說，他們不能在旨在通过重要設施保护北德意志联邦的提案上签名。于是施韦泽去找进步党的明智的批評家，他們答应签名，可是第二天根据一个党派決議，他們又取消了自己的諾言。民族自由党人也玩了同样的把戏，先答应，后党派决

議，最后拒絕。保守党人表示願意签名，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要  
275 把农业工人除外，这一点施韦泽当然不能同意。在做了很大努力  
以后，施韦泽做到使进步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答应，如  
果主席提出有沒有人附議的問題，他們就各出五个人。可是主席  
西姆桑是一个道地的資產者，他对无产阶级的議會代表始終抱有  
毫不掩飾的偏見，这时他說，他不能表示滿意，他要看到十五个人  
的签名。于是施韦泽又作新的嘗試，各党派又找新的借口，主席又  
重新坚持，直到短期會議結束，吓得出汗的爱国者得救为止。

后来，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人指責說，施韦泽企图利用这个  
草案，使俾斯麦掌握工人运动，同瓦盖納勾通一气。草案完全以英  
国工厂立法为根据，它不包含在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保护法草  
案中也沒有完全重复的条文。俾斯麦本人当时也同平常一样，始  
終頑固地反对合法的劳工保护，各邦政府的代表机关，新的联邦議  
会絲毫也不关心施韦泽的草案，甚至暂时把帝国議會通过的进步  
党的关于废除結社禁令的議案扔到字紙簍里。施韦泽就附議問題  
同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商談，而且也同保守党人商談，这种做  
法是正确的，并且他本人立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做了詳細的  
报道。他在这个問題上，同瓦盖納进行了商談，也是十分可能的。  
可是他宁可放弃保守党的支持，也不願用违背原則的让步来換取  
这种支持，因此看不出他應該受到什么指責。

施韦泽不过是按照前一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會的意見行动的，  
代表大會宣称，工人保护法并不加强統治阶级的力量，而是把  
这种力量变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工具。

## 第四章

### 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

由于一部伟大著作的第一卷(在很长时间内只出了第一卷)的<sup>276</sup>出版,1867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部书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达到了经典性的完成阶段。他在描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同时,登上了一个可以明晰地俯视现代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的高峰,就像一个站在最高山顶上的登山者,俯视下方的山景那样。

马克思在他的新著的第一篇里,再一次总结了他在1859年的著作中对于商品和货币所做的叙述。同时,他是以还要丰富得多的叙述,在全世界这样广阔的范围內,用一幅色调精细入微的图景,来进行这一总结的。在写作技巧方面,能够比得上《资本论》的这几章的世界文学创作是不太多的。只有没有受过辩证法训练的读者,才会感到这几章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难于理解。只要认真努力,这个从人类发展过程的深处流出的、清澈得可以数出泉底的每粒砂子的认识的清泉,就能出现在每个具有健康头脑的人的面前。

然后马克思转而研究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个问题。既然在商品流通中进行着相等价值的交换,那么货币的持有者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价值买进和卖出之后,获得比他原来投入的货币更多的价

值呢？货币的持有者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現存的社会关系下，他在商品市場上发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消費了之后可以創造新价值的独特性能。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馬克思由此揭开了古典經济学沒有能够揭开，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費了很多力气也沒有能破的一个謎；馬克思还由此說明了似乎同資本主义的價值規律存在着尖銳矛盾的劳动報酬和劳动产品之間的差异。

劳动力以活的工人形式存在，活的工人需要一定的生活資料來維持自己的生存，以及維持在工人死亡后保证繼續有劳动力的家庭的生活。生产这些資料所需要的时间，就是劳动力的价值。但是，以工資形式支付的这种价值，大大低于劳动力的购买者可能从劳动力上榨取来的价值。超过补偿工人的工資所需要的时间的工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是不断增加的資本积累的源泉。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員就依靠这部分无偿的工人劳动过活。也就是說，地主的地租、資本家的利潤以及國稅和地方稅，都依靠这部分劳动偿付，我們在其中生活的整个社会状况就以这种劳动为基础。

誠然，无偿劳动本身并不是現代資产階級社会所特有的东西。自从社会上出現有产階級和沒有財產的階級以来，沒有財產的階級总是被迫向有产階級提供自己的无偿劳动。只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垄断生产資料，自由的工人或不自由的工人，就不得不在維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時間以外，再做若干時間的工作，去为生产資料的私有者生产生活資料。雇佣劳动不过是自从出現階級以来就占統治地位的无偿劳动制度的特殊历史形式，也就是一个为了正确了解它而应当就其本身加以研究的特殊历史形式。

为了使貨幣轉化为資本，貨幣的持有人必須到商品市場上去

寻找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的工人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拥有作为商品出售的劳动力，除了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其他可供出售的商品；第二，说他没有任何必要的物品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力。这不是自然历史关系，因为大自然既不创造货币和商品的持有者，也不创造本身只拥有劳动力的人。然而，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也就是一系列比较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衰亡的产物。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构成资本发生的历史前提。现代资本的生活史从现代世界贸易和现代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产生以后就开始了。庸俗经济学家胡说八道，似乎自古就一直存在着勤劳的优秀人物，他们积累了财富；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们最后除了出卖自己的身体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了。这种鄙俗、幼稚的见解可以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昏庸媲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由于自己的昏庸，在描述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时，反把这种解体看做是工人的解放，而不认为这同时就是由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向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人不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便不像归独立经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有那样归工人所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地、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被用一系列强暴和残酷的手段剥夺得干干净净。马克思在论原始积累的一章中，根据英国历史，对这类手段作了详细的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自由工人就是这样产生的。资本一生下来，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出血污。新生出来的资本一旦立定脚跟，就不仅维持工人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

雇佣劳动与以前的各种无偿劳动的不同点在于，資本的运动沒有止境，資本对剩余劳动的貪心永远不会滿足。在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社会經濟形态內，剩余劳动为一个或大或小的需要范围所限制，而从生产的性质当中还没有对剩余劳动产生无限的需要。但是，在交换价值占优势的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資本作为他人勤劳的生产者，作为剩余劳动的吸收器，作为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自己的能力、貪得无饜和效率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以直接的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过程。对于資本來說，重要的不是劳动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价值的增殖过程，也就是使資本可以比原来的投入額增加价值的交换价值的創造。資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貪求是无饜的。为滿足需  
279 要而进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有限度的，而交换价值的生产則是沒有止境的。

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統一一样，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創造的統一。价值創造的过程一直繼續到以工資形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得到等价的补偿为止；过了这一点以后，价值創造的过程就变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变成价值的增殖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統一，价值創造的过程是資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資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共同发生作用；在价值的增殖过程中，資本的这两个組成部分，以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的形式出現。不变資本轉化为生产資料，即变为原材料、輔助材料和劳动資料；它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可变資本轉化为劳动力，并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己的价值和超过这个价值的剩余，即生产本身可以改变而且可大可小的剩余价值。这样，馬克思就为剩余价值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同时把剩余价值

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上发生着虽不相同但各有其决定意义的作用。

在资本家延长工作日，使它超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时，就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如果一切都任凭资本家为所欲为，那么一个工作日就可能达到二十四小时，因为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越大。相反地，工人正确地感到，他们在为补偿自己的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每多劳动一小时就会使自己受到损失；他们亲身体会到劳动过度是个什么味道。自由的工人一出现在历史舞台，就为争取标准的工作日而斗争，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资本家为攫取利润而奋斗，不管他个人的品格是高尚还是丑恶，竞争都迫使他把工作日拉长到人的工作能力的极限。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争取每天有几小时休息而斗争，以便除去劳动、吃饭和睡觉以外，还能作为一个人进行活动。马克思用十分动人的笔触描述了英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工作日的长短问题上进行的五十年内战。这场内战从大工业出现以后开始，直到颁布十小时工作日法才结束。大工业促使资本家排除了本性和习俗、年龄和性别、白天和黑夜给剥削无产阶级所设的一切障碍。十小时工作日法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屏障，可以防止工人阶级本身自愿地与资本家签订契约，在死与受奴役的状态下，出卖自己和家人。

相对剩余价值是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随着增加而创造出来的。在产品决定着劳动力价值的一些工业部门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办法，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为此，必须不断地改革生产方式，改进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在探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各章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历史、经济学、工艺学和社会心理

学方面的論述，是他至今所写的著作中的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为他作传的一位資產階級作家，也嘲笑那些学院式的政治經濟学教科书不从这个丰富的科学宝库中汲取材料，而仍然肤浅地重复亚当·斯密一百多年以前对于分工所做的論断。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原諒这些教科书，那就是要想从馬克思这样的革命思想家的著作里找到可以直接倒入資產階級大学的秣槽里的思想，比从海克立斯<sup>①</sup>手里夺取木棒还要困难。

馬克思不仅指出，机器和大工业制造的貧困，比过去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所制造的更为可怕，而且也指出机器和大工业在不断改革資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为更高一級的社会形态作好了准备。制定工厂法，是社会对它的生产过程的自然发生的形态首次有意識和有計劃地施加影响。当工厂法調整工厂和作坊里的劳动的时候，最初不过是干預資本的剝削权利。但是事实的力量很快又促使工厂法也去調整家內劳动和干預父母的权力，从而承认大工业

281 随着破坏旧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础和与此相适应的家庭劳动，也在破坏旧的家庭关系。“尽管旧家庭制度在資本主义体系內的瓦解，显得十分可怕和可厌，但是大工业由于在家庭制度范围之外的社会有組織的生产过程中，給予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以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較高形式創造出新的經濟基础。当然，把基督教德意志的家庭形式看成絕对的，同把古罗马的家庭形式、古希腊的家庭形式或东方的家庭形式看成絕对的一样，都是不合理的。其实，这些家庭形式相互間形成一个历史发展系列。同样明显的是，由男女两性和不同年齡的个人构成的劳动結合体，在它的自发的、粗鄙的資本主义形式下（在那里，工人是为了生产

<sup>①</sup> 希腊神話中最伟大的英雄，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以力大英勇著称。——譯者

过程而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了工人而存在），是使人灭亡和遭受奴役的祸源，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必然反而变为人类发展的源泉。”<sup>①</sup>机器把工人贬低到简单的附属品的地位，可是同时又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条件，社会生产力的这个高度将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得到同样的人类应有的发展，而过去的一切社会形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馬克思探討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以後，就得出政治經濟學史上第一個合理的工資理論。商品的价格是用貨幣表示的商品價值，而工資則是勞動力的價格。直接出現於商品市場上的不是勞動，而是出售自己勞動力的工人；勞動只是通過一種叫做勞動力的商品的消費而發生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但是它本身並不具有價值。不過乍一看來，勞動好像以工資形式得到了報酬，因為一做完工作，工人就領到了工資。工資的形式抹去了工作日之被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一切痕跡。在使用奴隸勞動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奴隸好像完全為主人勞動，甚至他們僅僅用以補償自己的生活資料價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也像是為主人勞動的。他們的全部勞動都表現為無償勞動。相反地在採用僱傭勞動的情況下，甚至無償勞動也會以有償的面貌出現。在前一種情況下，所有制關係掩蓋着奴隸為自己所做的那部分勞動；而在後一種情況下，貨幣關係掩蓋着僱傭工人給資本家做的那部分勞動。馬克思說，由是，我們就懂得，把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轉化為工資形態，或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有一種決定的重要性。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權利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神秘，它的一切自由幻想，以及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辯護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參閱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28頁。

性的胡言乱語，都建立在这种掩盖真实关系，表现其相反的一面的現象形态上面。

計时工資和計件工資是工資的两个基本形式。馬克思根据計时工資法，着重揭穿貪婪无厌的剝削者，首先是雄赳赳的俾斯麦为反对頒布限制工作日的法令而經常发出的偏頗的空論；他們說，限制工作日会使工資下降。事实恰恰相反。临时縮短工作日，会使工資下降，但是长期縮短工作日，却能够提高工資；工作日越长，工資就越低。

計件工資无非是計时工資的轉化形式，它是最适合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工資形式。計件工資在真正的工場手工业时期得到較大的活动范围，到了英国大工业的突飞猛进时期，便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工資的杠杆。采用計件工資，对于資本家十分有利，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使資本家不必去监督工人劳动，而且为資本家提供各式各样的借口，以便克扣工資和施展其他欺騙伎倆。但是，对于工人來說，实行計件工資却有巨大的危害。过度劳动損害着工人的健康，他們本希望依靠过度劳动多掙几个工錢，然而实际上，过度劳动只有降低工資的趋势。此外，計件工資还加强工人之間的相互竞争，削弱他們的团结精神；由于采用計件工資，就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产生一群中間的寄生分子，他們从資本家支付的工資中克扣很大一个部分；其他还有种种弊端。

283 剩余价值和工資的关系决定，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断地替資本家再生产資本，而且也不断为工人再生产貧困，也就是說，它一方面再生产拥有一切生活資料、一切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的資本家，另一方面再生产这样的广大工人群众，他們为了取得最多只能維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撫养能够工作的无产者的新生一代的生活資料，而不得不向上述的資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

資本不仅再生产，而且不断扩大和增殖。馬克思在描述資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篇中，对于这一“积累过程”作了研究。

不仅是資本产生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产生資本。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一部分被有产階級当做收入，在他們当中进行分配，然后消費掉，另一部分当做資本积累起来。从工人階級身上榨取来的无偿劳动，现在成了从工人階級身上榨取数量越来越大的无偿劳动的手段。由于生产繼續进行，最初預付的全部資本，与直接积累的資本比較起来，即与轉化为資本(不管这项資本是在积累者本人手里发生作用，还是在他人手里发生作用)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比較起来，一般在数量上不断减少。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私有制規律，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的、必然的辯证法，而轉化为自己的直接对立面。商品生产的各項規律似乎确定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彼此平权的商品持有者互相对立，只有轉让自己持有的商品，才是获取他人商品的手段，而自己的商品只能由劳动来生产。现在，所有权在資本家那方面，表现为把他人的无偿劳动或产品据为己有的权利，而在工人这方面，則表现为他們不可能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

当現代无产者开始明白这种联系的时候，当里昂的城市无产階級敲起警钟，英国的农村无产階級放火烧毀地主庄园的时候，庸俗經濟学家发明了“节欲說”。根据这种学說，資本是由于資本家自願“节欲”而产生的，正如拉薩尔在《巴师夏-舒尔采》一书中已經做过的那样，馬克思也同样无情地抨击了这种学說。实际上，促进資本积累的是工人的被迫“节欲”，是强制压低工資，使工資低于劳动力的价值，以便把一部分必要的工人消費基金变为資本积累基金。实际上，对于工人的“奢侈”生活发出的哀号，对于据说柏林的瓦工們喝了一瓶香檳酒而不断发出的抱怨声，基督教社会改良 284

主義者的廉價菜譜，以及諸如此類的資本主義的爭論，都是來源于此。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如下所述。資本的增大，包含着它的可變部分，即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的增大。如果資本構成保持不變，也就是說，為了使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發揮作用，經常需要同等數量勞動力，那麼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生存基金，顯然與資本按比例一同增加，資本增加愈迅速，它也增加得愈迅速。同簡單再生產不斷地再生產資本關係本身一樣，積累以擴大的規模再生產資本關係，那就是在一個極端再生產更多或更大的資本家，在另一個極端再生產更多的僱傭勞動者。所以，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人數的增加，同時在上述情況下，資本的積累是在十分有利於工人的條件下進行的。在工人自己生產的日益增加的、越來越多地變為新資本的剩餘產品中，有較大一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工人手裡，因此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範圍，更好地以服裝、家具等等充實自己的消費基金。但是，工人不能由此擺脫從屬地位和受剝削的地位，猶如穿著漂亮衣服，吃着美味食品的奴隸不能不再是奴隸一樣。工人們經常被迫付出一定數量的無償勞動；不錯，付出的數量可能減少，但是決不會下降到給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造成任何嚴重威脅的地步。如果工資被提高得造成了這種威脅，那麼利潤的刺激就會鈍化，資本的積累就會弛緩，直到工資再降落到與資本增殖欲相符合的水平為止。

只有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資本的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不變的時候，僱傭勞動者為自己鍛造的金鏈才按照長度和重量稍稍放鬆一點。但在實際上，隨著積累的不斷進行，資本的有機構成（馬克思這樣稱呼它）也發生巨大變動。不變資本增加，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使得生產資料總量的增長快

于同生产资料合而为一的劳动力总量的增长，对劳动的需求不会随着资本积累按比例上升，而是按比例下降。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285各项规律引起大资本吞并小资本而发生的资本集中（与资本的积累无关），也起着这样的作用，不过形式有所不同。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数量越增加，吸收的工人就越少，另一方面，以新的构成再生产的旧资本，越来越多地排斥它原来雇用的工人。这样，就产生了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需要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支产业后备军。在工业处于停滞或平淡时期，这支后备军没有经常性的工作，所得报酬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被迫向社会救济机关求援，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一个使在业工人失去反抗力量，并使他们的工资保持低微水平的因素。

既然产业后备军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积累和发展财富的必然产物，那么它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条件。随着资本的积累和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在加强。这种力量需要大批的人力，以便把它们一举投入新的市场或新的生产部门，而不必缩减其他领域的生产规模。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道路具有被一些较小的波动打乱的、十年一循环的周期形式，周期由一般复苏、生产高涨、危机和萧条等阶段构成。这条生活道路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形成，即产业后备军的或多或少受雇和重新形成。社会的财富越大，运用的资本越大，这种资本增加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也就是说，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劳动生产力越大，相对剩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数量与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的劳动大军比较起来，产业后备军越大，其贫困与其所受劳动折磨成反比例的工人阶层的人数也就越多。最后，工人阶级中的求乞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等待救济的正式贫民也就

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286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也是由这条规律产生的。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一起，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以经常扩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这种协作形式是：有意识地在技术上应用科学、土地的有计划共同开发、劳动资料向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的转化、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联合的社会劳动的公共生产资料使用而来的节约。随着夺取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人数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规模继续扩大，但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同时加强。他们在人数上不断增加，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训练、统一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成了同这种垄断在一起和在它之下成长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不能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并存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将被恢复，但这已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作为土地和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现的恢复。当然，实际上已经以社会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化，远不如以个人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转化持久、困难和艰巨。后一种转化的实质是少数剥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前一种转化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剥夺者。

当然，只用不多几页篇幅，不可能提供《资本论》第一卷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和大量事实的近似概念。在这样的概括中，或多或少出现没有得到证明的论断，而这些论断在原书中却是用石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没有涂灰泥，也没有粉刷，以逻辑的作用力牢靠地结合在一起，巩固地建立在事实的重力的基础上。尽管这部著作中的精神瑰宝十分丰富，几乎俯拾皆是，但是这部书还有一个表明

作者才华的最真实的印記，那就是給讀者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这位大师比他的著作还要伟大。

馬克思一面批判政治經濟学，一面使它达到完善的地步。他是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筑的；馬克思在那些独立的思想家們中断了关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的地方，繼續这一研究，說得更确切一些，这些思想家們不得不中断这一研究，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內在規律的作用，还没有发展到使他們能够深刻認識这种規律的地步。古典政治經濟学的資產階級繼承者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暴露它的真实的而且毫无疑問并不漂亮的面目，他們就越不研究和闡述这种生产方式，而专心为資本主义现实塗脂抹粉，而把这种作法叫做“科学的繼續发展”。在馬克思的这部书問世以后，他們最初試图使用他們的慣用手法，即使該书沒沒无聞。但是，当这种策略沒有奏效的时候，他們又发出了狂叫，說什么这本书具有非科学的傾向。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是《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八年以后，奧格斯堡《总汇报》发表的批評。这篇評論不是出自哪一个自由貿易論者的手笔，而正如評論的內容所表明的，是历史学派的某一位成員写的。

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写道，誰要想彻底理解資本的实质，就得科学地探討資本的真实历史。这种研究工作要求具有巨人的力量和小人的耐心。誰要想談論今天的財富分配制度不公，就得探討今天的利潤和工資的事实，探討所有制及其发生和消灭的事实。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向有專門知識的讀者作某种证明。現在人們也許在期待这样的結論：馬克思滿足了上述的一切要求。可是并非如此！“馬克思有意識地和故意地停在五十年前英国国民經濟学的观点上，对科学的任何其他的发展采取輕視不理的态度，

或者不如說他对此毫无所知。他竭力用大卫·李嘉图的抽象手法,发展和完善李嘉图的学說,好像要补充李嘉图始終沒有作出的最終結論。他具有自学者的一切傲气,依靠他认为确凿无疑的前提,然而別人却认为这些前提早已被推翻了。李嘉图和其他一些老作家,当然有其不容置疑的功劳,他們研究了并完善了經濟学邏輯,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現在已經过时了。目前正着手用这种陈旧的邏輯,解决与資本所有制有关的迫切問題,而自以为在推动科学前进的人,走着錯誤道路,错过了科学生活的整整一代的时光。”所謂馬克思错过了的“整整一代”的时光,一方面被巴师夏及其門徒用来歪曲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說的詭辯所充实,另一方面被罗雪尔和“历史方法”的其他大师用来企图越过古典經濟学的令人不快的結論的胆怯的跳跃所充实。

我們只举出这一个例子就够了,因为它是无知的典型,而且也能說明資產階級經濟學几年及至几十年之久,談論馬克思的著作时所能理解的程度。資產階級經濟學終归也逃脫不了馬克思的著作的影响。事态的发展本身证实了馬克思所作的結論,这些結論是这样令人信服,以致对于目光短浅的人也不必证明它們的正确性。今天,沒有一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还敢重复二十年前这类經濟學家对《資本論》第一卷所說的那一套陈腐的廢話,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說,資產階級經濟學还在做着的一切实际工作,都直接或間接受到这部书的影响。只要資產階級經濟學不仅用稻草,而且还用相当有力的武器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它就在《資本論》的烈火中鍛造这一武器。可是,正如蛮族企图用文明的武器保卫自己的陈腐过时的社会制度,仍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一样,資產階級經濟學也逃脫不了灭亡的命运。

但是,在工人階級开始同馬克思的著作形成血肉相連的关系

以前，工人階級也还必須經歷經濟的发展，从中受到教育。这應該归咎于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的那种实际状况。馬克思說，同西欧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德国不仅受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痛苦，也受着这种发展不足的痛苦。由于古老的已經过时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的落后于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殘喘，就产生了一連串遗传下来的灾难，它們使工人看不清馬克思的著作所揭露出来的現代社会灾难的內在联系。約翰·菲力浦·貝克尔把《資本論》称为工人階級的聖經，这是一个从理論上来說不恰当，而从历史上來說是正确的比喻。最初，对《資本論》表示驚訝的人多，讀它的人少，对它表示欽佩的人多，能够理解它的人少，用正統的热情解释《資本論》的人多，用批判的認識解释它的人少。关于教条主义的狂热的指責，在当时比現在具有較大的意义，因为今天德国大工业的势不可擋的进步，一天比一天清晰地表明，馬克思多么正确地理解了英国大工业的典型本质，他的著作是多么結合历史实际，而沒有教条主义的性质。

一部描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定时期的历史性著作，不可能是适用于未来一切时代的、絕對无誤的智慧之泉，誰也不会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而馬克思更不会这样提出。三十年来，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許多为馬克思所不知道和沒有預見到的現象；現代工业特有的生活道路，沒有繼續保持馬克思所說的十年一循环的周期形式。但是，事实上的任何偏差，至今只是加强了馬克思所发现的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占統治地位的趋势的正确性。有人企图引证工人階級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最先得到了进步，来否定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工人階級带来的贫困化，結果是枉費心机。然而馬克思所证明的資本主义积累的趋势，正是大工业越来越厉害地用使人挨餓和服劳役的手段訓練

和教育将要挖掉資本主义老根的工人大軍。有人妄图把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經過艰苦的努力，才由大工业中挖掉的东西，說成是大工业的所謂成就，想用这种办法使工人階級厌恶經濟的和政治的階級斗争。这种妙論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縮短自己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痛苦阶段的口甜心苦的諧謔罢了。

如果說大器晚成，《資本論》第一卷只是慢慢地成为德国无产階級的精神财产、那么在它出版以后，这个可喜的同化过程就开始了。施韦泽首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談到这部著作，他完全理解这部著作的内容，馬克思认为他所写的这一組評論文章是值得重視的。然后在李卜克内西自 1868 年初作为薩克森人民党的机关报出版的《民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評論，分两次刊完，毫无疑问这篇評論是恩格斯写的<sup>①</sup>。第一个掌握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这部主要著作的精神的德国工人，是制革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他当时住在彼得堡，从那里給《民主周刊》寄去一篇字里行間洋溢着伟大著作的精神的評論。

对此馬克思感到十分高兴；他把他的巨著为工人階級本身所理解的标志，看做是这个著作的“最好的报酬”。他常称一年后在一篇論人脑活动的实质的著作中独立地闡明了唯物史观的狄慈根，是“我們的哲学家”。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61—271 頁。

## 第五章

# 德国的工会

如果說 1857 年的危机第一次（虽然起初只是間接地）推动了 291 欧洲工人运动的复兴，那么 1866 年的危机，起的这种作用就强烈得多，直接得多。英国证券交易所紛紛倒閉，使得投机买卖完全陷于停頓。在流通普遍停滯期間，許多工厂不得不縮減生产或完全停止生产；工資下降，失业人数增加；1866 年和 1867 年的歉收，使工人階級不可缺少的粮食的价格猛涨。

在这种經濟压力下，欧洲工人运动得到巨大发展。按照工人运动在各国所达到的不同規模，无产階級对非人的生活状况的义憤以不同形式表現出来。芬尼亚运动<sup>①</sup>席卷爱尔兰，比利时的矿工們在一次饥餓暴动中起来反对最可怕的困苦处境，这个资产階級的模范国家只知道用枪弹来鎮压这次暴动。在 1866 年的失敗使德国资产階級执掌政权的奥地利，立即形成了一个无产階級反对派，当然这个反对派的实际力量同它外表上的威武姿态是不相称的。

在工人运动已經相当发展的国家里，对危机的鞭笞的反抗表現为多次的罢工，同时也就同国际建立了比較紧密的联系。1866

<sup>①</sup> 芬尼亚运动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爱尔兰爭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以小资产階級秘密革命組織“芬尼亚社”为核心。1865—1867 年間曾发动过一些地方性起义，但均被英国鎮压。1870 年后，活动漸停止。——譯者

年在設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工会代表會議，“极为殷切地”劝告这些組織参加国际，国际对伦敦机器制造工人、青銅器工人、裁縫、制籃  
292 工人和其他行业的罢工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867年春天巴黎青銅器工人的一次罢工中，国际的援助保证这些工人能够享受刚刚获得的联合自由。1868年春天，当日內瓦建筑工人为了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时而展开斗争时，国际又帮助他们获得了胜利。

在德国，經濟危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被同一个1866年带来的政治危机的影响所掩盖。德国資產階級和普魯士专制制度刚刚建立的友誼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因为他们对目前的危机应该由誰負責这个问题发生了有趣的爭吵，在个别地区，如东普魯士省，这种危机发展成为最可怕的饥荒。官方报刊宣布要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不幸的經濟理論作殊死战，因为一切灾难都是这种理論造成的，而自由派报纸也毫不逊色地断言，普遍的危机是由于各邦政府不断地扩大軍备，从而使战争危机不断增长而造成的，因为它们使生产和流通受到損害。工人階級的机关报对正在爭吵的两兄弟說，他們每个人可以想想自己的缺点，可是它們却认为这次失业的直接原因应由政府負責。《社会民主党人报》說，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造成导致群众貧困的生产停滞，可是政府的过错在于，在那个基础上发生了今天这个特殊的停滞，《民主周刊》也发表类似的想法說，铁血政策的种子在不景气、饥荒和国民貧困化中发芽成长了。

### 一 《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尽管有这种相同的看法，可是自从《民主周刊》出版以来，全德工人联合会同薩克森人民党之間的对立不是緩和了而是大大加

剧了。

其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治态度比较缓和。恰恰在这一时期，施韦泽激烈地反对普鲁士政府，以致受到控告和监禁的两面夹攻，报纸则被警察没收，《人民报》甚至毫无顾忌地赞扬这种攻击的激烈程度。当然，《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了能够按时出版，不得不在对柏林政府的支柱的个人攻击方面有所保留，而莱比锡的《民主周刊》就不必采取这种态度。可是这种迫不得已的慎重决不会使《社会民主党人报》蒙受耻辱，而当它比《民主周刊》更有力、更通俗地论述迫切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就更不是这种情况了。它关于当时萨克森的出版自由所说的话，同莱辛在一百年前关于老弗里茨统治下的普鲁士出版自由所说的话<sup>①</sup>差不多相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主周刊》不会因为侮辱俾斯麦，而只有因为侮辱波拿巴而受到控告。但是，总的说来它享有值得羡慕的出版自由，而《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是德国受迫害最厉害的报纸，莱比锡的报纸不应因为利用了它的有利形势而受到责备，柏林的报纸也不应因为它没有自讨苦吃而受到指责。

两个报纸的真正差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在北德意志联邦的基础上当反对派，而《民主周刊》要摧毁这个联邦，第

<sup>①</sup> 梅林这里指的是莱辛于1769年8月25日致弗里德里希·尼古拉的信中所说的话：“此外关于您的柏林的思想和写作的自由，您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这种自由只限于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反对宗教的无礼的话。正直的人很快就会以运用这种自由为耻。可是请您让一个人在柏林试一试，自由地写别的东西，而不写宗伦费尔斯在维也纳所写的东西；请您让那个人试一试，对高贵的宫廷僕从说真话，而不像他们对他所说的那样；请您让一个要想为了臣民的权利发表反对压榨和专制的言论的人，在柏林像现在在法国和丹麦那样行动，那么您很快就会体验到，那个国家到今天为止还是欧洲最卑贱的国家。”（《莱辛全集》，共十卷，鲍尔·里拉编，第9卷，1957年柏林版，第327页。）——原编者

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科学的認識方面,远远胜过《民主周刊》。薩克森人民党的机关报估計不久的将来,1866年的产物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它推动博伊斯特去反对俾斯麦,說博伊斯特正想“报柯尼希格累次之仇”,他在奥地利实行議會統治,解放报刊,实行結社权,把军队置于帝国議會之下,着手废除国家与教会的条約,《民主周刊》甚至还为臭名远揚的汉諾威王党军队辯护。相反地,它对《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采取的政治立場,尤其是社会立場几乎毫不了解。这家报纸說,全德工人联合会沒有別的基础,只有  
294 “几句不断重复的拉薩尔关于国家資助的套語”,这个論断的頑固程度仅次于它的不公正的程度。《民主周刊》除了发表了两篇評論《資本論》第一卷的文章以外,沒有发表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断发表的关于科学共产主义問題的許多論文有同等价值的文章。为了挽救“目前的物价上涨和失业”的局面,《民主周刊》甚至又一次把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的劳动紙币提出来討論,在一組关于《国家資助和自助》的論文中,虽然它所持的見解原則上是正确的,但是它却为这种見解提出了不正确的論据,它硬說,拉薩尔向群众提出国家資助这个口号,而沒有說明,哪个国家能够而且應該帮助,并且还补充說,拉薩尔“当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民主周刊》对約翰·雅科比的評價比对拉薩尔的評價要好一些,它期望他运用适当的行动力量,使德国民主派得到新生。1868年1月,約翰·雅科比对他的柏林选民作了关于德意志人民党的宗旨的講話,不久以后,这篇演說为他写給一个拥护者的一封信所补充。这两者都表明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高尚、純洁的人,但也是一个对現代資产階級社会的階級斗争毫无所知的唯心主义的形式上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普遍公式,如果应用到具体的日常問題上,可以表示某种很革命的东西,也可以表示某种很反动

的东西。他要求每个民族、每个种族有同样权利要求自由和自决权，这个要求可能被好心人理解为民族革命；但像雅科比本人所理解的，作为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自决权，这个要求却是十分反动的，它溯源于一个对破坏三月革命起了不少作用的观点，即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这样一些真正的革命者所經常坚决反对的观点。

雅科比的社会綱領也是不明确的。他要求在資本和劳动之間合理分配生产成果，限制大資本家和大地主濫用权力，对于工人則用他們在生产成果中应得的份額即全部的劳动利金，来代替难以維持生活的低微工資。这是唯心的空論，它可以表示一切可能的东西，可是正因为如此，也必然造成巨大混乱，而且也确实造成了巨大混乱。同雅科比一样高尚、純洁的白拉克解释这种看法說，在資本和劳动之間合理分配生产成果和工人應該得到全部的劳动利金不是一回事；資本沒有权利繼續使用劳动力，而劳动（只有它才能創造一切价值）才應該得到全部劳动成果。相反地，宗納曼这样解释雅科比的綱領，他說工資和利金是一回事，工資保证最低的劳动利金，問題在于，除了工資以外，保证工人在生产成果的余額中得到一份；这对工人有好处，对工厂主也有好处，因为工人知道他为什么劳动，就可以提高生产。到底是誰正确理解了雅科比的口号呢？是正直的社会革命家白拉克呢？还是企图更多地剝削工人的資本家宗納曼呢？这是人的智慧所不能断定的。

《民主周刊》决沒有否认，約翰·雅科比还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它认为，他十分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党，和在俾斯麦专制政治的領域內开展反对这种政治的斗争，就必须掌握住雅科比。撇开問題的原則方面不談，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就是錯誤的，即它过高地估計了雅科比的政治影响。雅科比

身后除去一小撮資產階級思想家而外，沒有任何力量，這些思想家的機關報是古伊多·魏斯新創辦的《未來》，這是資產階級的最正直、最有才氣的報紙，但也是讀者最少的報紙。柏林的小資產階級或者支持在資產階級軌道上行駛的《人民報》，或者，在它開始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就吞下了又冒出头來的蠱惑家海耳特在《國民報》上扔給它的誘餌。對於同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結成可靠的同盟，柏林小資產階級懷有舊日的恐怖心情。

296 施韋澤生活在這些狀況之中，他善於巧妙地使海耳特的煽動失去作用，不惜同這個空想家進行公開論戰，他對雅科比的綱領的看法比《民主周刊》要公正得多，但決不是不友善的。他指出了這個綱領的不徹底性，但是也“衷心”同意雅科比的說法：“人民黨和工人聯合會必須攜手並進；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兩者的共同目標，即人的高尚化”，只是補充說：“是的，我們願同資產階級的比較堅決的分子攜手並進，可是我們要以有自己的原則的獨立的工人黨的身分這樣做。”1868年7月19日，在沃耳芬比特耳附近舉行的有很多人參加的民眾大會上，根據白拉克的提案以及關於這個提案的解釋，通過了一個決議，決議認為雅科比的綱領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之間在目的上沒有原則差別，這時《社會民主黨人報》才提出有力的證明。它十分確當地說明，接受雅科比的模糊的言論，會使歐洲社會主義倒退幾十年，可是它卻把這些言論叫做一個裝模作樣的資產者的愚蠢空論，這是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潑去的做法。像雅科比這樣一種人是一點也不裝模作樣的。毫無疑問，他是真心要同工人友好的，雖然他並不了解，問題的關鍵何在；當人們對他的綱領有兩種完全相反的解釋時，他始終保持沉默。

這一段敘述已經足以說明《民主周刊》同《社會民主黨人報》之間存在的意見分歧了。今天高高在上地對此妄加評論是很沒有意

义的，正如从一方面来看完全是背叛，从另一方面来看完全是明智一样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历史的对立，这些历史的对立没有得到历史的解决以前，必然继续斗争。在一定时期内，萨克森和南德的工人群众不了解《社会民主党人报》，正如柏林、爱北斐特、汉堡和整个北德的群众不了解《民主周刊》一样。

## 二 汉堡代表大会和纽伦堡代表大会

工人运动的高涨既推动了萨克森人民党，也推动了全德工人<sup>297</sup>联合会。不管《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观点相距多么远，可是德国工人在紧急关头所能依靠的毕竟只有这两个机关报。它们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的或官方的御用文人异口同声所说的那样，用“蛊惑性言论”得到日益增长的影响，而是用世界上最正当的方式，即对工人阶级在各方面进行忠实帮助的方式获得这种影响的。

同1867年一样，1868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即由一千二百个订户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个订户，分布在二百一十五个地方。汉堡仍然以八百零七户遥遥领先，其次就是柏林的二百二十四户，再其次是爱北斐特-巴门一百六十一户，汉诺威一百五十四户，埃森一百零七户，不伦瑞克八十九户，哈尔堡六十一户，阿尔托那六十户，卡塞尔五十八户，法兰克福五十三户，巴黎五十户。多年以来，在巴黎有一个拉萨尔拥护者的巩固而忠实的集团，其中魏特林的老同志彼特森和后来任巴黎公社劳动部长的列奥·弗兰克尔，由于有热情有见识而显得突出。

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没有狭隘的民族倾向。在这一方面它也只知道考虑什么是已经可能做到的，什么是还不可能做到的。当

1867 年底 1868 年初，奧地利工人运动得到巨大发展的时候，施韦泽向維也納工人发表了一个卓越的宣言，說明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共同的任务和目标。他強調使德国工人和奧地利工人联合起来的內部統一。“我們知道，我們是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人們决不能使我們相信，如果我們站在維也納的文化公园里或蒂罗尔的山上，就是在外国。說德国話的地方，就是德意志祖国。”但是施韦泽并不諱言，在目前情况下，建立外部統一的任何尝试都威胁着內部統一。遺憾的是霍弗斯特騰在这一方面的空想更多一些。他为了創辦一个工人报到奧地利去，引起了一場混乱，使德国和奧地利的工人运动都受到損失。由于完全正确地預見到，維也納資產階級会誹謗他是“俾斯麦分子”和“普魯士人”，霍弗斯特騰就化名参加了維也納工人协会，当假面具掉下以后，这个步骤当然不仅更加引起他應該避免的事情，而且也使維也納工人产生怀疑。施韦泽責备霍弗斯特騰的这种行为，但是对他的“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采取最寬容的态度，并完全承认霍弗斯特騰对联合会机关报的功績，这样施韦泽就履行了一件不可拒絕的义务。

現在联合会的內部組織已經完全建立起来，并且很好地发挥作用。拉薩尔曾經希望把所有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組織在联合会之中，这个希望越来越幻灭了。甚至在有成千上万个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人的爱北斐特-巴門和汉堡，联合会會員也只各有五百人；唯有伊塞隆，特耳克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原則的所有工人差不多全組織起来；在这个較小的城市中，有七百名會員。联合会只是党的核心，可是一旦事关紧要，就有六倍、十倍、十二倍于此的群众很容易地加入到这个核心里来。1868 年 3 月，在約有三百个联合会會員的埃森进行改选时，哈森克萊維尔在主要选举中得了二千零六十五票；后来在复选中败于保守党候

选人之手，因为进步党选举人把反动的科伦警察局长看做是比老民主主义者哈森克莱维尔更有资格的代表。可是，1868年7月，当赖因克放弃議員席位的时候，累内普-梅特曼选区被保住了，弗里茨舍在那里主要选举中得了三千二百二十三票，复选中战胜了舒尔采-德里奇推荐的、大多数进步党选举人通过弃权間接支持的保守党候选人。

在白拉克的周密管理下，联合会的財政状况也有好转。同从前一样，会費是每周半个銀格罗申，在特別貧穷的地区，如西里西亚和薩克森織工区为四分之一銀格罗申，可是各处必須把收到的会費的半数上繳給联合会金庫。行政管理費用是非常节省的；柏林代表大会确定联合会唯一支薪的干部，書記的月薪为二十塔勒，并且只同意总共付給罗勒尔二十五塔勒，作为他自从不伦瑞克代表大会以来任职半年的报酬。1867年中期，主席每月为联合会工作所能支付的款項只有二十五塔勒，而一年半以后，每月已經可以支配三四百塔勒了。

收入的一大部分暂时被用来弥补联合会机关报的亏空，这个报纸由于霍弗斯特騰財力罄竭多次瀕于深淵边缘，后来只得費劲地自力更生。为了維持这个报纸，施韦泽不得不在1868年2月向联合会会员发出一个非常募款的紧急号召。因为他不願公开說出是怎么回事，免得使資產阶级高兴，所以他只是說，事关联合会的重大利益，他将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对募来款項的用途作必要的說明。虽然如此，号召仍然得到很好的結果。施韦泽作为联合会机关报的編輯拿的薪金同当主席拿的薪金一样多。可是，在霍弗斯特騰到了維也納，同联合会领导有关的事务日益增加以后，施韦泽就聘請威廉·哈赛尔曼为助理編輯，哈赛尔曼是一个年輕的学化学的大学生，生于不来梅，幼年父母双亡，靠有錢的亲戚施舍度日，

尝过同这个命运往往不可分割的艰辛。由青年时代的这些悲惨的经历，产生了敌意的沉默寡言的表现，这已经成了哈赛尔曼的外部举动的特征。他对资本主义无比憎恨，并且有一个灵活的头脑，不久他就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应付自如了。他的能力不及施韦泽，可是他是一个有才干的记者，尽管他的文章刺激的成分多，鼓励的成分少，但却是十分有力的。

经过三年苦斗，施韦泽终于达到他在拉萨尔死后给自己确立的目标。他在保持拉萨尔的组织策略的同时，能把德国工人运动导入《共产党宣言》的比較广阔、自由的道路。他同马克思保持友好的关系。<sup>①</sup> 1868年夏天，当计划降低铁关税，制铁工业家企图用煽动性言论，唆使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反对这样做的时候，  
300 施韦泽就向马克思求计。然后他向工人说明，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德国的制铁工业能够经得住降低铁关税，但是维持铁关税也不会妨碍制铁工业的发展。问题在于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以某种方式起重大作用，而民族发展并不因此受到损害。因此工人必须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如果主张保护关税的制铁工业家要求工人支持，那么他们就干脆回答说：好，我们准备这样做，我们主张在降低铁关税以前对铁的生产情况进行调查，我们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这个调查的范围不仅包含资本家的利

<sup>①</sup> 梅林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施韦泽之间根本谈不到存在什么友谊。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8年的通信：比如5月6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5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7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1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2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9月2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0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等等（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译者）。梅林在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还没有见到这些信。——原编者

益，而且也包含工人的利益，特别是要包含生产铁的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和生活状况。根据施韦泽的这个指示，特耳克在哈根召开了一个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大会，制铁工业家被邀参加这个大会。可是这些虚伪的人没有一个出席，于是工人大会作出决议说，降低铁关税并不损害工人阶级的总的利益，因此工人没有任何理由给主张保护关税的制铁工业家以所要求的帮助。

附带说一下，施韦泽利用独裁的全权，决定联合会的社会政治态度，这还是唯一的一次。他明确指出，正确判断铁关税问题，首先要有专门科学知识，他曾经向“我们这一派的最重要的科学权威”征求意见。他决不企图执行一种具有主观专断意义的独裁；他清楚地知道，现代无产者不是盲目任人指引的羊群。当然警察和司法的无尽无休的迫害助长了可恶的独裁欲，这种独裁欲趋向越来越严格的集中。可是施韦泽经常十分重视，同代表大会完全协调一致，也同会员群众完全协调一致。虽然他有正式的职权，但是他所任命的全权代表，没有一个不是由有关地方的会员提出的。他所理解的独裁只是一种明确而迅速的有力行动，他把这种独裁看做是一把锤子，虽然一只手能够最有力地挥动这把锤子，但是必须由集体来锻造它。 301

可是事态的发展开始使这种有限的独裁受到压制。1865年，当罢工运动在德国露出最初苗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采取了鼓励的和善意的态度，不过还完全根据拉萨尔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联合自由是工人阶级的一种好权利，不是在较大范围内消除工人阶级疾苦的手段。后来，1867年在英法两国爆发的许多罢工，已经使这个报纸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它看到，现代工业达到一定高度的所有地方，不顾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种种协定，不顾工人由于罢工而实际体会到的痛苦经

驗，都出現了具有威力的罷工；工人不可能這樣固執、這樣完全地看錯自己的利益；罷工必然有一種內在的根據。《社會民主黨人報》認為這種根據在於，無產階級首先從工資狀況上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受損害的和被壓迫的階級，首先把它的解放的杠桿放在這裡，因此罷工有怎樣高度評價也不為過的突出的特性，即把至今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階級狀況的工人從昏睡中推醒，使他們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中受到輕視以及他們有共同的利益。可是，因為《社會民主黨人報》堅決認為，罷工在經濟上必然是得不到成果的，只是一個提高無產階級階級覺悟的手段，所以它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工人階級已經公開為實現自己的最後目的而努力的地方，罷工通常是不可容許的。

然而，1868年施韋澤也從這種見解邁出了一步。在理論上他可能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學習到，工資鐵律是他的障礙，在實際上，日常經驗給他指出，有階級覺悟的工人也不放棄罷工，罷工沒有經濟成果並不是不容置辯的教條。弗里茨舍在1865年底就建立了雪茄煙工人協會，接着在第二年中期成立了印刷工人聯合會，現在壽普也建立了裁縫工會，呂普克爾特建立了木工工會。在像愛北斐特-巴門、埃森、漢堡這些社會民主主義的老家，爆發了多次罷工，取得了變化無常的，但一般說來至少並非不利的結果。經過鬥爭而得到增加的工資，大多只能補償生活資料上漲的價格，在這一方面，工資的增加證實了工資鐵律而不是否定工資鐵律，但是它也恰恰指出，在一定情況下罷工是非常必要的。

柏林的事件特別具有教育意義，籠罩着那裡的災難吹散了沙文主義的愛國狂熱的最後煙霧，工人運動開始復興，在工人運動早就停頓的布勒斯勞（拉薩爾的故鄉），第一次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在柏林，印刷工人和雪茄煙工人的工會組織都取得了顯著成果；印

刷工人取消了規定的星期日劳动，雪茄烟工人通过延續数月之久的光荣斗争，抵制一个工厂主强加在他們身上的侮辱人格的工厂法规。面包师、瓦工、木工开始反对可伶的工资和无限的劳动时间，現成服装工业的惊人秘密的紗幕第一次露出了一点縫隙，这种工业在柏林盛极一时，并且已經夸口說这里是天下第一。

这种工业中的剝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变得傲慢自負的資本家們甚至不怕把他們的騙人伎倆公之于世。他們往往把湿羊毛交給他們的女工，在加工过程中羊毛干了，交回成品时，重量不足就成为克扣工资或扣除交出的保证金的理由。有一家叫舒尔茨和济本馬克的商号竟使出这样的手段，即向检察院告发一个不甘心受它欺騙的工人侵占原料。可是法庭宣告被告的女工无罪，因为調查证据的結果表明，舒尔茨和济本馬克商号有計劃地欺騙被它敲骨吸髓地剝削的女工。这个令人惊异的案件使人們注意到柏林現成服装工业的状况，事实表明，这种工业的繁荣完全是以精神和肉体的衰亡为基础的，它利用这种手段戕害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女工的生命。 303

这些穷苦的人們如果要想多挣点錢不致很快就餓肚子，她們就必须从黎明劳动到天黑。当她們疲憊的眼睛在最微弱的灯光下（有錢人的嬌生慣养的眼睛在这种灯光下連綫也瞧不見）終于失去作用时，几小时的不安静的睡眠就是她們唯一的安慰，是她们生活中的唯一享受。她們吃这样多的辛苦，每天縫厚呢絨类最多挣十个銀格罗申，縫白麻織品約八个銀格罗申，做刺綉工作約三至五个銀格罗申。这些女工摆脱这种可怕的貧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卖淫，这条出路使她們受到警察的監視，把她們送进劳动院、監獄，遭到不名誉的死亡。

應該承认，当这种情况被公众知道的时候，資產階級大吃一

惊。甚至連最地道的自由貿易論者至少也起来譴責从現成服装工业的女工的吃不飽飯的工資中夺走几个可怜的分尼的欺騙行为。只有普魯士警察完全站在資本主义犯罪掠夺方法的頂点。它解散了討論現成服装工业的状况的工人集会，因为这些女工要亲自参加。根据普魯士結社法，她們根本沒有这种权利；普魯士警察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对“穷人中的最穷的人”的白血病感到十分愉快；“社会王国”只能有这种表現而不能有别的表現。

同三年前一样，《社会民主党人报》又以极大的毅力，不顾警察的沒收，維護受到威胁的結社权。进步党的哲学家們从后面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当施韦泽在帝国議會中竭力要再提出去年关于实行联合自由的提案时，他們也只是沒精打采地跟着跑。帝国議會中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暂时不想参与其事，但是坚持明年实行联合自由，尽管只以保留的方式实行。不管警察用种种詭計迫害罢工的工人，自从1865年法庭在布尔克的織布工人罢工中宣判被控违反联合禁令的二百七十八个工人无罪以后，检察机关就不再为此进行起訴了。可以預料，在法律上承认联合自由将使罢工运动更加扩大，工人階級的最近的未来将属于工会斗争。

施韦泽沒有看錯。他仍然把通过罢工可以消灭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叫做对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得逞的、粗暴的欺騙，可是他看到，在工人群众沒有通过实际經歷認識到工人哪怕只要求最低限度地改善他們的状况，統治階級是多么憤怒和无比憎恨以前，工人群众不会提高階級觉悟，不能摆脱警察国家和金錢力量的監視。“总之一句話，罢工是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完全統治的历史必然的过渡阶段。”由此自然得出結論，即通过正确地組織罢工，尽可能地縮短这个过渡阶段，防止工人群众中存在的运动的分散和分裂，至少尽可能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以反对資本主

义生产方式，并維持它同政治鼓动的紧密联系。

施韦泽达到了这一步，虽然他沒有走得更远。他不承认工会运动同政治运动有同等权利而且是独立的，在他看来工会运动只是給政治运动以更大力量的杠杆；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工会运动看做是一个要塞，在它的墙后有新兵受訓，迫不得已时，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也能找到一个避难所。虽然事情日益表明，政治組織只包括工人阶级的精銳部队，但是因此它也受到警察当局和国家检察机关的大力迫害，它們总是寻找而且也找到新的借口，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責难。这个联合会的大約三分之一的地方組織又因为“建立联合会分会”而受到攻击；在某些地方，如在柏林本地，联合会在初审中虽然經過斗争被宣判无罪，可是检察官立即向高一 305 級的法院提出控訴，高一級法院的判決至少是不可忖度的。1868年夏天，当施韦泽在汉堡召开联合会代表大会时，产生了一个不吉利的預感，即这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8月22日至26日举行的。施韦泽所以在汉堡召开这个大会，是为了向那里的会员致敬，“他們由于有最严格的紀律和对原則的忠誠、有行动力量和自願牺牲精神而超群出众，可为整个联合会的典范”。为了对卡尔·馬克思的巨著表示感謝，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发出請帖請馬克思以貴宾的身份参加代表大会。紧急的工作使他不能到会；他在一封回信中表示歉意，并“高兴地”确定，代表大会把一切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提到了公开會議的議程上，这些出发点是鼓动人們爭取充分的政治自由、調整劳动日和工人阶级在它必須为全社会完成的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任务中的、有計劃的国际合作。代表大会决定尽一切合法手段，为爭取政治自由而斗争；它宣称依法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必要的，它指責剝夺工人的最后的休息日和最后的家庭幸福的星期日劳动是社会暴

政的頂峰；最后大会作出決議說，只有各文明国家的工人行动一致，他們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德国工人党就有义务同受同样原則指导的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党共同前进。

代表大会的三次公开會議都是庄严的群众大会。汉堡工人表明他們无愧于旧日的声誉，他們提供了六千名值得感激的理解力很强的听众。在四次不公开的會議中，处理了联合会的本份事务。三十六个代表，代表有七千二百七十四名按期繳納会費的會員的八十三个地方，而大多是这一年才爭取到的五十至六十个地方还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代表大会同意，主席可以首先把余款用于維持联合会机关报方面，为此施韦泽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所有者，交一千塔勒給联合会作保证金。此外代表大会还决定，直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收支平衡为止，不足的份数由联合会訂来用于鼓动工作。但是代表大会否决了沃耳芬比特耳會員关于把《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联合会財產經營的提案，也否决了杜塞尔多夫一个會員把編輯部同主席职务分开的提案，大会认为这两个提案是不适当的。人們估計《社会民主党人报》过两个季度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到了那个时候，联合会的經費就用于派遣支薪的鼓动員（首先在薩克森王国和南德）进行有計劃的宣传工作方面。为了組織这一工作，主席得到了必要的全权。書記的月薪提高到二十五塔勒。

不公开會議所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联合会对罢工运动的态度問題。不伦瑞克的會員提議組織罢工。为此佩尔提議轉入議程，而弗里茨舍却提出了两个議案，要求代表大会首先声明，罢工不是改变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的手段，而是提高工人的階級觉悟，冲破警察的監視，在正确組織的前提下把各种严重的社会弊端，如过长的劳动時間和星期日劳动从現社会清除出去的手段，第

二个提案要求代表大会责成主席为成立总工会而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佩尔的提案以三千四百一十七票对二千五百八十三票遭到否决，弗里茨舍的第一个提案以相同的多数票被通过，他的第二个提案以三千二百五十五票对三千零四十四票遭到否决。代表大会对罢工采取了原则上欢迎的立场，可是从联合会方面来看，罢工的实际组织是不必要的。

根据这个投票结果，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声明，他们将以帝国议会成员的身份召开一个工会代表大会。他们的声明又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主张是否违反党的原则。施韦泽本人认为，毫无疑问代表大会有权制止主席做它认为有害联合会的一切事情。如果主席不服从，他就必须退出联合会。现在代表大会不同意联合会掌握罢工的组织（它这样做也许是有益的），可是它原则上是同意罢工的。由此他似乎得出结论，代表大会拒绝责成联合会主席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而不愿表示禁止参加这个大会。现在它可能作进一步的说明，可是他毫不諱言，如果代表大会禁止他召开工会代表大会，他就一定立即辞职，并退出联合会。按照他的见解，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必须组织罢工运动；如果他意识到由于一种重大的迟误而可能使鼓动工作毫无生气，他就不能继续负责领导工作了。后来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声明，它不愿表示禁止；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帝国议会成员的身份可以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307

可惜关于这些讨论没有详细记录，因此不能看出，反对派在多大程度上受了实际困难或正统的拉萨尔主义的支配。这两点共同发生作用；佩尔在他提议转入议程的简短理由中只是强调指出财政上和形式上的反对意见，而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文章中十分坚决地为自己辩护，反对认为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就是

背离拉薩尔传统的这种看法。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他完全正确地强调这一事实，即罢工运动存在于群众之中，而在拉薩尔在世时是没有这个运动的。发动这样一个运动，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同样也不是拉薩尔的任务，可是如果存在这个运动，那么每个社会主义者（拉薩尔还活着可能也是这样），必须念念不忘给它指出正确目标。代表大会一结束，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从汉堡向全德国的工人发出了一个宣言，定于9月27日在柏林举行全德  
368 工人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决定一切与罢工有关的事项，并在会上建立全德工人的广泛组织，利用罢工达到共同进展的目的。

十天以后，在紐伦堡举行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自从格腊代表大会以后，倍倍尔以灵巧而有力的手腕对联合会进行了领导，不久他就认识到，在向前进的和往后拉的分子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他在写给阿伯特·朗格的信中說，宁可有十个可靠的协会，而不要三十个摇摆不定的协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联合会内部以十分原始的方式发展，受到经济事实的不可抗拒的雄辩所推动，而不是像一般人所說，是受了李卜克内西的所谓说服术的推动，他和《民主周刊》一样，同联合会本身还没有关系。联合会自己有一个机关报，即在曼海姆出版的《工人会堂》。可是工人协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联合会想起一点作用，它就必須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迫切问题采取一定的立场，联合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越积极地武装起来保卫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还占有的最后阵地。莱比錫总部9月5日在紐伦堡召开代表大会，并表明它的目的是提議把国际的章程中的要点当做联合会的纲领，这时双方立即为多派代表参加大会而大力进行宣传鼓动，资产阶级方面千方百计地人为地增加还跟着它跑的工人和工人协会的数字。

可是面对着貫穿工人群众的不可抵抗的潮流，它們沒有成功。紐伦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莱比錫总部提出的綱領，还决定成立集中的工会，否决了宗納曼提出的一个議案，这个議案主张工人的救济会通过邮局来建立，也就是說使工人救济会成为受国家监督的机构。在重大的綱領問題付諸表决时，票数是七十二个协会的六十九票对三十七个协会的四十六票。資产階級少数派还想使个花招挽救敗局，它硬說支持多数派的工人协会会员还不到一千八百 309 名，而支持少数派的却有八千八百名。倍倍尔立即在一个簡單明了的声明中揭露了这种欺騙。虽然按照他的計算，少数派还有五千八百七十六个会员，而多数派只有六千四百八十个会员，但是不久事实就表明，立即退出联合会的少数派根本沒有行动能力。少数派企图建立德意志工人同盟，可是始終沒有超出发起阶段。少数派的协会或者加入了多数派，或者解散了；它們之中今天只有柏林工人协会仍然存在，当时这个协会分为两个协会，一个用旧名称坚持进步党的綱領，另一个用民主工人协会的名称参加工人协会联合会。

正如格腊代表大会一样，紐伦堡代表大会也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它还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联合会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倍倍尔被选为主席，莱比錫被定为总部所在地。奥地利和瑞士的工人协会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国际总委员会的是埃卡留斯，刚刚参加过汉堡代表大会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几个会员，希尔德斯海姆的基尔希納和柏林的卡尔·希尔施以多数派的观点作了有力的发言。虽然如此，在多数派之中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們同无产階級階級斗争是水火不相容的。像拉登多夫这样的老实人，宗納曼这样的不可信賴的分子，德意志人民党中的各种狡猾人物，他們所以勉强接受国际綱領，是因为这

个綱領对于工人階級的民族政策还一点也沒有談到。德意志人民党正式派遣代表出席了紐伦堡代表大会，而紐伦堡代表大会也正式派代表参加德意志人民党于9月19日和20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代表會議，經過三年的疼痛以后，这个會議終於产生了一个民族問題和社会問題的綱領。

撇开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和汉諾威苟延殘喘的奥古斯滕堡分子和汉諾威王党分子，撇开雅科比的几个拥护者，尤其是主要由工人組成的、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大力发展的薩克森人民党不談，德意志人民党已經收縮成一个南德的党。可是假如德意志人民党面对着南德的軟弱无能的政府，在整个欧洲的竞争的掩护下，开展一个有力的民主宣传（这种宣传是使柏林反动派煩惱的最可靠手段），那么德意志人民党在柯尼希格累次和色当之間的几年中<sup>①</sup>，恰恰由于它的地域的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历史意义。可是有利的时机白白地放过了，因为同德国革命的时期相似，偏狹的分立主义战胜了一切民主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空話，因为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沉痛地所說，德意志人民党的唯一动力是对普魯士的有利于敌人的盲目憎恨。

德意志人民党在1868年秋天終於写到紙上的民族綱領，也无非是一种落后的、用关于自由和自决权的空話粉飾的分立主义，而它的社会綱領則还要更糟一些。德意志人民党原則上声明它“贊同紐伦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綱領”，提出了像改进国民学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在废除常备軍和工人参加分純利等点上，比北德自由派激进一些或狡猾一些得出資本主义結論，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水平。这

<sup>①</sup> 指普奧战争和普法战争之間的几年。——譯者

些要求同它們所“贊同”的国际的綱領和平相处，就像資本同劳动和平共处那样。人們根据这些作为就可以理解，馬克思把北德的民族自由党人同南德的人民党人之間的冲突叫做“小事”了。恩格斯也說过类似的話，他說，第二年的历史证明，民族自由党人和人民党人之所以这样激烈爭論，只是因为他們是同一种愚昧固陋的两个相反的极端。

当紐伦堡的多数派还同德意志人民党保持联系的时候，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的決議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作出的決議更为一致。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9月6日至12日在布魯塞尔举行，有九十七名代表参加，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比利时代表，法国有十八名，英国有十一名，瑞士有八名，德国有四名代表出席大会。布魯塞尔代表大会关于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罢工对于 311 工人阶级的意义所作的決議同汉堡代表大会所作的完全一样，国际代表大会第一次贊成土地公有制，当然只有主要由法国代表組成的有力的少数派表示反对。施韦泽接到了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正式邀請，可是因为他不断地受到国家檢察机关的迫害，必須注意几个开庭期限。他在答复邀請的回信中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站在国际的立場上，只是由于德国結社法的阻撓，它才沒有正式参加这个协会。

正在这个时候，結社法又被用来破坏作为民族組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高等法院在第二审中判決，柏林的地方組織作为独立的分会加以解散。虽然不服还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訴，可是9月16日，萊比錫警察局就下令解散了整个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次作为借口拿出了这条規定，即會員所繳会費的一半可以在各地用于地方用途，“由此可見各地的联合会會員不仅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而且也是有自己的出納处的地方組織的成員”。因为問題只涉

及到一个借口，所以施韦泽也没有用法律手段来对付莱比錫警察当局的命令，而只是简单地指示說，联合会必須立即解散，正如他給会员解释的那样，并不是“为了服从官厅的命令”，而是“因为根据目前情况，那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合理的事情”。施韦泽認識到而且也公开表示，在莱比錫进行的打击是从柏林来的；他想避免最高法院对“独立的分会”事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因而所有普魯士法院必須遵从的判决。他采取自动解散联合会的办法，保留了立即又以排除一切可能有的指摘的形式，建立新联合会的可能性。

### 三 工会运动的分裂

312 尽管有其他种种分歧，汉堡代表大会和紐伦堡代表大会都服从似乎为德国全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开辟共同行动領域的两个決議，一个是加入国际，另一个是成立工会。《民主周刊》对形势的理解也是这样。它在9月12日的一期上写道：“在汉堡、紐伦堡和布魯塞尔有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目标：从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劳动，取消阶级統治和工資奴隶制度，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国家。”同时《未来》上也发表了一篇莱比錫通訊，其中說，民主的工人协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定程度上的圓滿合并只是時間問題。

这种統一的努力是值得称贊的，可是人們却在离开所追求的目标很远的道路上做这样的努力。《未来》的莱比錫通訊中說“前者和后者”由于个人原因阻碍德国工人的团結。《民主周刊》变得更加粗魯了，它在第一版上承认汉堡代表大会的民主決議，而在同一期的第二版上却絕對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处罰联合会的—一个汉堡的会员，鞋匠普腊斯特，因为据一个人民党—汉諾威王党

報紙說，他在漢諾威紀念拉薩爾忌辰的集會上稱贊普魯士的兼併。可是甚至沒有確定，這個一年以後從施韋澤一邊轉到李卜克內西一邊的普臘斯特是否真正犯了違背原則的錯誤；在漢諾威王黨的庇護下，為爭取德國的統一和自由而鬥爭的這家報紙的斷言，不能被認為是確凿的證明。《民主周刊》的這篇論文立即也被《未來》轉載了。

在這以前，施韋澤沒有計較《民主周刊》對他私人的和政治上的完美無缺進行的一切攻擊。現在他回答《民主周刊》說，全德工人聯合會不能對某一個會員的言論負責；主席也不能像法警和檢 313  
查官似的站在演說人身後；如果有人要想知道，他本人對那個漢堡會員的所謂言論有什麼看法，那麼他說，“無論是普魯士的兼併、軍事、警察行動，或是在中小邦中被‘人民黨’和被驅逐的王侯的工具挑起的、對普魯士的偏狹、可惡的憎恨，都不能使我們所追求的德意志人民國家早日實現”。對於《未來》的萊比錫通訊，施韋澤聲稱，全德工人聯合會將同紐倫堡協會的多數派攜手前進，正如它同一切意氣相投的友好黨派攜手並進那樣。可是合而為一是談不到的，除非紐倫堡協會在它們受到歡迎的時候參加全德工人聯合會。可是拉薩爾建立的嚴格的組織決不能為了給一種“含糊的謬論”讓位而有所改變。

這種表示肯定是很不客氣的，不過同九個月來施韋澤不得不聽《民主周刊》說的那些壞話相比，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粗野行為。無論如何，施韋澤所說的“含糊的謬論”是不容誤解的。他不是指他本人剛剛表示贊同的國際的綱領，而是指紐倫堡協會對德意志人民黨的曖昧的關係。雖然如此，《民主周刊》還是發生了誤解，它說施韋澤的不客氣的話“只”能針對馬克思的學說，拉薩爾的學說同馬克思的學說的差別僅在於，前者使後者鈍化。因此施韋澤再

一次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事业的叛徒”。

此后，只剩下工会运动还是它們共同活动領域。可是紐伦堡协会沒有派代表参加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于9月27日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正如李卜克内西后来所說，并不是因为在施韦泽宣布紐伦堡协会不可参加代表大会以后，再去参加就破坏了紐伦堡协会的名誉。事情是这样：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萊比錫警察局解散以后，314 《社会民主党人报》声称，根据結社法規定，政治团体彼此不能結合，考虑到这一点，“像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紐伦堡多数派这样有政治綱領的工人团体”，不能派代表参加大会。就这整个指示来看，只涉及一个使代表大会免遭警察干涉的形式問題；最多紐伦堡少数派的协会有理由表示不滿，它們沒有政治綱領，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个注释中补充說，这个少数派也不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因为否則事实上一个政党受到了优先待遇。代表大会对于已經存在的一切工会的代表，各行各业的会義和一切工人會議的所有代表毫无限制是表示欢迎的。

对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責备提出更早，人們責备他們支持工会代表大会的召开，他們不先等待紐伦堡代表大会的发展，然后再同胜利的多数派的总部共同进行工会运动的組織工作；事情并不特別急迫，因为联合自由还要过一年才实行。可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有确实的理由趁热打铁。他們希望在斗争的信号发出以前，就已經把他們的队伍組織好，把他們的軍事金庫充实起来。面对着自己党內的反抗（这种反抗从对紐伦堡代表大会的結果的很成問題的思辨中只会得到新的养料），对他們來說，尽快地制造一个既成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制止进步党的阴谋活动，它現在正着手控制无产階級罢工运动，并把它引上錯誤的道路。

有人說，在麦克斯·希尔施为了研究英国工会并把它移植到德国来，而到英国去以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就着手建立工会了，这纯粹是捏造。李卜克内西在流亡英国期间对英国工会了解很深，回到德国以后，做过许多报告，使德国工人注意英国工会，而早在麦克斯·希尔施想到这个漂亮的主意——用拙劣地模仿英国 315 工会的办法使还有进步思想的工人看不清自己的真正利益——以前，施韦泽至少几年以来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论述过有关问题。麦克斯·希尔施为了了解合作事业到英国去，到了英国他才由于真正研究过英国工会的卢约·布伦坦诺的指引，注意到英国工会；对于麦克斯·希尔施的“研究”，有一个确当的考验，在他已经有几个星期之久，在德国工人面前颂扬仲裁办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以后，却向布伦坦诺求援，请求布伦坦诺使他摆脱困境，因为他自己“可惜没有一点”关于英国仲裁机构的“材料”。如果说驳斥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可能从麦克斯·希尔施那里学习了一点东西的这种极端无知的说法是必要的，那么由于麦克斯·希尔施企图匆匆忙忙地着手建立德国工会，因此尽快地阻止他的活动就是更加必要的了。

在这期间，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号召在德国工人中得到了热烈响应。有二百零六名代表出席了9月26日开幕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些代表代表一百一十个地方的十四万二千零八个各种行业的工人。代表人数最多的当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基地柏林，计二十七人，包括附近的布兰登堡在内共四十二人，其次是汉堡-阿尔托那二十二人，爱北斐特-巴门十一人，不伦瑞克七人。可是从南德，如奥芬巴赫、曼海姆、海德堡、弗赖堡、施派耶尔、斯图加特、奥格斯堡、符次堡等地来的代表为数也不算很少，此外，萨克森王国、德累斯顿、弗赖贝格、格劳豪和莱比锡也有代表参加。

于是进步党大失所望。它只能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两天召集还跟着它跑的机器制造工人的最后残余，約四、五百人开会，而在这些人之中已經产生了这样的意見：人們不能因为一件好事是由社会民主党方面发动的，就不参加。舒尔采-德里奇本人不得不发表一篇演說来应付这种危局，他自夸是天生的工人領袖，叫嚷什么“坏蛋們的高談闊論”。这个會議选举了以麦克斯·希尔施为首的十二名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抗議“組織社会战争”。当然破坏代表大会的这一企图沒有得逞；麦克斯·希尔施在第一次會議上說了一些討厌的廢話以后，他和他的党羽就被赶走了，而舒尔采对施韦泽的一个使者与其說老实还不如說是慎重地否认，他所說的“坏蛋們的空談闊論”是指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宣言。这种胆怯还給他带来代表大会的一个有力的決議，同时代表大会宣称，它把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看做是自己的兄弟，驅逐他們的代表只是反对有意識的搗乱者。可惜这个善意的声明沒有能够寬慰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的受到伤害的团結精神，他們現在又更紧密地站到进步党一边去了。

除此而外，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得非常順利，經過四天討論，建立了十个 *Arbeiterschaft*① 和一个 *Arbeiterschaft* 联合会。人們所以选用“*Arbeiterschaft*”这个名詞，是因为大多数代表害怕 *Gewerkschaft*② 这个名詞可能在許多工人中引起对行会活动的不愉快的回忆。立即組成十个工会是鞋匠、裁縫、瓦工、面包师、五金工人、伐木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装釘工人、馬具工人、矿

① 德文 *Arbeiter* 意义是工人，加后綴 *schaft* 变成集合名詞，*Arbeiterschaft* 一詞的意义，此处即为工会。——譯者

② 德文 *Gewerk* 原意是手工业、行会，而 *Gewerkschaft* 一詞的意义是工会。——譯者

山工人、冶金工人和制盐工人，最后还有染工、織工和手工业工場工人。代表大会为各工会起草了示范章程，由各工会决定接受、修改或拒絕接受；它們的义务只是作为联合会的成員遵守該会的章程，只要它們一滿五百人就可以参加联合会，联合会本身是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样子組織的一个爭取胜利进行罢工斗争的团体。由三个委員和两个候补委員組成的主席团，由全体會員普选产生；代表大会由各工会派当地代表参加，各个代表所掌握的票数为他所代表的地方的工会的會員数；每个工会有一个全权代表参加委员会，工会每有五百个會員，它的代表就有一票。可是这个委员会的职权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相应机构理事会的职权大得多。尤其是它可以单独决定：是否要宣布一次罢工是联合会的事情；它是一个决策机构，而主席团只是一个执行机构。

在已經成立的工会中，裁縫工会临时加入联合会，因为它还不知道它的代表大会是否贊同，而雪茄烟工人和木工的代表宣称，他們要迫切劝告他們的代表大会参加。相反地，印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拒絕参加，因为他只有权贊成各工会的一般的联合而无权贊同各工会的集中的結合。有人提議等各工会組成以后再建立联合会，然后召开一个新的代表大会，其理由是要照顾到人們不可冒犯的“其他社会主义分子”，不过經過深入討論以后，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同时多数派的发言人认为，代表大会可以代表德国工人階級的各个派別，如再召开新代表大会将花費巨大費用，而且必須堵塞資产階級敌人进行新阴谋活动的一切可能性。这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且設立了第一届主席团，由施韦泽、弗里茨舍和爱北斐特的工厂工人克萊因組成。第一任委员会也立即成立起来，願意参加工会的各行业代表各选出一个全权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被选为联合会的机关报。

施韦泽就代表大会問題，在9月15日和10月8日給馬克思写过信。这两封信的原文迄今沒有发表，可是馬克思于10月13日写給施韦泽的回信<sup>①</sup>已經发表了。从这封回信的内容推断，施韦泽希望馬克思审查他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議案，并就工会运动問題，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紐伦堡协会之間进行調解。馬克思說他准备充当調解人，并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正的；他还說，他曾經以国际的德国書記的身份一再号召和平；他得到的回答（为此引证了318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話）是施韦泽自己挑起了这场战争，他声明說，在这场决斗中，他应起的作用，仅仅是充当公断人。人們不可能說得比馬克思在这里所說的更公平的了，可是这次他对德国的情况也沒有确切的了解。施韦泽沒有挑起战争，馬克思从人們給他寄去的“引证”中可能也看到这一点，这些引文說明施韦泽制止挑衅；否則恐怕他就很难以这样友好的态度給施韦泽写信。正是在这封信中，他承认施韦泽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表現出来的“絕对的毅力和智慧”，这一点同《民主周刊》大不相同，《民主周刊》在几周前还几次指控施韦泽背叛民主和社会主义。

馬克思对施韦泽是怀着善意的，而且也是公正的。他并不諱言，工会联合会的章程有原則性的錯誤。选出的組織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和英国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組織是可能存在的——他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它也是不适宜的，在德国尤其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訓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級机关，所以在這裡首先就应当培养他們独立活动。而且章程也不能促进施韦泽所計劃的“迅速行动”；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完全多余的主席团，这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机构，

<sup>①</sup> 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7—231頁。

到处都引起冲突；在英国工会那里，多半是围绕着的钱的问题兜圈子，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宣告结束。尽管如此，马克思承认，这种组织错误大概可以通过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消除掉。

马克思责备施韦泽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这种责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施韦泽想把工会运动当作第二级政治组织的辅助手段加以控制。然而这种责备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把拉萨尔说成是一个宗派创始人，把全德工人联合会说成是一种宗派运动，假如马克思（这一点他没有说，也许也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所谓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专有的阶级运动就是指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那么他的责备就加倍不正确了。德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同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相比，全德工人联合会是阶级运动的更为进步的形式。就在马克思在伦敦写这封信的这个10月13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施韦泽写的论文，完全根据马克思的见解，说明了国际的概念和性质。文章说，谁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谁也就属于国际，正如乌利州的公民也就是瑞士公民那样。因为在各个文明国家中存在着巨大差别——而且只要存在着这种差别，工人的本国组织就是必要的。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别，可是发展的方向是（而且必须以这种精神推动这种发展），国际的中央领导能够日益代替工人运动民族中心的作用。这肯定不是一个宗派领袖的见解。由于马克思指责施韦泽犯了他没有犯的错误，施韦泽必然无意地被诱致低估马克思的正确指责的份量。如果他始终认为工会运动是从属于政治运动的辅助手段，那么他的工会是考虑得彻底的、合乎逻辑的，而且因为他的进步党敌人承认，如果问题在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战争，他的工会联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所以施韦泽也

比較容易忽略馬克思的反对意見。

工人代表大会結束以后，进步党人自己立即着手根据在資本和劳动之間存在利益的协调这一有名的原則組織工会。协调使徒希尔施将代替完全破产的节约使徒舒尔采。如果在工会中組織起来的英国工人在仲裁处被工厂主当作平等的人看待，應該归功于他們几十年的付出巨大牺牲的艰苦斗争，麦克斯·希尔施抹煞这一事实，自以为或者装做自以为英国工会唯一賴以取得成就的战争是一个巨大錯誤，英国工厂主慑于工会力量而屈就的社会和平的差强人意的状况是資本和劳动之間的自然状况。进步党工会的示范章程模仿英国工会的章程，只是前者折断了后者的脊梁骨；这些工会同样友好地邀請工人和企业主参加，麦克斯·希尔施宣称，“他的”工会决不“专门”保证“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且同样保证工人的剝削者的权利和利益。創立这种工会的实际見解基于这一估計，即德国企业主自願給与“善意的”工会以英国工会从英国企业主手里强夺过来的东西。第一个被用作例证的工厂主是博尔济希。机器制造工人进步党工会要求他解雇一个打工人耳光的工长，可是当舒尔采-德里奇和麦克斯·希尔施为此去見机車大王时，他却用精神的耳光把他們赶出来。

可以預見，进步党的工会不久就会陷入絕境，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一派以正統的方式恪守拉薩尔的詞句，对工会运动进行反抗，这种反抗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如果要避免这个运动的分裂，問題就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否同紐伦堡协会和薩克森人民党联合。馬克思遵守他的諾言，进行了調解；《民主周刊》以它自己的方式比較友好地对柏林代表大会进行了評論。然后倍倍尔以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德国工会章程，这个章程处于施韦泽和麦克斯·希尔施所走的两条道路

的中間，而且是正中間。它不是在山牆上，而是在基础上开始建筑，放弃了工会的一切独裁的集中，而为了面对資本保证會員的利益和权利，把各工会組成有力的联合会。它由于簡單而沒有过分的要求，比施韦泽的巧妙砌成的建筑，更比进步党章程的偏狭、曖昧的言論給人以較好的印象。熟悉英国工会的一个英国人說，这个章程比另外两个章程更有工人气派。 321

同时，11月26日在倍倍尔主持下召开的萊比錫工会代表會議，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內西提出的決議案，这个決議案主張，在不同进步党工会进行任何合作的情况下，施韦泽的工会和紐伦堡协会的工会經過磋商，为联合和統一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彼此建立契約关系，首先在經濟方面互相支持，可能还选举一个共同的临时委员会。对于这个又是首先在《未来》上发表的建議，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团和委员会于11月29日也通过一致的決議，严加拒絕。決議說，工人的团結是工会发展的首要要求。建立第三个工会組織只能促成分裂；倍倍尔先生和李卜克內西先生可以不必利用契約关系的建議恢复被他們破坏的团結。如果他們真正不想破坏工会运动的团結，那么他們就有义务加入工会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部进行他們认为合适的改革，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工会运动的分裂就确定了。分裂的責任不应由这一方或那一方单独負担，換句話說，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的分裂是由实际情况造成的。即使謀求团結的努力取得比实际更大的成就，这些努力或早或晚也会遭到失敗。德国工人阶级之間的裂痕太深，因而医生还不能在一天之間就把它縫合起来。在它从内部彻底愈合以前，它必須先完全止血。

## 第六章

# 社会民主工党

1868年10月10日，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施韦泽同党  
322 内的几个朋友，又恢复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而且为了尽可能去除官  
厅压制工人运动的借口，对工作规程作了一些由于各种法律和警  
察的决定而成为必要的修改。同时施韦泽把联合会会址移到柏林。  
这件事也使他受到严厉谴责，甚至被说成是“恶劣行为”，是把工人  
运动交给俾斯麦，可是毫无疑问，这是施韦泽所能执行的最正确的  
政策。联合会在莱比锡或汉堡都不如在柏林安全；现在警察正在  
莱比锡开始对开展中的工会运动进行恶毒、卑鄙的攻击，如果联合  
会在德意志政治的中心，完全公开地在结社法的严格监视下日益  
有力地发展，它就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好地防止这种进攻。

普鲁士政府为了根据自己的政策的需要，容忍或镇压联合会，  
可能希望它把会址设在柏林，然而至少可以推论，不管普鲁士政府  
施展什么诡计，在几年之内它不会解散联合会。自从资产阶级成  
为普鲁士政府的忠实奴才以来，俾斯麦对工人运动的煽动兴趣已  
经大大低落了。杜林的建议书已经由政治家的行动降低为个人的  
思辨；瓦盖纳没有得到作者许可，就用自己的名义出版了这个建议  
书，因此现在作者愤而对他进行起诉。可是俾斯麦仍然知道，对他  
的政策的最严重的考验还没有过去，尽管有计划地迫害工人运动  
适合他的心意，在六十年代末期，他还没有这样做。这是施韦泽所

适应的复杂状况，正如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适应薩克森出版自由的复杂状况那样。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经过顺利和不顺利的局势，使工人运动发展成为反动警察国家的一切暴力政策暂时也不能镇压的力量。

他可以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没有引起党的队伍的瓦解看做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经过三个星期的停顿阶段，党的血液更热、流得也更快了。1868年12月1日，当施韦泽将服三个月的徒刑的时候，他可以在一次关于财政问题的发言中宣布，随着新的一年开始，支薪的鼓动员的有计划的鼓动工作将要展开，用这种办法终于达到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已经确定的目标。在施韦泽服刑期间，特耳克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并为此迁居柏林，弗里茨舍领导工会联合会，哈赛尔曼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新年年初的几次改选表现出党的力量的增强。在杜伊斯堡，党第一次在主要选举中就取得了胜利；哈森克莱维尔以六千七百九十二票击败了保守党的和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在策累，约克在主要选举中得了二千三百三十六票，在复选中得了五千二百五十九票，仅以数票之差遭到失败。

在新旧两年交替期间，施韦泽得到了几个星期的假释时间，以安葬他父亲并处理遗产问题。他利用重新获得的自由布置主席改选事宜，并定于复活节在爱北斐特-巴门召开代表大会，同时也在南德和薩克森王国开展宣传活动。《民主周刊》对此发表了非常有害的言论，它说，施韦泽因为“家事”得到假释，结果却在俾斯麦的创造物面临严重危机的现时，在民主派中散布不和的种子。这种恶意的指责没有事实根据。俾斯麦的创造物既没有面临严重危机，施韦泽也没有做任何不是联合会的利益所要求的事情。召开代表大会和布置主席选举可以证明组织的恢复。这两件事是对民主原

324 則的让步。至于在南德和薩克森进行鼓动，則是施韦泽执行汉堡代表大会的決議。

而且他不是片面地执行这个決議的。他利用在法兰克福逗留的时间，同二十五个理事和全权代表討論在南德进行鼓动的問題。根据他們的建議，他把这一工作委托給維斯巴登的技师彭霍尔斯特，美因茲的鞋匠克尔施和奥芬巴赫的五金工人豪斯坦，并定鼓动期限为六周，从联合会金庫中支二百塔勒做鼓动費用。然后他在柏林对在薩克森王国进行的鼓动作了类似的安排，担任这一工作的是汉堡的裁縫李比希和柏林的鞋匠舒曼。

### 一 南德和薩克森的鼓动

自从拉薩尔死后，南德的工人运动进展十分緩慢。1866年的事件重新喚起的对普魯士的旧日憎恨，由小資产階級内部传播到无产階級内部，因而使无产階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疏远。

尤其是在維尔騰堡，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到1869年为止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站稳脚跟。在維尔騰堡工人协会联合会中，舒尔采的幻想已經破灭了，大資本迅速地毀灭了各种各样的小自助机构，如織工合作社、手工业者銀行、工人住宅建筑合作社等等，这使工人睜开了眼睛。普奥战争期間，維尔騰堡工人协会联合会在比貝腊赫举行了一次年会，會議表现了关心政治問題的坚定傾向，使至今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大言不慚的爱德华·普菲費尔、基利安·施坦內、古斯塔夫·济格勒和其他斯图加特交易所和工厂的巨头很为不滿。他們的怨恨只是使联合会的地址在1867年的年会上决定由斯图加特迁到格平根，此后联合会仍然存在，并在那里出版了一个小小的月刊当做机关刊物。普菲費尔及其一伙仅仅控制了斯图加

特工人协会，他們是利用济格勒染料工厂的工头和工长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同时斯图加特还有一个民主工人协会。这时联合会虽然已經同舒尔采决裂，但是它还只支持士瓦本人民党，用这个党的經費去参加紐伦堡代表大会。1869年初，这个联合会共有拥有一千五百六十四名會員的二十一个协会。它們仅次于薩克森协会，是紐伦堡多数派的最有力的支柱；联合会机关刊物的一月号宣称，如果施韦泽的鼓动在士瓦本的某个地方展开，就对它宣战。

南德絕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同維尔騰堡类似。甚至在部分工业高度发展的地区，无产階級运动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菲尔特和紐伦堡的老工人协会在紐伦堡代表大会以后仍然跟着进步党跑，这里最进步的工人才站在人民党的立場上。在菲尔特，工人們組成了“未来”工人协会，这个协会主要关心政治問題，而不关心社会問題，它同拉薩尔的运动采取对立态度，因为它还不理解拉薩尔运动的階級性质。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在这个协会里具有重要影响，可是他們的影响很快就被花边工人加布里埃尔·勒維斯坦的影响抵銷了，勒維斯坦是这个协会的主席，曾同倍倍尔一起主持紐伦堡代表大会，他具有非凡的实际才能和活动能力，在切身的市区制度問題上，在反对城市集团的斗争中，善于使自己和他的同志了解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代表大会以后，在紐伦堡从老工人协会中分出一个小组，先用先鋒队的名称，后用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独立組織起来。这个小集团先过着一种田园詩式的党的生活，永远快活，也永远沒有錢，可是他們漸漸对老工人协会施加压力，老工人协会发现，进步党领导人只是在需要它的时候才关心它。加之，一个同它有紧密联系的消費合作社的垮台，使它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損失。

然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美因河彼岸并不是完全沒有成就的。

它的宣传活动从美因兹扩展到沃尔姆斯、海德尔堡，尤其是曼海姆，在那里不久就有四百名会员集合在联合会旗帜周围。在奥格斯堡，有一支坚强的会员队伍，这时由排字工人陶舍尔担任领导。陶舍尔也同排字工人奈弗一起在慕尼黑进行鼓动工作，奈弗为了同排字工人弗兰茨在巴伐利亚首府的无产阶级中进行活动，迁居到那里去了。这些人的不倦努力使联合会扩展到安斯巴赫、符次堡、施魏因富特、霍夫、考夫博伊伦和科耳贝摩尔，可是他们不能使联合会在菲尔特和纽伦堡安家立业。

这时经济发展冲垮了南德分立主义对普鲁士的激烈憎恨用来掩护自己的纸壁垒。冷静的关税同盟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革新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有利，以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两个大阶级（它们已经在这个社会中明显形成了），毫无顾忌地越过了君主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一切痛苦阶段。当巴伐利亚议院反对修订关税同盟条约的时候，陶舍尔于1867年10月29日在“三王”厅召开大会，有几千工人在他们的企业主的鼓励下参加了大会。陶舍尔在热烈掌声中高声朗读了致议院的一封陈情书的底稿，其内容是绝对要求批准关税同盟条约。虽然他已经选择了使容克的头脑开窍所必需的明确的语言，但是几个自由派编辑还觉得这个陈情书写得“太规矩”，他们提议加上一条，同议会约定，如果它们继续阻挠，就会听见工人的拳头敲他们的门的声音。经过这番欣然接受的润饰以后，这个陈情书送到了慕尼黑，两天以后容克地主就暴跳如雷了。

根据关税同盟条约，1868年春天在南德举行了关税议会选举。工人候选人只得了几百票，陶舍尔在奥格斯堡得了一百五十二票，可是普选权的实际使用对南德工人并不是没有长期影响的，正如在北德开始的工会运动不是没有长期影响那样。雪茄烟工人

协会扩展到曼海姆，甚至斯图加特，印刷工人在那里也有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帮工的严格组织；在奥格斯堡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在很短时间内组织起来，其中有八百个工场手工业工人和四百个五金工人；在纽伦堡五金工人、鞋匠和裁缝也开始团结起来。南德的无产阶级在各个地方十分活跃，因此彭霍尔斯特、克尔施和豪斯坦开始进行鼓动的条件是很好的。

然而南德的资产阶级也懂得估价这种危险，并且为了对可怕的侵入者进行反击而动员了一切力量。它在卡尔斯鲁厄和普福尔茨海姆做到了这一点，可是在弗赖堡却遭到了更可耻的失败。年老的费奈迭在那里用他的老骨头抵挡“煽动使徒”，同时根据资产阶级报刊的可信的证明，年青有为的思想家阿道夫·瓦格纳用一种“歼灭性的”辩才支持费奈迭。另一方面，这个胜利仍然是鼓动员在处女地上获得的唯一巨大成就。除此而外他们只在鼓动已经存在的地方，给它以新的推动，比如在沃尔姆斯、海德堡、曼海姆，以及在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符次堡都是这样。在陶舍尔陪伴他们去的菲尔特和纽伦堡，他们既要同进步党人斗争，又要同人民党人斗争。菲尔特大会被警察解散，在纽伦堡大会上，人民党人取得了胜利。鼓动员除了顺路到了乌耳姆以外，没有进入维尔腾堡领土，可是不久以后那里的冰也化了。1869年圣灵降临节前后，木器工人赖克哈特回到故乡，他原籍斯图加特，在汉堡全德工人联合会做了两年工作，现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活动。

南德的鼓动员在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资产阶级报纸的叫嚷表明，它们的老板付出极大牺牲才取得几次胜利，因而感到心惊胆怕。比较起来，萨克森王国的鼓动进行得不顺利，尽管李比希和舒曼竭尽全力企图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必须恢复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制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倍倍尔先生和李卜

克內西先生”的“分裂活动”，而这是他們所做不到的。当然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联合会内部已在分化，只是反对工会的斗争現在正再一次挑起宗派的狂热，1869年3月，門德在弗賴貝克的一次补选中战胜了保守党-分立主义的候选人，被选入帝国議會。可是，假如薩克森的鼓动員不必在同聚集在《民主周刊》周围的工人协会和人民协会的斗争中花費了他們的最大力量的話，門德这个对手还是不难战胜的。

在政治上，这个机关刊物仍然遵循反普魯士的人民党路綫；在1869年的新年号上，它向做好战斗准备要报1866年背信弃义的襲击之仇的“革新的”奥地利致敬。恰恰与此相反，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报》論述了奥地利的“自由派资产者的騙局”，这种对付工人的騙局比普魯士所曾有过的更肆无忌惮、更随心所欲、也更可恶。此后不久，馬克思也說，如果要指出什么地方的話，那末就在奥地利，自由派资产阶级表现出它的自私的本能、精神的低下和对工人阶级的可卑的怨恨，而阿尔伯特·朗格对博伊斯特企图用来掩飾最可怜的反动行为的那种可悲的自由主义所发表的意見，是怎样尖銳也不为过的。自从1868年12月，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选《民主周刊》为自己的机关刊物以来，除去对普魯士的片面憎恨以外，这个刊物的无产阶级性质也表现得明显多了。由于紐伦堡的分裂，联合会遭到削弱，于是不得不让曼海姆的《工人会堂》停刊；現在倍倍尔在《民主周刊》担任“总部事务和工人事务”的編輯，同时他很少談論高級政治，但却更有效、更巧妙地把仍然十分松弛的联合会比較严密地組織起来。同时他得到了莫特勒的大力支持，莫特勒的組織才能同倍倍尔不相上下，他在格里米乔（尤其在紡織工业的无产阶级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会宣传和政治宣传。

紐伦堡多数派的七十二个协会中，有五个由于种种原因渐渐

分离出来，可是在一年之中，有四十二个新协会参加进来，因而这个联合会有了一百零九个协会，一万名会员。虽然如此，它还必须同最大的困难，尤其是财政困难进行斗争。因为每个会员每年只向联合会缴纳一个银格罗申的会费，所以每年收入只有三百塔勒多一点，这笔钱不仅要用作宣传经费和组织经费，而且还要用来弥补《民主周刊》的不小的亏空。1869年3月，倍倍尔在一个致联合会会员的通告中号召自愿缴纳非常会费，他指出，到那时为止联合会金库还依靠“站在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其他朋友的支持”。这些朋友是施韦林的宫廷建筑顾问德姆勒尔（他是一个有名的艺术家，也是一个活跃的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金克尔和维利希在美国募集的、现在由拉登多夫和苏黎世的其他流亡者管理的革命基金。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由这笔基金中共计得了三千五百法郎，其中的一大部分用于《民主周刊》。

这时，这个艰巨的改组工作碰到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敌对鼓动。为了抵制这一鼓动，本来可以用于更有用的目的的原来就不多的一笔钱被花光了。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施韦泽表示极大的愤慨，以及他们在萨克森工人那里的控诉为什么得到了成果。他们甚至强调，他们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站在相同的原則基础上，事实上，2月11日，莱比锡工人第一次大会结束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这个会上同舒曼进行了斗争，决定3月7日同萨克森人民党的全邦大会相结合，在霍亨斯坦-恩斯特哈尔召开萨克森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反对现在开始伸出巨爪的萨克森反动派的宣传活动。为了召开这个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中除去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一个拥护者以外，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萨克森人民党党员各占三名。三天以后，莱比锡工人第二次大会也结束了，李比希在会上讲了话，表示了团结

的願望，他提議李卜克內西和施韦泽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對他們彼此的指責進行爭辯。

当然，这个提案是被否决了，还是被通过了，是永远也不会完全明确的。可是同倍倍尔一样很少出席大会的李卜克內西在一个公开声明中答应他一个人，或同倍倍尔一起，在萊比錫或柏林或在  
330 全德工人联合会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或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仲裁中证明，施韦泽为了金錢，或者由于爱好，从 1864 年底起有计划地阻碍工人党的組織工作，玩弄俾斯麦独裁政治的把戏，使建立党的統一的一切努力归于失敗。《社会民主党人报》接受了这一挑战，而是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即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接到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正式邀請，在那里申述他們譴責施韦泽的理由。

## 二 爱森納赫代表大会

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施韦泽又坐在監牢里。可是特耳克可以相信，他接受李卜克內西的挑战是符合施韦泽的心意的。施韦泽最欢迎的就是李卜克內西企图在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指責。人們几乎一致地再选他为主席，使他得到联合会的信任投票，联合会不否定他六年的历史，就不能接受李卜克內西的著名的指責。3月5日，当施韦泽由于要到北德意志联邦帝国議會开会而被从監獄中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宣称，他将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得非會員能够出席代表大会并对他控告。可是他补充說，他决不想同任何认为攻击他是对的人吵架。他的态度和他的行动是这样公开，他的拥护者之中有誰认为需要辯护，可以自己进行辯护。

施韦泽发出的这种高傲声調，决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內疚。施韦泽在回顾最近五年时可以說，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发展

和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如果他用一种强烈的自負来对付关于他的背叛的无尽无休的謠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他應該想起“驕則敗”这个俗語。独裁者决不能認識到，他的独裁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多余的，这是一切独裁的灾殃。不仅施韦泽本人，而且連很多會員都认为联合会的独裁領導是必要的，人們可以举出許多十分确当的理由來說明这种看法的正确。然而工人运动愈强大，它扩展的地区愈广，它就越离开个人領導。施韦泽开始表現出来的自負，实际上是終局的开始，一方面因为他无意中泄露，独裁实质上已經过时，另一方面因为施韦泽走上了一个斜坡，在那上面将会不可遏止地往下滑。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早就存在反对他的独裁的反对派。白拉克和約克，还有由于为工人階級做了不怕牺牲的不眠不休的工作而在汉堡工人中获得很高威望的盖布这样一些人，在薩克森人民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階級意識的觉醒，而不是人民党的外壳，他們在这一点上表現出比施韦泽有更尖銳的眼光。图林根的會員更坚决地靠近薩克森工人，由于薩克森工人除了身受平常的小邦苦难以外，还受普魯士的执达吏和班长的压迫，因此他們的反普魯士的悲观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在柏林，施韦泽的独裁甚至在他最亲近的人中引起多次私人爭吵，尤其是同联合会書記罗勒尔，而更多是同霍弗斯特騰。霍弗斯特騰在維也納彻底失敗以后，又要求对《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共同处理权，他說他在辞职到維也納去的时候，只是暂时放弃这项权利，并不是像施韦泽所說是最后放弃这项权利。

由此产生的不愉快的爭吵，今天我們还不十分清楚。有人說施韦泽进行了犯罪性的欺騙，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来不是一个財產对象，第二，施韦泽完全承认有純利

时霍弗斯特騰有要求得到一半的权利。加之，这个报纸作为精神力量，不是霍弗斯特騰而是施韦泽的业绩。因为霍弗斯特騰公开宣称，他现在反对施韦泽的政策，所以恢复他的共同处理权，就会使联合会机关报陷于完全瘫痪状态。如果说施韦泽对他的老伙伴不讲交情（这在今天和当时都很难判断，因为有关的协议是他们两个人秘密商定的），那么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政治影响，可是，正因为如此，霍弗斯特騰的诉苦在由于其他原因已经不信任施韦泽的所有人中加强了对施韦泽的独裁的不信任。

施韦泽从另一个方面保证了他对联合会机关报的所有权，自从联合会重新成立以来，他放弃联合会金库的任何帮助，用自己的钱，用他父亲死后他得到的遗产来弥补自从成立工会以来大大扩大的报纸重又产生的亏空。因此他也承担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对编辑部的敌意的怨言，说他在接受通讯方面有偏袒而且毫无顾忌。

虽然有这样一些不和，施韦泽的地位还没有受到严重威胁，他满怀信心地展望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他决定在爱北斐特-巴门召开代表大会，同去年的会址汉堡一样，那里到处都有冒烟的烟囱，它是大工业的标志，宣告了当代的迫切问题。在那里开会也是为了向那里的工人致敬，他们曾经首先以无比的顽强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使用了普选权这个武器。施韦泽本人只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议案，即在德国结社法许可的范围内，联合会同国际紧密结合起来；在申述理由时，他强调指出反动分子和反人民分子、公开的和隐蔽的专制主义、军人、贵族和僧侣的统治、资本权力的国际联系，是决定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的着眼点。由联合会内部提出的议案更多。大多数提案涉及鼓动和宣传的个别问题，但是有几个提案是企图限制主席的独裁，有的提议把理事会集中在一个地方，有的提议成立一个出版委员会，有的提议把主席同联合会

机关报分开。药剂师福格尔和三个柏林的会员走得最远，他们认为“固定领导人选”是多余的，他们建议召开一个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德国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应该就一个共同纲领和共同组织达成协议。

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869年3月28日开幕。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代表一百二十六个地方的五十七名代表，在他们身后有一万二千零五十三名按期缴纳会费的会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第一天就发了言，提出了由于《民主周刊》而为人所知的对施韦泽的指责，他们说，施韦泽在帝国议会中进行叛卖活动，承认北德意志联邦，发言赞成军事法案，把纽伦堡纲领叫做废话，不让纽伦堡协会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等等。一个杜伊斯堡的代表立即提议，向联合会主席表示德国工人的完全信任，因为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发言中没有什么新的、重要的东西。假如施韦泽没有通过他那不适时的独裁活动，破坏了对他十分有利的形势的话，这个提案就可能被一致或接近一致通过了。

他仍然站在他的旧立场上：同其他党派合并是不可能的，谁想做社会民主党员、就必须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同追求类似目标的其他政党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是可能的，只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不经常攻击他，不动摇联合会的组织，而愿意向他——被选出的联合会主席表达他们的愿望，他是乐意这样做的。可是事实上施韦泽并没有回答对他提出的指责，而简单地要求信任投票，不是为了代表大会还要进行考查的他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以此宣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指责无效。这时有许多代表不能决定，他们并非根本反对信任投票，而是想在对联合会的整个情况进行考查以后，再对此作出决定。经过长时间的关于议事规则的辩论以后，信任投票被四十二名代表以七千四百票通过了，而十四个代

表以四千六百三十五票弃权。多数派中有彭霍尔斯特、埃尔纳尔、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特耳克，少数派中有白拉克、盖布、J. M. 希尔施、佩尔、福格尔、约克。

334 这次投票对于施韦泽是一个有力的打击，但不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没有参加的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施韦泽宣称，少数代表在外人面前把他抛弃了，因此他将让派出这些代表的地方的会员亲自投票，看他们今后对他是否表示信任。少数派的代表（有一部分人猛烈攻击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回答说，他们弃权决不是要想进行不信任投票；他们只是不愿向压力让步，并且认为在任何时候都跳过来保护主席，根本不是他们的任务。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最多只有个别代表真正不信任施韦泽，比如背叛了图林根会员的J.M. 希尔施和因为提案没有通过的希望而收回了提案的福格尔。可是少数派的发言也表明，施韦泽的独裁做法给那些要把主席置于比较严格监督之下的提案准备了道路。

于是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人编辑委员会作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申诉机构，并给理事会创造比它至今在联合会生活中所有的更大的活动范围。理事人数由二十五人降为十五人，其中十二人，即除主席、书记和司库以外住在同一地方（但地方每年更换一次），并且应该在联合会的那三个干部之上起一种监察委员会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原定主席在独立发布命令三个月内必须得到理事会的同意，现在把三个月改为八天；主席、书记和司库“在政治上不忠实或严重贪污作弊的场合”，理事会也有权将他们免职。可是这样一个决议必须在十四天之内得到非常代表大会或全体会员直接投票认可，只要上述所有规定牵涉到修改会章问题，就应该把这些规定提交非常代表大会或全体会员直接投票决定。施韦泽适应这种情况，甚至提议允许理事会有临时罢免干部的权利。可是

他这样做很难說是沒有打算的。他說，主席犯了錯誤，就根据会章 335  
罢免他，用这个办法来限制主席的大权，这是对的，可是，在主席任  
职期間，不应阻碍他自由地、有力地发挥作用。事实上这并不是代  
表大会提出这些新规定的本意，还不如說这些新规定主要是想对  
目前的行政工作进行比較严格的监督。

經過五天討論以后，代表大会在相当和平的气氛中散会了。特  
耳克被选为書記，代替罗勒尔，同特耳克一样，新編輯委员会的三个  
委員，弗里茨舍、呂普克尔特和舒曼也是施韦泽的忠实拥护者。  
第一年新理事会移至汉堡，在那里盖布的忠貞不二的性格、十分敏  
銳的眼光和这时已經增加到一千三百名會員的坚定态度，最可靠  
地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不合时宜地使主席陷入困境的行为。关于施  
韦泽和霍弗斯特騰之間的爭執，代表大会宣称它无权过問，这是当  
然的，可是代表們一致決議把企图对施韦泽进行猛烈而无礼的攻  
击，以支持霍弗斯特騰的福格尔从联合会中开除出去。代表大会  
同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也有了某种接近，它接受了施韦泽的同国  
际紧密联系的提案，施韦泽宣称，只要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不攪扰  
他，他就不攻击他們。在相应的前提下，《民主周刊》也停止了对施  
韦泽的攻击，从而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各派团結一致（但不是合并）  
的希望。

遺憾的是，同《民主周刊》的这一通知同时，在人民党的机关报，  
《法兰克福新聞》上刊登了一篇通訊，倍倍尔虽然表示不同意，可是  
資产階級報紙却为了使施韦泽出丑而充分利用它。这篇通訊說，  
施韦泽对于李卜克內西的“完全客观的”指責沒有辯护，却請求进  
行信任投票，他得到六千五百张贊成票，可是有四千五百票放弃表  
决；施韦泽十分狼狽，但是並沒有辞职，尽管他曾經声明，如果有人  
数較多的少数派表示对他不信任，他就願意引退。这种攻击的事 336

实叙述当然只能由在論战期間常有的观点的片面性来解释，施韦泽被这种新的攻击所激怒，又恢复了他从前的计划，他指示其代表在爱北斐特-巴門弃权的各地由会员对信任問題进行表决。他很高兴的是，除去不伦瑞克-沃耳芬比特耳和爱森納赫以外，会员們越过代表对施韦泽表示了他們的信任，可是他的胜利是用新的磨擦和与此不可分离的新的規定这較高的代价换来的。第一陣风就这样刮过去了，并没有造成重大的損害；四月中旬，《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声明，根据它們已經达成的協議，全德工人联合会和薩克森人民党之間的爭端結束了。

它們有充分的理由結成統一战綫反对共同的敌人。北德意志帝国議会在这年春天討論了新營業法規，资产階級的議会代表在討論中大放厥詞。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其中有：用萊茵省的一个酒鬼的笑話消灭工人問題的下流的談諧家布朗，用可怕的德語，对各界尤其是对无产階級进行道德說教的德行家拉斯克尔，还有把社会民主党当做早飯吃光，而不預感到自己的胃在今后三十年內是多么难受而且无法医治的营利家施图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甚至这个集团中最聪明的人物，由农民起义的共产主义組織者变成貼現公司的投机肉鍋的老主顾的米凱尔，也只会重复《共产党宣言》反对封建社会主义的論据，打死所謂的工人朋友瓦盖納。他小心翼翼地加了一个边注說，他在一个“英国作家”的著作中发现了这个卓越的思想。

施韦泽及时武装起来，对这种資本主义的陶醉进行了冲击。在进行一般辯論时，他就根据馬克思的《資本論》（正如他自己指出），做了一篇关于現代劳动关系的一般观点的出色演說；在專門問題  
337 辯論中，他提出了許多修正，同他以前的工人保护法草案一样，这些修正以英国工厂立法为依据，但又保持完全适当的界限。他在

星期日劳动和夜工、女工和童工、正常工作日等問題上提出的要求，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根据自己充分理解的利益能够同意的范围。如果资产阶级由于惯常的昏聩而拒绝这种要求，那么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工人阶级的经济学在智能和道德方面就显得更为出色。同施韦泽并肩进行这一斗争的有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还有善于用动人的辩才巧妙地打击施图姆及其同党的倍倍尔。

无产阶级反对派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实际成果，只有倍倍尔提出的废除填写劳动簿的法定义务的議案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关于童工和实物工资制的普魯士立法的可怜条文，才能借新的营业法規得救，可是帝国議會頑固地拒絕設置也許能在这种可怜的萌芽状态下，使法律上的工人保护得到一点发展的工厂視察員。施韦泽提議实行工厂視察員制度，由政府任命，但由帝国議會批准，他的这个提案没有被通过。只有保守党人对有效的工人保护法的第一次要求，表示了十分可疑的关心。进步党通过节约使徒舒尔采和协调使徒麦克斯·希尔施反对这个提案，民族自由党的无聊的詼諧家布朗說，他一生中常常一天工作十五小时以上，并没有因此而一命嗚呼；为了反对警察干涉，家法不是应该减弱，而是应该加强；夜間誰在床上也不能保險不受工厂視察員侵犯，因为他們在侵入时只要声明，他們以为这里是工业企业就行了；由官方对工厂的监督中，将产生一个西班牙的海尔曼达德<sup>①</sup>，一种秘密法庭。“财产和教育的代表人”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种惊人的噱語，而这时英国工厂視察員制度已經实施了三十多年，早有丰富的文献談到它的效果了。当人們从当时的會議記錄

<sup>①</sup> 海尔曼达德(Hermandad)意为“兄弟会”，中世紀西班牙各城市公社与农村公社結成的同盟。旨在保卫本身的自由和权利，反对貴族的压迫。曾自設法庭并拥有武力，后变为乡村警察机构。——譯者

中讀到，資本主義的代表企圖以多么放肆的、此后當然徹底改變了的高傲態度，否決工人階級最起碼的要求的時候，往往以為是在做夢。

338 李卜克內西從一種當然完全不同的立場出發，指責施韋澤的“議會把戲”。他認為把嚴肅的政治鬥爭貶低為議會的伴戰，是犧牲原則；他懷疑施韋澤提議設置工廠視察員，是企圖把工人運動交到俾斯麥手中。5月31日，李卜克內西在民主工人協會的一次公開集會上，談到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对帝國議會的關係。柏林工人參加民主工人協會的人不多，該會會員中却有相當多的年輕的文人和商人，如阿道夫·赫普納爾、卡爾·希爾施、鮑爾·津格爾等等。這些人中，猶太人占很大優勢；施韋澤的擁護者嘲笑這些為數不多但卻活躍而討厭的對派，是“知識分子”和“磨坊主”。李卜克內西指責“議會把戲”是“目光短淺或背叛”的結果，同時宣稱社會主義是只有在街道上、在戰場上才能解決，而在議會中解決不了的權力問題。他同意社會民主黨同雅科比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更緊密地發生聯繫。他說，絕大多數工人所以對社會民主黨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是因為社會民主黨只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不進行政治的前哨戰，因為反動派利用“民族自由黨的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同它要想推翻其社會統治的民族自由黨資產階級追求同一目標，由此可見這種社會主義是荒謬的。

後來李卜克內西嘲笑常常引用這篇演說反對他的人是“不可救藥的幼稚病患者”，他說，因為情況改變了，所以他對於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立場的看法也改變了。當然，歷史判斷的唯一依據就是，李卜克內西的策略是否適合他提出這種策略時的情況。不過這個問題必然得到完全否定的答復。施韋澤和倍倍爾所進行的“議會

把戏”，是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推荐的，也是恩格斯在《民主周刊》上推荐的。恩格斯在他评论《资本论》的文章中写道：“下一届‘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也将讨论工业法规，从而也要讨论调整工厂劳动的问题。我们期望，每一个由德国工人选出的议员，都能在着手讨论这个法律以前预先把马克思的这本书好好研究一番。这里可以得到很多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就成为一种势力，只要他们善于利用他们的地位，尤其是只要他们了解问题的所在，而这是资产者所不了解的。”<sup>①</sup>施韦泽正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要“议会把戏”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至少也像《未来》那样坚决地进行了“政治的前哨战”。这两个报纸在政治反对派问题上的差别主要在于，施韦泽比古伊多·魏斯更为蔑视分立主义民主派。可是这种差别也不很大，因为古伊多·魏斯对德国情况很有了解，不会希望德意志人民党的七个士瓦本人搞垮北德意志联邦。除此而外，施韦泽进行“政治的前哨战”甚至比约翰·雅科比还坚决得多。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刊》上刊载他的演说的时候，利奥·弗兰克尔从巴黎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坚决站在施韦泽一边，反对李卜克内西的这些攻击。施韦泽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看做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的受骗人，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可是李卜克内西对施韦泽的一再攻击，也必然使施韦泽在这个不幸的错误中越陷越深。

只有持公正态度的人才能承认这一点，可是并不因此而可以为施韦泽目下的行动辩护。他感到限制他的独裁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束缚，因为他把这种限制看做是密谋的结果，所以他敢于用一切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9页。——译者

手段重新摆脱这种限制。形势对他是很有利的。会员們对于修改会章的直接投票漠不关心，只有不到五十个地方认为值得費力进行表决。代表大会的決議虽然得到絕大多数代表的拥护，但是也遭到萊茵地区的大地方組織，如巴門、愛北斐特、杜塞尔多夫的强烈反对。当施韦泽到汉堡去建立新理事会的时候，联合会在这里的老核心部队热烈欢迎他，他在汉諾威也受到热烈欢迎，联合会在汉諾威蓬勃发展，这时已有一千名繳納会費的会员。在同一个5月，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工人协会的大約六十名会员面前譴責施韦泽的“議會把戏”，而六千名柏林工人在阿尔汉巴拉正向这种“議會把戏”欢呼；《社会民主党人报》可以用自豪的語言結束关于庄严的群众大会的报道說：柏林是我們的！呂普克尔特巧妙而有力地领导的柏林建筑工人大罢工，把无产阶级階級斗争帶到柏林工人階級的还没有接触过政治运动的广大阶层中去。5月22日，施韦泽在卡塞尔召开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以便檢閱現在可以揮动联合权的武器的队伍。

当然北德意志工业法規有計劃地在这个武器上磨了許多缺口。北德意志帝国議会对工人的敌意，甚至在涉及自由貿易論的可能对工人有利的簡單結論的时候，也不能抑制。德国自由主义本来已經这样怯懦，以致只敢在官僚所乐意的范围内决定迁徙自由和营业自由，而让主要障碍即官僚的核准制度仍然存在。它更关心破坏联合自由，正如拉斯克尔所說，以致“有力的、强硬的”警察机关能够把一切罢工运动限制在合法范围之内，也可以說限制在統治階級感到滿意的范围之内。不仅农村工人享受不到联合权，而且还插进一个特殊的惩治条例，旨在抑制罢工工人的所謂恐怖行为，这个条文具有很大的伸縮性，警察只要稍稍耗費一点它經常具备的恶意，就可以破坏无产阶级爭取提高工資的一切运动。北

德意志帝国議会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所痛恨的这种特权之上，附加了对工贼有利的一种特权；对于违反根据联合法达成的协议，既不能进行控告也不能提出抗议。

尽管如此，有一部分联合自由还是被保留下来，因此工会联合会卡塞尔代表大会充满了战斗和胜利的喜悦情绪。出席大会的代表二百二十个地方，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二名缴纳会费的会员的一百名代表；全联合会缴纳会费的会员共有五万多人。派代表参加卡塞尔代表大会的计有雪茄烟工人（一万会员）、木工（五千五百八十五个会员）、瓦工（三千九百五十五个会员）、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三千六百六十六个会员）、五金工人（三千二百八十一会员）、伐木工人（二千一百三十七个会员）、鞋匠（一千八百零八个会员）、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千七百四十二个会员）、矿工和冶金工人（一千五百五十八个会员）、裁缝（六百七十一会员）；其他，如面包师、装钉工人、油漆匠的工会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代表大会主要研究了宣传鼓动问题和组织问题。除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外，吕普克尔特代替不能迁居柏林的克莱因参加了主席团。主席团委员没有薪金，可是这个时期施韦泽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每月有四十五塔勒的薪金，这是由爱北斐特-巴门代表大会为此目的设立的一个委员会确定的。看来，给主席支薪也是从限制他的独裁考虑的；无论如何施韦泽是反对这样做的，他把确定给他的四十五塔勒减少为二十五塔勒，而且也没有领这笔钱。在卡塞尔，人们几乎觉察不到在爱北斐特-巴门开会时部分代表中存在过的不和。图林根的一个代表提议对施韦泽进行信任投票，结果除六票反对外，其他都投了信任票。总的说来，五天的会议使施韦泽在工会方面和政治方面似乎都获得了很大胜利。

此外，他还善于使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拥护者对自己抱有

好感。这时拉薩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門德在慕尼黑-格拉特巴赫被捕了,由于警察非法解散一个工人集会而引起了一场騷动,据说他是这次騷动的禍首。可是帝国議会根据施韦泽立即提出的議案不同意逮捕門德,按照宪法,逮捕是必須得到帝国議会同意的。这样,同拉薩尔有关的社会民主党两派之間建立了友好关系。可是不久以后,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工人协会中发表了一篇演說,使施韦泽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同这个对手不可能长期协调一致。倍倍尔在图林根地区进行了一次鼓动旅行,他在格腊、珀斯納克、阿波耳达、耶拿、魏瑪、哥达和爱尔福特等地的演說取得很大成果。同时倍倍尔沒有对施韦泽进行任何攻击,只是贊同社会民主党各派的团结,因此他也博得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图林根会员的热烈贊同。在大多数會議上通过了相应的決議(当然在个别會議上沒有通过),而沒有同时贊同社会民主党各派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在任何情况下,施韦泽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有同他,即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才能进行这种联合的尝试。他认为倍倍尔在图林根的鼓动是“破坏协议”,并且认为现在是进攻的好机会。

6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机关报,莱比錫的《自由报》发表了門德和施韦泽的引人注目的声明,声明向“主权人民”建議“恢复拉薩尔党的統一”,其条件是:两个至今分离的联合会应于6月24日,由双方主席解散,并于同一天建立一个执行1863年5月23日的老会章的总联合会。这个总联合会的主席应根据普选原則,由全体会员选举,选举結果于7月3日公布。然后以同样方式选举一个新理事会,理事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在6月24日至7月3日这一期間由門德暂时领导新的总联合会。門德和施韦泽向两个联合会的会员提出了这些建議,并且指示他們在6月22日以前必須对这些建議进行

表决。

这是施韦泽的一次正规的政变，从这时起，他的独裁对他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联合会得了不可救药的痼病。它从本身表现出来的生命标志就是一个垂死宗派的痉挛性抽动，比如它对工会组织进行顽抗，3月里用粗暴的行动破坏萨克森人民党在霍亨斯坦-恩斯特塔尔举行的全邦大会，从而使计划召开的萨克森工人共同代表大会未能举行。一年前施韦泽曾经威胁说，如果汉堡代表大会不允许他组织工会，他就退出联合会，现在却同工会组织的坚决反对者结成同盟，他本人不容许自己的联合会有更高的发展，但却对另一个联合会的宗派的拉萨尔主义做了重大的让步，即恢复拉萨尔的旧会章。他的用意何在当然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恢复没有限制的独裁。他要求“主权人民”在三天之内通过或否决他的全部建议，这个要求一点也没有露出他的秘密意图。他的理由是，因为两个联合会联合起来，警察可能解散它们，所以要求赶紧决定，可是这种形式上的困难是他本人通过自己进行的方式造成的。他估计，一切优秀工人对党派争吵感到厌恶、对统一的正当而迫切的愿望将使它们摆脱一切疑虑。一般说来，这个估计也是正确的。

他的建议在两个联合会中表决时，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汉堡的新理事会只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不要接受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进入统一的组织，第二个条件是施韦泽应该在新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赞成恢复在爱北斐特-巴门作出的决议。当亲自来到汉堡的特耳克受施韦泽的委托接受这两个条件的时候，理事会表示同意，并自动解散。起初只有不伦瑞克、格腊、哈尔堡、马格德堡、爱尔福特、哥达、法兰克福的几个会员，其中有白拉克、约克、彭霍尔斯特、埃尔纳尔公开表示反对。他们在6月22

日的一个宣言中建議举行德国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总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組織；施韦泽的政变純粹是一次突然襲击；对施韦泽的怀疑——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虛荣心而濫用联合会，把它贬为与工人为敌的反动政策的工具——現在已經成为事实了。第二天，由于在图林根进行鼓动被施韦泽公开指責“破坏協議”的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声称，他們准备斗争，事实将会表明，是那一边的“腐化、卑劣、賄賂”取得胜利，“还是我們这一边的正直、純洁的意图”取得胜利。可是后来施韦泽沒有履行他通过特耳克提出的保证。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說，不能把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排斥在統一組織之外，又說修改 1863 年的会章是不合适的，于是这时汉堡的十个會員也就同他断絕了关系，为首的是盖布和其他前任理事。

給这些声明伴奏的，是《民主周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間的猛烈炮击。同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犯了錯誤。一方說施韦泽是俾斯麦的雇佣兵，特耳克是一个連資產階級公民权也不具备的阴险的罪犯，另一方說李卜克內西是資產階級的秘密盟友，倍倍尔是向汉諾威前国王領取津貼的人。資產階級看到双方攻击感到十分高兴，同时它又巧妙地忽視了在工人运动的这一严重危机中产生的巨大进步。7月17日，《民主周刊》发表了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决定在8月7日至9日在爱森納赫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大会”。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六十三个前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三个从前拥护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會員，奥地利工人的一个委员会，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的国际德国支部，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主义协会，最后还有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代表这个联合会签名的約有一百名會員，其中有倍倍尔、李卜克內西、瓦尔特希、梅茨內、胡果·希

尔曼、莫特勒、斯托尔、加布里埃尔·勒文斯坦、卡尔·希尔施、J. M. 希尔施、赫普纳尔、福格尔和威廉·艾希霍夫。

当这个宣言发表的时候，人们就可以肯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群众将站在他们新选出来的主席施韦泽一边，因此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避免的。就这一点而言，资产阶级的幸灾乐祸是有一定意义的。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只要使德国无产阶级发生分裂的实际原因继续存在，与其作种种联合的尝试，还不如保留两派的各自独立的组织<sup>345</sup>，因为一切联合的尝试必然由于那些原因而一再失败，经常引起新的愤怒。公开的论战比这种慢性的、破坏性的热病还好一些，公开论战虽然有种种坏处，但也有很大的好处，它使实际存在的矛盾明显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矛盾具备最简直的形式，它有力地推动宣传工作，建立两个坚强的组织，一旦历史发展扫除联合的实际障碍，这两个组织就可以缔结和约，这时没有胜利者和战败者之分。

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战争就已经开始了。施韦泽决定派代表参加这个大会，他希望把新组织扼死在摇篮里，或者利用显示力量的办法使这个新组织一开始就不为人所重视。因为他本人还要服两个月的徒刑，所以特耳克率领代表十万二千名工人的一百十名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团的费用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各负担一半。对方有二百六十二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十四万工人。一开始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虚报自己所代表的工人人数”，双方都同样没有道理，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有道理。因为整个危机在德国工人中引起一个生动的运动，代表资格大部分是由群众大会提出来的，因此数字本身不会是不正确的，可是即使数字不是欺瞒，但也不是表明争论双方的力量的可靠尺度。施

韦泽在工会組織和政治組織中远沒有聚集十万二千人，参加在爱森納赫建立的新組織的會員也沒有十四万人。

起初，奥地利和瑞士的援軍純粹是一种摆飾。施韦泽始終认为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在組織上的結合是一种幻想；这种結合决不会发生这个不幸的結果，即奥地利工人参加爱森納赫代表大会被奥地利反动派当作借口，利用阴险的迫害手段镇压多瑙河畔的年輕的工人运动，其速度不下于这个运动发展的速度。事实上  
346 新組織由两种成分組成：即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會員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从前的會員。后者究竟有多少人，还举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特耳克估計有三百人，李卜克內西估計有五千人，与其說两者的平均数是确实数字，还不如說特耳克的估計数字接近实际，而李卜克內西的估計距离实际甚远。虽說他們的人数不滿一千，可是他們之中有很多在有組織的階級斗争中經過考驗和鍛煉的人物。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有一万會員，根据倍倍尔当时的陈述，这些會員在五十八个薩克森地方，二十五个維尔騰堡地方，以及几个巴登、黑森和巴伐利亚地方有自己的組織，此外在柏林和萊茵河畔还有个别的嫩枝。

經過一陣激烈爭論，证明合作不可能的时候，两派就在爱森納赫各自举行了自己的特別代表大会，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來說，这种代表大会只是一种示威行动。相反地，对方却組成了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早就准备改組由他領導的联合会，这次建党基本上是按照他的計劃进行的。紐伦堡綱領的主张成为爱森納赫綱領的原則部分，而开姆尼茨綱領的主张則是爱森納赫綱領的“最迫切的要求”的基础。同时事实立即表明，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之間根本不存在原則意見分歧，从現在起，它們彼此不提更不友善的战争名称，而常常互称敌对派。如果說李卜克內西有理由說，爱森納

赫綱領中包括了共产主义的最后結論的話，那么特耳克同样有理由說，爱森納赫綱領基本上就是拉薩尔的綱領。其中沒有一点是五年来《社会民主党人报》所沒有提出过的。是的，拉薩尔綱領的真正可以駁斥的主张在爱森納赫綱領中得到了更可駁斥的表現形式。根据卡尔·希尔施的提議，在資产階級社会的基础上已經可以實現的“最迫切的要求”中，也包括国家对合作事业的鼓励和国家在民主保证的条件下貸款給生产合作社，同时拉薩尔的生产合作社的革命意义又被用施韦泽多次揭发的国家資助掩盖起来了。 347

組織內部的分歧是更重要的。倍倍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組織者，能对拉薩尔的組織的优点作出正确評價，可是独裁應該避免，警察的一切破坏也應該尽可能防止，所以倍倍尔的行軍路綫受到限制。党的領導权交給了一个五人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之上有一个十一人組成的監察委员会；两个机构都由代表大会所規定的这两个机构的所在地的党员选举。这两个机构也行使党报的监督机关的职权，可是它們本身則服从至少一年举行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每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都應該投一票，可是一个地方的党员选派的代表不能超过五名。每个党员每月必須向委员会繳納一个格罗申的会費，或者訂閱党报。每个地方的党员有义务根据党綱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协会的每个会员每月必須为了进行普遍宣传繳納一个格罗申。《民主周刊》被指定为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从10月1日起每周出版两次，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归党所有。党的所在地設在爱森納赫，委员会設在不伦瑞克-沃耳芬比特耳，監察委员会設在維也納。很明显，这个組織比拉薩尔的組織民主得多，但也松散得多、脆弱得多。

关于对国际的立場問題，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也沒有作出同汉堡和爱北斐特-巴門代表大会所作的不同的決議。这时倍倍尔也

說出施韦泽时常強調的話：“在任何情況下，必須首先在德國本國建立社會民主黨，因為除去國際組織以外，本國的組織也是必不可少的，國際組織如果沒有本國組織就只是一個影子。”愛森納赫代表大會建議黨員個人參加國際，可是如果這個決議不只是一紙具文，那麼它必然使得這個本來就笨拙的組織變得更加笨拙了。代表大會也向根據倍倍爾的章程建立的工會推薦國際組織，這些工會從這時起自稱國際工會。這種組織起初為數不多：只有裝釘工人在萊比錫，礦山工人和冶金工人在茨維考，工場手工業工人、工廠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在格里米喬組織起來；這時五金工人在紐倫堡、瓦工和木工在德累斯頓、鞋匠在萊比錫開始組織工會。起初這些團體人數不多；聖靈降臨節在萊比錫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場手工業工人、工廠工人和手工業工人約有三千會員，他們在莫特勒的英明領導下得到較大的發展。

當愛森納赫代表大會結束的時候，德意志工人協會聯合會舉行了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六年前，這個組織是作為資產階級抵抗無產階級運動的剛剛掀起的浪潮的堡壘而建立的，現在它已經被日益高漲的潮水淹沒和沖垮了。這個聯合會變成了社會民主工黨。

### 三 頭幾次黨派之爭

在起草愛森納赫綱領時，事實已經表明，德國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內部沒有原則上的意見分歧，而以後幾個月的鬥爭立即開始清除妨礙團結的實際障礙。它們粉碎了統治拉薩爾派的獨裁，斬斷了把愛森納赫派同德意志人民黨結合起來的紐帶。

起初事態發生了有利於施韦澤的轉變。9月5日至12日在

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把重点放在討論土地問題上。虽然这个問題一年前在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已經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作了决定,可是为了彻底弄清这个問題,总委员会針对法国代表的一个頗有力量的少数派,把这个問題放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議程的首要地位上。这个代表大会有七十八名代表参加,其中有整整三分之一是法国代表,巴黎公社的高貴烈士瓦尔兰也是代表之一。总委员会派出阿普尔加思、魯克拉夫特、考威尔·斯特普尼、埃卡留斯、荣克和列斯納为代表,德国代表中除代表爱森納赫派的李卜克内西以外,还有莫泽斯·赫斯、里廷豪森、沃耳芬比特耳的教师施皮尔和馬格德堡的大学教授楊納施,瑞士代表有約翰·非力浦·貝克尔、毕尔克利和格罗伊利希。巴枯宁以那不勒斯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这是一个庄严的大会,它对討論的主要問題所作的決議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一样。代表大会以五十四票宣称,社会有权把土地变为公共财产,并以五十三票宣称,为了社会的利益討論这个問題是必要的。少数派大多弃权,反对第二个決議的只有八票,反对第一个決議的只有四个法国代表。可是,如果說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以此对蒲魯东主义的小資产階級幻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那么在議程上的第二个問題即继承权問題上,战斗又一次陷于停滞状态。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的有力的观点,即认为继承权是随着私有制的存在而存在,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的,而巴枯宁則把意識形态的上层建筑同經濟基础顛倒过来,他想为了正义把继承权作为不平等的独立的根源加以消除。这两种見解都沒有得到多数人的贊同,因此問題仍然是悬而未决。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決議在德国資产階級中引起普遍不安。不仅是像阿道夫·瓦格納这样的爱国的“科学界人

士”指責这个決議是輕率的、沒有价值的、可惡的，而且德意志人民党的勇士們也声嘶力竭地咒罵国际的“傲慢粗野的做法”，并且揭发巴塞爾的多数派是柏林和巴黎的病人的秘密帮凶。刚从監獄里出来的施韦泽能够滿意地对工人們說，只要国际明确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場，資產階級反对派就会像誹謗拉薩爾的鼓动那样誹謗它。关于土地公有制問題，施韦泽无須多說，因为他早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十分明确地論述过这个問題。可是这时他写了两篇关于继承权的优秀論文，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他对科学共产主义掌握得多么全面。他的观点同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問題向巴塞爾代  
350 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完全一致，只是这个报告在十月号的《先驅》杂志上才发表，而施韦泽則在9月17日和19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他的文章作为报纸对巴塞爾會議的最初的簡單报道发表。施韦泽在文章中深入地論述，消灭继承权在資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烏托邦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多余的要求，可是对无产階級在从資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专政來說，消灭继承权有它巨大的实际意义。

当然施韦泽毫不迟疑地利用他的优越地位。現在他可以有根据地說，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仅是組織上最巩固的工人党，而且是原則上最进步的工人党。他竭力同国际保持和平，承认巴塞爾決議的意义，虽然他說，“卡尔·馬克思学派”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对“半社会主义”感到“棘手”。施韦泽更为激烈地对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評論，說它不敢贊同巴塞爾決議；組成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从前的拉薩爾分子，純粹是稻草人，他們不敢反抗人民党的資產者。

事实上，白拉克、彭霍尔斯特和施皮尔所属的不伦瑞克委员会打算发表一个支持巴塞爾決議的正式声明。可是委员会的这一主张遭到李卜克內西的反对。尽管李卜克內西坚决承认科学共产主

义的这一结论，但是他在巴塞尔就对使土地公有制成为纲领性决议的对象一事提出实际顾虑。正如他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现在他不愿过早地同德意志人民党发生争吵，并认为只要党报不否定巴塞尔决议就够了。对于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些决议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民主周刊》在最后一期上回答说：“不表示态度。每个党员个人可以而且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对于这件事党无权干涉，而且党也不受决议的任何约束，正如它不受国际工人协会本身约束那样。”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甚至在李卜克内西奉为圭臬的策略观点方面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这时施韦泽说，爱森纳赫派不敢拥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德意志人民党要求明确否定巴塞尔决议。<sup>351</sup>

可是结果还是产生了李卜克内西要想暂时避免的分裂。人民党的个别领袖还在爱森纳赫参加了大会，比如宗纳曼，虽然在几年前他企图否认这一事实，可是结果文件肯定了他的出席。像他和他那一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充分了解的人，竟然对纽伦堡纲领和爱森纳赫纲领的原则意义完全不了解，这是不可想像的；也许他们是想保持关系，以便试探到最后一刻，看工人是否受人支配。人们还不如作有利于士瓦本小市民的估计，即他们根本不了解在纽伦堡和爱森纳赫作了什么决议。因为巴塞尔决议使他们大吃一惊，所以他们就像被毒蜘蛛咬了一口似的。他们特别竭力使社会民主工党的南德党员脱党；他们特别在士瓦本工人中利用残余的偏狭观念进行投机，而且也收到效果。维尔腾堡工人协会邦联合会虽然参加了爱森纳赫派，但并没有解散，从来就是这个联合会的灵魂的该会书记布隆能迈耶尔在《斯图加特观察家》上对马克思的独裁表示很不信任，他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完全没有恶意的决议中，看到了马克思的独裁，根据这个决议，国际总委员会在

必要时应该为工会的国际联系做媒介。

只有倍倍尔巧妙而迅速地阻止人民党的阴谋活动。11月5日至30日，他到南德做鼓动旅行，经过科堡、班堡、埃尔兰根、菲尔特、纽伦堡、累根斯堡、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到了维尔腾堡的许多地方，对南德工人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工作。士瓦本邦联合会不再保持独立的组织了。倍倍尔在斯图加特歌厅的大厅里谈到，假如不是《斯图加特观察家》的编辑从中调解，就已经同人民党彻底分裂了。可是，正是《斯图加特观察家》发表了三篇长文章反对倍倍尔的演说，这三篇文章出自人民党的一个普鲁士食客，不久就成了哈布斯堡的御用文人的尤利乌斯·弗雷塞的手笔，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无知令人惊异，其学识恐怕还不及舒尔采-德里奇。倍倍尔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组论文作答，这些文章他还用《我们的目标》为题出版。这是他的处女作；它生气勃勃而力量充沛地不止在一处表明，它的作者勤勉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基本上它还是以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作为依据的。这时李卜克内西也放弃了人民党；1870年1月13日，他无比确切地对莱比锡工人描述人民党说：“它是一个通过偶然事件产生的临时党；完全没有力量，它决不能摧毁北德意志联邦。它只会吵吵嚷嚷，别的什么也不会。在经济比南德发达的北德，它只由很少几个人组成，只有在南德，而且只有在士瓦本，它才有群众，可是在那里它是一个形形色色的、目前通过反对‘普鲁士化’的斗争而团结起来的分子的混合物。”几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在梅朗内做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有效地在人民党的攻击面前捍卫了巴塞尔决议。这个报告后来也增补出版，也同倍倍尔的论文一样成了爱森纳赫派的优秀的鼓动武器。

毫无疑问，这个党起初对巴塞尔决议采取保留态度，有助于重

新巩固施韦泽的地位。10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同两年以来每个新季度的情况一样，没有增加，但也没有减少。十六个地方的订户减少了，可是十二个地方的订户增多了；汉堡仍然以一千二百十四户领先，其次是柏林七百六十五户，爱北斐特-巴门一百七十六户，汉诺威一百三十户。《社会民主党人报》共有五千个订户，而《人民国家报》只有两千个订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公布订户的精确数字的时候，兴高采烈地补充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进攻只能使工人阶级的胜利进军暂时停顿，而不会得到别的东西。爱森纳赫派断言施韦泽身后只有一股盲信的群众，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汉堡和莱茵河畔的经过锻炼的工人群众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牢牢握住旧日的旗帜，而代替白拉克、盖布和约克的那些人，也是活跃、能干的，他们是：爱北斐特的织工哈尔姆、杜塞尔多夫的木器工人德雷斯巴赫、阿尔托那的雪茄烟工人莱麦尔、汉诺威的机器制造工人弗罗默和雪茄烟工人迈斯特尔、卡塞尔的木器工人普方库赫、布勒斯劳的木器工人赖因德斯，木工奥古斯特·卡佩尔和奥托·卡佩尔还有其他一些人。为了消除联合会内部混乱的最后痕迹，施韦泽在德国做了为期七周的组织旅行。他先到施泰廷，后到布勒斯劳和彼得斯瓦尔道，然后进入萨克森王国，到德累斯顿、林巴赫和莱比锡，再经斯塔斯富特、埃格恩、马格德堡到汉堡、阿尔托那、基尔、诺伊明斯特尔、哈尔堡、吕内堡、汉诺威、不来梅、卡塞尔。在莱茵河畔，他访问了爱北斐特、巴门、杜塞尔多夫、埃森、雷姆夏特、科伦，最后到了南德的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符次堡。他在所有这些地方都举行了不公开的会员会议，他让每个会员就人们对他的指责提出质问；这次紧张旅行的报酬是按联合会鼓动员的费用支付的，那就是三等车车票和一个半塔勒一天的出差费。

在他外出期間，特耳克也終於掌握了柏林。自从1866年以来，进步党就不再理解这个世界了；它决不願缺少俾斯麦給资产阶级摆的物质利益的酒宴，可是它也不願像民族自由党人那样毫不关心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丢到桌子下面去，而是把政治理想当作席面上的和平的裝飾品加以利用，这是俾斯麦的神經实在不能忍受的。进步党就在这种进退两难局面中渐渐衰亡了。1869年夏天，当它企图在“知識分子的城市”中，挑起一場反对建立一个小修道院的騷动的时候，人們可以看出，它是多么老弱无力。一个坚强的鉗工师傅召集了柏林的几个教皇全权主义者，在进步党人想大敲而特敲的文化之鼓上打了一个窟窿。这时进步党人进行了另一种嘗試；他們的邦議會議員通过一个庄严的提案，要求普魯士政府为通过外交途徑使欧洲大国普遍裁軍而努力。这个提案是不伦不类的。在每个有思考能力的欧洲人都預料到的普法战争的前夕，甚至从溫和的市民常常称为“实际政策”的那种立場出发，这个提案也沒有什么意义，而它作为对軍国主义的原則性抗議則又是軟弱的、不彻底的；而且这个提案在普魯士众議院里被提出来，那里的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說他們无权过問，因为外交和軍事事務已經轉交北德意志联邦办理了。可是正因为这个提案沒有使进步党負有严肃的政治責任，进步党就把它当作一个鼓动手段，以便把在軍国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呻吟的群众招到自己麾下。

11月7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进步党在音乐厅的大厅召开了一个民众大会，把它的裁减軍备提案提到議程上。不仅发出召开民众大会的正式通知，而且进步党报纸还特別強調，这不是党的會議，是民众大会，虽然它們知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会参加民众大会，不管这个大会是哪个党召开的。《人民报》穩操胜券地說，几

乎所有进步党大人物都参加的发出邀请的委员会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破坏大规模示威的企图”。

这是一次“大规模示威”,不过不是为了向进步党致敬。在过分拥挤的大会开幕以后,选举主席时立即表明,出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工人。特耳克当选为主席。随后,已经舒舒服服地准备了办公室的进步党司令部,就从后楼梯悄悄地溜走了。这时在大厅里的进步党少数派,企图用大吵大嚷的办法阻碍讨论,可是人们立即根据他们的行为,比较客气地或不客气地把他们赶走了,接着大会在特耳克主持下安安静静地进行。人们不仅注意倾听了拉萨尔派的发言,而且也倾听了爱森纳赫派和舒尔采的拥护者的发言。大会以通过一个决议而结束,决议指出进步党的提案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不彻底的提案;欧洲国家所需要的是废除常备军,建立以青年军事教育为基础的国民军;进步党议员是资产阶级 355 的代表;只有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才能做对工人有利的事情。

于是进步党发出了关于压制集会权的震耳欲聋的怨言。正是用最不客气的办法破坏或者企图破坏拉萨尔的不公开的党的会议的那批人,现在装作受到侮辱的无罪的人,因为他们自己挑起的角力产生了对他们不利的结果。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损害了集会自由,因为他们的领袖拒绝承认依法选举特耳克为主席,他们的随从企图阻止会议在特耳克主持下继续进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是既简单又明确的:“如果人们召开一个不分党派任何人都可参加的一般的民众大会,那么人们可以期待,在我们认为有利的一切情况下,我们的党也参加。在所有这样的集会中,根据一般的民主习惯,人们都通过多数来选举主席。如果人们不愿社会民主党人参加,那么可以召开有一定党派色彩的会议。我们不会参加进步党和人民党的会议。”因此在音乐厅中通过几个会员完全未受骚扰

地发了言的民主工人协会的做法也是不适当的，它建議“所有党派”成立一个保护集会自由的联盟，并且还特別強調它是属于国际的。因此資產階級党派也瞧不起它，而特耳克有理由問，国际总委员会对于这种策略会有什么意見。“爆破兵”和“犹太小伙子”之間的可惡的論战，是很不正确的行动的必然結果。反过来，《人民国家报》老老实实地說，虽然它也惋惜，胜利果实首先落到“宮廷社会主义”的怀里，但是进步党人應該得到这种結果。

可是揚言要报仇的資產階級不願只以无中生有的中伤自慰。它号召还跟着它走的机器制造工人，又在一个星期日，即11月28日的上午到宇宙館举行一个一般的工人大会，会上“大多数柏林工人将坚决譴責施韦泽的卑鄙无耻的行为”。进步党的协会和报纸的激烈煽动，为一个阴险行动做准备，其目的是在柏林工人中制造一場小騷乱。會議原定十一点钟开始，可是九点左右，进步党工人就准备通过后門偷偷地溜进宇宙館，如果社会民主党工人十一点到会，会场就已被占了。进步党煽动者希望那时发生杀人事件。在这决定性的早晨，警察总监下令召集全部警察，甚至占领了宇宙館周围的广场和街道，这个事实說明，警察对于資產階級的心情了解得多么深刻。可是特耳克是一个深謀远虑的統帅。当大約一千名进步党工人在九点钟左右向前推进时，他們发现宇宙館已被四千名社会民主党工人团团围住，尽管冬天早晨天气很冷，这些工人七点钟就已經到了。进步党的部队几乎沒有一个小前卫能在晨雾的掩护下从后門钻进去，因为社会民主党工人发现了这个門并立即把它堵住了。当两支敌对的队伍在馬路上对峙的时候，进步党工人的階級意識大大觉醒了。工人决不为了让資產階級和反动派高兴而大打出手，人人都了解这一点。到了十一点，宇宙館的大門打开时，群众安安静静地走进会场。进步党的机器制造工人安德雷

阿克致开会詞，衷心劝告工人保持和睦，然后特耳克和吕普克尔特被选为主席，經過激动的但是和平的辯論以后，大会作出決議說，音乐厅的騷动是进步党引起的，因为它不願承认多数人的決議，每个利用喧嘩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破坏會議的人，都对集会法进行了可耻的暗害。进步党对柏林工人的統治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施韦泽的声望比过去更大了。可是現代工人运动决不能成为独裁欲的玩具；它无情地懲罰一切以它做自私的游戏的嘗試。施韦泽的旅行总的說来收获很大，可是也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sup>357</sup>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以后，巴伐利亚的會員仍然是他最忠实的拥护者；对于爱森納赫派在紐伦堡一个工人大会上所做的和解的嘗試，他們采取拒絕的态度。現在他們已經能够在慕尼黑出版一个小小的周刊《无产者》了。可是施韦泽对此并不感到滿足。当他到了奥格斯堡，发表一篇动人的演說吸引會員的时候，他要求《无产者》停刊，因为一个組織就只应有一个机关报。他願給《无产者》的发行人弗兰茨和陶舍尔每人四百份《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售之款归他們两个所有，以此来弥补他們的損失。虽然施韦泽威胁說，宁可抛弃所有南德會員，也不能让《无产者》繼續出版，但是巴伐利亚人还是拒絕了他的要求。为了說服陶舍尔，他又同他单独商談，可是陶舍尔說，他决不同他的同志們分开。于是施韦泽就想第二天召开慕尼黑會員大会，决定《无产者》停刊問題，可是他也沒有达到目的。关于他的意图的謠言迅速地在喜爱《无产者》的慕尼黑工人中传播。施韦泽一来就受到了不友好的接待。关于《无产者》停刊的事，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所有巴伐利亚會員脫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他們为了建立“拉薩尔工人党”，定于1870年1月23日在奥格斯堡召开一个一般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党一方面不要一切“領

导机构”，另一方面要同德意志人民党严格区分开来。代表大会几乎只有巴伐利亚工人的代表参加。倍倍尔为了劝说巴伐利亚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工党，而受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托出席了代表大会。他的演说给人以一个良好的印象，如果彭霍尔斯特不在大厅里散发传单，倍倍尔十之八九可以达到目的，这个传单诽谤陶舍尔是由施韦泽一手提拔起来的宗派醉汉。被这种纯属虚构的论断所激怒的巴伐利亚工人决定，暂时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形成了第四派。

358 他们所以是第四派，是因为这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又同施韦泽闹翻了。她责备施韦泽破坏协议，说他没有履行联合时所承担的义务，即使工会运动逐渐消失并尽可能阻止有组织的罢工。施韦泽否认，他曾经承担这种义务；同政治运动相比，他经常把工会和罢工置于次要地位，但是他从来没有答应把它贬到次要地位以下。很难想像，施韦泽会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断言的那样暴露自己，但是他也沒有证明或者试图证明，他曾使伯爵夫人的拥护者转而赞同他的工会运动的见解。既然他主张合并，他就做了一件错事，而现在就應該吃到苦头。在庄严宣布联合以后半年，德国工人党却分成了四派。独裁政策的这一悲惨结果给独裁者的政治威望以沉重的打击。施韦泽说，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重新背叛时，她以前的拥护者中只有一部分人还跟着她跑，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这个宗派确实除了几个表现其存在的幽灵似的人物以外，已经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消失了。可是它暂时还有力量在哈雷召开一个代表大会，对施韦泽进行了最激烈的指责，不正确的指责比正确的指责几乎更使施韦泽难堪，因为他只要有一点眼光，怎么会看不清这些盟友的不可靠性呢？

更糟糕的是：由于施韦泽的政策，工会运动确实受到了损失。

工会运动本来处在可喜的蓬勃发展阶段。大工业区的一系列的罢工经常获得荣誉，有时也取得胜利。在柏林，瓦工和木工经过斗争，提高了工资，缩短了工时。在汉堡，劳恩斯坦车辆制造厂的伐木工人和五金工人通过一次充满激动人心的事变，顽强罢工，阻止工厂领导降低他们的计件工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工厂领导这样做的美妙的理由是，工人不需要往面包上抹黄油。在奥格斯堡发生了两次要求撤换暴虐的上级的大罢工；奥格斯堡机器厂的铸工由于工人们团结一致，在一星期后取得了胜利，可是克劳<sup>359</sup> 359 斯的织布工人却在罢工两星期后失败了，因为工厂主在波希米亚招了五百名织工，用特别快车载到奥格斯堡来了。仅仅在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分别举行的两次大会上，就募集了七百古尔登<sup>①</sup> 支援罢工的经费，这一事实表明工人们以多么伟大的牺牲精神进行了这些罢工。社会民主党工人经常光荣地，有时胜利地进行了工会斗争，而进步党的工会通过瓦尔登堡的罢工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为了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进行报复，麦克斯·希尔施企图定居瓦尔登堡行政区，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受苦受难的矿工却把他的轻率举动真当做一回事，有六千五百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而大部分自由派矿主把协调使徒看做恶意的煽动者，以饥饿相威胁，命令解散“他的”工会。罢工以彻底失败告终，对于麦克斯·希尔施及其进步党助手说来是很不光彩的。西里西亚的矿工不得不为了自己的错误付出很大代价，一些有见识的人转到社会民主党方面去了，不久以后吃了麦克斯·希尔施的同样苦头的福尔斯特工厂工人也是这样。进步党耍的把戏刚开始就又停顿了。

工会运动的所有这些有利的发展，受到施韦泽自私自利的独

<sup>①</sup> 德国货币名，一南德古尔登等于 1.714 马克。——译者

裁政策的严重損害。几乎所有的工会組織中都发生政治爭論；只有在呂普克尔特領導下的瓦工和木工一致拥护施韦泽。其他工会是分裂的，它們的主席包括弗里茨舍在內都背离了施韦泽，只有一个相当数量的會員还始終忠实于他。党派爭論在工会組織中比在政治組織中为害更大，因为按照工会組織的性质，是不應該发生党派爭論的，这种爭論分裂了已經爭取到的力量，使它成为无用，而当这种爭論使多次罢工尤其是萊比錫雪茄烟工人的一次罢工受到損失时，沒有爭取到的群众就更被吓退了。可是这时施韦泽已經这样晕头轉向，仍然在独裁者的道路上前进；他从組織旅行回来以

360 后，建議把所有工会合并为一个支援总联合会，这就使得他所建立的工会組織的缺点加倍严重了。

1870年1月5日在柏林举行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有代表八千零六十二名繳納会費的會員的三十九名代表参加，这个大会表明，反对施韦泽独裁的反对派並沒有銷声匿迹。会上发生了許多令人不快的爭論。施韦泽抱怨“联合会的貴族”和經常制造新混乱的“知識分子”；他說，他不理解这些人怎么能够接連好几天像老太婆似的喋喋不休；他对用这种方式先同联合会的敌人后同联合会會員进行爭論，已經感到厌倦了。普方庫赫一針見血地对此反駁說，施韦泽由于同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結成联盟，使联合会听到了老太婆的絮叨。当然总的說来，六天討論的結果对于施韦泽还是有利的。爱森納赫派一再断言，施韦泽用普魯士政府的秘密經費进行鼓动，而且沒有忘記他自己的私利，經過最詳細地检查出納情况，证明这种說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施韦泽也相当完整地保持住自己的独裁地位。主席仍然由會員直接投票选举，只是不在每次代表大会以前，而在代表大会以后；接管《社会民主党人报》为联合会财产的提議遭到否决，出版委員會沒有恢复；只有理

事会得到較大的职权。理事仍然分散在全德国，不过他們應該定期有文书来往，一年开两三次会。理事会有权干涉主席“濫用权力”，此外并不限制主席的“全权”。特耳克被选为书记，哈森克萊維尔被选为司庫，后者同时进入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

同这个代表大会直接联系着的是有代表二万零六百七十四個繳納会費的會員的八十九名代表参加的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經過三天討論，这个大会也以施韦泽的胜利結束。財政状况良好，施韦泽关于所有工会組成一个联合会的提案被以約一万二千票对約九千票通过了。考虑到少数派为数甚多，代表大会决定把決議的  
361  
实际执行日期推迟到1870年7月1日，但是这并不是对施韦泽表示不信任。討論情况表明，少数派并不讨厌施韦泽的提案，而由于考虑到許多工人的“行会”的偏見，希望这个提案逐步实现。

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施韦泽还对約翰·雅科比取得了一次胜利。柏林邦議會第二选区选举理事会召集选民于1月20日在柯特布斯門旁的新社会大厦开会，听取他們的議員，市顧問龙格和約翰·雅科比的报告。这些选民之中有許多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在居住在这一区的施韦泽和哈森克萊維尔的领导下出席了大会，在选举主席时，他們得到了多数票。进步党領袖又装作受欺侮的正派人，以龙格为首退出了會議；而雅科比从邏輯上考虑到，不仅口头上而且也要用实际行动拥护民主原則。施韦泽主持會議时他留下并且說了話，虽然声音很低，工人們却十分恭敬地傾听他关于工人运动目的的講話。他的演說中有一段著名的話：“对于未来的文化史家來說，建立最小的工人协会也比薩多瓦战役<sup>①</sup>的日子有更大的价值”；这篇演說接近科学共产主义的程度达到一个資產階級

<sup>①</sup> 薩多瓦是波希米亚北部的一个村庄，在柯尼希格萊次附近，普奥戰爭中，1866年7月3日，普軍在此击潰奧軍。——譯者

思想家所能达到的程度，总之这种接近足以使柏林的进步党人和法兰克福的民主主义者同样吃惊。可是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沒有迈出最后一步。它在理論上沒有表示拥护使一切剝削成为不可能的生产資料公有制，在實踐上也沒有公开贊成階級斗争，这同下述事实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久以前雅科比在进步党自由貿易論者致瓦尔登堡人的宣言上签过名，这个宣言說德国沒有階級斗争的場地。雅科比要想通过国家、企业主和工人的携手并进来解决社会問題。大会根据哈森克莱維尔的提案做出決議說，雅科比的演說中接受了許多社会主义真理，但是仅仅停留在半路上，这个決議是完全确切的。

362 可是，如果施韦泽因此就以为自己对爱森納赫派进行了一次沉重打击，那么他对自己的胜利就估計得太高了。实际上雅科比的演說沒有什么特殊意义；《人民国家报》虽然刊登了这篇演說的原文，并为它对施韦泽的攻击进行辯护，但是《人民国家报》已經深深地被卷进了階級斗争的风暴，不会被雅科比所惑。薩克森政府和薩克森工厂主都利用迫害手段，粉碎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和平合作的幻想，假如这种幻想不是产生于雅科比的书斋之中，而是产生在別的地方，他們就自己来干这件事了。爱森納赫派必須进行艰苦的斗争，尤其是同財政困难进行斗争；革命基金（現在它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保管人也开始感到困难了）用三千五百法郎又一次帮助他們克服了头几个难关，可是他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在薩克森无产階級中建立了一个不可攻破的堡垒。1870年4月，福格特兰特的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普劳恩被倍倍尔占領了，1869年麦克斯·希尔施曾在那里的一次改选中侥幸当选。正如麦克斯·希尔施自己絕望地抱怨說，仅仅由于倍倍尔的寬宏大量，他作为选区的被选的代表才能得到发言的机会。在薩克森，除去齐

陶斯和法兰肯堡以外，进步党自由貿易派对工人的統治已經垮台了。到 1870 年中期，《人民国家报》的訂戶增加到三千戶以上；萊比錫有一百九十八戶、德累斯頓一百五十九戶、科伦一百二十八戶、格里米乔一百二十四戶、格劳豪一百十九戶、美因茲九十六戶、茨維考九十三戶、梅朗內九十一戶、布勒斯劳八十八戶、开姆尼茨八十五戶、不伦瑞克七十八戶、汉堡七十五戶、斯图加特七十一戶、柏林六十三戶、韦尔道六十一戶、佩斯五十五戶、奥格斯堡和紐伦堡各四十戶。

从外表上来看，两派的斗争是以令人不快的形式进行的。在报纸上人們互相指責对方背叛了工人的事业，在工人集会上，常常出現激烈爭論的場面。在前一方面，爱森納赫派应負較大責任，在后一方面，拉薩尔派应負較大責任。尽管有这种斗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說也通过这种斗争，两派日益接近。爱森納赫派于 1870 年圣灵降临节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根据資格审查委员会的确定，有一百十一个地方的七十四名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四十七个有党员的地方沒有代表出席。有代表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党员总数达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人，只及有代表参加爱森納赫代表大会的工人的十分之一或九分之一，甚至这个数字也是很有問題的，因为它不限于繳納党費的党员，而且还包括几千名奥地利工人和瑞士工人。《人民国家报》根据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情况估計积极的党员有一万人，它这样說并不是对自己的党的成果有悲观的看法。

拉薩尔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由于賴克哈特的积极鼓动，他們在士瓦本首府这个不利的地方站稳了脚跟；代表大会开幕前几个星期，还有几个鼓动员从国外回来，他們把約二百五十个工人聚集在一个严密的組織內，这个組織可以在公开大会上使爱森納赫

派的斯图加特組織不能發揮作用。后来当爱森納赫派的代表大会开会时，大会在一个不公开的準備會議中決定，准許非黨員參加代表大会的公開會議，但不允許他們參加討論，这在第一次公開會議上就引起騷動，并使會議提前結束。代表大会只能用不让非黨員參加公開會議的辦法，保證大會不受干擾。

尽管一开始有这种不愉快事件，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討論对于澄清兩派之間的关系（無論在組織方面，还是在原則和策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事实不久表明，在爱森納赫決定的組織过分笨拙。人們把委員會留在不伦瑞克-沃耳芬比特耳，但把監察委員會由維也納迁至漢堡-阿尔托那-哈尔堡。此外，每个爱森納赫派的成員同时是國際的成員、黨員和地方協會會員这一点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少数會員實現了关于个人參加國際的要求，不过这个要求仍然不变。然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廢除了黨員建立地方協會的义务。它決定，地方組織應該選舉受托人和查賬員，以便通过他們同委員會联系，这样就同拉薩尔派的組織大大接近。在另一方面，  
364 兩派組織之間的差別更为加深了，而爱森納赫派的比較正确的观点显露出来了。在彻底的科学共产主义的見解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报》还远远超过《人民国家报》，可是爱森納赫派的机关报給黨員的自我闡明留下的廣闊余地，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它有效地鼓舞了黨員的精神利益。在斯图加特大会上決定成立一个著作股份公司，传播党的著作，并准許現在終於同爱森納赫派合并的巴伐利亚派繼續出版《无产者》。随后卡尔·希尔施在格里米乔創辦了党的第一个每天出版的地方报纸，《市民和农民之友》。施韦泽为了扼杀《无产者》，尤其是更好地掌握南德的群众，取得了理事会的同意于1870年4月1日創刊《鼓动者》，这是一个小小的周刊，訂閱的价格非常便宜，通常按最乐观的估計，要有五万个訂戶才能弥补所

花的費用。可是这个报纸只爭取到不到一万五千个訂戶，而且使《社会民主党人报》受到很大損失，以致拉薩尔派的主要机关报从7月1日起不得不减少版面，而《鼓动者》編得再好也不过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个分支而已。过分严格的集中也有它有害的一面。

关于原則問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根据倍倍尔的提案宣称，“現代社会的經濟发展，将使把土地变成公共財產一事成为社会的必然性”。这样，两派在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上的一致，得到了肯定。另一点一致表現在工会問題上，尽管起初更多地是同样模糊而不是同样清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热烈倡議，把許多工会組成一个联合会，反对的理由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反对这样做的理由相同；因为这样就容易联系到工人一向所知道和熟悉的机构——同业公会和行会。报告人約克这样看，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案宣布組織和促进公共生产事业是工会的主要任务。<sup>365</sup>

一个資产階級作家說得对，从辯論的情况看不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怎么恰恰做出这个決議。看来当时是有两种动力发生作用。1870年上半年，工会的发展陷于停滞状态，而罢工运动却不断扩展，使得一些人产生了怯懦情緒。施韦泽在1870年9月公布的眼目說明了这种情况。在1870年的头八个月中，工会联合会的行政管理費为六百三十七塔勒，鼓动費为二百十七塔勒，罢工川費只有三百九十五塔勒，这笔錢是用来支援汉堡、基尔、呂内堡、于耳岑、馬格德堡、爱北斐特、佐林根、明斯特尔和慕尼黑等地的十一次罢工的。当然施韦泽估計各工会的金庫和国外党员的自願捐款（地方捐款不計在內）为那十一次罢工提供的款項为二万二千五百塔勒，这也并不夸大，毫無疑問，拉薩尔派的工会是比較强大的。同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团一样，《人民国家报》也已經对“沒有意义的罢

工”提出了抗議，約克在斯图加特提醒人們不要把罢工看做是工会的“絕對任务”，罢工“白白浪費了大部分力量”。人們还没有把合作社和工会充分区别开来，甚至像約克这样一个进步的无产者也把这两者毫无区别地混在一起。党内只有个别人反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問題的決議；明显地提出反对意見的，是两个从前的拉薩尔分子，胡果·希尔曼和布勒斯劳的鞍匠克雷克尔。他們在《人民国家报》上說，決議容納最严重的誤解，否认工会的历史性质，对此編輯部做了与其說是抵抗不如說是逃避的評語，說将由工会建立的生产企业應該像英国合作社那样只有实验价值。

在策略問題方面，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报告决定，“仅仅出于宣传原因”参加即将于秋季举行的帝国議會选举和关税議會选举。当选的党的代表总的說来應該采取否定的态度，并利用一切机会揭发两个机构的討論都是演喜剧，但是也要“在可能情况下，为工人階級利益进行活动”，这样就更加接近了拉薩尔派的立場。差不多同时，施韦泽在《鼓动者》上精确地規定社会民主党議員的任务說，對他們說来，帝国議會和关税議會“实质上不外是一种鼓动手段”。有了好机会，他們應該宣告社会主义的原則，公开揭露反动的假議會活动，在重要投票（譬如反对一切捐稅）上起协助作用。事实上，1870年春天的区别表现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很少参加議會會議，如果他們参加就刺激性地向資產階級政党提出挑战，而施韦泽則按时到会，代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对个别議案进行实事求是的，但也并非不尖銳的批評。

如果說施韦泽在这一方面执行了被近几十年的历史經驗证明为正确的策略，那么他在另一个策略問題上也有一个清楚地暴露于公众面前的弱点，那就是由于他扮演独裁者的角色，現在已經真正降为狹隘的宗派領袖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定，在选举中不

同其他党派结成同盟，也不进行和解，可是在党没有提出别的候选人的地方，就投至少在政治方面基本上采取党的立场的候选人的票，尤其是投别的党派提出的真正的工人候选人的票。相反地，一个月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于汉诺威在施韦泽主持下作出决议说，凡有党员的地方，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复选中投最进步的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决不投反动分子或爱森纳赫分子的票；在反动分子和爱森纳赫分子两者竞选时弃权，在爱森纳赫分子和自由党人两者竞选时投自由党人的票。后来在倍倍尔和麦克斯·希尔施两人竞选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只得投麦克斯·希尔施的票。这个极端的决议是以所谓爱森纳赫派的伪善为理由的，据说即使爱森纳赫纲领的政治要求得以实现，这种伪善对工人事业也是害多利少。可是爱森纳赫派的不伦瑞克委员会确切地回答了可悲的诡辩——这就是煽动工人反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工党将坚持把优先权给每个工人候选人，而不给资产阶级候选人。 367

施韦泽的独裁日益陷入迷途，必然在这条道路上悲惨地趋于没落。这种独裁在完全破产以前在一次暴风雨中粉碎了，对它来说这是一件幸事。这场暴风雨把施韦泽的独裁同分裂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争论的最深刻的原因一起冲走了。如果说柯尼希格累茨战场是这种争吵的诞生地，那么色当战场就是它的葬身之处。

## 注 释

在第一版中总括为“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时代”的1863年至1878年这一时期，现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拉萨尔去世为止，第二阶段到普法战争为止，第三阶段到反社会主义者法颁布为止。这样做是为了使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更清楚地显露出来。我研究这些问题的时间越久，就越领会到，党史的第一个十年中充满的内部纠纷，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民族问题，一切其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争论最终都归结为工人阶级采取什么实际行动、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而不是采取什么原则的问题，因为在原则上，人们一致认为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基础上的德国统一同实现民主理想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这个问题真地引起兄弟之争，那么今天人们在回顾现在已经永远停息的斗争的时候，可以由于只有这种兄弟之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感到自慰。因为问题恰恰有它的两个方面，而任何一个方面在它还不能长时间地成为决定因素的时候，它都想以其特殊的方式争强斗胜。

现在我把从拉萨尔的公开答复到反社会主义者法的颁布这十五年分为三部，这第三卷包括其中的头两部，即拉萨尔的鼓动和党派之争。同第一版相比，我认为尤其是论述党的创始阶段的那一章得到重要的和有价值的补充，这一点是依靠党的忠实的老档案员，我的朋友莫特勒不倦地、细心地收集并供给我使用的八十七份信件、电报、记录和其他手写材料才做到的，为此我要在这里对他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现在连一些细节问题也都清楚了，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个天然的产儿，另一方面拉萨尔作为助产士给它作出了不可估量的不朽贡献。

对于党派的争论这一部，我没有作重大的修改，我关于施韦泽所说的一些话，修改得最少。在出第一版时，我估计别人根据资料处理同样的历史题材，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但是这个期望没有得到实现。我对于施韦泽本人的评论，任何一点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更不用说对它进行反驳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下述事件而有所改变：《前进报》在评论本书第一版时，企图从

我引用的材料中，找出种种反对施韦泽的东西，或者 K. 艾斯納通过他論李卜克內西的小册子要想看到，“将来的历史发展毫不含糊地证明”施韦泽执行了“最沒有远見的短暫政策”。从这些言論中只能看到，它們的发明人沒有付出劳力，对这些事情本身进行研究。

倍倍尔针对我对施韦泽的看法而进行的論战，当然是另一回事。倍倍尔想在他和李卜克內西同施韦泽的斗争的总的叙述中，证明我的叙述是不正确的，不言而喻，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表示滿意。对施韦泽个人有所偏爱这一点，同我是最不沾边的。我不認識他，在資料沒有糾正我的錯誤之前，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很可疑的政治活动家；我只考虑历史的真实性，我反对根深蒂固的党的神話，維護历史的真实性，但在一定情况下，我也乐意为了历史的真实性，牺牲施韦泽。我对于施韦泽的看法是根据文件材料得来的，如果有材料可以否定我的看法，那么我愿意放弃我的看法，只要它沒有遭到这种否定，我就毫不动摇地坚持我的看法。<sup>①</sup>

因此我根本不想援引这样的事实来反駁倍倍尔，即口头或书面对我的党史提了意見因而使我感到高兴的所有旧拉薩尔分子和旧爱森納赫分子都对我既不掩飾施韦泽的真实缺点或贬低爱森納赫派对他进行的斗争，同时也清除了根据党的传统加在他身上的过分的罪責表示滿意，他們之中的个别人至多只有这种保留，即我在某些細节上矯枉过正，对于这一点，我不願再作爭辯。这些表示贊同的意見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当然也不把它們看做是贊成我或反对倍倍尔的确切证明，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爭論通过个人对三十年以前的事物的回忆是根本得不到解决的。当恩格斯为国家学辞典写馬克思小传的时候，肯定他仔細地审查了他自己的回忆，虽然如此，几乎每句都有一个錯誤。或者我們再把李卜克內西在他晚年还一再重复的看法同現在发表的拉薩尔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作一番比較，李卜克內西断言，拉薩尔在 1859 年是拿破侖狂信者，在 1864 年由于害怕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会談而进行了間接的自杀。

这种历史問題只有通过历史批判才能解决。因此我愉快地欢迎倍倍尔所作的叙述，但是在目前抱着一个可以实现希望，即如果他全面地研究了

① 1927 年，历史学家古斯塔夫·迈耶尔公布了一个材料，证明 1866 年施韦泽曾通过他最亲密的助手霍弗斯特騰接受了俾斯麦的二千五百塔勒的“借款”，这就足以证明施韦泽是被俾斯麦收买的好細。——譯者

关于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的爭論的文件材料，会大大改变他对施韦泽的不确当的評价，但他并不因此而需要放弃他对施韦泽进行斗争的权利。

1863年至1878年党史的主要資料是当时的党报：《北极星报》，1863年至1865年在汉堡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1864年至1871年柏林出版。《民主周刊》，1868年至1869年萊比錫出版。《人民国家报》，1869年至1876年萊比錫出版。《新社会民主党人报》，1871年至1876年柏林出版。《前进报》，1876年至1878年萊比錫出版。此外在下列著作中，較多地論述了这一时期：耶尔克《社会政党史》，1867年弗賴堡版（Jörg, Gesch. d. sozialpol. Part., Freiburg 67）和耶格尔《現代社会主义》，1873年柏林版（Jäger, D. moderne Sozial., Berl., 73）这两者是从极端教权主义立場出发的，R. 迈耶尔《第四等級的解放战争》，1874年柏林版（R. Meyer, Emanzipationsk. d. viert. Standes, Berl. 74），是从保守的社会立場出发的，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1877年不来梅版，是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場出发的，耶尔克和耶格尔的著作，尤其是迈耶尔的内容广泛的著作对他們的时代来说，是很有贡献的著作；至于我当时的著作，誰要对此感到兴趣，可以参閱梅林《資本和报刊》，1891年柏林版（Mehring, Kapital und Presse, Berl. 91）。拉伏来依《当代社会主义》，1881年布魯塞尔版（Laveleye, Le socialisme contemporain, Bruxelles 81），有埃貝克的德文譯本，1884年杜宾根版，这本书是肤浅的，主要是根据耶格尔和迈耶尔的著作綜合而成的；舍尔的《我們的社会政党》，1878年萊比錫版（Scheel, Uns. sozialpol. Part., Leipz. 78）一书，对七十年代的社会政党的概述比上述著作好得多。但是所有这些著作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試作的历史評价，都或多或少已經过时。

### 第 三 部

#### 拉薩尔和萊比錫中央委员会（第7—88頁①）

施穆勒《小工业》（Schmoller, Kleingewerbe），卡姆弗迈耶尔《現代社会阶级》（Kampffmeyer, Mod. Gesellschaftsklassen）。J. S. 《德国大工业发展史稿》，載《新时代》第11卷下冊第620頁（J. S., Beiträge z. Entwicklungsgesch. d. deutschen Großindustrie, NZ 11<sup>2</sup> 620）。

① 系原文书頁碼，检索时請查本书边碼。下同。——譯者

胡貝爾《手工业者同盟和手工业者的苦难》，1867年諾爾特豪曾版(Huber, Handwerkerbund u. Handwerkernot Nordh. 67)。圖恩《萊茵河下游的工业》(Thun, Industrie a. Niederrhein)。瓦爾特希《魏特林》，載第78期《未來》(Vahlteich, Weitling, Zukunft 78)。埃利森《朗格傳》，1894年萊比錫版(Ellissen, Langes Biographie, Leipz. 94)。《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1903年5月23日萊比錫工人的紀念刊物(內有倍倍爾、瓦爾特希、梅林和耶克的文章)，1903年萊比錫版(Die Gründun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Festschrift der Leipziger Arbeiter zum 23. Mai 1903, Leipz. 03)。羅斯梅斯勒《向德國工人進一言》，1863年柏林版(Roßmäßler, E. Wort a. d. deutschen Arbeiter, Berl. 63)。瓦爾特希《德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黨派之爭》，開姆尼茨版(Vahlteich, Der Parteikampf zwischen d. Sozialisten i. Deutschl., Chemnit.)。《全德工人報》，1863年至1866年在科堡出版(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zeitung, Koburg 63 bis 66)。舒爾采-德里奇《工人問答》，1863年萊比錫版(Schulze-Delitzsch, Arbeiterkatechismus, Leipz. 63)。拉薩爾《公開的答復》(Lassalle, Off. Antwortschr.)。伯恩斯坦在拉薩爾鼓動文集的導言中，提出許多關於拉薩爾的鼓動的历史材料。馬克思《綱領的信》，載《新時代》第9卷上冊第561頁。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662頁。伯恩斯坦《關於工資鐵律問題》，載《新時代》第9卷上冊第294頁(Bernstein, Z. Frage d. ehern. Lohnes, NZ 9<sup>1</sup>, 294)。拉薩爾致洛貝爾圖斯的信載在他的遺著中，布赫爾致拉薩爾的信，載波辛格爾著《布赫爾傳》。伯·貝克爾《拉薩爾工人鼓動史》，1874年不倫瑞克版(B. Backer, Gesch. d. Arbeiteragitation Lass., Braunschweig 74)；這本書由於引用許多文件材料因此是有價值的，但是貝克爾的看法則是幾乎完全錯誤的，對拉薩爾往往很不公正。洛貝爾圖斯《公開信》，1863年萊比錫版(Rodbertus, Off. Brief, Leipz. 63)，又載於科札克著《洛貝爾圖斯-雅格左夫的社会經濟學觀點》，1882年耶拿版(Kozak, Rodbertus-Jagetzows sozialökonom. Ansichten, Jena 82)。拉薩爾《關於工人問題，萊比錫的演講》(Lassalle, Z. Arbeiterfrage, Leipziger Rede)。路·畢希納《拉薩爾先生和工人》，1863年法蘭克福版(L. Büchner, Herr Lassalle u. d. Arbeiter, Frankf. 63)。路·畢希納《我同拉薩爾的會見》，1894年柏林版(L. Büch-

ner, M. Begegn. m. Lass., Berl. 94)。奥只文德爾《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1878年柏林版(Oberwinder, Sozialism. u. Soziald., Berl. 78)，其中有一些关于当时法兰克福及其附近的状况的有趣报道。拉薩爾《工人讀本，法兰克福的讲演》(Lassalle, Arbeiterlesebuch, Frankfurter Rede)。胡貝爾《工人和他們的顧問》，1863年柏林版(Huber, D. Arbeiter und ihre Ratgeber, Berl. 63)。施韦泽《时代精神和基督教》，1861年莱比錫版(Schweitzer, D. Zeitgeist u. d. Christentum, Leipz. 61)。施韦泽《路金德》，1864年法兰克福版(Schweitzer, Luzinde, Frankf. 64)。

### 拉薩爾的策略轉變(第89—145頁)

《人民报》专論集，根据手稿印刷，1863年柏林版(Die Volkszeitung 1. ihr. Gesamthalt., a. Manusk. gedr., Berl. 63)。拉薩爾《集会、报刊和法兰克福議員大会》(Lassalle, D. Feste, d. Presse u. d. Frankf. Abgeordnetent.)。伯恩斯坦已經令人信服地证明，《南德日报》的信是阿·朗格写的。拉薩爾《致柏林工人》(Lassalle, An d. Arbeiter Berlins)。布施《我們的帝国首相》，1884年莱比錫版(Busch, Unser Reichskanzler, Leipz. 84)。拉薩爾《科学和工人》(Lassalle, D. Wissensch. u. d. Arbeiter)。拉薩爾《刑事訴訟 II 和 III》(Lassalle, Kriminalprozeß II und III)。拉薩爾《間接稅和劳动階級的境况》(Lassalle, D. indir. Steuer u. d. Lage d. arbeit. Klasse)。拉薩爾叛國案。拉薩爾《巴师夏-舒尔采》(Lassalle, Bastiat-Schulze)。大学的学者(除去桑巴特还有黑尔克納)今天同三十年前一样不能就其联系理解拉薩爾的作用。关于这方面見古·迈耶尔《社会經济学家拉薩爾》，1894年柏林版(G. Mayer, Lassalle als Sozialökonom, Berl. 94)和 L. O. 布兰特《拉薩爾的社会經济学見解和实际建議》，1895年耶拿版(L. O. Brandt, Lassalles sozialökonom. Anschauungen u. prakt. Vorschläge, Jena 95)。关于在拉薩爾的遺著中發現的所謂蒲魯东鼓动計劃，1866年1月15日布赫爾写信給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說：“我相信，我把这个文件毀掉，是实现拉薩爾的意願”，可是1889年夏天布赫爾对他的傳記作者波辛格尔說(至少根据后者的保证)：“我没有說我消灭了拉薩爾的文件，事实上也没有消灭它，我故意說得含糊其詞，为的是

逃避伯爵夫人的进一步的要求，根据遗嘱，伯爵夫人对于这些文件没有什么权利。”据此，拉薩尔的鼓动计划一定还在布赫尔的遗物中，尽管布赫尔的“含糊其词”很不漂亮，可是他在濫用拉薩尔对他的信任这一点上并不像在其他方面那样有过错。

#### 拉薩尔死前(第146—156頁)

拉薩尔《容斯多夫演說》(Lassalle, Ronsdorfer Rede)。克特勒尔《工人問題和基督教》，1864年美因茲版(Ketteler, D. Arbeiterfrage u. d. Christentum, Mainz 64)。拉薩尔《答瓦盖納对〈巴师夏-舒尔采〉一书的批評》(Lassalle, Erwiderung auf Wagners Rezension des Bastiat-Schulze)。对拉薩尔进行的杜塞尔多夫审判案。伯·貝克尔《拉薩尔死前》，修訂版，1892年紐伦堡版(B. Becker, Lebensende Lassalles, neue Bearb., Nürnberg. 92)。遗憾的是，这个“修訂版”没有更彻底地取消貝克尔的讨厌的注解，难免遭到这种危险；即把这根或那根新线織入关于拉薩尔之死的传奇之中。海伦·馮·拉科維察(德尼格斯)《我和斐迪南·拉薩尔的关系》，1879年布勒斯劳版(Helene v. Racowitza (Dönniges), M. Bezieh. z. Ferd. Lass., Bresl. 79)，是一个低劣的作品，还有波辛格尔的《拉薩尔的痛苦》，1888年柏林版(Poschinger, Lassalles Leiden, Berl. 88)，如果这位性急的多产作家的这个著作不是专门重述拉薩尔的书信，也同样低劣的。

### 第 四 部

#### 国际工人协会(第159—170頁)

論述国际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的最好著作，仍然是艾希霍夫著的《国际工人协会》，1868年柏林版(Eichhoff, D. Intern. Arbeiterassoz., Berlin 68)。特斯图特和維勒塔尔德的著作从来就没有什么用处，而且早就过时了。莫(里茲)·布(施)所著《国际的历史》，1872年莱比錫版(M[oritz] B[usch], Z. Gesch. d. Intern., Leipz. 72)，是用俾斯麦的雇佣文人的剽窃方式，从其他著作中寻章摘句，拼凑成的一个味道很坏的大杂燴，他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做广告，嘲笑那些著作是“肤浅的作品”，当然这一点也不是不正确的。国际的历史(尤其是在德国方面)的最重要的資料是約·菲·貝克尔編

的《先驅》，1866年至1871年在日內瓦出版（J. Ph. Beckers Vorbote, Genf 66 bis 71）。关于所謂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歪曲格萊斯頓的話一事，見布倫坦諾《我同卡尔·馬克思的論战》，1890年柏林版（Brentano, M. Polem. m. Karl Marx, Berl. 90），和恩格斯《布倫坦諾反对馬克思的事件》，1891年漢堡版（Engels, In Sachen Brentano kontra Marx, Hamb. 91）。

### 拉薩尔的繼承人(第171—217頁)

从拉薩尔去世到普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必须主要根据《北极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来叙述。K. 希林所著《伯·貝克尔的被逐》，1865年柏林版（K. Schilling, D. Ausstoß. B. Beckers, Berl. 65），对于柏林支部内部的斗争做了报道，作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信徒，他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叙述都有不正确的地方，因而遭到指责。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1865年漢堡版（Engels, D. preuß. Militärfrage u. d.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 65）。弗·阿·朗格《工人问题》，1865年杜伊斯堡版（F. A. Lange, D. Arbeiterfrage, Duisburg 65）。（欧根·李希特尔）《拉薩尔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1865年柏林版〔（Eugen Richter）, Gesch. d. sozialdemokr. Partei i. Deutschl. seit d. Tode Lassalles, Berl. 65〕舒尔采-德里奇《取消营业风险》，1866年柏林版（Schulze-Delitzsch, D. Abschaff. d. geschäftl. Ris., Berlin 66）。施韦泽《死舒尔采反对活拉薩尔》，1886年苏黎世版（Schweitzer, Der tote Schulze geg. d. leb. Lassalle, Zür. 86）。特耳克《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目的及其他》，1873年柏林版（Tölcke, Zweck etc. d. Allgem. Deutsch. Arbeitervereins, Berlin 73）。关于普鲁士众议院关于结社权的辩论还可参考席佩尔《德国联合权历史论文》，载《新时代》第17卷下册第81页（Schippel, Beitr. z. Gesch. d. Koalitionsrechts i. Deutschl., NZ 17<sup>2</sup> 81）。梅林《对批判的批判》，载同上杂志第818页（Mehring, Z. Kritik d. Kritik, ebenda 818）。倍倍尔《关于监狱的議案的修正》，载《新时代》第18卷上册第180页（Bebel, E. Amendirg. d. Zuchthausvorl., NZ 18<sup>1</sup> 180）。席佩尔《进步党和结社权》，载同上书第252页，倍倍尔《进步党和结社权》，载同上书第253页。

## 自上而下的革命(第218—275頁)

这一章比上一章更多地以报纸,尤其是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先驱》上的材料为依据,这两种报纸刊载了关于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一切活动的报道。哈恩、舒尔特赫斯那里的关于普奥战争史的历史文件,尤其是1871年至1880年柏林警察总局的行政工作报告(1882年柏林版)。杜林《事业、生活和敌人》,1882年卡尔斯鲁厄版(Dühring, Sache, Leben und Feinde, Karlsruhe 82)。《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助手》,1867年日内瓦版(Der Sozialdemokrat und seine Helfershelfer, Genf 67),这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阻止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巴門和賴辛巴赫-諾伊罗德当选而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速记记录。

## 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第276—290頁)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斯图加特版(Kautsky, Marx' ökonom. Lehren, Stuttg. 87),是《资本论》的一本很好的入门书。《总汇报》,1875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49期和50期(Allgemeine Zeitung, Augsb. 75, Nrn. 49 u. 50)。

## 德国的工会(第291—321頁)

《民主周刊》、《社会民主党人报》、《先驱》。雅科比《德意志人民党和民主纲领的目标》(Jacoby, D. Ziele d. deutsch. Volkspartei u. Z. demokr. Progr.)。关于麦·希尔施率地建立进步党工会的情况,参阅布伦坦諾《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立法年鉴等等》,1878年莱比錫版(Brentano, D. Hirsch-Dunckerschen Gewerkvereine, Jahrb. f. Gesetzgebung et-c., Leipz. 78)。麦·希尔施《德国工会和它最新的敌人》(1879年柏林版)(M. Hirsch, D. deutsch. Gewerkver. u. ihr neuest. Gegn., Berl. 79),决不能否定布伦坦諾的文书证明。

## 社会民主工党(第322—367頁)

《民主周刊》、《社会民主党人报》、《先驱》。霍弗斯特騰《我同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1869年柏林版(Hofstetten, M. Verhältn. z.

Schweitzer u. z. Sozialdemokr., Berl. 69)。关于北德意志帝国議會营业法規辯論的速記記錄。李卜克內西《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特別是我同帝国議會的关系》，1869年萊比錫版(Liebkecht, Über d. polit. Stellung d. Sozialdemokr., insbes. m. Bezug a. d. Reichst., Leipz. 69)。阿·瓦格納《土地私有制的廢除》，1870年萊比錫版(A. Wagner, D. Abschaff. d. privaten Grundeigent., Leipz. 70)。倍倍尔《我們的目標》，1870年萊比錫版(Bebel, Unsere Ziele, Leipz. 70)。李卜克內西《关于土地問題》，1874年萊比錫版(Liebkecht, Z. Grund u. Bodenfrage, Leipz. 74)。雅科比《工人运动的目的》(Jacoby, D. Ziel d. Arbeiterbewegung)。

## 人名索引

(自本卷起, 条目后系原文书頁碼, 检索时請查本书边碼)

### a

- 阿德隆 (Adelung)——普魯士檢察長。  
——126。
- 阿尔勃莱希特 (Albrecht)——高級教師, 萊比錫工人教育協會的創始人之一。——25。
- 阿列克西 (Alexi)——柏林的家庭教師, 拉薩爾的擁護者, 後來是虔誠主義的反動分子。——106, 171。
- 阿倫特 (Arndt)——柏林的鞋匠,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81, 105。
- 阿普爾加思, 羅伯特 (Applegarth, Robert 1834—1924)——英國工會領袖之一, 1868—1871年是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後來退出國際。——170, 348。

### ai

- 艾希霍夫, 威廉 (Eichhoff, Wilhelm 1833—1895)——德國社會主義作家, 1868年出版了一本論國際工人協會的著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予以推薦。——344。
- 艾希勒, 卡季米爾·奧古斯特 (Eichler, Casimir August 1836年生)——油漆匠, 六十年代初期是俾斯麥派在工人運動中的密探。——19, 22—24, 65。

- 艾斯納 (Eisner)——柏林的醫生, 拉薩爾的擁護者——65, 106。
- 艾維爾斯 (Ewers)——1863—1864年是德國-丹麥戰爭中沙皇的特使。——240。
- 埃爾納爾, 弗里茨 (Ellner, Fritz)——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的制黃銅器工人,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會員。——140, 174, 182, 254, 333, 343。
- 埃卡爾特, 路德維希 (Eckardt, Ludwig 1827—1871)——1848年維也納三月革命和1849年德累斯頓五月起義的參加者, 1865—1867年是曼海姆《德意志周刊》的發行人。——204, 224。
- 埃卡留斯, 約翰·格奧爾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圖林根的裁縫,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後來參加英國工聯主義運動。——162, 249, 265, 309, 349。

### an

- 安德雷阿克 (Andreack)——柏林的機器製造工人, 進步黨黨員。——356。

### ao

- 奧貝文德爾, 亨利希 (Oberwinder, Heinrich)——作家, 拉薩爾的擁護者,

- 后来是驻巴黎的德国警探。——140、174。
-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和新闻工作者，1862—1864年出版《德国年鉴》，1874—1877年是民族自由党国会议员。——126。
- 奥地利皇帝 (1848—1916)——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 奥多尔夫，雅科布 (Audorf, Jakob 1835—1898)——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1887年以后是《汉堡回声》的编辑。——27、58、77、80、110、138、172、213、233、254、255、257、259、261、264。
- 奥古斯塔 (Augusta 1811—1890)——萨克森-魏玛的公主，威廉一世的妻子。——112。
- 奥古斯滕堡公爵 (Herzog von Augustenburg)——见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提安·奥古斯特。
- 奥拉茹斯 (Olearius)——六十年代任赖辛巴赫的地方长官——116—118、256、260。
- 奥托-瓦爾斯特，奥古斯特 (Otto-Walster, August 1834—约1893)——新闻工作者和作家、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流亡美国，在他去世前不多几年回到德国。——257。
- 奥哲尔，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人，工会领袖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年任该委员会主席，1871年被开除出国际。——161、170、249。

## ba

- 巴尔策 (Balzer)——传教师，六十年代初期是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27、28。
- 巴伐利亚国王 (König von Bayern 1864—1886)——见路德维希二世。
- 巴枯宁，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Bakunin, Michail Alexandrowitsch 1814—1876)——在西欧的俄国流亡者，民主主义的政论家，1848—1849年参加德国革命，后来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敌人，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由于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第一国际。——168、349。
- 巴克莱 (Buckley)——英国工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70。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辩护人。——18、36、128、133、288。
- 巴札尔，圣阿芒 (Bazard, Saint-Amand 1791—1832)——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主义者，从1825年到1831年同安凡丹一起是圣西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30。

## bao

- 鲍尔，弗洛里安 (Paul, Florian)——西里西亚织工，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向国王请愿的一个代表团的领导人 (1864)。——117、254。
- 鲍姆加尔腾，海尔曼 (Baumgarten, Hermann 1825—1893)——自由主义历史学家，1872—1890年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205。

## bai

- 白拉克，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

1880)——不伦瑞克的商人和出版商，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212、213、233、264、266、295、296、298、331、333、343、350、353。  
 柏梅 (Böhm)——杜伊斯堡的铁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257。

## bei

倍倍尔，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21、22、32、85、174、228—230、246、258、265、266、270、308、309、320、321、323、325、327—330、333、335、337—339、341—344、346、347、351、352、357、362、364、366。

貝克尔，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4—1865)；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 (1872)；后在爱森纳赫派的一个机关报，《不伦瑞克人民之友》工作。——72、77、80、140、153、171、175、176、181—183、188、190、195、197、202、204、213—217。

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科伦地方法院候补法官和政论家；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的会员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理事，被选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伦安全委员会；《西德意志报》编辑 (1849年5月至1850年7月)，1850年以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2年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刑；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人，做过多特蒙德和科伦的市长。——85、102、201。

貝克尔，约翰·菲利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制刷工人，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的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曾以瑞士军官的身分参加反对宗得树德 (Sonderbund) 的战争，他是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他指挥巴登的人民自卫团；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共产主义者；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一位重要领袖，《先驱》杂志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94、142、155、183、187、202、249、289、349。

貝奈德克，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冯 (Benedek, Ludwig August von 1804—1881)——奥地利将军，1866年战争中是奥军最高司令官。——238。

## bi

毕希纳，路德维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格奥尔格·毕希纳的弟弟，医生，从事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作为哲学家是庸俗唯物主义者。——16、67、70、72、73、224、264。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科伦激进的政论家；1842—1843年是《莱茵报》撰稿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主要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51、59、85、201、269。

毕尔克利，卡尔 (Bürkli, Karl 1823—1901)——瑞士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曾参加第一国际。——349。

毕洛夫，汉斯·古伊多·冯 (Bülow, Hans Guido von 1830—1894)——德国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83。

毕舍，菲利浦·约瑟夫·本札曼 (Bucheze,

-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 圣西门的学生; 1848年任临时政府总理。——49, 54, 130。
-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esle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伦敦大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 激进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第一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主席。——161, 163。
- 俾斯麦侯爵, 奥托·冯 (Bismarc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11, 22—24, 62, 82, 89, 90, 92—98, 100—103, 106, 109, 111—120, 126, 148—151, 160, 171, 178, 184, 185, 199, 203, 204, 218—228, 230, 235, 238—240, 245, 252, 253, 257, 259, 260, 267, 271—273, 275, 282, 293, 322, 323, 338, 344, 353。
- 彼特森, 尼尔斯 (Petersen Niels)——丹麦的毛皮匠, 魏特林在瑞士的信徒。——297。

### bian

- 卜尼格先, 鲁道夫·冯 (Bennigsen, Rudolf von 1824—1902)——民族自由党政治活动家, 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创建人之一。——13, 68, 99, 224。

### bo

- 伯恩斯坦, 阿隆(笔名雷本斯坦) (Bernstein, Aaron [Pseudonym Rebenstein] 1812—1884)——民主主义政论家, 柏林《人民报》编辑, 有一个时期是犹太法学教师。——96。
- 博尔济希, 奥古斯特 (Borsig, August 1804—1854)——柏林奥·博尔济希机车和机器工厂的创建人(1836); 1841年

该厂制出第一台机车, 1853年开始向外国出口机车。——65, 320。

- 博伊斯特伯爵,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 (Beust, Friedrich Ferdinand, Graf von 1809—1886)——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反动国务活动家, 1849年任萨克森外交大臣, 1858—1866年任首相, 1867—1871年任奥地利首相。——109, 226, 228—231, 271, 293, 328。

- 波尔恩, 斯蒂凡 (Born, Stephan 1824—1898)——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参加过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代表。革命后流亡瑞士, 后至伦敦。——186。

- 波拿巴, 路易(拿破侖第三) (Bonaparte, Louis [Napoleon III.] 1808—1873)——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共和国总统(1848年至1852年), 法国皇帝(1852—1870)——109, 110, 115, 160, 219, 220, 225, 238—240, 242, 271—272, 293。

- 勃朗, 让-约瑟夫-路易 (Blanc, Jean-Joseph-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代表阶级调和, 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年8月逃亡伦敦, 在那里是小资产阶级流亡团体的领袖之一。——49, 54, 62, 64, 130, 132。

### bu

- 布赫尔, 洛塔尔 (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官吏, 政论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中间派左翼); 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拉萨尔的朋友;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麦在外交方面的助手。——52, 53, 57, 63, 65, 66, 95, 127, 130, 154, 171,

222、227。

布拉斯, 奥古斯特 (Braß, August 1818年生)——德国新闻工作者, 俾斯麦的拥护者, 《北德总汇报》的发行人。——106。

布兰肯堡 (Blanckenburg)——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 阿道夫·塔敦-特利格拉弗的女婿。——22。

布朗, 卡尔 (Braun, Karl 1822—1893)——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之一, 1884年以后是自由思想者党党员, 帝国议会议员。——336、337。

布莱希勒德, 格尔森·冯 (Bleichröder, Gerson von 1822—1893)——柏林银行家, 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对俾斯麦有过影响。——241。

布林德, 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是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81、188。

布龙, 卡尔·冯 (Bruhn, Karl von 1808年生)——曾任炮兵军官, 1836年是被逐者同盟的密使, 1848—1849年曾参加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巴登的起义, 1850年以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来是圣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汉堡《北极星报》的发行人。——81。

布隆能迈耶尔 (Bronnenmeyer)——七十年代是维尔滕堡邦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书记。——351。

布伦坦诺, 卢约 (Brentano, Lujo 1844—1931)——经济学家, 讲坛社会主义者。——315。

布罗克豪斯, 亨利希 (Brockhaus, Hein-

rich 1804—1874)——从1823年至去世为止是莱比锡弗·阿·布罗克豪斯出版社的领导人。——71。

## cha

查理一世 (Karl I. 1600—1649)——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1625—1649); 英国革命时期被处死。——112。

## ci

茨万齐格尔 (Zwanziger)——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彼得斯瓦尔道(西里西亚)的麻织工厂主。——117。

## da

达尔维克男爵, 卡尔·弗里德里希·莱因哈特·冯 (Dalwigk, Karl Friedrich Reinhard Freiherr von 1802—1880)——德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黑森首相(1850—1871)。——226。

达尔文, 查理 (Darwin, Charles 1809—1882)——192。

达姆尔, 奥托博士 (Dammer, Dr. Otto)——化学家,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副主席, 后来脱离工人运动。——24、26、28、32、77、80、85、126、139、142、152、175。

达乌, 路易-尼古拉斯, 奥尔施塔特公爵 (Davoust (或 Davout), Louis-Nicolas duc de Auerstaedt 1770—1823)——法国元帅。——137。

## dan

丹麦国王 (1848—1863)——见弗里德里希七世。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s-Jaques 1759—1794)——巴黎的律师,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 1792年8月10日以后任司法部长, 雅各宾党在国民会议中的代表, 因反对罗伯斯庇尔, 1794年4月5日被处死。——83。

## de

德尔, 威廉 (Dell, William)——改革同盟的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170。

德芬斯 (Devens)——埃森的地方长官。——268。

德克维茨, 古斯塔夫 (Deckwitz, Gustav)——不来梅的木器工人, 一度做过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138、233、234、254。

德雷斯巴赫, 奥古斯特 (Dreesbach, August 1844—1906)——木器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曼海姆的《巴登-普法尔茨人民报》的发行人, 1890—1893年, 1898—1906年是帝国议会议员。——353。

德姆勒尔, 阿道夫 (Demmler, Adolf 1804—1886)——施韦林的宫廷建筑顾问, 民主主义者, 后来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1877—1878年是帝国议会议员。——28、329。

德尼格斯, 海伦·冯 (Dänniges, Helene von 1911年死)——拉萨尔的情人。——153、154。

## di

迪尔, 弗里德里希 (Dürr, Friedrich)——奥格斯堡的机械师,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141。

迪斯累里, 本扎曼 (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1804—1881)——1867年后为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英国国务活动家

和作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青年英国集团; 先是托利党的, 后是保守党的领导人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52, 1858—1859 和 1866—1868); 首相 (1868, 1874—1880)。——115。

迪特曼 (Dittmann)——排字工人, 柏林工人协会的主席。——65、118、197。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f 1828—1888)——德国工人, 唯物主义哲学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职业是制革工人。——290。

## du

杜林, 卡尔·狄根 (Dühring, Karl Eugen 1833—1921)——庸俗唯物主义者, 实证主义者, 折衷主义者,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222、223、322。

## dun

敦克尔, 弗兰茨·古斯塔夫 (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出版商,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创始人之一; 拉萨尔的朋友。——17。

## duo

多尔格 (Dolge)——德累斯顿 1849 年五月起义的参加者, 被判死刑, 后减为六年徒刑, 后来在莱比锡做制造钢琴的工人。——24、57、58。

## en

恩格尔, 恩斯特 (Engel Ernst 1821—1896)——统计学家, 1860—1882 年任柏林普鲁士统计局局长。——125。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17、43、46、48、50、

130、136、155、168、178、179、183、186、188—191、194、195、202、273、290、310、338。

恩斯特二世(Ernst II. 1818—1893)——薩克森-科堡-哥达的公爵(1844—1893)。——83、109。

## fa

法赫尔,尤利烏斯(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德国自由貿易的拥护者,五十年代初期,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1850—1861年流亡英国;后来是进步党人。——174、197—199、206。

法斯特尔,貝托尔特(Feistel, Bethold)——柏林的印刷工人。——261。

法因,格奥尔格(Fein, Georg 1803—1869)——1833年因进行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而被迫逃亡;在《新苏黎世报》做过几年編輯;1848年回到德国,1849年又逃亡瑞士。——86。

## fei

菲尔肖夫,魯道夫(Virchow, Rudolf 1821—1907)——杰出的病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达尔文进化論的反对者,进步党人,帝国議会議員(1880—1893)。——211。

費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激进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预备議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左派);后来是自由党人。——327。

費希特,約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54、99、100。

## fen

芬克男爵,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Freiherr von 1811—1875)——普魯士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右派的領袖之一;后来是老自由党人。——62。

## fu

符尔芬(Wulffen)——六十年代曾任柏林市法院的法官。——123。

福尔肯貝克,麦克斯·馮(Forckenbeck, Max von 1821—1892)——民族自由党人,帝国議会議長(1874—1879)。——257、259、260。

福格尔(Vogel)——柏林的药剂师,拉薩尔分子,1869年是爱森納赫党的創立人之一。——332—335。

福格特,奥古斯特(Vogt, August 約 1830—1883)——鞋匠,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柏林反对派小組的成員,第一国际會員。——105。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吉森大学教授,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预备議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左派);1849年是帝国临时摄政之一;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凶恶敌人;后来成为拿破侖第三的密探。——188。

弗尔斯特林(Försterling 1827—1872)——德累斯頓的銅匠,拉薩尔的拥护者,后来是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所建立的工人联合会的名义上的領袖人,北德意志帝国議会議員。——139、153、182、215、229、233、234、254、255、264、270、274。

弗賴塔克, 奧托 (Freytag Otto)——萊比錫的律師, 1872 年案件中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和赫普納爾的辯護人, 後來, 通過募捐、建築和其他活動給黨做了不少工作。——246。

弗兰克尔, 列奧 (Frankel, Leo. 1844—1896)——德籍匈牙利人, 金匠, 左派蒲魯東主義者, 第一國際會員, 巴黎公社的勞動部長, 後來是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通訊書記, 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297、339。

弗兰茨, 雅科布 (Franz, Jakob 1846—1902)——慕尼黑的排字工人,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鼓動家, 《無產者》的編輯, 1870 年參加愛森納赫派, 1878 年至 1901 年住在美國。——326、357。

弗兰茨·約瑟夫一世 (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奧地利皇帝 (1848—1916)。——91。

弗雷塞, 尤利烏斯 (Fresse, Julius)——1868—1870 年是斯圖加特《民主通訊》的發行人。——352。

弗里茨舍,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烟草工人, 全德工人聯合會創始人之一, 德國雪茄烟工人的機關報《使者》的編輯, 1868 年起是北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 1877—1881 年是帝國議會議員, 1881 年流亡美國。——12、21—24、26、77、139、173、174、179、182、213—215、229、230、257、298、302、306、307、313—317、323、333、335、337、341、359。

弗里德蘭 (Friedland)——商業顧問, 拉薩爾的姊夫。——171、172。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王)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普魯士國王 (1740—1786)。

——185、219、293。

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III. 1831—1888)——德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 (1888 年 3 月 9 日至 6 月 15 日)。——91。

弗里德里希七世 (Friedrich VII. 1808—1863)——丹麥國王 (1848—1863)。——108。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提安·奧古斯特 (弗里德里希八世) (Friedrich Christian August (Friedrich VIII.) 1829—1880)——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宗得堡-奧古斯滕堡公爵。——108、113、218、221、245。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國王 (1840—1861)。——119。

弗羅默, 卡爾·弗兰茨·埃貢 (Frohme, Karl Franz Egon 1850—1933)——社會民主黨人, 1875 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 1890 年以後是《漢堡回聲》的總編輯, 1881—1924 年是帝國議會議員。——353。

傅立叶, 弗朗斯瓦·瑪麗·沙爾 (Fourier, François-Marie-Charles 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54、169。

## gai

蓋布, 奧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社會民主黨人, 1875 年以前是愛森納赫派, 1874—1876 年是帝國議會議員。——268、331、333、335、344、353。

## gao

高封納, 朱澤培 (Govone, Giuseppe 1825—1872)——意大利將軍, 陸軍大臣 (1869—1870)。——220。

## ge

歌德, 約翰·沃尔弗岡·馮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112。

格爾拉赫, 恩斯特·路德維希·馮 (Gerlach, Ernst Ludwig von 1795—1877) ——普魯士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保守黨創始人之一。——149。

格拉博夫, 威廉 (Grabow, Wilhelm 1802—1874) ——普楞茨勞的市長, 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1862—1866年是普魯士眾議院議長。——204。

格萊斯頓, 威廉·尤爾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不列顛的國務活動家, 托利黨人, 後來是皮爾黨人,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是自由黨領袖之一; 財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 1880—1885, 1886 和 1892—1894)。——163。

格羅伊利希, 海爾曼 (Greulich, Hermann 1841—1925) ——瑞上的社會民主黨人。——349。

格奈斯特, 亨利希·魯道夫·海爾曼·弗里德里希·馮 (Gneist, 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 von 1818—1895) ——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和法學家, 普魯士眾議院和帝國議會議員。——89, 202, 260。

## gui

圭茨, 阿伯爾特·威廉·古斯達夫 (Goetz, Albert Wilhelm Gustav 1821 年生) ——鑄造廠廠主, 萊比錫工人教育協會 (1861) 創始人之一, 後來是民族自由黨的帝國議會議員 (1890—1893)。——

25。

圭茨, 斐迪南 (Goetz, Ferdinand 1826—1916) ——醫生, 1848年的革命者, 資產階級體育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北德意志帝國議會中是薩克森人民黨議員, 1887年至1890年在帝國議會中是民族自由黨人。——270。

## ha

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 索菲婭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 ——拉薩爾的女友和擁護者。——94, 114, 115, 151, 154, 156, 171, 172, 176, 177, 181, 182, 188, 201, 202, 223, 231—234, 248, 254—258, 262, 263, 320, 327, 329, 341—344, 357, 358, 360。

哈爾科特, 弗里德里希 (Harkort, Friedrich 1793—1880) ——萊茵的工業家, 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後為北德意志帝國議會和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 (進步黨)。——268, 270。

哈爾姆, 弗里德里希 (Harm, Friedrich 1844—1905) ——愛北斐特的織工, 後來當商人, 社會民主黨黨員, 1875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 帝國議會議員 (1884—1893)。——353。

哈恩, 路德維希·恩斯特 (Hahn, Ludwig Ernst 1820—1888)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地方通訊》的編輯, 1884年以前是政府新聞局局長。——82。

哈塞 (Haase) ——博爾濟希工廠的職員, 進步黨員。——65。

哈賽爾曼, 威廉 (Hasselmann, Wilhelm 1844年生)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 1874—1876, 1878—1881年是帝國議會議員; 1880年, 作為無政府主義

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299,323。  
 哈森克萊維爾, 威廉 (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 ——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以前是拉薩尔分子,1871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74—1877,1879—1888年是帝國議會議員。——102,195,215,232,235,245,256,268,270,298,323,333,337,360,361。

### hai

海耳特, 弗里德里希·威廉 (Held, Friedrich Wilhelm 1813—1872) ——政論家;1831年任普魯士少尉,后当演員,后来是多种激进派报刊的发行人和編輯。——295。

海尔維格,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erwegh, Georg Friedrich 1817—1875) ——德国著名詩人,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82,86,87,173,183,187,189,200。

海曼 (Heymann) ——法蘭克福的木器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創始人之一。——70,75,77,140。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 ——激进的政論家,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1849年曾短期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移居美国。——81。

### han

罕勒 (Haele) ——律師。——154。

汉澤曼, 大卫·尤斯图斯 (Hanseman, David Justus 1790—1864) ——大資本家,萊茵自由派資产階級領袖之一,

1847年是聯合議會議員;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同年3月至9月任普魯士財政大臣,推行同反革命力量妥協的叛賣政策。——117。

### hao

豪威耳, 乔治 (Howell, George 1833年生) ——1859年以后是英国工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861年任改革同盟的書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70。

### he

赫普納尔, 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 ——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以前屬愛森納赫派,《人民国家报》編委,1872年萊比錫叛國案的被告,后来流亡美国。——338,344。

赫斯, 莫泽斯 (Heß, Moses 1812—1875) ——德国政論家,《萊茵报》的創辦人和撰稿人之一;四十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后来成了拉薩尔分子。——83,133,183,187,189,190,255,349。

### hei

黑尔斯, 約翰 (Hales, John) ——英国工人,工会會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6—1872)。——170。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54。

### hu

胡貝尔, 維克多·艾梅 (Huber, Victor-Aimé 1800—1869) ——保守的政論家和教授,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創始人之一。——9,34,81,82。

\* 此处释文为譯者所加。

胡登, 烏尔利希·馮 (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人文主义者, 詩人, 貴族起义时期(1522—1523)德意志帝国直屬騎士阶层的理論代表。——99。

## huo

霍尔托尔普, E. G. (Holtorp, E. G.)——第一国际的波兰通訊書記。——162。

霍弗斯特騰, 約翰·巴普提斯特 (Hofstetten, Johann Baptist)——曾任軍官, 拉薩尔分子, 与施韦澤同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創办人和編輯。——151、178、183、206、213、297、299、331、332、335。

霍伊茨 (Heuts)——柏林的鞋匠, 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105。

## ji

济貝尔, 亨利希·馮 (Sybel, Heinrich von 1817—1895)——資產階級历史著作家和政治活动家。——89、259。

济格勒, 古斯塔夫 (Siegle, Gustav 1840年生)——巴登萊腓和苏打工厂厂主, 1887—1903年为帝国議會議員(民族自由党人)。——324。

基尔希納 (Kirchner)——希尔德斯海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309。

基希尼亚維 (Kichniawy)——杜塞尔多夫的排字工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創始人之一。——80。

## jia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革命的領袖, 在爭取意大利独立的斗争中, 是一支志願軍的

卓越將領。——69、238。

## jin

津格尔, 鮑尔 (Singer, Paul 1844—1911)——社会民主党人, 1885年起是党执行委员会委員, 1884—1911年是帝国議會議員。——338。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約翰 (Kinkel, 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詩人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魯士法庭判处終身監禁, 后逃出監獄, 流亡英国; 伦敦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領導人之一; 曾进行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81、329。

## ka

卡佩尔, 奧古斯特 (Kappll, August 1854年生)——漢堡的木匠,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 1877—1878年是帝国議會議員, 八十年代退出工人运动; 在美国住了一个时期。——353。

卡佩尔, 奧托 (Kappll, Otto 1896年死)——漢堡的木匠, 前者的兄弟, 1875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 八十年代退出工人运动。——353。

## kan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17。

康普豪森, 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科伦銀行家, 萊茵自由派資產階級領袖之一; 1847年是联合議會議員; 1848年3月至6月任普魯士首相, 推行同反革命力量妥協的叛卖政策。——268。

## kao

考威尔·斯特普尼, W. F. (Cowell Stepney, W. F. 1820—1872)——英国食利者,改革同盟的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70、349。

## ke

柯恩,詹姆斯(Cohn, James)——英国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联合会主席;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170。

柯普兰(Copeland)——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70。

科尔克(Kolk)——六十年代任柏林市法院法官。——123。

科尔平,阿道夫(Kolping, Adolf 1813—1865)——爱北斐特(后在科伦)的天主教传教师,四十年代创立了第一批天主教的帮工协会。——9。

克尔施(Kälsch)——美因兹的鞋匠,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324、327。

克拉森-卡佩尔曼(Classen-Kappellmann)——六十年代任科伦市参议员,进步党人。——203、204、241。

克莱因(Klein)——爱北斐特的工厂工人,施韦泽创立的工会联合会主席团委员。——317、341。

克雷克尔,尤利乌斯(Kräcker, Julius 1839—1888)——布勒斯劳的鞋匠,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后来是爱森纳赫分子,从1881年至去世为止是帝国议会议员。——365。

克林格斯,卡尔(Klings, Karl)——佐林根的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80、137、183。

克伦威尔,奥列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领袖;1653—1658年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主。——112。

克内弗尔(Knöfel)——鞋匠,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主席。——228、229、246。

克尼佩尔多林,伯恩哈特(Knipperdolling(Knipperdollinck), Bernhard 1536年被处死)——布尚,明斯特尔的再洗礼派。——199。

克特勒尔男爵,威廉·埃曼努尔(Kettler, Wilhelm Emanuel, Freiherr von 1811—1877)——美因兹的主教。——148。

## la

拉登多夫,奥古斯特(Ladendorf, August)——普楞茨劳一个参议员的儿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革命时代长期担任柏林一个国民协会的主席;1854年被普鲁士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多年监禁,后来是德国人民党党员,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86、224、264、265、309、329。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17、18、24、26、27、29、32—88、93—156、165、168、170—183、186—188、192—197、199、201、205—213、216、222、223、228、232、233、247、254、255、262—264、270、283、293、294、297—299、301、302、307、312、313、323、324、341、347、352、355。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 Eduard 1829—1884)——律师和政论家,民族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336、340。

## lai

賴克哈特(Leickhardt)——木匠,汉堡和斯图加特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鼓动员。——327、363。

賴騰巴赫,尤恩(Reitenbach, John)——东普鲁士普利肯的民主主义者。——180。

賴辛海姆,列翁諾尔(Reichenheim, Leonor)——西里西亚的工厂主,进步党的領袖之一。——117、118、199。

賴因德斯,克拉斯·彼得斯(Reinders, Klaas Peters 1879年死)——布勒斯劳的木器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78—1879年是帝国議会议员。——353。

賴因克,彼得·阿道夫(Reineke, Peter Adolf 1818年生)——柏林的卫生顧問,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8年以前是北德意志帝国議会议员。——256、268、270、274、298。

萊麦尔,奥托(Reimer, Otto 1841—1892)——阿尔托那的雪茄烟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74—1876年为帝国議会议员。——353。

萊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15、293。

## lang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政論家,写过一本論工人问题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书。——16、17、44—46、54、101、103、136、174、180、185、192、193、199、206、212、216、226、231、264、

308、310、328。

## lao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埃尔兰根和海德尔堡高等学校的教授,1826年至1832年发表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71。

## le

勒济希(Lässig)——德累斯顿的鞋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創始人之一。——77、80。

勒·吕貝,維克多(Le Lubez, Victor 約1830年生)——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6年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誹謗总委员会,被开除出第一国际。——162。

勒文施坦,加布里埃尔(Löwenstein, Gabriel 1825—1911)——紐伦堡的花边工人,菲尔特工人协会主席,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以前是爱森納赫派。——325、344。

勒維,古斯塔夫(Lewy, Gustav)——杜塞尔多夫的商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拉薩尔的朋友和拥护者。——57、59、62、80、93、182、215。

勒泽尔,彼得·盖尔哈特(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科伦工人协会副主席,《自由、友爱、劳动报》发行人;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2年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主要被告之一;后来成为拉薩尔分子。——201。

## li

李比希(Liebisch)——裁縫,全德工人联合会薩克森的鼓动员(1868—1869)。

—324, 327, 329,

李卜克内西, 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106, 175, 178—181, 183, 186—188, 202, 204, 228—230, 246, 258, 270—275, 290, 308, 312—315, 321, 323, 327, 329—330, 333—335, 338—341, 343, 344, 346, 349—352, 365。

李嘉图, 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62, 64, 134, 287, 288。

李希特尔, 欧根(Richter, Eugen 1838—1906)——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德国进步党的领袖; 为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进行过斗争。——74, 85, 91, 206, 241, 270。

里廷豪森, 摩里茨(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民主主义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会员和安全委员会委员; 《新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9年是《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之一, 后来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59, 256, 349。

### lie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魏玛的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在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三年要塞监禁; 1856年起侨居伦敦,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62, 265, 349。

列文, J. (Le vien, J.) ——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支部的主要成员。——235。

### long

龙格(Runge)——柏林市参议员。——361。

### lu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57, 99。

路特希尔德, 卡尔(Rothschild, Karl 1820—1886)——1855年后和他的兄弟共同领导法兰克福路特希尔德银行, 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参议员和普鲁士贵族院参议员。——261。

鲁克拉夫特, 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会会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年退出国际, 后来成了自由党人。——170, 349。

### lü

吕德尔斯, 于尔根(Lüders, Jürgen)——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主要成员。——138。

吕普克尔特(Lübker)——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8年在柏林成立木工工会。——302, 335, 340, 341, 356, 359。

吕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民主主义军事著作家, 1860年以参谋长的身分参加过加里波第的远征。——69, 86, 154, 171, 183, 187, 189, 202。

### luo

洛贝尔图斯-雅格左夫, 约翰·卡尔(Ro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普鲁士大地主和经济学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

- 左翼的領袖。——44、50、52、53、63、64、70、73、76、130、146、223。
- 洛茨(Lotz)——登北斐特的工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會員。——143。
- 洛厄佛，路德維希(Loewe, Ludwig 1837—1886)——路德維希·洛厄佛兵工廠公司創辦人，1876年起是普魯士眾議院進步黨議員，1878年起是帝國議會議員。——26、32、59、65。
- 洛厄佛，威廉(Loewe, Wilhelm 1814—1886)——卡爾貝的醫生，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1849年是殘余議會的議長，流亡到1861年為止，1867—1881年是北德意志帝國議會和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進步黨)，1884年以後是民族自由黨人。——269。
- 羅伯斯庇爾，馬克西米利安-瑪麗-伊西多爾·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Marie-Isidor de 1758—1794)——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活動家，1793年是雅各賓派的領袖，1793至1794年是革命政府的首腦。——83。
- 羅恩伯爵，阿爾勃萊希特·泰奧多爾·埃米爾(Roon, 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on 1803—1879)——普魯士元帥和陸軍大臣(1859—1873)，實行普魯士軍隊的改革。——202。
- 羅，哈里埃特(Law, Harriette)——1867年起是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70。
- 羅赫納，格奧爾格(Lochner, Georg 約1824年生)——德國工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和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擁護者和朋友。——162。
- 羅勒爾(Roller)——速記員，1867—1869年是全德工人聯合會書記。——264、299、331。
- 羅斯梅斯勒，埃米爾·阿道夫(Roßmäßler, Emil Adolf 1806—1876)——自然科學家和作家，民主主義者，1848—1849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左派)，1850年以後在萊比錫同工人運動有密切接觸。——16、17、25、28、57、58、62、85、246、247。
- 羅雪爾，威廉(Roscher, Wilhelm 1817—1894)——德國庸俗經濟學家。——64、130、288。

## ma

- 馬爾薩斯，托馬斯·羅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國牧師和經濟學家，提出人口過剩的反動理論，為資本主義使勞動人民生活貧困辯解。——45、46、192、450。
- 馬考萊勳爵，托馬斯·巴賓頓(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Lord 1800—1859)——英國歷史學家，國務活動家，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5。
- 馬克思，卡爾(Marx, Karl 1818—1883)——17、43—48、50、51、54、69、100、106、109、111、128、130—136、142、155、156、159、162、163、168、170、178、179、183、186—188、190、191、195、200、202、209、213、222、227、276—296、299—301、305、310、313、317—320、328、336、350—352。
- 馬拉斯特，阿爾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國共和主義者，政論家，1848年是臨時政府成員。——203。
- 馬丁(Martin)——阿什的織襪工人，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140。
- 馬丁尼(Martiny)——考克門的律師，全

德工人联合会創始人之一，不久又脫离工人运动。——80、82、202、257。

馬志尼，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之一；1849年是羅馬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首腦，1850年是倫敦“歐洲民主派中央委員會”的組織者之一；五十年代初企圖求得波拿巴主義者集團的援助。——163。

### mai

迈斯特尔，亨利希·恩斯特·奥古斯特 (Meister, Heinrich Ernst August 1842—1906)——1866年后是哈姆的雪茄烟工厂主，社会民主党人，1884—1906是帝國議會議員。——353。

### men

門德，弗里茨 (Mende, Fritz 1879年死)——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所創立的“拉薩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264、328、341、342、381。

### mei

梅茨內，泰奧多爾 (Metzner, Theodor 1830—1902)——鞋匠，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后来是愛森納赫派。——80、81、105、175、182、344。

美因茲主教 (Bischof von Mainz)——見克特勒爾，威廉·艾曼努爾。

### mi

米尔納，喬治 (Milner, George)——愛爾蘭的工人，从前是憲章主義者，1868—1872是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70。

米凱爾，約翰奈斯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普魯士銀行家，民族自由黨人；青年時代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歷任帝國議會議員 (1867—1877和1887—1890)，財政大臣 (1890—1901)。——336。

米拉波，奧諾萊-加布里埃爾 (Mirabeau, Honoré-Cabriel 1749—1791)——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貴族反對派和大資產階級的領袖。——68。

米勒，亨利希·馮 (Mühler, Heinrich von 1813—1874)——普魯士文化大臣 (1862—1872)。——16。

米謝利斯，奧托 (Michaelis, Otto 1826—1890)——與尤斯圖斯·法赫爾同是《國民經濟、政治和文化史季刊》的發行人。——206、269。

### miao

繆勒，泰奧多爾 (Müller, Theodor 1865年死)——法蘭克福工人教育協會的領導人。——16、67、72、75、140。

### mo

莫爾 (Moll)——佐林根的研磨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143。

莫爾爵士，托馬斯 (More (Morus), Sir Thomas 1478—1535)——英國政治活動家 (上院議長)，人文主義作家，空想共產主義的代表。——130。

莫里斯 (Maurice)——英國工會會員，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70。

莫特勒，尤利烏斯 (Motteler, Julius 1838—1908)——愛森納赫黨的創始人之一，1879年至1890年由於組織將秘密文件由瑞士運至德國，而得到“紅色郵

政局长”的外号，帝国議會議員(1874—1878, 1903—1907)——265、328、344、348。

### mu

穆罕默德 (Mohammed 約 570—632) ——阿拉伯的宗教創始人。——199。  
穆勒，約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英國哲學家，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者。——64。

### na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國皇帝 (1804—1814 和 1815)。——137。  
拿破侖第三——見波拿巴·路易。

### nai

奈弗 (Neff) ——慕尼黑的排字工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鼓動員。——326。

### ni

尼德爾來 (Niederley) ——萊比錫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80。

### nuo

諾特榮克，彼得 (Nothjung, Peter 1821—1880) ——裁縫，1848 年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和科倫工人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49 年 5 月愛北斐特起義的參加者；1851 年擔任共產主義者同盟特使時被捕，在 1852 年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中被判六年監禁，後來成了拉薩爾分子。——81。

諾伊曼 (Neumann) ——柏林的醫生，拉

薩爾的擁護者。——106。

### ou

歐文，羅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169。

### pan

潘塞 (Panse) ——鞋匠，1862 年成立的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同盟的領導人。——8。

### pei

佩爾，奧古斯特 (Perl, August)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1866—1867 年任該會主席，漢堡工人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27、28、58、77、80、110、138、142、182、232—234、242、254、255、257、262、306、307、333。

### peng

彭霍爾斯特，列翁哈特·馮 (Bonhorst, Leonhard von 1840 年生) ——建築師、社會民主黨人，1871 年不倫瑞克叛國案的被告，後來脫離政治活動。——324、327、333、343、350、357。

### pi

皮爾辛 (Pielchen) ——六十年代是柏林市法院的法官。——123。

### pu

普方庫赫，威廉 (Pfanckuch, Wilhelm 1841—1923) ——卡塞爾的木器工人，社會民主黨人，1875 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帝國議會議員 (1884—1887, 1898—1907, 1912—1918)。——

353, 360。

普菲费尔, 爱德华 (Pfeiffer, Eduard)

——斯图加特的工业家。——324。

普福, 路德维希 (Pfau, Ludwig 1821—

1894)——抒情诗人和艺术批评家, 普鲁士和俾斯麦的积极反对者。——224。

普腊斯特 (Praast)——汉堡的鞋匠, 全德

工人联合会会员, 后来属爱森纳赫派。

——312。

普林斯-史密斯, 约翰 (Prince-Smith,

John 1809—1874)——资产阶级国民

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党的创始人,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后来是帝国议会议员。

——206。

普鲁士国王 (1861—1888)——见威廉一

世。

普鲁士王储 (1861—1888)——见弗里德

里希三世。

普罗伊塞, 卡尔 (Preuße, Karl)——柏林

工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17、

118。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

政论家,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奠基人; 1848年是立宪会议的代表。——

130, 160, 186。

## qi

齐格勒, 弗朗茨 (Ziegler, Franz 1803—

1876)——1840年起是勃兰登堡市长,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中间派左翼), 由于支持拒绝纳税决议受到

控告, 被免职并被判要塞监禁, 1865年

起又是普鲁士议员, 后来是帝国议会议

员。——57, 78, 130, 203, 223, 225,

232, 241。

## rong

荣克, 格奥尔格·哥特洛普 (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科伦的陪审

官、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青

年黑格尔分子; 1842年是《莱茵报》发

行人之一;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

左派的一位领袖;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

人。——51。

荣克, 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

1901)——瑞士工人, 1864年至1872

年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瑞士支部

的书记, 1872年反对海牙决议和总委

员会。——162, 249, 349。

## sa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 (Herzog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844—1893)

——见恩斯特二世。

萨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64。

## sha

沙皇 (1855—1881)——见亚历山大二世。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15。

## sheng

圣西门伯爵, 克劳德-昂利·德·鲁夫洛

瓦 (Saint-Simon, 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1760—1825)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49, 54,

130, 169。

## shi

施腊普斯 (Schraps)——律师, 小资产阶级

- 級民主主义者，北德意志帝国議會議員。——246、258。
- 施林格曼，萊因霍德 (Schlingmann, Reinhold)——出版商，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106。
- 施米特，朱利安 (Schmidt, Julian 1813—1886)——新聞工作者和文学史家，同古斯塔夫·弗賴塔克一起主持《边境使者》杂志(1848—1860)，1862—1863年是《柏林总汇报》总編輯。——97、128。
- 施納貝爾，亨利希 (Schnabel, Heinrich)——西里西亞的織工，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257。
- 施皮爾，沙姆埃爾 (Spier, Samuel 1838—1903)——沃耳芬比特耳的教師，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克委员会副主席(1869)，1871年不伦瑞克叛国案的被告。——349、350。
- 施坦納，基利安 (Steiner, Kilian)——斯图加特的工业家。——324。
- 施坦納特 (Steinert)——全德工人联合会萊比錫支部的领导人。——229。
- 施特方尼，弗里德里希 (Stephany, Friedrich)——柏林郊区手工业工人协会主席，后来是資產階級新聞工作者。——18、206。
- 施特賴特，費多爾博士 (Streit, Dr. Fedor 1820—1904)——律師，1848年的革命者，民族聯盟的創始人之一，科堡《德國工人总汇报》的發行人(1863—1866)。——29。
- 施特勞斯 (Strauß)——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雪茄烟商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創始人之一。——80、140。
- 施特雷克富斯，阿道夫 (Streckfuß, Adolf 1823—1895)——作家，1848年曾参加民主运动，1851年因写《法国大革命》一书被控叛国，但被宣判无罪。——20、23、26、57、59。
- 施图姆-哈尔貝克男爵，卡尔·斐迪南 (Stumm-Halberg, Karl Ferdinand, Feiherr von 1836—1901)——薩尔区的鋼鐵工业巨头，帝国党的創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帝国議會議員(1867—1881, 1889—1901)——336、337。
- 施魏格爾特 (Schweigert)——加里波第軍隊中的上尉。——69。
- 施韦泽，約翰·巴普提斯特·馮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1834—1875)——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律師；1867—1871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發行人和总編輯，北德意志帝国議會議員，支持俾斯麥的政策，1871年以后脫离政治生活。——83、84、140、151、153、175、177—180、183—194、200、201、204—211、213、214、216、223、227、228、233—237、245、246、253—257、259、260、262、264、266、268—275、289、292、295、297—301、303—307、311—325、329—345、347—353、356—362、364—367、372、374。

## shou

寿普 (Schob)——萊茵河畔米尔海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曾創立裁縫工会。——257、302。

## shu

叔本華，阿尔都尔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德國唯心主义庸俗哲学家。——83。

舒曼 (Schuhmann)——柏林的鞋匠，1868—1869年是全德工人联合会鼓动

員。——324、327、329、335。

舒尔采-德里奇, 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 (-Delitzsch), Franz-Hermann 1808—1883)——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左翼); 德国合作事业的创始人, 宣传由工人节约资金建立生产合作社;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导人之一。——9、17、23、25、28、29、32、34、37、49—51、59—62、65、70、74—76、82、85、99、101、104、105、117、118、121、128、137、142、148、149、173、174、192—194、197—199、205—209、212、298、315、316、319、320、324、325、337、352、354。

### si

斯密, 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64、280、287、288。

斯特腊福德伯爵, 托马斯·温特沃思(Strafford, Thomas Wentworth, Earl of 1593—1641)——查理一世时期英国国务活动家。——112。

斯托尔, 卡尔·威廉(Stolle, Karl Wilhelm 1842—1918)——格劳豪附近的盖绍的旅店主和园艺家, 《格里米乔市民和农民之友》的发行人之一(1870—1878), 帝国议会议员(1881—1887, 1890—1918), 1917年后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344。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冯(Struve, Gustav von 1805—1870)——律师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联邦共和主义者; 1848年是预备议会议员, 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逃亡至英国, 后来

到了美国; 站在北方各州一边参加了美国内战。——29。

### tao

陶舍尔, 列翁哈特(Tauscher, Leonhard)——奥格斯堡的排字工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员, 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326、327、357。

### te

特耳克, 卡尔·威廉(Tölcke, Karl Wilhelm 1817—1893)——拉蓬尔分子, 短时间(1865)担任过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2、195、196、215—217、231—234、245、254、262、298、300、323、330、333、335、343—346、353—356、360。

特韦斯腾, 卡尔(Twesten, Karl 1820—1870)——1845年以后任柏林市法院顾问, 1861年以后是普鲁士众议院议员(进步党)。——223、260、270。

### tu

图赛奈尔, 阿尔丰斯(Toussenel, Alphonse 1803—1885)——法国政论家, 傅立叶主义者。——130。

### tuo

托伦, 昂利·路易(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工人,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 蒲鲁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期间投入凡尔赛分子一边; 后来是参议员。——161。

### wa

瓦尔(Wahl 1866年死)——奥格斯堡的剪布工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212.

瓦尔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柏林最高法院顧問, 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左派領袖之一和副議長, 1849年是第二議院議員, 后来是进步党党员。——109、225、241。

瓦尔顿, A. (Walton, A.)——建筑师, 改革同盟主席, 1867年起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70。

瓦尔兰, 路易-欧仁 (Varlin, Louis-Eugène 1830—1871)——釘书工人, 六十年代是法国工人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左派蒲魯东主义者; 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 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 后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348。

瓦尔斯特 (Walster)——見奧托-瓦爾斯特。

瓦尔特希, 卡尔·尤利烏斯 (Vahlteich, Karl Julius 1839—1915)——社会民主党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創始人之一, 1869年轉入爱森納赫派, 帝国議會議員(1874—1876, 1878—1881), 1881年流亡美国。——12、21—24、26、28—30、32、77、80、81、101、104、105、139、144、145、152、153、171、175、183、216、344。

瓦盖納, 海爾曼 (Wagener, 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論家, 俾斯麦的拥护者。——22、117、118、149、150、199、223、241、271、275、322、336。

瓦格納, 阿道夫 (Wagner, Adolph 1835—1917)——經濟学家, 1878年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創始人, 俾斯麦政策的拥护者。——327、349,

瓦克納格爾, 威廉 (Wackernagel, Wilhelm 1806—1869)——愛北斐特的德国語言学家, 后来在巴塞尔当教授, 1863年发表《第三階級的一个非‘工人’的初选人致斐迪南·拉薩尔先生的公开信》。——73、82。

瓦滕斯累本伯爵, 亚历山大 (Wartensleben, Alexander, Graf von 1807—1883)——波美拉尼亚的地主;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中間派)。——211。

## wei

韦尔凱尔 (Welcker)——法兰克福的皮革工人, 拉薩尔的拥护者。——140、174、230、261。

韦斯顿, 約翰 (Weston, John)——英国工人, 罗伯特·欧文的拥护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70。

維爾克特, 路德維希 (Würkert, Ludwig 1800—1876)——传教师,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由于参加1849年的五月起义, 被判四年懲役,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72、257。

維爾姆斯, 爱德华 (Willms, Eduard)——全德工人联合会書記。——80、137、144、153、155、171、181—183、232—235。

維利希, 奧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曾任普魯士少尉, 由于政治信仰脱离軍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是一个志願軍团的指揮官;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同沙佩尔一起是反馬克思的宗派集团的領袖; 1853年流亡美国, 在美国内战中任北方各州的將軍。——329。

威尔特, 麦克斯 (Wirth, Max 1822—1900)——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温和的保护关税论者, 凯雷的信徒。——18、67、70、72、73、173。

威廉斯 (Williams)——英国合作社里的领导干部,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70。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 (1861—1888) 和德国皇帝 (1871—1888)。——92、112、113、116—118、126、144、147、195、240。

魏斯, 古伊多 (Weiß, Guido 1822—1899)——民主主义政论家, 《柏林改革》和《天平》的总编辑。——187、203、295、339。

魏特林, 克利斯提安·威廉 (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裁缝;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12、62、297。

### wen

文特尔 (Winter)——律师, 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861)。——25、58。

### weng

翁鲁, 汉斯·维克多·冯 (Unruh, Hans Victor von 1806—1886)——普鲁士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右翼领袖之一, 10月起任该议会议长; 后来是进步党创始人之一, 再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19、23、24、62、203。

### wo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 (f), Ferdinand 1812—1895)——新闻工作者, 1846—

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后来流亡巴黎和伦敦,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站在马克思一边, 后来脱离政治生活。——162、163。

沃尔弗, 鲁伊治 (Wolff, Luigi)\*——马志尼的秘书, 曾参加加里波第战役, 1864—1865年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后来被查明是波拿巴主义者派来的奸细。——153。

### wu

乌兰德, 路德维希 (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诗人和小说家。——15。

乌利希 (Uhlich)——传教师, 六十年代在马格德堡工人教育协会工作。——18、265。

乌特克, 亨利希 (Wuttke, Heinrich 1818—1876)——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大德意志党的创始人之一。——63、139、183、187、206、229、230。

### xi

希尔曼, 胡果 (Hillmann, Hugo)——1849年曾在爱北斐特参加五月起义,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属爱森纳赫派。——12、59、77、80、137、142、182、195、201、215、216、232—235、254、256、257、344、365。

希尔施, J. M. (Hirsch, J. M.)——爱尔福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要会员, 后来属爱森纳赫派。——235、255、263、333、334、344。

\* 原书缺, 译者补。

希尔施, 卡尔(Hirsch, Karl 1841—1900)  
——社会民主党人, 爱森纳赫党的创始人之一, 1871年以前是多种党报的编辑, 后来是社会民主党报刊的驻巴黎记者, 1878—1879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出版《灯笼》。——338, 344, 346, 364。

希尔施博士, 麦克斯(Hirsch, Dr. Max 1832—1905)——经济学家, 希尔施-邓克尔工会的创始人之一, 1869年至1893年是议员(先属进步党, 后属自由思想人民党)。——18, 85, 174, 266, 314—316, 319, 320, 337, 359, 362, 366。

席尔特巴赫(Schildbach)——进步党人, 六十年代曾参加莱比锡工人运动。——58。

西姆森,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冯(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von 1810—189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議員和議長(1848年12月至1849年5月), 属于中間派右翼; 第二议院議員(左派); 德意志帝国議會議長(1871—1874)。——89, 275。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 并把小生产理想化。——222。

### xiao

肖, 乔治·伯纳(Shaw, George Bernard 1856—1950)——爱尔兰諷刺作家和剧作家, 费边社社員。——170。

### xie

謝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夫·馮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德国哲学家, 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123。

謝林, 海爾曼·馮(Schelling, Hermann von 1824—1908)——前者之子, 普鲁士法学家和国家官吏, 柏林市法院檢察官(1861—1863), 普鲁士司法大臣(1879—1889)。——123, 126。

謝普勒(Scheppler)——美因兹的钟表工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 后来是进步党黨員。——70, 77, 80, 140。

### xu

許尔斯曼(Hülsmann)——六十年代任伊塞隆市市長。——195, 196, 232。

### xue

雪萊, 派尔希·毕希(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論者。——83。

### ya

雅科比, 約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科尼斯堡的医生, 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坚决的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預备議會議員和普鲁士国民議會左派領袖之一; 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和第二议院議員(极左派); 后来是俾斯麦政策的反对者, 1872年起是社会民主党黨員。——111, 180, 241, 243, 244, 294—296, 309, 338, 339, 361, 362。

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1818—1881)——俄国沙皇(1855—1881)。——110。

**yang**

楊納施 (Jannasch)——馬格德堡大學教授, 第一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的代表。——349。

**yao**

約克, 泰奧多爾 (York, Theodor 1830—1874)——木器工人, 社會民主黨人, 1869年以前是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 後來是愛森納赫黨人。——27、32、77、80、138、145、175、182、213、233、257、262、323、331、333、343、353、364、365。

**yi**

伊岑普利茨伯爵, 亨利希 (Itzenplitz, Heinrich, Graf von 1799—1883)——

四十年代是普魯士縣知事; 1862—1873年任商業大臣, 1867—1870年是北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 屬保守黨。——199。

**yue**

約翰遜, 塞繆爾 (Johnson, Samuel 1709—1784)——英國作家。——15。

**zong**

宗納曼, 列奧波德 (Sonnemann, Leopold 1831—1909)——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59年起是《法蘭克福報》編輯, 帝國議會議員(1871—1876, 1878—1884)——18、67、70、72、85、86、140、173、174、187、200、205、224、249、265、295、308、309、351。